胡乔木

# 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胡乔木

# 回忆毛泽东

ISBN 7-01-001830-8

9 787010 018300 >

ISBN 7-01-001830-8 定价：45.00 元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胡乔木

# 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责任编辑:王乃庄　冀　良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
(2003.12 重印)
ISBN 7-01-001830-8

Ⅰ.胡…　Ⅱ.胡…　Ⅲ.①回忆录-中国-现代②毛泽东-生平事迹　Ⅳ.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307 号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增　订　本)
HU QIAOMU HUIYI MAO ZEDONG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3　插页:2
字数:550 千　印数:65,001-70,000 册

ISBN 7-01-001830-8　定价: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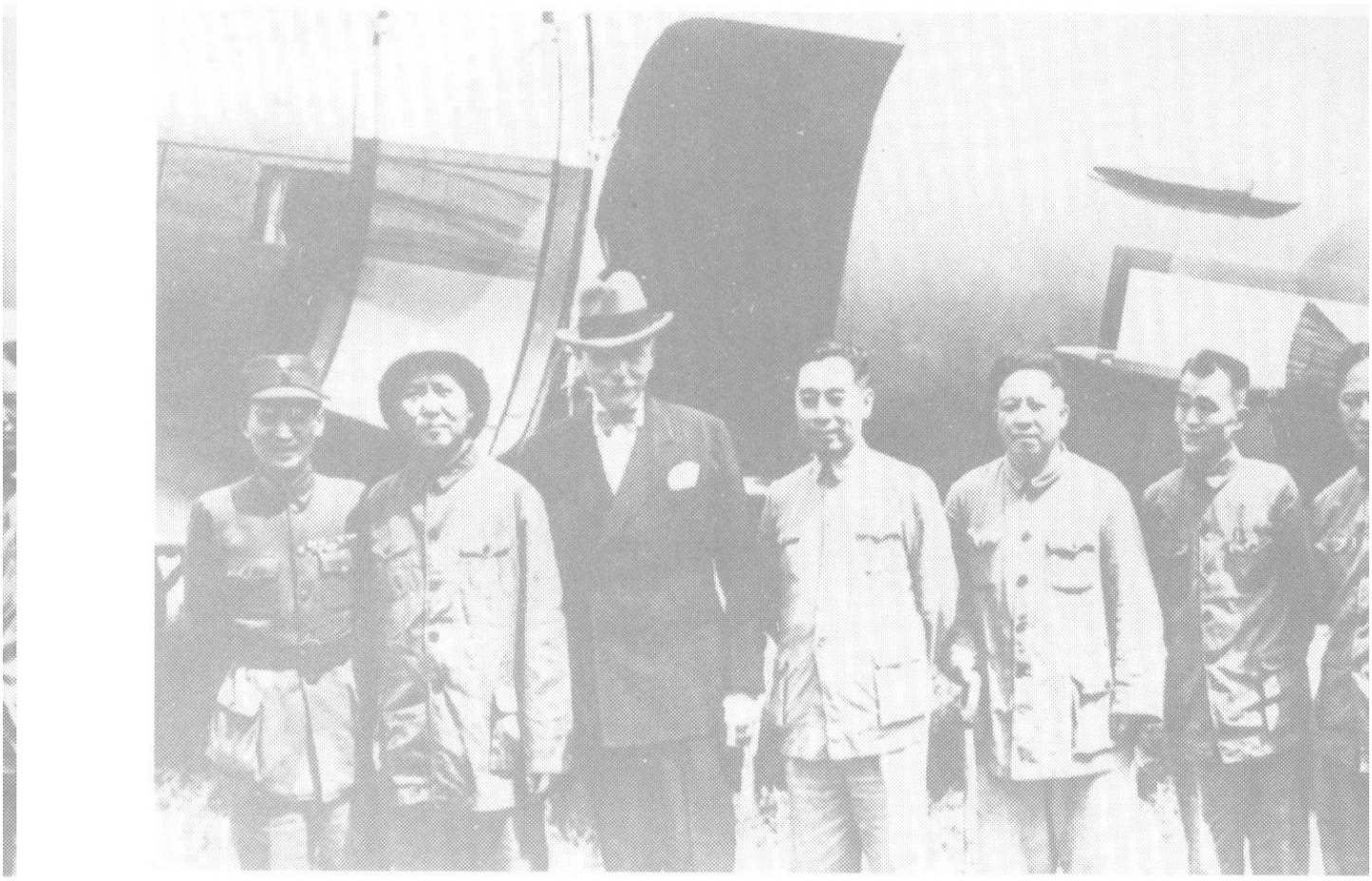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与胡乔木
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945 年 8 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胡乔木（右二）随同前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胡乔木在一起。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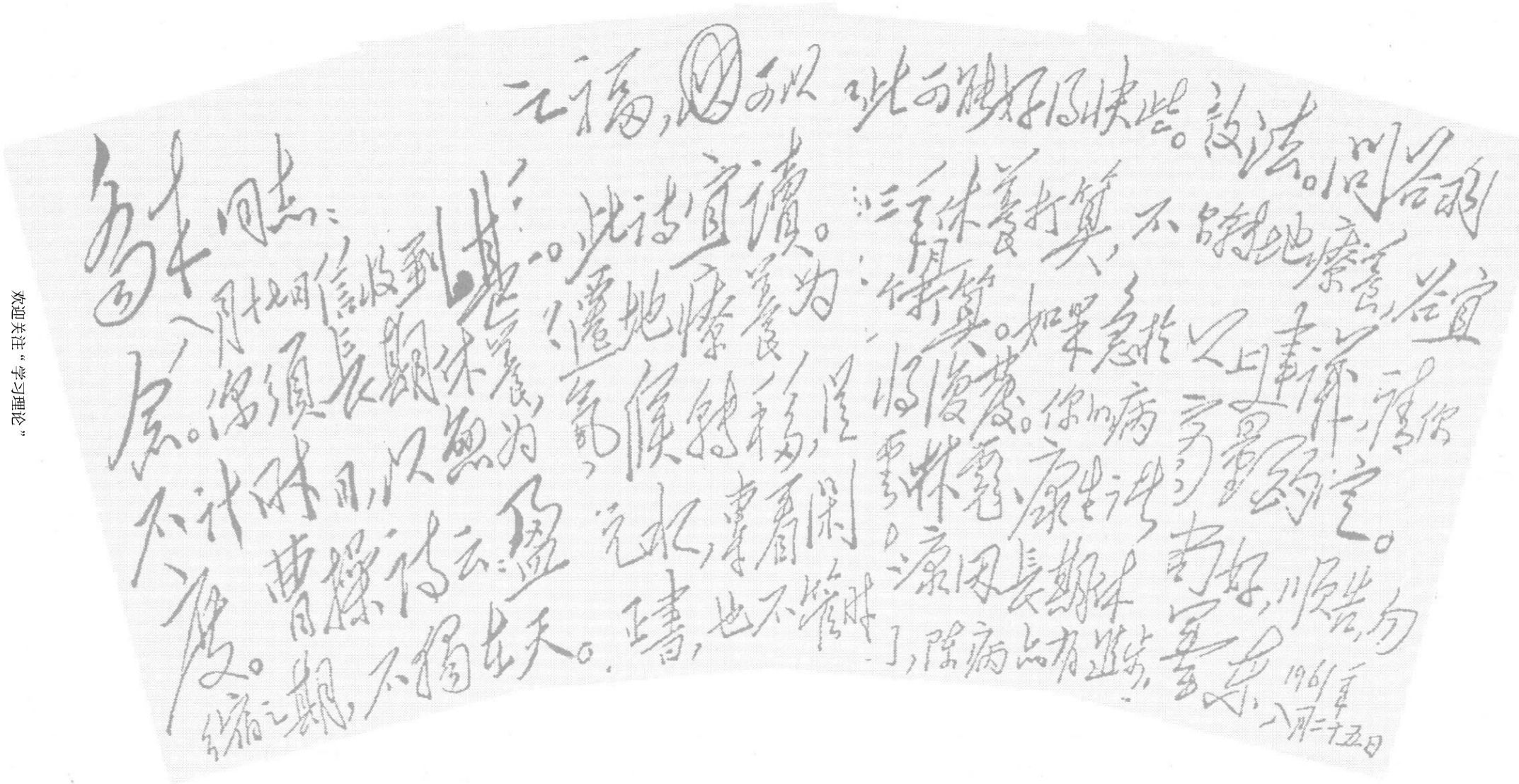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胡乔木。



1992 年 3 月胡乔木在上海瑞金宾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件手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前　言

写成和出版一部回忆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胡乔木生前未了的心愿。

1990年初，胡乔木开始考虑撰写这样一部著作，并指导几个同志着手写了几个专题。1991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工作。在这前后，胡乔木就这项工作进行过二十多次谈话。在他的指导下，编写组写出四十年代的大部分专题的初稿，并陆续送他审阅修改。有些初稿经他审阅提意见后又写成修改稿。到1992年4月，他初审了三篇修改稿（即《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和《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表示基本符合要求。以后，由于他病情加重，再也无力过问这项工作。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逝世。按照原来的设想出书的条件已经失去。已写出的回忆四十年代毛泽东的一批文稿，虽按照胡乔木的初步意见作了修改，但修改稿的大部分他都没有看过；他看过的几篇也还不是经他最后审定的文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考虑到胡乔木生前回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在他指导下撰写的专题回忆文稿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经党中央有关方面领导批准，决定将它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名义编辑出版。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其中有一篇是1985—1986年、即这项工作开始前几年他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谈话记录，因属于同一个主题，故一并收入。这些记录未经过他本人审定，但多是根据录音整理，只作了必要的文字修饰。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胡乔木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19篇文稿。在写作这些文稿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及其他资料。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无论“谈话录”的整理还是“初拟稿”的写作都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组**

1994年7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目　　录

前　言 …… (1)

## 第一部分
## 谈　话　录

一、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一) …… (3)
(1990年2月19日)
二、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二) …… (12)
(1991年8月28日)
三、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三) …… (17)
(1991年9月6日)
四、关于皖南事变和陕甘宁边区建设 …… (25)
(1990年9月6日)
五、关于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 …… (32)
(1991年11月15日)
六、关于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 …… (39)
(1990年5月23日、6月8日)
七、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九篇文章" …… (43)
(1990年4月7日、5月24日,1991年3月20日、
4月8日、11月23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八、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 (53)
(1991 年 10 月 25 日,1992 年 1 月 4 日)
九、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 …… (64)
(1985 年 12 月 7 日,1986 年 1 月 13 日、1 月 26 日)
十、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 …… (72)
(1991 年 11 月 7 日)
十一、关于延安美军观察组和赫尔利斡旋 …… (78)
(1991 年 11 月 30 日)
十二、关于重庆谈判 …… (81)
(1990 年 9 月 12 日)
十三、关于战后国际形势 …… (85)
(1991 年 11 月 1 日、12 月 17 日)
十四、关于《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 …… (94)
(1991 年 12 月 21 日)

## 第 二 部 分
## 初 拟 稿

一、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 (99)
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121)
三、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 …… (136)
四、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 …… (153)
五、编辑党的历史文献 …… (174)
六、整风运动:1941 年“九月会议”前后 …… (187)
七、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
“历史草案” …… (211)
八、大生产运动和组织起来 …… (232)
九、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 (249)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十、整风运动:1943 年“九月会议”前后 …… (269)
十一、党的历史决议 …… (302)
十二、抗战后期延安的外交活动 …… (328)
十三、党的七大 …… (360)
十四、重庆谈判 …… (388)
十五、战后国际形势和内战的爆发 …… (420)
十六、《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 …… (439)
十七、1947 年在陕北 …… (468)
十八、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 …… (510)
十九、共同纲领的制定 …… (545)

## 第 三 部 分
## 胡乔木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 (565)
(1951 年 6 月)
二、毛主席开始了工作中心的转变 …… (604)
(1979 年 1 月 6 日)
三、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永垂不朽的 …… (607)
(1979 年 1 月 6 日)
四、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解释 …… (609)
(1979 年 9 月 17 日)
五、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泽东的评价 …… (611)
(1979 年 9 月 17 日)
六、《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 …… (614)
(1980 年 3 月 15 日)
七、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 …… (619)
(1980 年 4 月 12 日、1987 年 6 月 12 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八、要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决议》的始终 …… (622)
（1980 年 5 月 16 日）
九、对一九五七年后几段历史的议论 …… (626)
（1980 年 5 月 24 日）
十、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 …… (635)
（1980 年 6 月 9 日）
十一、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
加以区别 …… (638)
（1980 年 7 月 3 日）
十二、毛主席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 …… (642)
（1980 年 7 月 5 日）
十三、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 …… (645)
（1980 年 7 月 7 日）
十四、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 …… (649)
（1980 年 7 月 24 日）
十五、毛主席跟林彪、江青完全不同 …… (654)
（1980 年 9 月 21 日）
十六、决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 …… (657)
（1980 年 9 月 21 日）
十七、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 …… (660)
（1980 年 9 月 27 日）
十八、毛泽东思想要讲三个组成部分 …… (665)
（1981 年 4 月）
十九、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是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 (666)
（1981 年 5 月 19 日）
二十、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 …… (668)
（1981 年 8 月 8 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二十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何犯“左”的错误 …… (673)
(1981 年 9 月 14 日)
二十二、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 …… (688)
(1983 年 5 月 14 日)
二十三、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 …… (701)
(1987 年 11 月 5 日)
二十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成果 …… (707)
(1991 年 6 月 25 日)

后　记 …… (721)
增订本后记 …… (725)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第一部分

# 谈话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一

# 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一)*

（1990 年 2 月 19 日）

只想说一件事。好些同志老早就向我提过一个意见，要我写些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有的同志要我写回忆。我虽然作过毛主席的秘书，但许多重要事情并不是经过秘书执行的，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因此就想另选一个题目，就是着重写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主席怎样在四十年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当然我们还可以往五十年代延伸写，那样问题比较复杂一点。可以先把四十年代的写出来，下一步再作考虑。

四十年代怎么写法？不分阶段写。如果分阶段写，就同党史差不多了。我现在想了这么几个题目。

一、毛主席怎样分析四十年代的形势。形势变化很大，很快，很复杂。现在不是去重复哪一年怎么样变化，而是说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形势中，他用什么态度什么方法来判断、来分析。

二、毛主席怎么运用战略策略。在认识形势后对大的斗争局面要制定一个战略，要有许多具体的策略。在这方面，四十年代毛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郑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主席的言论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遗产。

三、政策。政策同策略的性质不一样，有对人民的，有对敌人的、有对朋友的。一般说是比较稳定的。政策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如土地政策，政权政策，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这些方面，毛主席的言论也特别丰富。

四、对外关系的独立自主。这方面在四十年代主要是对美关系。对美关系是有斗争有联合的。还有对苏联、对共产国际，这方面很需要写，但怎么写好，要研究。现在共产国际的材料许多已经公布了，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利用它。这个题目也可以把它放在前面的政策中作为一个小题来写。

五、关于党的整风和党的建设，毛主席提出各种思想、各种原则。

六、最后还可以写毛主席作为一个宣传家的活动。他在这方面的特色、贡献，直到现在我们还需要向他学习。

这样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贡献作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还是用他的著作、活动作主线，用当时具体的历史作背景（党内、国内、国际的）。目的是想为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增加一点内容，可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有所贡献。

形势分析方面现在想到一些。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三十年代没有那样提。他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资产阶级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划分开来，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在四十年代能胜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又分出附属于不同帝国主义集团的，如依附日本的，依附英美的。后者主要是依附美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依附日本的又分为降日的和亲日的。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区别，利用这些矛盾，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取得胜利。对其他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一个中间力量），也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并采取许多重要的政策。自从三十年代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党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如从福建人民政府开始，利用不同的地方军阀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一直是党的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这方面的情况有更多的变化。党不但把中央军同地方军加以区别，而且对不同的中央军也采取不同的政策。对比较能接受抗日统一战线的如卫立煌，采取的主要是联合的政策。在地主阶级中也把开明地主区分出来。这些区分，成了四十年代我们党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对农民的研究，毛主席在四十年代用的精力很多。从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这一点上，有的是值得说说的。他对农民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纠正土改中的“左”倾时说得特别清楚。所谓贫雇农坐江山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的一系列政策。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上，他讲了许多话，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这一点上绝不能有任何含糊。讲土改时他提出农村斗争的上述公式，但在分析农民时他讲了在中国社会农民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应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在这方面他在四十年代讲的许多话，有助于反驳认为毛主席是民粹派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的影响，也很容易按照这种观点把毛主席的前前后后的想法、说法、作法作一种歪曲。但毛主席是完全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农民的。

毛主席写给博古的信，谈巩固家庭的问题。这封信点明我们党同民粹派不同，我们并不把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旧式农民身上。旧式的农民家庭是必然要分化的。农民家庭要出工人，没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工人，革命就没有希望。农民家庭要出战士，妇女要参加劳动，那么农民家庭也就不能巩固了。就在延安，毛主席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说要固守农民的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在四十年代有许多重要的发展。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也讲了很多，对其中不同的部分作了估计，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只要不反共，都欢迎，都要团结，都要使用。

四十年代所以比三十年代有所前进，是因为形势大为发展了。抗日初期，新的国共合作关系刚刚建立，我们党刚到敌后活动，这时对国民党还有种种希望。尽管我们党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但是对蒋介石还是希望他领导抗战到底。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1939 年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我们党对国民党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三十年代已提出，但到四十年代初，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许多民族资本家在抗战期间搬迁到大后方，这个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愈来愈激进，作用显得比较突出。三十年代它还不能形成自己的政党，到四十年代，它一方面建立自己的政党，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对我们党表示同情，这种形势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就日益明朗了。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是党在抗日时期一个中心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离不了这个问题。从抗日战争初期的局势，到中期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局势有很大的变化，但民族矛盾始终是占主要地位。三次反共高潮为什么没有导致国共关系破裂？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日本尽管用种种方法来诱降，国民党也确实同日本进行了多次接触想妥协下来，但是除汪精卫一派外，国民党的主体还是没有投降。所以反共高潮一次一次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起，到最后仍不能不收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非常有兴味的问题。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都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国际上好多国家也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但是一切努力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原因就在于这时候民族矛盾变了，变成另一种形式了，阶级矛盾突出起来了。

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变化很快，也很大。比如美国，在中国抗战开初的几年，它的外交的重点还是同日本妥协。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被迫改变它的重点。可是，美国在中国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很长一个时期举棋不定。这些关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之间的矛盾，也是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也特别复杂。

对这些形势怎么作判断？特别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迅速判断这种变化，非常重要。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个什么情形？然后到困难阶段，日本集中力量来对付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国民党也用主要力量来反共。我们党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困难尽管很大但终归是能够度过的。到什么时候这种力量对比逐渐改变过来，以后有了更加明显的变化？到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已是非常明朗了。

要从这种形势分析中，说明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在不断变化的，是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的，这些因素又是互相联系的。从这种形势分析中制定我们党的战略和策略。在这些矛盾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战略就不作改变，比如只要抗战时期民族矛盾的地位超过了阶级矛盾，就要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战略。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国民党及支持它的美国成了我们的主要敌人，这时我们又有了新的统一战线。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从于这个战略，有很多策略问题。毛主席曾经讲过，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不同战略阶段，这个策略始终是我们在斗争中坚持的。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这些策略可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贡献。尽管过去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也讲过这些话，但是运用成功像中国这样的例子，恐怕在世界历史上很少见。

由于运用这些策略，我们党怎么从最困难的境地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人民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但是比起抗日战争，以至红军时期，那就要好多了。这些历史情况，许多过去经历过、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能记得。我们要用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来说明，我们党怎么运用这些战略策略来克服困难，渡过困难。由某种程度的劣势改变为政治上以至军事上的优势（政治上是明显的优势，军事上是潜在的优势）。抗战结束了，和平谈判是一个争取人民、教育人民、争取多数、团结多数的过程。解放战争中，我们怎么能以弱小的力量（装备上物质上）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军事上不去讲了，因为我不是搞军事的。可以从政治上分析这个变化。从政治上分析的时候，到解放战争时期，从许多文件中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历次预见，毛主席坚持胜利的信念。好像历史的发展变化差不多就是他指挥的。敌人尽管看起来是那么气势汹汹，但是毛主席毫不动摇，坚信最后胜利一定要到来。结果，最后胜利比党中央预见的来得更快一些。前面说的策略，它的依据，正是对人民的力量、对人民在斗争中创造历史这个根本的信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这条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写的文件很多。对于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友我三方的政策，都有许多规定。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对大多数国民党军，是当友军看待的。我们力求发展壮大，有时也要退避缩小。这些都依据形势的变化来定。

农民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大的改变。为什么有那许多变化？为什么要采取那些政策？要说明。虽然中国人、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是捍卫农民利益的这一点至少在四十年代是一致公认的，但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什么要采取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的方式？为什么要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后来又采取平分土地的政策？为什么要依靠贫农？还有对富农的政策，等等，这是需要说明的，需要作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大生产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国民党停止给八路军发饷。对这样造成的困难，我们采取了哪些方法？大生产是其中的一项。在精兵简政时，仔细地计算了多少农民能够养活一个脱离生产的人。这里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在解放战争中出现很多变化。一方面产生新区，新的农民问题，另一方面产生城市，新的城市问题。统一战线政策，对外政策，比在抗日战争中复杂了。像这些政策大都同现在的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这些政策的形成、演变的历史，制定这些政策所依据的原则，对今天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整风和党的建设。整风为什么会产生？要从整个历史背景、党的历史背景来说明。要解决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对立面就是从教条出发。从教条出发，关键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中国革命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情况来做工作，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国共产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中国党带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很多困难。当然，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困难。这才产生第二次王明路线。而且，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1938年为止，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还存在，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在这个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

另一点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如果不依靠群众，党的斗争也是要失败的。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是有依靠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党的历史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历史。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风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整风文件要那样学习讨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用那么长的时间？这里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正处在缩小时期、困难时期。毛主席对彭德怀讲，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如果不是那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也是很难理解的。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普通的政党都不会这样搞。我们党以前的整顿也都同这次的整风不能比。那么多干部达到思想统一，一到需要的时候就能派出去工作，而且很顶用。如日本投降时去东北，都是整风取得成功的结果。不然，那是难以想像的。

通过这次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这需要作些说明。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就是到今天也仍然显出它的重要意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

# 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二)*

（1991 年 8 月 28 日）

早一点把班子组织起来，以后我再给大家详细讲一下。两年时间写出书来，时间比较紧。虽然不同薄(一波)老的书攀比，大致上要相称。写作不在书的厚薄、文章的长短，我们的书肯定不能写那么厚，因为薄老和我两人的身份、作用不一样。书中个人回忆要比现在的稿子有所增加。五十年代的好加一些，容易一些，四十年代的比较困难。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重复，也要同薄老的上下册尽量少重复。写成一篇篇文章，不是编年史。选题要好好研究一下。

可以设想的选题：

整风到历史决议到七大。

毛主席同解放日报。毛主席提议写的重要文章都经他看过改过。后来又有一次报纸的改组改版。毛主席认为解放日报是党报不是社报。解放日报以前是新中华报，毛主席在那个报上也发表过好多东西。我去他那里以后他就基本上不谈新中华报。以后放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郑惠、石仲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弃延安时就是新华社。这是较重要的一件事。

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毛主席的讲话。文艺座谈会前后，写起来比较复杂，当时有些事作的有过头的地方，有些事现在写出来不大容易理解。有关文艺座谈会的材料很多，作家个人写的也不少。如果定下这个题目，可以专门研究一下。

共同纲领也是一个题目。

1950年下半年，我调到中宣部去了。毛主席要我去作常务副部长兼秘书长。这个时期毛主席有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要写。

接下来有对几个作品的批判。开始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这件事不太好写。“文革”时把这个批判没有进行下去说得很严重，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一条线。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

同梁漱溟的争论，薄老的书没有提。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毛主席发火不对，但为什么发火？当时关键是对待工业化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同梁的争论主要在这里。梁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做不可的事。梁漱溟讲得那么尖刻，毛主席气得很。

然后是到合作化了。我写了一个合作社示范章程。毛主席非常重视，但实际上没有执行。四十年代，我写过一个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毛主席很重视。我费了很大的精力。在写的时候毛主席不断来催，写出几页就拿走。

三反五反开始时，我作胃切除手术，休养了，这一年的事我不清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产生，很难写得比薄老的更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1956年反冒进，我也是活动分子之一。中宣部起草的那篇社论，我作过修改。

八大文件，除周总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外，许多是我起草的，可以写相当一段文字。

然后到1957年，几件事情影响到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提出“大跃进”？一是反右派斗争胜利了。毛主席觉得是很大的胜利。完全是群众性的斗争，把资产阶级右派打退了。国际上各国共产党开了莫斯科会议。苏共原准备了一个宣言稿子，我们党提了许多修改意见。后来由我们党重新起草一个稿子，同原来的面貌不一样。这个稿子基本上被接受了，苏共的同志对我们党说了许多好话。关于和平过渡问题，小平同志讲了一篇话，讲得很清楚，毛主席很赞赏这个讲话。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只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而且也不是很和平。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整风中工人贴了很多大字报，毛主席在上海看了几个工厂的大字报，感到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这些都为“大跃进”的提出打下基础。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是《乘风破浪》，其中就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话。后来他接受了一位民主人士的建议，将“鼓起”改为“鼓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法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有这些内外因素，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提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毛主席开始还不大相信,说三年就能改变面貌了?曾希圣说,水利兴修了,两熟制改三熟制,就是改变面貌,毛主席听了觉得有道理。后来有的地方竟提出一年改变面貌的口号。

在1958年,年初开南宁会议,年尾开武昌会议。武昌会议的决议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和我多次斟酌、考虑。他当时很满意。公社化已过了高潮,他在反思。当时有两件事,一是王稼祥同志给少奇同志提出,人民公社决议不要发,认为经验不成熟。后来毛主席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也有大量的问题要解决,所以要发。另一件是,1959年的几大生产指标都订得很高。陈云同志主张不要在公报上公布。他要我向毛主席报告,我不敢去向毛主席报告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全会已经开过,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讲了很多话,人都散了,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这件事,以后在上海会议上我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这话在庐山会议前期也讲过: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后来庐山会议的气氛完全反过来了。庐山会议当然要写。同我有关系的是在会议前期写了一个会议纪要,即《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在批彭德怀时,一些人也批了这个纪要。不过,对会议纪要没有攻得那么厉害。写纪要集合了很多人,都是中央指定的,费了很大的劲才写出来。庐山会议在毛主席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谈,决定不写了。现在看,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

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没有参加。我到1960年春就集中力量搞《毛选》第四卷的编辑工作。本来庐山会议后就有人提出继续出《毛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出《毛选》的问题,而是出《刘选》。

以后几年,我几乎全在同苏联打交道。三次去苏联谈判。中苏争论开头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中苏合营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问题。苏联当局企图用合营的方式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中国要保卫自己的主权,反对合营。毛主席当时说了三条:一、苏联要搞,我们去打游击;二、海岸都归你们;三、中国自己搞,苏联只提供技术援助。话说得很尖锐。苏联所以垮台,同它这种蛮不讲理的大国沙文主义有关。这里边的争论很多。

到1961年我去搞农村调查,然后开广州会议搞农业六十条。毛主席要我到韶山解决食堂问题。有个电视剧说毛主席要他的乡亲回去解散食堂,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书上也有人这样写过,肯定夸大。这样大的政策,毛主席不会通过他的乡亲去解决。一直到起草六十条的末了,还写了一句,食堂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农民听了最有兴趣的是这句话。

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

不久,我患了精神衰弱症。报告了小平同志,决定让我休息。

这已经到了六十年代了。与这本书规定写的时间四十、五十年代有点超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三

# 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三)*

(1991 年 9 月 6 日)

写一本书,回忆毛主席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书名怎么定,再斟酌。大致是这个意思。1940 年我还未到毛主席那里去。我是 1941 年去的,到六十年代初离开。关于四十年代定了 15 个题目,关于五十年代定了 22 个题目。五十年代时间长一点,建国以后事情比较多,题目多一些。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不把中央整个活动放到里面。中央一些活动同毛主席没有关系的就不说了。因为是个人回忆,拟定的题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我没有接触过,就不好写进去,如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等。有些事也许没有那么大,但从个人回忆方面说,比较清楚,就列到题目里。

说是个人回忆,但有相当多的事也不能限于个人回忆。有些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我不很了解,这种事我还是要写。这在四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龚育之、郑惠、石仲泉、东生、林蕴晖、郑谦、邱敦红、徐永军、施肇域、张高富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十年代中的情况更多一些。五十年代个人回忆的成分多一些，同毛主席的接触超过秘书的身份。四十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不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写的时候不要勉强加入个人成分。勉强加入不适当，使读者感觉是故意把个人加进去，失掉书的主旨，成为不是回忆毛主席，而是回忆自己 。回忆成分多少要看事实。凡是可以回忆的、个人接触多的就写进去，也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书的篇幅现在还不能估算出来，大体上比薄老写的分量要小一些。他写的一些题目涉及范围很广，利用的档案资料比较多。我的书分量要稍微小一些。最早是想一篇只写一万字，现在看一万字不行，可能要到两万三万。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

材料来源，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的记载（报刊上的）；三是个人回忆。三方面结合起来。仅仅靠个人回忆是不够的，不能把事情说清楚。

出书的时间，1993 年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最好在那个时候出。时间比较紧，1993 年 6 月就要定稿。当然还是以书的质量为第一标准。如全书不能都定，也可以分册出。尽量争取全书都出。时间要计算一下，排个日程。

题目，四十年代 15 个，现在分别说一下。

一、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1941 年我去毛主席那里工作时，他正忙着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化。那个纲领最初不是毛主席写的，但他作了大量的修改，费的心血比较多，同他写的差不多。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毛主席提了很多意见，作过很多工作。

二、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这个总结的内容很丰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毛主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开。文章不限于写皖南事变,包括毛主席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后提出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

三、苏德战争与中国战局。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我们党、国民党、日本、英、美、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很多事件。苏德战争、特别是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缓和,国民党作了很多表示,我们党作了很多努力。但我们党的努力始终没有从国民党方面得到积极的反应,一直到后来美国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战。

四、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编《六大以来》的时间比较早。我到毛主席那里去时,他已经在编,并不是在整风以后才编。出版的时间晚一点。毛主席不但亲自编,而且亲自校对。后来我把校对工作接过来。《两条路线》是从《六大以来》中选出来的。编出《六大以来》使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一个武器。把党的历史文献编出来,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了口服心服。过去没有涉及过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整风时涉及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五、整风运动。主要叙述党中央的整风。全党的群众性的整风要提到,但不占主要地位。党中央的整风同党的历史总结有关系。

六、文艺座谈会前后。整风时毛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要介绍会前作家的状况,作品的状况,毛主席同作家的交谈,等等。会后,作家下乡、下部队,同群众结合。

七、大生产运动。介绍一个背景,为什么要发动大生产运动。一方面是国民党停止发饷,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军民关系较紧张,农民负担重。因此要动员部队、机关、学校自己动手,解决财政来源,减轻农民负担。

八、组织起来。在大生产运动中出现了组织起来的动向,在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业生产中也在流通领域中形成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毛主席发表组织起来的讲演。这是毛主席一生非常重要的思想。他一生的斗争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影响一直到解放以后，提出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问题。

九、同美国的谈判。1944 年美国直接参加中国战场作战，有很多人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发展一种关系，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进行一些政治谈判，最后没有谈成功，但影响比较大。写这个题目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国内没有一部写谈判的历史的著作，当时的许多材料没有公开发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各种回忆。写这个是填补很重要的一个空白。

十、历史决议和七大。

十一、重庆谈判。指 1945 年 8 月末到 10 月初在重庆的谈判，不包括后来 1946 年年初的谈判，只以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为限。毛主席的谈判为后来的谈判打下一个基础。

十二、战后国际形势。这是二次大战后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就要发生。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谈话。同时由陆定一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由毛主席作了很多修改，对认识当时的形势意义较大，影响较深远。

十三、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毛主席同解放日报、新华社的联系相当密切。解放日报是毛主席创办的，毛主席为报纸写过大量文章、新闻，对编辑部的文章作过大量修改，对报纸的方针提过重要的意见。新华社是 1937 年成立的。毛主席为它写过多少东西，作过多少工作，要介绍一下。解放后毛主席也为报纸通讯社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如那一段有那么多时间来过问，写了那么多评论，包括观察家的评论、新闻稿（述评性的）。一直到西柏坡，毛主席还为新华社写了不少东西。

十四、在陕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十五、在西柏坡。

五十年代的题目22个，也分别说一下。

一、共同纲领。这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文件，提出了我党建国的各方面政策。要写明毛主席对此作过什么指示，作过什么修改。

二、建国初期的宣传工作。想把评论白皮书文章的学习包括在内。抗美援朝的宣传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能不能打赢这个仗，前途怎样？对美帝国主义怎么认识？这些都很重要。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也是一件大事。土改本身没有宣传，但为了帮助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实际、农村的实际，倡导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有很重要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要写一写。为了把中间派吸引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当时做了许多工作。宣传工作不只是这些，但从这个侧面写很有意义。

三、对外关系。着重说一下中国真正独立了，结束了过去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地位，现在站起来了，各个方面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思想和方针政策。

四、全国统一和少数民族问题。统一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中国在现代史上长期没有统一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真正的统一、高度的统一，是以前统治阶级不可能做到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从解放新疆西藏到建立许多民族自治区，改变历史上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真正形成平等的关系。方针不是民族自决，而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时间愈久愈表明它的正确性。汉族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40多年来基本上保持了和睦关系，是建国初期奠定的基础，以后发生了错误，已经纠正了。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但基础是好的。

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争论和宣传。主要指毛主席同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漱溟的争论，很多人作了文章，甚至出了书。有些文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把争论的实质说出来。争论不仅是对梁漱溟一个人。当时在党外，民主人士中，有人对立即实行工业化有疑虑。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意见还不是第一位的。这些人认为，战争过后要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搞工业化会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加重。梁漱溟是一个代表。党内也有争论，如对统购统销。说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那么平静的一件事。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主席作了不少修改，也可以说一说。

六、起草宪法。在起草宪法前还起草过一个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决议内容主要是反对高饶，强调党的统一，党的纪律。这个文件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写的，毛主席作了大量修改，讲了一些很尖锐的话，说帝国主义必然要在中国党内寻找代理人，因此党必须加强团结统一，加强纪律，同帝国主义分裂党的阴谋进行斗争。按实际情况说，高岗不能说是哪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倒是同苏联有关系。

七、向苏联和苏联专家学习。毛主席很重视这件事。当时难免发生照搬照抄，所以后来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但是总起来说，苏联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苏联专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也不应当忘记。

八、关于文艺问题的几次批判。对《清宫秘史》、《武训传》、胡风批判以后，没有就此完结，以后一直进行到“文革”。这里主要说建国初期那一段，后面可以捎带说说。

九、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5 年初毛主席提出要我修改邓子恢同志等起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毛主席当时指示要稳定下来，要将合作社的一些规章标准化，在全国统一执行。但是后来领导思想变化太快，稳定不下来。毛主席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一种矛盾的思想，希望稳定下来，同时又想要不断改变。

十、知识分子会议和农业发展纲要。知识分子会议是中央决定召开的，由周总理主持，毛主席讲了话。农业发展纲要在会前进行过讨论，会议中间也进行过讨论。

十一、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一次会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后来毛主席的想法改变了，但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同毛主席的指导分不开。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十二、苏共二十大和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

十三、双百方针和人民日报的改版。毛主席在1956年鉴于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很希望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一种新的探索，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提出双百方针是个重要标志。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由原来的一张扩大为两张，主要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要打破陈规，办得生动活泼，让各种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包括对党的批评。毛主席不仅作了口头指示，中央还有正式文件。毛主席对宣传方面的新想法还有好多，可以一起说一下。

十四、八大。写些什么，还没有想好，是有许多问题值得讲的。

十五、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到反右派斗争以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以后发展到大鸣大放，右派进攻，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及反右斗争结束以后一些事。本来是全党整风，反右斗争一来打乱了，以后重新进行整风，在工厂农村中提出许多积极的批评意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对1958年“大跃进”有很大关系。毛主席认为，整风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他在上海看了工厂的大字报，非常兴奋，感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加上其他因素，于是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十六、1957年莫斯科会议。莫斯科宣言，苏联搞了一个稿子，我们提了许多意见，等于推翻原来的稿子。后来由中国党起草的稿子通过了。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这一段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可以讲了。

十七、1958年“大跃进”。这一篇在内容上要避免同薄老写的发生重复。少量的重复不可避免。

十八、武昌会议。1958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毛主席的思想。北戴河会议决议他没有多加考虑。武昌会议决议毛主席是深思熟虑，作了反复修改的。不仅涉及人民公社的问题，还涉及经济发展的速度。

十九、庐山会议前期的继续纠“左”。

二十、庐山会议。

二十一、毛选四卷的编辑。

二十二、人民公社六十条。

已写的稿子大体上定下来，对后来的稿子有好处，有个统一的标准。

与薄老的书不同，他写的是重大决策，我写的是回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四

# 关于皖南事变和陕甘宁边区建设*

（1990年9月6日）

## 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影响很大。我们党的政治进攻取得了胜利。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大。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消灭共产党，至少消灭新四军。他以为日本人会鼓励他，至少会中立、不作声。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进攻新四军，日本人还是打了他。他也没想到国内国际上有那么大的反响。蒋就进退失据了。这说明当时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同共产党破裂是不可能的。他们一方面要大规模地反共，一方面还要维持抗日的形势，这是不可能的。

在皖南事变前，国民党作了长时间的舆论准备。从何、白"皓电"开始，命令新四军北调，这很毒辣。英、美政府对这个步骤并没有怎么关心，事变之后也没有怎么关心。因为它们正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想同日本妥协。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石仲泉、田松年、高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对于“皓电”，我们的反应是低调的。毛主席也觉得应该谨慎。低调的反应使人们认识到共产党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这就争取了中间派。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布一月十七日命令，反诬新四军叛变。党中央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采取尖锐对立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当时我们曾一度估计可能破裂，又估计破裂有一个过程，我们想延缓它，逐渐形成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在我们实行了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之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后来中间派形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同这一形势的发展有关。以前阵线没有这么分明。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间派也许就不会独立出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了。国际上，后来美国也报道了皖南事变。我们赢得了支持。蒋消极抗日，英、美当时也消极，但英、美还希望中国牵制日本。

蒋介石对日本人估计错了，对共产党估计错了，对中国人民的态度估计错了，对国际反应也估计错了。皖南事变后他的处境很被动，陷于孤立。我们提出十二条，后来又有一个补充十二条。尽管蒋介石没有接受，后来还反共，但以这次为界限，此后逐渐走向缓和了。蒋在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人民知道，国民党这回输了。这是我们斗争的结果。当然，我们也付出了牺牲。

皖南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中央在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当然，打是会打的，如果处理得好些，不至于有那样大的损失。我们同意北上，对我们有利。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军事上也有利。皖南山区，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作出让步也是正确的，赢得了支持。

假如历史不采用皖南事变的形式出现，我们同样可以采取别的方式争取中间派。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在策略上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握得很好。加速了争取中间派向我党靠拢的进程，从此，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成熟。蒋介石的反共再也没有那么大的高潮了。到1944年，国民党在日本军队的进攻面前，军事上发生大溃退，政治上的腐败也暴露无遗。国共两党、国统区与解放区在人民心目中形成鲜明的对比。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对王明右倾路线的认识更清楚了。新四军领导人在这次事变上的失算，是与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有关的。经过这次事变，我们在军事上尽管受了那样大的损失，政治上却有很大的进展。就是在军事上，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利。要我军退到黄河以北，是国民党一贯的方针。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这个企图就被打破了。新四军在苏北把韩德勤的军队打退了，在整个江淮站住了。八路军、新四军连成一片了。整个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更加有利。这次斗争的成功，表现出毛主席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

这个题目怎么写法？我想着重写对毛主席的回忆，写到我自己的应当很少。我是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初到毛主席那里的。我在1937年到延安，从1937年到1938年8月在安吴堡青训班，1938年8月回到延安到中央青委工作，然后从青委机关调到毛主席那里。

文章采用回忆方式，不是回忆整个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历史过程，而是回忆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中的决策。不是全面地写历史，那样就必须写到重庆方面的斗争。这里只写毛主席怎么领导这个斗争。

这一段的资料很丰富。除了看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资料、《中共中央文件集》，还要到中央档案馆去看档案。此外，再看其他方面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资料。还有，我们在大后方的工作，怎么把皖南事变揭露出来争取广大群众，美国方面对事变的情况是怎么知道的，这都是我们做工作的结果，要找材料。说到斗争的发展时，要注意有关方面的情况。

皖南事变的背景要讲得简要明白。应当多讲事变过程中毛主席的分析、决策。材料很多，只能选用其中少数重要的。

这次斗争，毛主席自己做过总结，我们可再作个历史回顾。本来，皖南事变前，国民党要求我们的军队退到黄河以北，对我们压力很大。我们答以“佳电”，现在看来也很正确。听陈云同志说，毛主席写“佳电”写了一夜，反复推敲，到天亮，看看可以了。其中一些话，后来毛主席反复指示要宣传。“佳电”用词恳切，是一篇很好的驳蒋的文章。当时蒋标榜的是要统一军令。他的命令很不容易驳。尽管后来他还在叫统一军令，一直叫到 1946 年召开政协，但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一次大的斗争，人民感觉到了，他的所谓统一军令，就是要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而这又是消灭不了的（那时我们的力量还不是很大，没有抗战胜利时那么大）。他不发饷了，我们却自由了。蒋介石采取这一步骤确实得不偿失。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战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次运用得淋漓尽致。这是很难得的一段历史经验。毛主席怎么分析形势？形势是千变万化的。日本人同蒋介石有矛盾。但在这次事变中这种矛盾会如何发展，很难料定。对中间派的态度，如何逐步把中间派争取过来，当时也很难料定。国际上的反应也是争取得来的。后来国民党本身的分化也很大。其中左派不说，中间派由对共产党的压力变成对国民党本身的压力了。军队中的矛盾也增加了。顾祝同不能指挥江北，江北由汤恩伯指挥，但汤恩伯也不能指挥江南。我们还利用了桂系和蒋的矛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这篇文章不要写长，可以写得很出色。我们在斗争实践中发展自己的认识，要用文字把认识表述出来，也不是很容易的。

##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

以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标志，建设边区的思想在毛主席思想的发展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这个《施政纲领》实际上是毛主席写的，全部由他修改定稿的。这是规定党中央对内的政策，即根据地内实行的政策。相对于其他根据地来说，陕甘宁边区所处的是较和平的环境，政策的实行可以较为从容。1941 年的这个《施政纲领》代表了抗战时期毛主席对根据地的政策思想。

另一方面，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后来国民党进攻边区时，表现得更充分。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这是一个因素。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转战陕北是难以想像的。群众对党、对军队爱戴、信任，毛主席对群众也信任。

这种信任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施政纲领》之后两年中，毛主席作了很多指示，直接做了很多工作。毛主席和党中央住在陕甘宁边区，不是像住在旅馆里，的确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

做这些工作的时间大体上在 1941 年和 1942 年这两年中。这两年中指示较多，再往后，他对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指示还有，就少了。建设边区的思想在这两年中已经奠定。以后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就是一个概括。

《施政纲领》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背景。国民党不要民主，它反共反人民。我们首先突出民主，如实行选举，建立参议会，作了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多的工作。为什么要实行选举？怎么选？怎么实现民主、团结，又提出三三制？这有一个全国的环境，要与民主人士精诚团结。毛主席有很多考虑。他的根据，是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的阶级阶层在人口中占着很大的数量。要争取全国的中间力量。当时陕北有一个警备区，没经过土地革命；抗日了，要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开明绅士（有些老区找不出开明绅士了，也没有必要了）。警备区人口比老区还多。陇东等地人口稠密。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三三制，影响很大。共和国成立时，也继承这个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些政策，当时是很有特色的。

经济方面，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人民的负担是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决财政问题？后来发表的那篇文章提出，不解决经济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财政问题。毛主席认真地研究了经济问题。当时党内有不同看法。处理好也不容易。为了实施《施政纲领》，要有些具体领导。这样就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当时还未提出大生产问题，但接触到了。

陕甘宁地区人民的财政负担是否重？开始时认为不重，同国统区比不算重。后来慢慢地认识到，公粮收重了。不是有一个故事吗？有次打雷，打死了一个干部，有人说怎么不把毛泽东打死。处理这个问题，也反映出毛主席的特色。他不但不去追究，反而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有这种意见。于是就提出精兵简政，发展生产。这是一个转机。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同时指出，人民负担一点是必要的。如在运盐问题上，当时只有盐能与外边交换，而产盐区与交换地点又有距离。要不要运盐，有点分歧。毛主席认为，在运盐这些事情上有一点强制性是必要的。

在这以前和以后，毛主席都多次讲过，对边区在全国的地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等问题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

要写的题目很多，不一定都涉及。如对边区的文教工作，他也有很多指示。看看是否要单独写一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五

# 关于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

（1991 年 11 月 15 日）

关于施政纲领，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1939 年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一个是 1941 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边区施政纲领是 1941 年 5 月公布的，那时我已到毛主席身边，看到他修改这个纲领。当时在《解放日报》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毛主席指示我也参加这项宣传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有关论述、中央文件和边区的实际，我为《解放日报》写了好几篇社论。这完全可以单独作为我们要写的一个题目，放在皖南事变的题目之后，把原计划的顺序改变一下。下面谈一些想法。

写施政纲领，先写纲领的背景，然后写两个纲领的比较，主要是 1941 年的边区施政纲领同 1939 年的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发展。边区施政纲领的内容确实是一段时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解放区的具体运用。它对各个方面工作都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政策，政治方面，法律方面，教育方面，科学文化方面，知识分子方面，还包括提倡新文字等等，是一个系列，比新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鲁振祥、郑惠、石仲泉、邱敦红、张高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民主主义论具体得多。这个纲领发布后，敌后其他根据地也发表了类似的纲领，表明当时党中央的政策跟后来的政策在思路上是一贯的。不必逐条讲，可以分门别类议论一下。这是实在的东西，反映毛主席当时比较有系统的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当时我们党对国民党1938年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是拥护的，并不是采取反对态度。这要作点说明。比较起来，边区纲领要比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水平高。我们以后批评国民党是说它没有执行它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在宣传上，当时同批评国民党没有执行三民主义是差不多相提并论的。可以把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作为背景写，要提，但不是专门讨论。

红军到陕北以后的事，作背景写。主要讲四十年代，对以前的事可以追述。以前的一些问题在四十年代还是存在的，还是要继续解决的，不过，四十年代比红军初到时有很大变化。边区本身的工作已经有了章法，组织健全起来了。原来既有边区党委，还有陕西省委，是平行的，贾拓夫、张德生他们在陕西省委，后来贾调到边区党委。成立西北局，陕西省委工作大概是合并了。不仅是陕西省，还有甘肃的工作、内蒙的工作，西北局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延安归边区。

讲到边区政治经济建设，首先应该讲毛主席对边区的重视。很值得讲，因为他曾反复多次地讲这个问题，恐怕三十年代到陕北就在讲，直到四十年代还在讲。有两个显著的论点，一个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一个是洋包子和土包子，还有其他许多观点。毛主席强调要重视并尊重陕甘宁边区，尊重陕甘宁边区的同志和他们的工作，这一点是他的基本思想。他在陕北、在延安时期，始终是这样一个观点，由此出发才谈到他对边区做了些什么工作。毛主席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原因很清楚，从南方来了大批干部，一个时候集中在边区，对边区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否则，对边区看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起，中央和边区的关系就不好处理。

政治建设方面，讲的面要宽一点。首先是中央与边区的关系，可以从历史上回顾一下演变过程。开始一段是中央直接管，后来边区同志自己管，但中央对边区工作始终关怀、支持，一直多方面地进行指导。边区党委、西北局开会，不说大会，就是日常会议，每次中央都派人去参加。有一段时间，是指定任弼时同志管边区、西北局工作。但毛主席还是管得很多。他亲自抓施政纲领的制定就是一个例子。

本地干部、外来干部的关系问题，毛主席一直非常强调。

边区党委的领导、政府的领导、西北局的领导，中央都是派了人的。除林老（林伯渠）、谢老（谢觉哉）管政府外，在边区党委、西北局，李卓然是中央派的，后来派李维汉做边区政府秘书长，再早还有张国焘。李维汉去当秘书长，这是毛主席下的很重要的决心。以后陈正人也是边区党委、西北局方面的负责人。这些事只能是毛主席决定。李维汉去边区，是很重要的一着棋，这在陕甘宁边区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协调林老、谢老和高岗之间的关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边区本身范围由小到大。1940 年前，绥德等 5 县划为警备区，后来并入边区，这对边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陇东、关中也都有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反“磨擦”。因为边区一成立，就不断处在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中间。在延安县，国民党的县长保存了很长时间。国民党在绥德地区有个何绍南，是行政督察专员，跟我们“磨擦”得很厉害，毛主席写了很多有关的电报。有一个电报要求国民党当局把何调走，因他不断搞“磨擦”，使得边区不得安宁。电报推荐王震，说王震如何好，懂得大局，深堪重用，要求国民党当局让他负责警备区工作。反“磨擦”过程很长，讲领导边区的政治建设，离不开反“磨擦”斗争。抗战开始不久，用萧劲光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名义出了一个关于八路军留守处的布告。后来把警备区并入边区,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组织。因为有这个组织,贺龙过问边区的事了。陈云管联防区的财经。毛主席、党中央与边区关系之深,不说这些事情,就不容易了解清楚。毛主席确实有点像把边区当作自己的"亲儿子",非常爱护。

拥政爱民是件很大的事。所以要提出拥政爱民,就是因为留守兵团与地方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比较紧张。遇到两方面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就责备留守兵团,很严厉。有一次会上,兵团领导人讲留守兵团作了哪些工作,讲了很多成绩。讲后,毛主席激动地说:成绩,成绩,成绩!用不着说这么多了,有成绩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讲成绩,是要讲缺点。这件事可能跟规定拥政爱民有关系,就是要求部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这样,双方纠纷才有前提加以解决。

以后边区党委扩大成为西北局。西北局开了高干会,是件很大的事,开了可能有两个月,讨论了许多问题,包括边区历史问题,工作问题等等。毛主席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就是在那个会上作的。

总之,毛主席对边区工作,从政治上讲,参议会、三三制是一个部分。单说这个,远不能表示毛主席与边区政治上关系之深。毛主席在1947年撤出延安后为什么坚持留在陕北,而且在同胡宗南军队作战中胜利了?党、政府、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本的原因。这是有来由的,从这里讲起就讲出头绪了。不然,不容易说清楚。这是个大题目。

关于经济问题,要说明这里有一场争论。毛主席为这个问题写的东西,写的信,要用,全文用。当时,实际上是林老、谢老在一边;高岗主持的边区党委在一边,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后来派李维汉去,毛主席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林老、谢老年高德劭,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多少显得有点居高临下，高岗自恃正确，没有处好同他们的关系。他们二老又不大善于处理这种关系，认为他们说的话，高岗应该尊重。毛主席决定派李维汉去，李有组织能力，会处理这种关系。结果处理得比较圆满，同时还继续重用二老。这样回忆，读者可以理解。

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有好多事，其中之一是运盐，政府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非运不可。毛主席有一封信，说政府没有一点半强制，是不行的，维持不下去。任何政权都得要有一定的权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时围绕财政、经济问题，争论不少。这部分内容不能回避，在回忆中要写出来。

关于边区人民负担问题，人民该负担的还是要负担，但负担是否重了？《解放日报》发表南汉宸的一篇长文章，拿陕北同山西对比，拿历史对比，证明边区人民负担不重。事实上，后来证明是重了，所以提出精兵简政，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这些政策就是在这么个矛盾背景下提出来的。林老、谢老反映了问题的一方面，没有考虑全局，但考虑全局也不能不考虑人民负担的轻重问题。开始强调必须要有负担是必要的，但是负担的轻重是不是适当，问题要在实践中逐步解决。经过这些过程，才能产生正确的政策。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不能说成全是毛主席的著作。大部分稿子是李富春写的，毛主席加了许多分析，加写了许多文字。当时以毛主席的名义发表，毛主席并不愿意就说这全是他的东西。这里还得区别一下。里面引用的调查材料，不是毛主席调查的，用的是李富春他们搜集的现成材料。他没有在会上作报告，只讲了一篇话，不可能把整个的都讲。可以查查档案原稿，哪些是毛主席修改的。对他修改部分可以作些介绍。

毛主席在那时很强调经济工作，后来反而不那么强调了。延安时期的调查，是解放后不可比的。全国解放初期，对各个问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各个省每个月或几个月都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毛主席看了这些报告，对各部门各地方的情况比较清楚。以后毛主席不主持政治局会议了，仍然看综合报告。这种报告一般不详细讲情况，着重讲政策。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可以使省、部级的领导有全局的考虑，这个工作继续时间不长，以后毛主席不抓了，这个工作就停了。

前些年李维汉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西北局的历史，可以说那是中央的结论。李作了大量调查，形成的那些结论中央通过了，陕北地方同志也同意了。除高岗问题外，还有朱理治、郭洪涛的问题比较麻烦。朱、郭对当时的结论不服气，认为说得过分了，他们个人责任没有那么大。他们也不是说当时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但许多事情不是他们个人决定的。我们的稿子可以避开关于高岗等的一些细节，专门讲一些思想内容，一些很精彩的思想内容。当时的西北局高干会首先肯定刘志丹，连带也肯定高岗，并不是专门肯定高岗。刘志丹代表比较长的一段历史，那段时间高岗并不起主要作用。《解放日报》发表过一整版新闻，是我写的，里面提到高岗。我本来在新闻里写了，边区老百姓讲“我们的高麻子”，毛主席把它改为“我们的老高”。

你们写的初稿对大生产的具体叙述不清楚，讲笼统的话比较多。如三五九旅应该具体叙述一下。南泥湾开荒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吴满有运动、赵占魁运动都要讲，不然显得议论很多，太抽象。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那个初稿中讲了足食，没有讲丰衣。丰衣就是纺线，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周总理纺线纺得很好，传为美谈。毛主席参加过开荒，没听说他纺线。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出过单行本，毛主席写过很重要的按语，要全文引。毛主席说作家要向这篇东西学习，才能写出好东西。

大生产，边区工业生产也应该提一下。边区工业，以军工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主，其次是造纸。因为当时没有纸，要自己解决。其他轻工业，可能还有些，不突出。毛主席在工业展览会上讲了一段话，对工业的评价是很突出的。

在发展工业方面，毛主席特别表扬沈鸿、钱之道是劳动英雄。这在边区很难得。这个情况要讲，除讲吴满有、赵占魁外，还要讲沈鸿、钱之道。

组织起来，怎么写法？要照顾后来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写的初稿发了很多议论，跟解放后的发展，一直到改革开放，衔接不起来。农业互助组织，照那样的设想发展下去是很美好的。但事实上，后来没有继续下去，这可能与战争有关系。你们写的初稿把组织起来的问题说得绝对化了，没法解释现在的包产到户了。当然包产到户并不是分田单干，但那么强调集体劳动，有些话就说不下去。集体劳动也有效，但不能说得太高。那时的集体劳动是有限的，在合作化时期已显出毛病，到公社化时期更明显了。初稿在这方面说话有点顾头不顾尾，议论太多，跟全书体例不够吻合。议论部分要适当压缩，回忆要以事实为主，不能以议论为主。

组织起来，有一件小事要提一下，当时安塞出现一个合作化程度很高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没有存在好久，因主客观条件都不那么成熟。但毛主席非常重视。关于这个合作社，《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篇调查报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六

# 关于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

（1990年5月23日、6月8日）

苏德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苏关系影响很大。

苏德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非常紧张，经常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当时有个苏联人在延安，他的任务就是催促八路军打到东北去，急得不得了。苏联很难了解中国。对中国党的政策、方针，他们不理解，只说中共不支持他们。

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完全处于观望状态。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也不想过问中国的抗战。太平洋战争后，美国一开始大败，这才促使它考虑中国抗日战场，改变起初不关心的态度。通过这么一个过程，美国才认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

毛主席为苏德战争写过一篇社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收入时有修改。战争一爆发，毛主席就让我写了一篇文章：《苏必胜，德必败》。那时我们住在枣园。毛主席出了题目后，让我当场写。请你们找出这篇文章看看。这并不是要说我写的这篇东西如何重要，而是通过这篇社论的写作看出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情是多

---

* 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徐永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么迫切。毛主席写的社论是在这篇文章之后。苏德战争期间，毛主席还写过一些新闻稿。

苏德战场的各种变化，引起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这个问题，现在不大为人注意，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有话可说。

莫斯科保卫战时，有一天，书记处在枣园开会讨论战局情况。毛主席让警卫员拿地图，警卫员拿去了中国地图，毛主席生了很大的气，说他要的是世界地图。当时毛主席很着急，要研究希特勒打到什么地方了。毛主席没有想到，在战争初期苏联军队那么不经打。

这个题目有大量的文字材料可用，如社论、电报，也不复杂。你们现在就着手写，从战争爆发写到大反攻。

苏德战争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它对国内抗战有很大的影响。这之前，中国抗战是很沉闷、很危险的。国内发生了皖南事变。国际上，英美等国有可能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利益，这就是当时我们说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这种危险是相当严重的。这是当时的一件大事。

苏德战争以前，苏联也是很危险的。他们同德国签订和约是不得已。苏联的政治信誉因此大受影响，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尽管苏联反复强调，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不必介入，但仍不能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所接受，因为共产党是反对法西斯的。如果同希特勒德国签订和约只是一种策略，斯大林就应该积极准备战争，但他显然准备不足。

日本当时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相当可观。他们发动珍珠港事件是老早就计算好了的，认为可以打赢。在南洋，英国军队被日本军队打得大败，不堪一击。英国当时号称海上霸王，但日本没有费多大的力量很快就占领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珍珠港事件前，英美并不是完全小看了日本的力量。他们想同日本妥协，而且以为日本也是愿意妥协的。英美还支持日本，卖军火、卖废铁给它。美国当时没想着帮助中国抵抗日本。所以蒋介石派人到美国游说，没有什么结果。

苏德战争的爆发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两个事件时间相距不远，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苏德战争初期，我们党虽然对苏联战场焦虑不安，但对苏联最终将取得胜利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

1941 年 11 月 7 日，斯大林要像往年一样在红场阅兵，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德军离莫斯科已不很远，它可以搞空袭。但苏联红军作了严密的防范，掌握了制空权。这极大地鼓舞了苏军的士气，最终莫斯科保住了。希特勒的闪电战破产了。

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人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有一段观察的时间，在苏军稳住阵脚后，才提出开辟第二战场。对第二战场的开辟，英美一直采取拖延战术。这一方面是他们想有意消耗苏联的力量，另一方面确实不容易，要在诺曼底登陆很难。英美在这一登陆战中出了不少名将。

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有一段时间也认为英美完了，也想过向日德靠拢。因此，一时间投降活动又有抬头。但战局的发展与蒋介石设想的不同。美军在战争爆发后的退却中慢慢地站稳了脚跟，相继争夺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中途岛一战，日本海军遭到很大的失败。这以后，史迪威指挥盟军打通滇缅路。在打通滇缅路时，国民党军队的不少将领还是很努力的，但国民党的腐败也暴露在美国面前。美国舆论说，美国援华物资要分一部分给共产党。这样，美国才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如果不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世界局势不会如此发展，中国抗战局势的发展也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有一些不同。我们的困难会大得多。

由于美国的压力，1943 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趁此叫嚣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也要解散，并秘密地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没有成功。这是由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

写这篇文章，一方面要反映出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紧张、沉重的心情。毛主席当时是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经常发表社论，每天都有苏德战场情况的报道。另一方面要反映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中国的影响，则是由原来的击破远东慕尼黑阴谋，到当时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毛主席在苏德战争期间，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指导国内斗争，开展对英美的工作。以前也想争取英美，但办不到。因为他们要同日本妥协。我们对美军上层的工作，直到现在还有影响。卡尔逊中校在这方面的影响比斯诺还大。他深入到八路军中，说要把在八路军中学到的东西在美军中实验。他同罗斯福关系比较好。通过他，美军与八路军建立了关系。以后美空军飞行员在对日作战中常降落到解放区游击队附近。游击队救了他们，人数不少，华北有，广东也有。我们党同美国的关系的高潮在 1944 年。

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我们党一方面重视苏联，注意保持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做美英的工作。这主要是通过恩来同志在重庆做的。毛主席的指导方针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蒋介石是被动的，不赞成的。他一心一意地反共，不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以致愈来愈被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七

# 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

（1990年4月7日、5月24日，
1991年3月20日、4月8日、11月23日）

## 一

我去毛主席那里工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开始我不知道秘书该怎么做。后来我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我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事吧。”毛主席说：“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他对我讲校对怎么难，校对也称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以后我就接手这件事。

编辑工作起初是由王首道同志负责。我参加编辑时，王首道同志还在负责，慢慢地他就交给了我。我是什么时间完全接过来的，已记不清了。

---

* 参加前四次谈话的有：徐永军、东生。参加第五次谈话的有：徐永军、石仲泉、龚育之、郑惠、张高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六大以来》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王明是什么人？从苏联回来是什么背景？回来干了什么事？这都是党史上的常识。但这篇稿子也要简明扼要地说一下。王明是1937年12月不知是从新疆这条路、还是从别的路由苏联回来的。回来时，毛主席去机场欢迎，说："喜从天降"。去机场的还有王稼祥等。王明一回来，大肆宣扬抗战主要的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他认为只有蒋介石能抗日，认为张学良、共产党没有多大作为。王明的口号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不知道国民党根本不承认统一战线。一直到"七·七"事变时，国民党还没有决定承认红军。他想把卢沟桥事变当局部事变处理，让宋哲元去同日本人谈判。到"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全面抗战。这样他才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承认这支军队由共产党领导，国民党不派人参加任何八路军的组织。国民党不想让八路军开到敌后去。共产党为了抗日同阎锡山进行了紧张的谈判，八路军要假道同蒲路到山西北部山区去抗日。阎锡山眼看那些地方保不住了，就同意了。反正是一丢，丢给日本是丢，丢给共产党还是一个人情。这样，八路军一部分开到晋察冀前线，发动了平型关之战，名声大振。八路军还打了一些其他的仗。后来日本人在山西驻兵越来越多，使我们面临严峻的局面。但我们在山西的工作做得很好。如山西新军是由薄一波等同志组成的。阎锡山为网罗人才，选中了薄。在新军的配合下，八路军很快在太行站住了脚，后来又在晋绥站住了脚，创造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三块大的根据地，还有其他根据地。八路军在山西站住脚后，在河北也慢慢打出一个局面来了。吕正操的回忆录提供了许多材料。河北的根据地不仅有冀中，它是主要的，还有冀南、冀热辽。然后115师一部又开到山东去，与山东纵队等共同开拓了山东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局面。另外，鄂豫皖老根据地在抗战初期也搞了一些游击队，后来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军在长江南北都找到了立足点。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发展更快。八路军黄克诚部队南下与新四军汇合，成了新四军的一部分。

在抗战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了。这都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都是与王明的右倾主张相反的。王明回国后在延安指责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许多正确作法，到武汉时发表了许多宣扬右倾思想的文章。蒋介石对王明的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蒋介石并不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什么大人物，有什么分量。所以王明搞的那一套在武汉完全碰壁。以后王明要用他的那一套保卫武汉，结果越来越保不住了。仅仅靠讲演、游行、宣传，是保卫不了武汉的。本来，长江局如果利用在武汉七、八个月的时机着重搞抗日游击战的工作，力量就用到点子上了。当然，武汉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王明搞了几个月，犯了右倾错误。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他的错误。在这之前，王明刚回国时，在 1937 年 1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会后，张闻天传达了王明的讲话。我当时在安吴堡青训班，听冯文彬从延安来传达的。1938 年六中全会上批评王明，指出王明的那些口号是行不通的。要团结就得有斗争，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独立自主就没有统一战线。抗战一年后，许多事情的发展变化使我们对这个独立自主问题看得清楚了。王明后来到了重庆。这时国民党更加反共，对他的那一套就再不理睬了。王明也就更加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 1930 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

## 二

毛主席在江西苏区时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整得厉害，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长征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闲人。立三路线时党内并没有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纠正立三路线。立三路线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直接革命的时期，把党委改为行动委员会，让红军攻取武汉、长沙等大城市。共产国际不赞成这么搞，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共产国际认为当时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李立三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并超过了共产国际，要立即夺取政权。李立三认为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并要求苏联红军出兵，开到中国来帮助中共。后来会议材料转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看了后很惊讶，很不满，说这是立三路线，是错误的。

周恩来、瞿秋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立三路线，解除了李立三的职务。但米夫把他的部下王明、博古从苏联送回中国夺权。在米夫指使下，王明等人造反，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不干，他们要求首先解决党中央的问题，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调和主义，对立三的错误上纲不高。王明这时写了《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书中指出三中全会只看到了立三路线的左，没有看到立三路线的右。四中全会时，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夺权，当时的中央招架不住。

毛主席批评瞿秋白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是一介书生。王明、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博古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四中全会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后来上海党中央被破坏后，成立临时中央，博古实际上做了总书记。四中全会后形成的以王明为代表的这么一个中央，在上海作了许多决议、指示。他们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跑到中央苏区，把原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统统拿下来，从各方面贯彻他们的“左”倾路线，最后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被迫进行长征。遵义会议虽然在军事指挥上批判和改变了王明“左”的一套，但在政治路线上还没有来得及清算。

这一段历史要算账，首先要在政治上说清楚。所以中央开始编六大以来的文件。长征时把文件带到陕北了。编辑《六大以来》是很大一件事。可以让大家看清楚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

可以将《六大以来》的内容简单介绍一下。编辑经过，谁发起的，要讲清楚。当然决定编的是毛主席。《六大以来》分上、下两册，起作用的主要是上册。编辑过程从何年何月开始到何年何月止，我都记不清了。编、印、排、校、发，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时裴桐同志负责管档案。我编《六大以来》时，差不多每天都同他联系。他一直管档案，解放后也是。你们可以去采访他。然后再找一找王首道同志。

## 三

1937年、1938年报纸刊登决定召开七大的通知，有十多个人联合署名，都用的原名。陈云用的廖陈云。但结果没有按原定的时间开。编辑《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

四中全会不太合法，是闹出来的。推选的领导人不能反映出党的情况。王明、博古等人原先都不是中委，都是米夫等人搞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鬼。从六大到编《六大以来》的1941年，间隔时间长，变化大。一编《六大以来》，就发现了过去存在的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研究四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问题。在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发表这些文件的时候，毛主席对这些文件不可能有很多接触。那时中央在上海，文件即使传达到苏区，时间也过了很久。

在研究六大以来的文件时，毛主席注意到四中全会的一些文件，不能不考虑：四中全会是怎么来的，文件是什么性质的，有哪些问题，三中全会对不对、该不该否定，六大对不对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特别重视其中的九个文件。针对这九个文件，他写了九篇批判文章。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 四

从遵义会议以来，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样。毛主席写的《农村调查》的“跋”讲到，那时执行的许多政策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当时也是错误的。这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人，对政策上有什么错误容易理解，但对路线错误不理解。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立三的“左”，大家都清楚。但王明却强调立三是“右”。这就比较明显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表明四中全会比立三更“左”。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的一些过激措施，但它的决议，王明的小册子，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形势的分析，都是“左”。“九·一八”事变本来应当是党的一个转机，党的工作应当有一个变化，但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没有这样做。

四中全会是夺权。以后王明中央派了代表到各个苏区，钦差大臣满天飞，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发议论，贯彻他们的“左”倾路线，给党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王明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他们反对中间力量，认为中间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在党内搞反对右倾，到处反，到江西就反到毛主席头上，说他在军事上是逃跑主义，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在未把毛主席打倒之前，就开始反邓、毛、谢、古。以后是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在组织上对毛主席作出处分。把四中全会对形势的估计，对阶级关系的估计，在土地、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政策的性质弄清楚了，说四中全会“左”就没有问题了。

编辑《六大以来》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四中全会开始产生了党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现在的稿子要着重说明这一个过程，同时把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言论跟陈独秀的右倾言论作个比较。当时跟王明的斗争，首先是在抗战时期的政策上。这跟共产国际有关。王明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这给中国党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但在1938年，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国前同他谈话，指出中共要以毛泽东为中心，王明不要另搞一套。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又是对的，对六中全会有很大的影响。

## 五

正面介绍毛主席写的这九篇文章。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当时只给什么人看了，要讲清楚。毛主席是在编辑过程中选择了六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四中全会后的九个重要文件进行解剖。他只在很小范围给人看过。直到六十年代，他重看此文，还有修改。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九篇文章”在我们的题目中放在什么地方写合适。“九篇文章”分量大，放在整风运动中写不合适，放在历史决议中写又太长。“九篇文章”是比较独立的，它并不是为着准备起草决议。它有一个特殊性。“九篇文章”还是放在编辑《六大以来》这里写。怎么个说法，就说是编《六大以来》的一个副产物。编《六大以来》这本文献有几个副产物，“历史草案”是一个，《两条路线》这本文献也是一个。如果没有《六大以来》，就不会有《两条路线》。先有《六大以来》，再有“九篇文章”，然后有《两条路线》。

现在的初稿没有交代“九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要从各种情况推断它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是在写“历史草案”之前。

“九篇文章”的命运也很特别。当时没有发表，五、六十年代毛主席重新修改后给几个同志看了一下。到他临死前不久还把这批文章拿了出来。他非常重视这批文章。所以要写这个题目就得把这些原委说一下。但这个副产物没有进入社会，连党内的社会也没有进。《两条路线》就不同了。《两条路线》的编出，使整风更加深入了。两条路线是什么性质的两条路线？哪些文章是代表哪条路线？哪些文章又是代表哪条路线？这在编《六大以来》时分不清楚。到编《两条路线》时已经清楚了，已经有针对性了。它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认识过程，也是全党的认识过程。

“九篇文章”表示毛主席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深化了，以前没有这样深化。尽管里面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后来还有发展，但当时毛主席的这种认识是比较系统的，从毛主席的思想上来说是弄清楚了的。

写历史文献编辑的这篇稿子，是比较系统、认真地介绍“九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文章”的一个合适的场所。要把编辑的前后经过，毛主席起草、认识的过程说清楚。这是毛主席对“左”倾错误认识的一个里程碑。

“九篇文章”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读书笔记。他虽然重视，但确实没有准备发表，这里涉及到对个别人的评价，又与文章的形式过于尖锐有关。毛主席长期踌躇。顺便说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关于义勇军的问题，批评不当。六十年代找出来给我看时，我提出过修改意见。现在毛主席的稿子里，对义勇军还是没有讲清楚。当时在国统区成立义勇军并不等于建立正式军队，并不是要调到前线去打仗。上海、北京的学校都成立了义勇军，无非是准备抗日，它并不是非法的。

“九篇文章”作为读书笔记可以说是比较确切的。给少奇等看，也不是讨论，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

如果在整风场合，或者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也不会这样讲。这里是他自己写，自己看，把话说得再凶，反正也没有人听见。

我们的稿子用回忆的形式写，对于“九篇文章”不要那样详细地去说。我们是介绍“九篇文章”：毛主席怎么写的，目的是为什么，对第三次“左”倾错误毛主席的认识达到了什么水平。毛主席在这九篇文章中认识到或指出了第三次“左”倾错误有哪些特点。

六十年代看到“九篇文章”的人可能比较多些。究竟是哪些人还得调查。

“九篇文章”除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外，还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有很多发展。好些问题在这里说得比较清楚。过去的文章里面没有说得这么清楚。这也表明整风是从思想方法着手的。“九篇文章”不仅讲了这个思想方法问题，而且还贯彻了这么一种观点。到编辑《两条路线》时就完全是政治性的了。这时两条路线已划分清楚，中央的认识也基本统一了，从而选哪些文章作为代表作也就清楚了。编辑《六大以来》时还不可能。当时也稍有取舍，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有一个界限的。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刘少奇的自我批评(白区的党指责刘右倾,刘被迫作检讨)。我问毛主席,这篇文章用不用,他说不用。可见编辑《六大以来》也并不是有文必录,不然篇幅更大。但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件,哪些是要害,哪些是阶段性的代表作,这是通过"九篇文章"弄清楚的。它对这条路线的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都指明了。对这以后的别的同类文件即使没有作分析也没有多大关系了,因为这个问题已基本搞清楚了。

编辑《两条路线》是总学委的工作。这时不费什么事,只选目。我参加了编辑工作,并负责向毛主席联系。毛主席把题目定下来,然后大家再传阅一下。编辑本身没有什么复杂的。现在回忆时需要说明一下哪些文件选到《两条路线》里了,它包括多少文章,《两条路线》是怎么回事。把当时的情况作点介绍。

编《六大以来》时,按问题编,这个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裴桐同志收集资料就是按问题收集的。中央定了这么个方案,毛主席也就没有改变。下册没起太大作用。组织问题、青年问题谁也没有讨论。为什么还要编出来?因为当时已有了这么个体例,好像不编也不行。

当时的读者对《六大以来》很有兴趣。有的人提出来,研究历史干脆从一大研究起,于是中央决定编辑《六大以前》。编辑《六大以前》有好处。有助于大家认识、了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人们把它同王明抗战时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作比较。在这方面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了。

这个题目开始写时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家都不知道要写成什么样。现在写成的这个初稿,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要进一步使它适合于全书的体例。内容、形式要调整,与回忆体例一致,得多花点脑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八

#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1991年10月25日，1992年1月4日）

（谈话开始时，有同志提出如何评价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这份广播稿对1940年后延安文艺界的问题有一些说法。）

这份广播稿的发表是在整风后期了。你们看，其中讲“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就是在后期才有的说法。这一说法不可靠。广播稿的有些说法是为了突出毛主席的贡献，如说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为实际”。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一种潮流。

这份广播稿讲到：“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是对的，如指出“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等等。这些想法恐怕不全是写在文章上的，有的可能是毛主席找一些作家谈话时听到的。“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

---

* 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鲁振祥、龚育之、郑惠、石仲泉、邱敦红、张高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还是杂文时代”,是有这篇文章。说现在要“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颂德”,也是有的人在同毛主席谈话时提出来的。这里面说得比较笼统。“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广播稿讲座谈会的背景,这些话是实在的。这份广播稿前面说的关于文委的话,多少有点附会,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但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

当时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许多作家的言论。毛主席开始找作家谈话,越谈找的人越多,有的谈过多次。比如,说“不歌功颂德”的那个作家并不出名,他的话就是跟毛主席讲的,不是写文章讲的。毛主席在讲话时提到这个观点,我就知道是针对那个作家的话讲的。

毛主席跟作家的来往比较早,如跟萧军早就有来往。1941 年 8 月给萧军写过信,是派我送去的。这封信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毛主席当时比较赏识萧军。后来萧军的观点与党的观点有距离。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他发言内容很多,引起我反驳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后来雪苇写信给我,说鲁迅当年跟党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有关系的，我没有查考过这个事情。

写这篇回忆，不要把王实味作一个主要题目。不能拿王实味作文艺界的代表。这样不合适。不要把问题搞得太散。为什么说“座谈会前后”？“后”还有许多事。当时，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当然用不着详细写。然后，要求作家下乡。现在许多作家回忆，除座谈会本身外，下乡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座谈会讲话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普及与提高，是作家与工农兵结合。座谈会讲话后，有一大段事情。多数作家经过这场洗礼，回忆起来，尽管里面有些问题，但还是觉得有益处。主要是在与群众结合这一点上。丁玲也写过谈收获的文章。艾青除写了《吴满有》这篇作品外，还写了《秧歌剧的形式》这篇文章。毛主席对艾青是比较满意的，对他写出好的作品非常高兴。

王实味的事要提，最好放到前边。王的问题定性是错了。当时对其他人的斗争也很不合适。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倔强，他就住到延安东边的一个孤孤单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彭真同志找他谈话，表示过去两方面都有错误。以后萧军回到文协。对萧军问题的那种作法是不对的，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尤其不对。首先把王实味定成托派，结果没有证据，还说他是特务，关起来，最后打仗时杀掉了。

王实味不代表整个文艺界。尽管《野百合花》引起很大争论，比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争论得更尖锐，但《三八节有感》在文艺界有相当代表性。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改版问题，批评《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贺龙同志对文艺问题还发表过一些别的意见，最早的就是对《三八节有感》的批评。

毛主席并没有因为《三八节有感》就否定了丁玲。他很注意丁玲的作品，并有相当评价。丁玲写的《田保霖》，毛主席很称赞。对于有才气的作家，毛主席是很赏识、器重的。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出以后，先是不能出版，有人反对。丁玲找了好几个人看，那是在西柏坡。艾思奇、陈伯达、萧三和我几个人看了，都认为这部书写得不错。因此，毛主席对丁玲更加看重。他曾说：丁玲下乡，到农民里面生活，写出小说来了，而有人经常说与工农兵结合，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到底结合了没有？后来文艺界的风波，讲起来有些很难理解。文艺界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可调和，一说起来就充满仇恨。

要写好这篇东西，需要访问很多人。档案材料不会很多，甚至可能没有，因为完全是现场活动，没有什么电报往来，毛主席会下与作家的谈话也没有正式记录。

现在可访问的人，一是艾青，我也想找他谈谈。另外，刘白羽在，毛主席会前找作家谈话，不会不找他。林默涵、欧阳山都在，都可以访问。欧阳山在广州，要写这篇东西，专门访问一次也值得。没有充分的回忆，不太容易写。还可以访问草明，她对兰家坪文抗比较熟悉。要多找人谈谈，不然不容易下手。

在我的印象里，座谈会是在礼堂里开的。毛主席最后作结论的讲话是在露天，人到得很多，在礼堂里不方便。

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究竟是会前文艺界已经在整风，还是在会后才开始整风？有可能座谈会前已开始整风，但整不下去，各说各的吧。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至于讲话怎么样形成文字的，没什么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整理过的稿子发表时，正在搞“抢救运动”，搞出很多“特务”，所以就把文艺界的“特务问题”特别标出来。后来《讲话》再发表，就是收入《毛选》时，把这些关于“特务”的话删掉了。《讲话》从在《解放日报》发表到收入《毛选》，中间不会有大变动，因为毛主席的讲话是不好轻易改动的。编《毛选》时，我建议在有的地方加一些话，讲讲现实主义问题，因为当时说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根本方法，原《讲话》稿没有这样的话，我就想把日丹诺夫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写进去，毛主席很不满意。

《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这并不是考据，而是可以说明毛主席详细考虑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发展。删掉“特务文艺”之类的提法，可以讲，但并不重要。还有很重要的改动如对待文化遗产，原来只讲“借鉴”，后来改为“继承和借鉴”，因为有的文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如毛主席写旧体诗词，诗体七律，词牌菩萨蛮，这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就是继承。不仅这个，还有语言，就是继承，任何作家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都不可能写作。语言尽管有创新，但基本是继承，不可能每一个人创造一套语言，那样的文学是不可想像的。像这样原则性的修改还有，如原来说国统区作家在脱离群众问题上跟国民党“有些不同”，后改为“不同”。这表明毛主席并没有停留在原来那个地方，他对一些问题是很郑重、很认真的。

讲解放后的修改，不是列成一览表，把所有的修改都举出来，要挑选有意义的。不讲，一般读者可能不注意，讲出来，是客观事实，是毛主席自己改的，说明他的思想的发展。这篇讲话基本上是毛主席自己改的，很认真，也同我谈过，如借鉴和继承问题。收入《毛选》的文章，几乎都修改过，这里挑出来讲讲，很有意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有同志提到有人回忆,座谈会后曾印过一个没经整理的记录稿)这个有可能。(有同志问为什么过了一年多才发表?)那是因为整理费一点时间。整理后,毛主席看过就放到那里了。发表还要找个时机,同鲁迅逝世纪念日可能有点关系。

关于讲话本身的文艺理论问题,是不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谈一谈。一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问题上,《讲话》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其他的具体提法,相形之下,都是次要的。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言中引用毛主席的话,强调的就是这两点,可见是大家公认的。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其他都是流,所以作家要深入生活。文艺要诉之于读者,读者基本上是人民。文艺如果没有读者,就是没有对象。这两点可稍许发挥,但也不要说多。比较起来,这些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讲话有它的局限性。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属于讲话本身的问题。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讲了一个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当时《解放日报》登的这篇文章,是博古翻译的。LITERATURE,很容易译成文学,但 LITERATURE 的意义很多,我反复看原文,认为不能译成文学。齿轮和螺丝钉不是指文学,是很明显的。我在 1981 年有一次讲话,着重讲了这个问题。

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服从于政治,哪有这回事?恐怕绝大多数的作家根本不承认这样的事。你说托尔斯泰为政治服务?他绝不会承认。他有他的政治观点,这是一回事,但他写《战争与和平》绝不是为政治服务。写《安娜·卡列尼娜》是为政治服务?也不是。例子多了。莎士比亚为政治服务?他哪一部著作是为政治服务?你说《奥赛罗》是为政治服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政治服务?根本讲不通的话。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文学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跟阶级、政治的现象有些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直接。有时关系多点，如反法西斯战争前兴起的反法西斯运动中，世界文学几乎出现一种反法西斯潮流。当时作家有一种信念，反对法西斯就是维护人类的正义、和平、文明。法西斯没有文明，作家要维护文明。但也不能说那时的作品都是反法西斯的。有那么一些作家比较积极。比较出名的一个大作家，是德国的托马斯曼。他在法西斯上台后积极反法西斯，但他出名比较早，那时的作品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是描写一种社会生活。其他的作家，如巴比塞，政治倾向比较明显，但这也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种政治倾向。如左拉，反对德雷夫斯案件非常积极，非常坚决，甚至流亡到英国去，因为在法国呆不住了。左拉的作品虽然也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但一般地不能说是为政治服务的。可举出的例子太多了。中国最著名的《红楼梦》也不能说为政治服务。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楚了。

因为将列宁的文章中的话翻译错了，影响到认为文学是齿轮和螺丝钉，作家也是齿轮和螺丝钉。毛主席不能对翻译负责，但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讲法，是一个很深的印痕。《讲话》对作家的要求有的地方过于苛刻，把作家脱离群众跟国民党脱离群众说得差不多，这是不妥当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范围非常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教育的范围也很广泛，不可避免地要在什么范围内服从政治，但不能说教育范围内的所有问题都要服从政治。比如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外语，怎么说服从政治？这是根本不通的话。以前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把外语教学都政治化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讲过，语言是社会现象，并不是意识形态。说文学是意识形态，只是就一个方面，即就文学艺术观点而言，不能说整个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很复杂的科学，绝不是简单的公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比如毛主席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时，说作家艺术家要收集老百姓写的什么黑板报、什么歌谣、画的简单的画，帮助修改，音乐也是要帮，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经常做的。照这样讲，郭沫若成天收集小学、中学、大学学生和社会上各种人的东西，这怎么可能？这样，作家就作不成了。作家也不可能把什么人的东西都拿来修改，再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艾青写《秧歌剧的形式》，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但艾青绝不可能经常去具体指导某个秧歌队，修改歌词。

这里面有一个环境问题。当时是一种战争环境，特别是农村环境。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但讲文学、讲写作，又必须有一些典型作品教育学生。毛主席力图找到一个途径，解决普及和提高问题。解放后编《毛选》时，我提出，普及与提高，对有些作品不那么适用，比如说音乐，欣赏音乐当然也要有一定水平，但很难说哪一作品是一年级的音乐，哪一作品是二年级的音乐。绘画，也可以有这样的作品，人人都能欣赏。比如《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不一定要学过多少美术，都可以欣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觉得很美。这种例子很多。当时毛主席说，如果没有普及和提高的分别，就没有教育了。教育就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然后受教育，一年一年提高的。因此，还是原话不动，没有改。现在可以想到，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

讲话提出文艺的源泉是生活，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什么时候都适用。从文学史上看，所有大作家对生活都得观察、研究。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群众相结合，但怎么结合法，要看历史和个人条件的不同。有些作家可以下乡、下厂、下部队，但不可能所有的作家都下去。解放后毛主席有一次讲话，说如果不能下马观花，走马观花也好，也可以，这已经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的不同，说明他的思想是发展的。对有些人，让他同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不可能的。这种要求，对很多文化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是很难做到的。大学教授也很难做到，他要备课、讲课。像这样的要求，要看是在什么条件下、对什么人提出的。延安的情况，恰好比较适合。在延安，作专门研究很困难，缺乏这个条件。鲁艺有一位钢琴家就很苦恼，因为他没有用武之地。傅聪讲过这样的话：文艺工作者都去参加劳动，我的手如果劳动两个月，就不能弹钢琴了。少奇同志说这话有道理。确实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体力劳动。

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用不着说上面的这些话，也不需要同人去争论。争论没完没了。我的看法，你们也不一定同意，那也没关系。我想应该把毛主席写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在什么时代环境、什么历史条件下写的，搞清楚。这样来研究毛主席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是需要的。写这篇东西严格限制在回忆范围，只回忆那一段，不纵论古今，也不接触各式各样的看法。

茅盾对讲话的反应记不清了。后来我到重庆，同茅盾谈过。他的说法是：外地去的作家对解放区的生活不适应，有个适应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程，所以发生一些争论。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或是在上海，或是在大后方，同到延安相比，环境都有很大变化，作家原来把延安理想化了，觉得什么都好。至于理想是什么样的理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之是充满理想色彩，等到看了现实，并不那么理想，于是各种各样的议论都出来了，因为不合乎他们原来的理想。

郭沫若“有经有权”的话可以查一下。毛主席讲话后，征求一些名人的意见。郭老的话，恐怕是在他看了《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稿之后说的。离发表的时间不会太远。如果很远，毛主席也没有兴趣谈了，会不会是用电报传到延安的？在我的记忆中确实是这几个字。写回忆可以写出来，对这话我完全可以负责。记得清楚：“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说，这道理是对的。他说的时候很高兴。

到重庆传达讲话精神的主要是何其芳、刘白羽。我没有直接参加传达。我到重庆跟胡风有过一点接触。那时开了两次会，我先讲了一次话，以后周恩来同志讲了一次很长的话，主要讲胡风文艺方面的问题。范围比较广，里边也联系到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问题。这比较晚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谈判期间。

这篇文章同回忆的其他部分一样，要掌握分寸。什么话说，什么话不说，要很好斟酌。有些事情，事实是事实，也很生动，但怎么表达，要考虑好。文章提到一些作家，要适可而止。不要“深入虎穴”，好像一定要把哪个人说清楚。我们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哪个人说了好话，哪个人说了不好的话，不需要替什么人下这样的判断，要尽量避免。只是为了说明背景，不要对每个人说得太多，尤其对细节，说了没意思。不是写奇闻轶事，是写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前因后果。

文章前面部分，讲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像中国画，远山远水，淡淡的，写得太详细，与后面不相称，也显得有些繁琐。大体应是：毛主席对文艺很关心，表示了什么意见，称赞了什么作品，注意些什么问题，以后就是文艺界的思想状况，确实有集中暴露的问题，这样促成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这样就可以了。太具体了，文章就会缺乏完整性。要有中心。这里是重点，那里也是重点，就显不出重点了。会后的事情也要选择，哪些具体，哪些简略，形成完整的文章。这方面要多花些功夫。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九

#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

（1985年12月7日，1986年1月13日、1月26日）

## 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来把“左”倾路线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放在政治方面里一起讲，后来认为军事方面也要突出，就分开来讲。将军事方面与政治方面分开来讲，我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弼时同志在我起草的稿子上写的那七点意见比较具体，但逻辑不大清楚。后来又回到四个方面（政治、军事、组织、思想），这比较清楚。

《决议》在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才好开七大，七大以后再修改。从前线到延安的七大代表，要尽快回去。那时战争形势发展快，要占领城市，所以大家急于回去。我们刚刚进攻城市，日本投降了。《论持久战》中说的战略反攻阶段，没有打几天就完了。日本这么快投降，是与美国苏联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有关的。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一个岛一个岛地占领，很难过来。为了抢先，它决定丢原子弹。现在史学界有一个争论，即日本投降的原因是美

---

* 参加这三次谈话的有：逄先知、冯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国丢了原子弹还是苏联出兵消灭了关东军。实际上这是不好分开的问题。丢原子弹是直接原因，丢了两颗，两个城市就完了，如果再丢下去，丢到东京，日本怎么办？它是没法不投降的。另外，苏联出兵东北，一直打到朝鲜，这也促使日本投降。本来美国使用常规武器就可以占领日本，但这样美国军队牺牲会大一些，它为了减少牺牲，就丢原子弹。从政治上讲，美国不愿让苏联占领日本，所以抢先丢原子弹与苏联出兵东北有关系，这两个原因是互相联系的。《解放日报》当时发了几篇关于美国在广岛、长崎丢原子弹的新闻稿，引起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要强调人民斗争的作用。这是从政治上分析，免得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在《决议》起草时，我给弼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到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的问题。其实关于教条宗派问题早就讲了，整风一开始毛主席就讲了。政治局检讨历史时，教条宗派的人头比较清楚，经验宗派问题，则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当时担负着很重要的工作，说他是经验宗派就不好工作了。而且一说宗派就把问题说死了，还要说清楚这个宗派什么时候消失了，又牵涉很多的人，后来决定不这样讲。我写给弼时同志的这封信，是想说先讲事实，后说宗派。但后来也没有用教条宗派的说法。

现在写关于《决议》起草经过的材料，有一个缺点，只有档案方面的情况，即只有文字可查的情况，没有讨论的情况。我参加讨论的笔记本在延安撤退时丢掉了。当时参加讨论的有任弼时、刘少奇、陈云、彭真、聂荣臻等。这时稼祥同志病了。整风期间，开始他是主要指导者之一，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后来引起毛主席在七大那篇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当时的有些情况，可以问陈云同志，请他判断“是”与“不是”。《决议》中后来加上了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是彭真同志提出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

## 二

我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作为助手，对《决议》的起草工作始终参与其事。《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当然，毛主席不是一个人搞，是集中一些人搞，但是以他为主。

1941年历史问题草案稿为什么忽然搁下来？当时的情况是：随着中央内部整风开始，印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讨论逐步深入，感到原来的1941年草案稿有些认识就不够了。例如，第三次“左”倾路线不能说是从“九一八”才开始。许多高级干部回忆历史，使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当然也考虑到怎样对团结有利。当时犯错误的同志除王明外大多数都认识了错误。王明后来在七十年代还出了一个很坏的小册子——《中共五十年》。这个小册子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苏联印过，在越南也印过。在这个小册子中，王明说毛主席要毒死他，这是胡说八道。“文革”那么残酷，毛主席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文革”中很多事情是江青他们搞的，毛主席并不知道。整风起初王明还参加，后来他就生病了。为什么叫做王明路线，为什么说王明是四中全会及四中全会以后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因为四中全会以前就是王明在那里闹，米夫与他是搭档，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四中全会把王明搞上来，非常不正常，不是像康生所说的什么既反“左”又反右，而是把“左”当作右来反，大家对四中全会义愤很大。左联五烈士就是反四中全会的，李求实在左联的用名是李伟森。不能说，四中全会是正确的，“九一八”以后党的路线才是错误的。四中全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就错了，不仅是政治路线错误，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在党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同志说是篡权。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还是说王明路线，因为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你们整理的那个材料，对《毛选》收入《决议》时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也要写上一笔。1941年历史问题草案稿为什么写博古路线而没有提王明路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博古的错误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是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虽然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不让他去南方局作负责人，留在延安，但王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说是博古的错误。《决议》起草经过多次修改，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届一中全会的通过，出《毛选》时又加上王明、博古的名字，这个过程要写出来。

《决议》最初不提四中全会是路线错误，这里有认识方面的原因。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四中全会蒙上一个共产国际的影子，不了解内幕的人不容易理解。开始，中央没有集中力量考虑这些历史问题，到整风时中央同志都集中考虑这些问题了。中央整风，回顾了历史，提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这里面牵连的问题比较多，毛主席最初把“九一八”看得比较突出，因为“九一八”后国内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够，再往前说到党的成立。

《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茅盾回忆录也说武汉时期反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很多，这是事实。不然，八七会议怎么能召开？瞿秋白成为八七会议的主要发言人，这不是偶然的。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当然，七中全会时要换一个写法也不可能，我的这些话是事后诸葛亮。

## 三

《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委员会成员有无陈云同志？我记得他参加了几次会，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他提出的。这个话除他以外，中央没有人好说。毛主席不大了解白区工作情况，陈云同志与少奇同志工作联系多，其他人如博古等更不可能说。

参加委员会的，是否还有王若飞？1941 年 9 月以后中央秘书长是任弼时，但这以前王若飞曾任过秘书长，日常事务他处理得多。我为什么说王若飞可能参加呢？因为他参加了六大，当时参加过六大的，除恩来同志以外就只有他。讨论六大，王若飞比较有资格发言。王若飞在陈独秀时期担任过近似秘书长的工作。他在七大讲过这一段工作。他是在中央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后来坐牢时间也比较长。放出来时，薄一波去找他，向他说明当时中央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到延安后先分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后来到中央工作。在爷台山战役打起来以前，或者正在打的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程中，在延安开了一次群众大会，王若飞讲了话，代表中央发了一个声明。毛主席当时说：如果有千金可赏的话，就应赏给王若飞，一字千金。他在中央做了很多工作，开始毛主席很器重他，后来又感到他抓事务性工作比较多。就他当时担任的职务和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会参加对《决议》的讨论。

聂荣臻参加了讨论，我记得他讲了话。党的重要历史变化，从大革命起，他经历得多，对党的历史的了解比较完全。有的人在会议记录上没有，但实际上参加了讨论。

讨论《决议》就在枣园，几乎天天开会，一般是开半天。有一时期工作很紧张。陈云一开始就参加了讨论。聂荣臻从晋察冀回来，后来才参加的。王若飞参加讨论，我是推断出来的，没有准确的记忆。讨论的人有几个是固定的，天天参加；有的是今天参加，明天不参加。

这一段讨论《决议》的情况，一定要写到你们整理的材料上，写上陈云、聂荣臻，还有邓发，要说明经常参加讨论的不限于委员会成员。陈云调到晋绥统管晋绥、陕甘宁的财经工作，他管财经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整风中，康生几次攻击说陈云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没有阶级观点，说陈云讲会用人，人是什么人，国民党也是人，机会主义者也是人。康生还攻击洛甫的关于待人接物的文章。这一段时间，党内有许多的看法。当时，康生等发议论较多；少奇在关键时刻才讲。毛主席对我说：一个人要会讲话，有的同志不会讲话，打电话给我就讲半小时，一小时。陈云讲话非常简单明了，根本不占我多少时间。我记得邓发也参加讨论，讲了话，但不是每次参加。陈云几乎是每天参加。陈云在延安时身体就不太好，有一次他去马列学院讲话，在去的路上对我说，他是木炭汽车（意即走走停停）。那时王稼祥、洛甫、凯丰处境都不佳。博古不一定每次参加讨论，当时他已负责办《解放日报》，工作不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开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让他住到杨家岭。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就是他起草的。1941 年是王稼祥很活跃的时期。整风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整风运动，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 100 分。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当然这里面康生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

《决议》起草中，有一段天天开会，讨论一阵子，又改稿子，并向毛主席汇报。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王稼祥到苏区比博古早一些，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一起去的，任、顾都不是王明集团的。四中全会及上海的那些人，一直是批评苏区和朱、毛的。古田会议前，中央九月来信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才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几个朝代的中央，都是指令红军应这样应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势。还有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整风中王稼祥、任弼时当然要做自我批评。两个人的历史情况不同，任弼时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王稼祥是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遵义会议上，也表现在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多次说，两个人（指王明、王稼祥）都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讲的话却不同。对于任弼时，1948 年他在杨家沟做的土改问题报告，毛主席看了比较满意。在陕北转战期间，撤离王家湾时，任弼时等同毛主席争论，吵得很厉害。耽误了一天的时间。任弼时是行军中组织的支队的司令，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考虑，提出向东过黄河。毛主席坚持要继续留下来，与边区人民共命运，毛主席很生气，话说得重。我在旁边的房间里，他们争吵我都听见了。恩来同志什么话也没有讲，也不好讲。这以后，支队司令换成恩来同志。

我 1941 年刚到毛主席那里，关键的政治局会议我不参加，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般的政治局会议我参加。我是政治局的秘书，是毛主席亲自讲的。我那时叫乔木，在重庆时与当时在南方的乔木（乔冠华）的名字容易相混，毛主席让我加上“胡”姓，回到延安还是叫“乔木”。后来总理定名字，我叫胡乔木，他叫乔冠华。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

#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

（1991 年 11 月 7 日）

##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

毛主席在 1941 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可以考虑全部或者大部分引用一下。因为对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情况，一般读者不知道。历史问题决议已经收在《毛选》中，引用了历史问题草案，这样很容易对比，知道开始是个什么想法，后来经过各种过程发生了什么变化。写这篇文章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献，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否则，考证了半天，不一定能使人信服。这样把材料摆出来才能使人信服。

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整个地体现在历史问题决议中。整风运动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事实，但形成文字，成文的，是在历史问题决议中。历史问题决议特别写了两大段话，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另一方面是讲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有了很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石仲泉、龚育之、郑惠、张高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大的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时候，首先申明他们作的哪些工作是正确的。这表明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有世界意义的。斯大林搞残酷斗争的一套，列宁跟斯大林不同，但他进行党内斗争也跟我们整风的做法不一样。历史条件不同，我们不必去作这个比较，但总归这是一个新的传统。

整风从思想方法角度讲路线斗争，批评了过去党的历史上的批"左"批右斗争。过去开展的那些斗争都没有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阶级分析，思想分析，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分析。因为有思想分析，接下来才有阶级分析。

当时是整风的环境。有的学习组是专干整风这件事的。有些人从外地调回延安，手边没有什么工作，讨论党史用的时间就很长。在职的有工作的人用的时间也不少。如李富春同志，他有工作，不可能把他的工作停下来。但他是整风的一个组的组长，他那个组的活动还是相当频繁的。历史决议草稿交给中央全会之前，已在相当大的范围进行了讨论。交给全会之后，讨论的范围更大了。讨论是频繁、认真、深入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那时中央领导层的讨论也很认真。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每次修改都是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的水平、决议的水平，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文件。拿过去历史上党的决议看，如四中全会决议等，对比一下，就显出来这是完全不相同的。当然，这时有从容的环境，以前没有。以前有一些决议是苏联人或共产国际的人写的，写好了拿到我们党中央来通过，如八七会议的决议。别人代我们总结，我们予以通过。

（有同志提问，毛主席在 1941 年写了历史问题草案后为什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停下来,到两三年以后才起草历史问题决议?)这中间经过全党的整风。因为不能说毛主席写个历史问题草案,大家就能通过了。没有共同的认识不行。还得学习历史文件,大家联系自己进行讨论和检查,取得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起草历史问题决议、中央全会的决议。

批判"左"倾路线的那个"九篇文章",我看到得比较早。那是秘书工作的方便,并不是正式给我看的。"九篇文章"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历史问题草案是"九篇文章"的姐妹篇,恐怕也是这样。那时还是毛主席个人的想法,后来他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研究,研究过了才能够作决议。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写的这篇稿子的基本性质应该是文献性质,可以有些议论,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成为回忆了。主要是把一些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写作过程、修改过程介绍出来。当时参与的人现在都很老了,没有几个人健在了。体会、议论只能在这里面稍微有点穿插,带有点题性质。发的议论只能是个导语,下面还要引用文献。正式决议用不着引多少,引一些片段还是必要的,一般读者读的时候不可能拿着历史决议来对照。

写"九篇文章"是编《六大以来》的产物,所以毛主席对那些文件非常熟悉,引用起来如数家珍。

(有同志提出,毛主席在1941年曾经肯定四中全会,后来改变了,是否在最初有意作一种照顾?)同遵义会议的情况有些类似。我们常说遵义会议当时有意讲军事问题,避开政治问题,但是实际上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不可能谈政治问题,而且毛主席也不可能想得那么多。历史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这里面也可能有某种考虑的因素。毛主席有时也这样说,但不必一定强调这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历史问题决议对四中全会的说法，是同王明的小册子联在一起的。可以看决议，决议对四中全会本身并没有说什么，但它说这个会议批准了王明的那个代表党内“左”倾思想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小册子在那以后的十多年来一直还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作用。批那个小册子，关键是那个小册子不是批立三路线的“左”，而是批立三路线的右。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博古。他最不满意的是在这里。这在决议里也有表现。

（有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决议为什么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问题？）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限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决议要写到遵义会议以后、写到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然后抗战爆发，那就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已经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不能把时间延伸得太长。太长了，决议的思路得重新构架，那就比较复杂了。

在枣园的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这个会开了多次。我多次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修改。像我写给弼时同志的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后来拿到全会讨论，毛主席讲了什么意见，我马上就写上去。这个稿子修改的次数难以统计。不断地改。改了以后送一些同志传阅。传阅的范围比原来那个历史问题委员会可能更大一些。如张闻天同志最初不是委员会的，但仍送给他看。在委员会讨论时，任弼时同志管得较多，到全会讨论后，就是毛主席自己挂帅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关 于 七 大

(有同志提出七大筹备的时间较长,原因何在?)最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后来不是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风,就是要研究历史问题。把历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开。

我作为中直系统选出的七大正式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参加这次大会,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讲话。我不记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

(有同志提出,七大会上多数同志发言是作自我批评,这种精神反映了我们党的一种自信和兴旺发达的气象)这个话要从两方面说。如果开八大时,大家都上去作自我批评,那是不行的。七大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下面召开的,就是经过整风,作了历史问题决议,所以大家发言多作自我批评。这不能当作一种通例,似乎每次代表大会都要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兴旺发达,不这样做就不是兴旺发达。

整个书是回忆毛泽东,七大还是以毛泽东为中心。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一点要着重讲一下。关于团结,前面有好几篇回忆讲了,经过整风,经过作历史问题决议,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团结,确实如决议所说,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像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后来几次代表大会也说是团结的大会,但团结的含义不完全相同。当时说团结,是说从六大以来,其间经过了这么多的曲折,终于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它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在七大会议上,师哲讲过一段话。因为大家批评过去的错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同共产国际、苏联有关系。他就说，我们还是要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苏联的援助。他讲的话不长。毛主席说对。

可以把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多介绍一些。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很丰富，包括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都讲了不少。以后在共同纲领中也讲了，建国以后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允许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一

# 关于延安美军观察组和赫尔利斡旋*

（1991 年 11 月 30 日）

搞一个和美国人打交道，办外交的题目。是否可以说是“外交”？我看，与美国记者可以说是交往，对美军观察组是外交，特别是与赫尔利，我们当时是郑重其事的。后两个问题，写法上要以我们为中心，不能以美国为中心。入题要从我们方面开始，背景也要以我们为主，事件的叙述以毛泽东为中心，保持始终一致的回忆语气。

当时存在什么情况，为什么出现了与美国官方、军队合作的可能性？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当时出现了一股思潮、一股势力，不信任国民党，要求直接与共产党合作；二是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产生了观察组。美国表现出一种主动，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则抓住这一形势，决定采取行动。情况并非是因为我们主观上抱了很大的希望最后落空了；更不是说我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当了。这一点要写清楚。美国曾考虑给我们一些援助，但始终没有下决心；在观察过程中，战场形势发生了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章百家、邱敦红、龚育之、石仲泉、张高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变化，认为不需要了，这就失掉了合作的条件。如果美国给了我们一些援助，有少量合作，也不说明美国的政策有了多大变化，它的根本利益还是和蒋介石联在一起，中共与美国的合作也不会完全成功。关于谈判细节，我倾向讲一些。这样，文章就有新的价值。

观察组和赫尔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最早是恩来同志向美军提出派遣观察组到延安。那时可能性不大，后来形势发展了。观察组的基本情况要写清楚，它的任务是什么，完成到什么程度。观察组不办外交，但有外交性质。它收集情报，但不能决策。从美军观察组开始，我们对外交采取了慎重态度。

赫尔利来华后，美国的政策转变了。赫尔利这个人有点草包，对中国的问题没弄得很清楚，他把问题看简单了。关于赫尔利与毛主席签订的“五条协议草案”要讲。赫尔利来延安时就带来一个五条，他说那五条是得到蒋介石同意的，但那五条其实并不能代表蒋。我们提出修改过的五条，这是我们要力争的，赫尔利一下子就接受了。在赫尔利接受时，我们是抱着希望的。在同我们合作的问题上，赫尔利与史迪威不同。史迪威是自觉的，而赫尔利不是。赫尔利接受五条时并没有把问题搞清楚，所以后来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对赫尔利，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很慎重的。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最初，批评赫尔利还与美国政府分开。

我们与美国交往究竟取得了什么东西？我看可考虑这样几点：

第一，对美国政策摸底有一个过程，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必须要摸才能知道。当时国际国内都要求中国进步、要团结、要民主，美国政策到底怎样，我们原先不很清楚。

第二，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包瑞德都如此。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高林斯最近写了一本书，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可以说,我们党使普通美军人员受到很大的感化。他们是完全自愿的,不是洗脑筋,而是开眼界。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成功的。

第三,与赫尔利的谈判也是成功的。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没损失任何东西,我们得到中美两国舆论的支持,赫尔利这个人最后则身败名裂。无论是与赫尔利的谈判,还是后来与马歇尔的谈判,我们始终有理、有利、有节,取得了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经验,为我们后来的外交工作打下基础。

最后,对毛主席的外交谈判才能可以谈谈。毛主席对美国人表现出很大的吸引力。美国人承认,毛主席使谈判者无拘无束。同时,毛主席很机警,他遇到有威胁性的话回答是很严肃的。例如,在赫尔利背弃"五条协议"后,包瑞德劝我们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很气愤,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意思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路线,是不会畏惧的。这是属于一种个人的特质,可以放在末尾再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二

# 关于重庆谈判*

（1990年9月12日）

重庆谈判这个题目请你们现在就动手写。

首先，讲一讲抗战胜利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抗战期间1941年、1942年是最困难的时期，以后形势开始好转。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开始收复失地，许多中等城市也在我们的包围之中。1945年中，彻底打败了希特勒，苏联可以把力量转移到远东战线上来了，但面临一个与英美取得妥协的问题。直到那时，人们还认为要经过一个战略反攻阶段日本才会投降。但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胜利的到来是很突然的，尽管七大作了这个准备。

抗战结束时，苏、美、英尽管都希望中国和平，但各有打算。在朝鲜，美国占了三八线以南，苏联占了北边，这说明苏联与美国的妥协是一种什么状况。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毛主席不让步。但是，美国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占了便宜，加上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在苏联那里也有合法政府的地位，这些都是对我们不利的。然而，我们也有有利的方面，即有敌后大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邱敦红。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片根据地并且连成了片，只是装备、交通还不行。

再就是讲讲谈判有什么好处。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我们党决定与国民党谈判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毛主席一到重庆去，全国人民就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谈判上了。我们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使国民党很被动。在当时内外压力面前，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但又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这个原则，实现这个原则。承认和平、民主，就意味着承认解放区和接受民选政府，国民党当然不干。所以，谈判使国民党处在很矛盾的地位。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不去，人民不了解情况，国民党就会把不要和平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去了，表明我们是真要和平的，战争如果发生，是他们挑起来的。

谈判也是为了巩固八年抗战的成果。毛主席说，人民的力量，一枝枪、一粒子弹都决不能丢掉。当然为争取谈判成功也准备作些让步，让出南方的一些小块根据地，军队由原来想占六分之一，后来让到七分之一。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我们做了让步，国民党还不接受，就必然要打。它先打，我们反击，这就不仅在谈判过程中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而且谈不成功也会使我们处在主动地位。

谈判还显示了毛主席大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主席离开延安的时候，干部中很多人提心吊胆，老百姓也是这样。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在飞往重庆的途中，我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他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我理解所谓的“不了之局”，就是国民党想要我们放弃军队和解放区，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想要消灭我们，也是不可能的。蒋介石要谈判，我们来了；他要不要和平，那是他的事。毛主席一开始就下了两个决心：照协议办，就停战，就和平；蒋介石不照协议办，说明国民党不要和平，要打，那我们也只有奉陪到底。事态的发展证明，毛主席有什么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见，就有什么结果。

毛主席刚到重庆，魏德迈就提出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我某部冲突的问题，要毛主席答复。毛主席对此非常生气：屁股还没有坐下来，就提这样的问题，根本不讲礼貌。这说明魏德迈和赫尔利是一个腔调，他们是代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

谈判有两个主要结果：一个是表明国民党没有准备，没有诚意。他们先邀请毛主席去谈判，可是连个预案都没有。我们一去，国民党就被动了，方案由我们拿，逼得国民党表示接受和平、民主的原则。同时，我们作了军事上的让步，而国民党对于这种让步既不好表态，更不可能接受，只能讲军令、政令统一等等。另一个结果是《双十纪要》很成功，允许成立党派会议有利于争取中间派。国民党在协议里答应的东西就不好马上撕毁。1946 年 1 月发布停战令，虽然在蒋介石来说是应付性的，但他也不能不这样做。当时，全国人民要和平，英美苏也希望中国和平，签署了《纪要》是很大的成功。一方面，表明通过谈判国民党接受和承认了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原则；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党顺乎民意，赢得了人心，这有很大的意义。

对于谈判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情况也要交代清楚。例如，上党战役就是我们取得的很大的军事胜利和政治胜利。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而且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显示了解放军的实力，对谈判是很大的支持。上党战役的意义不只在于战役本身，胜利是整个党的，整个解放军的，整个解放区人民的。

日本投降后，我们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发展人民力量，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有许多有利条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旅大是自由港，而且我们的力量离东北比较近。国民党尽管有美国帮助运兵，一下子要全部占领东北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很不容易的。我们在东北站住了，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党派干部到东北去发展革命力量在当时是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重要步骤。

最后要讲一讲谈判的意义。首先是保卫了我们八年抗战取得的成果，并在军事上赢得了时间。解放军没有受到损失，有了一定的准备，后来基本上按照一个月消灭敌人八个师的速度取得胜利。

其次是在政治上确立了和平、民主的原则。我们在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决定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这个原则，发布了停战令，召集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政协会议闭幕没几天，民主党派就宣布政协成果被国民党挑起的流血事件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撕毁了。最后，还是打起来了，美国也调停不了，但蒋介石他们输了理。

谈判还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打了八年仗，除皖南事变的军事失利以外，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都是成功的。过去，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与国民党谈判一直没有结果，而现在国民党承认了我们的力量，不得不同我们签署协定，这本身就是胜利。可以说谈判是承先启后的，对未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一着。毛主席下了非常高明的一着棋。蒋介石输了。这篇文章是可以写好的。要把谈判经过写清楚，多叙述事实，充分利用档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三

# 关于战后国际形势*

（1991年11月1日、12月17日）

## 一

关于战后国际形势问题，1947年初，陆定一同志发表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目是《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登在1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陆定一同志说，他写的那篇文章是为毛主席代笔，文章反映的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虽说是由定一同志代笔，但毛主席还是亲自作了很多修改。

1946年底，毛主席让定一同志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指出，所谓“美国要进攻苏联”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策略，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制造许多“珍珠港事件”的一个借口。毛主席揭露了这种假象，指出美国的真实目的是侵略其他国家，美苏矛盾不成其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美苏之间打不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一点与建国以后总是讲战争危险，总觉得还有十年甚至只有几年时间就要爆发世界战争，有很大不同。后来之所以强调战争危

---

* 参加第一次谈话的有：章百家、邱敦红、龚育之、郑惠、石仲泉。参加第二次谈话的有：章百家、龚育之、石仲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险可能是因为经历了一场朝鲜战争、一场越南战争，这两个战争紧挨着中国，真刀真枪，不是虚声恫吓。毛主席认为，战争的危险变成了现实问题。

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定一同志的文章谈的矛盾和解决办法都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从那时直到中苏争论写“九评”，讲世界基本矛盾就是那么几条。但在当时情况下，世界上最紧张的现实矛盾是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谈毛主席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应作为历史来叙述，仅当作历史问题讨论，不要作为规律来讲，避免把它写成哲学问题，因为那样就复杂了，很难说清楚。

现在看来，那篇文章还是有些欠缺。当时对人民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对美国人民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对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矛盾都估计高了。英国实际上对美国把它的殖民地拿走并没有什么反抗，也没有办法反抗。还有，当时寄希望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能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历来的想法。危机后来是爆发了，但影响并不很大。

还有一个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当时有一个问题不易想到，就是和平演变的问题。不过，这和战后国际形势是两回事。那时考虑的是要不要打仗，还没有提出“和平演变”的问题。结果没有打仗，证明估计正确。事实上，美国对与苏联打仗也很害怕。后来，美国不断搞军备竞赛，但它的主要武器是和平演变。当时的情况是，东欧正在往社会主义转变，美国对此不甘心，预言共产主义政府迟早要下台。不过当时的情况与以后乃至现在的情况都不相同，历史有一个演变过程。

关于美苏关系，斯大林当时也讲过类似的话。战后初期，苏联一方面很害怕同美国打仗，另一方面又在讲世界上美苏矛盾不是主要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能成为主要的，世界战争还是会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帝国主义之间发生。这些问题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7年，召开莫斯科会议。在起草宣言时，中苏两党争论的问题之一是世界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我们强调战争不可避免，苏联强调可以避免。最后，宣言写成一个比较折中的提法。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现在看来和平过渡是幻想。那时虽然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但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特别在欧洲，法国、意大利共产党比较强，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后来，苏联主张搞美苏合作，放弃了夺取政权的问题，不仅革命谈不到了，连和平过渡也谈不到了。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之所以要提出有关战争的问题，主要是告诉苏联人，对此不要这么害怕，而苏联非常忌讳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历来如此。例如，30年代，立三说中国革命形势将要高涨，苏联应借机出兵，由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我们政治局会议的记录送到莫斯科，苏联人一看大为恼火，对立三罪状的“上纲”就高了起来。王明钻了这个大空子。他首先了解到苏联人认为立三的问题很严重，而中共中央并不知道。更明显的是后来的朝鲜战争。斯大林或是莫洛托夫曾对我们说，别想把我们拉到战争里去。苏联出动飞机是履行同我们的契约关系，等于是中国租苏联的飞机。苏联领导人紧张到普通人不易想像的程度，但表面上又故作镇定。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给中国一封电报，大意说中国是朝鲜的惟一希望。事实上，我们出兵的决策是很难下的。现在，有人说在前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了什么材料，说朝鲜战争是我们让打的。可以肯定，这是胡说八道。中央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实讲，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绝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

关于中共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斯大林不信任中国共产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我们和美国没接触的时候他就不信任。那时，有个苏联代表到延安，一见面就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日本？苏联的目的主要是要中共大规模出兵为它解除后顾之忧。中国党就是坚持打游击战争，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1946年马歇尔来华时，毛主席要恩来同志带话给他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毛主席讲这个话是有些原因的，一方面是策略，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摆出一个姿态；另一方面，对苏联也有看法。我们当时确实想争取美国的援助。但对我们争取美国援助斯大林又紧张。

解放战争后期，苏联是否提出过"划江而治"的问题？这是一个疑问，恐怕没有，但风声总有。我想，苏联正式提出这种意见的可能性不大，但苏联也从没有正面地说，我们支持你们。中国革命胜利了，斯大林承认了错误，说苏联提的一些建议不对，很危险。但毛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主席很不高兴。人家问他去不去列宁格勒，毛主席回答，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中苏关系中有很多事不合情理。当时，苏联对华总顾问写了一份报告，斯大林送给毛主席看了。这份报告里把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同志都排了队，说中国某人是亲英派、某人是亲美派，只有高岗是好人，其他人都靠不住。情报工作做成这个样子，简直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毛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主席谈谈情况，毛主席不愿意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很大。

关于我们党与美国的关系，以前谈了一些。这里再回忆补充几点情况。

1944年，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对延安挑剔的，都很惊讶、意外和兴奋。许多人回去写了书。这一年，《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篇庆祝美国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庆的社论，里面对美国评价很高，谈到美国的革命、独立，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这篇社论是毛主席要我写的，写后又要我作了修改。这个社论也带有欢迎的性质，一方面是欢迎外国记者，另一方面也是欢迎即将到来的美军观察组。毛主席对一些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个别谈话的情况我不知情。我和美国记者斯蒂尔也有过一次谈话，但不带任何外交色彩。

（有同志问，美国有份材料说，1945 年初，毛主席曾考虑去美国。是否有过这个考虑？）这个情况我当时没有听说。上美国去，这个事太大了。在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之前，很值得斟酌。表面看来，我们当时与赫尔利的关系已搞得很僵了。主席、恩来同志因此向美军观察组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毛主席去重庆都要开大会讨论。他要下决心去华盛顿，这个问题太重大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历来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但为辅的外援究竟在哪里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对美国的希望那么殷切，反映出我党和苏联的关系虽然经历的时间那么久了，但苏联始终对我党关系冷淡。苏联始终没有什么真刀真枪的援助。抗战后期，苏联在舆论上对我们的支持是有一点，登了几篇文章；但当时国际舆论对国民党已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有所表示。就是在皖南事变时，苏联的反应亦不如美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另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美国当时准备在中国登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援华物资可能分给我们一部分。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体现了这种可能性，但我们最后也没有得到。我们对同美国谈判，开始抱了不小的希望，最后也是失望，但希望并不是完全不切实际。我们当时对美国是有所帮助的，例如营救美国飞行员。

抗战结束时，苏联出兵东北，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头一条，没有苏联出兵东北，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苏联塔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社记者弗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中说，苏联出兵后进展迅速，使毛泽东闷闷不乐，这不是事实。如果毛主席闷闷不乐，我会知道。事实上，苏联出兵后，毛主席很高兴。有两点证明，第一，他对解放日报关于日本投降的新闻的批评很严厉，说夸大了原子弹的作用，没有宣传苏联出兵的决定作用。第二，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但是悄悄的，不公开。

1946年马歇尔使华有两点要提到。一点是马歇尔到延安去，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欢迎，这是比较大的一件事。还有一点，1946年中，面临国共破裂，我们那个时候要下决心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 二

当时的国际形势显得很严重，全世界都在议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现在的初稿对背景写得不够，还要再加强。

毛主席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非常英明的。美国同苏联的矛盾不是那么严重，主要是同第三世界的矛盾发展了。毛主席讲的中心问题还是中国问题。战后，同美国作斗争最尖锐的恐怕还是中国。毛主席有洞察能力，不被美国表面的气势汹汹所蒙蔽，不被喧嚣一时的议论所迷惑。当时说美苏必战，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苏联是世界进步力量的中心，苏联要避免与美国的冲突。世界进步力量也担心这一点，极力避免这一点。毛主席谈话是要振奋大家的精神，说明真正的问题是中间地带。假使美苏打起来，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就拼命宣传这一点，他对打赢内战信心不足，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在别的国家可能不像中国那么突出，但当时美苏关系肯定变了，从合作变为对抗，由此引起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党内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外为此忧心忡忡。毛主席镇定自若，洞察事物的本质。直接影响是稳定了士气，加强了信心，把人民动员起来打败美蒋进攻，使大家看到这是目前真正的出路所在。这是关键之点。

1946年4月，毛主席开始提出对国际形势的三点估计，以后又加以发挥，提出中间地带。应该着重说明三个问题：第一，美苏战争打不起来；第二，美国利用反苏叫嚣侵略“中间地带”；最后，除打破美苏必战外，另一个重要之点是美苏妥协，各国不必跟着妥协，中国人民准备坚决斗争。

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主要是英、美同苏的对立，国民党对此大加渲染，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共产党的宣传也有不小的影响。最初，在《论联合政府》中，毛主席设想的战后形势是美苏合作。这一点在出《毛选》时作了改动，应查老版本关于战后新秩序的论述。战后形势变了，美苏必战在党内有相当影响。毛主席不赞同这种看法。最初，毛主席在4月写的关于战后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已经说到这几个问题，但主要是以后的两次，第一次是跟斯特朗谈话，第二次是定一同志的文章。

毛主席纠正了，或者说破除了美苏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同时指出，美苏不仅不会打仗而且会有相当程度的妥协，但这一妥协并不需要各国人民跟着妥协。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苏联的政策实际是要各国人民跟着妥协，不希望影响美苏关系，引起美苏关系紧张。毛主席提出这一点，一个是表示我们斗争的坚定性，一个是针对前面谈的那种错误思想。各国反动派对人民革命力量只要能够消灭是一定消灭，中国一定要斗争，重点在此。中国就是中间地带，中国就要斗争，丝毫不动摇，解放区人民要动员起来。谈战后国际形势要归结到中国人民起来斗争这一点。讲纸老虎等等都是为此。当时，我们解放区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是有些紧张的。毛主席不为美苏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表现镇定，坚决斗争。结果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明毛主席的这两个判断是正确的，最后我们胜利了。

毛主席对国际形势估计也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例如，认为英法与美国的矛盾会成为主要的矛盾，当时对英法的左派力量估计比较高。

苏联的政策说不说，说到什么程度需要研究。苏联希望中国妥协。苏联的这种政策表明对美国估计过高，对中国人民估计过低，这种倾向始终存在。全国解放以后，斯大林对刘少奇的谈话表明了这一点。他说“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表示过去苏联对中国的判断有误。这个问题不必说得很多，要提出这一点。毛主席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苏联没想到，美国也没想到中国革命这样快取得胜利。对毛主席这个判断的意义要发挥一下。

与国民党的关系和对美国政策之间是有联系的。与国民党合作还是破裂？对美政策以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为转移。只是到了最后，我们才提出打倒蒋介石。美国的政策是必然援助国民党。在马歇尔来的时候，毛主席对他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我没听到毛主席讲马歇尔的坏话。对政协决议我们是要执行的。不论是跟国民党合作还是决裂，我们都有准备。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当然，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想在不放弃原则和人民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寻求妥协，原则是人民的利益寸土必争。这是重庆谈判的观点。一方面维持和平局面，一方面达到妥协，妥协有原则。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往前可回溯到七大《论联合政府》，往后可联系到“一边倒”。“一边倒”和分析战后国际形势是一脉相承的。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里包括两点：第一，美国是纸老虎；第二，美国是在侵略中间地带。由这两点可以延伸到“一边倒”。美苏冲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突，中国是中间地带，斗得很激烈，把我们放在中间地带的位置上，对美藐视。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引出了后来“一边倒”的结论。这个分析不是一时性的，而是后来很长时间内一直代表我们基本的外交政策。美苏后来也没有打，也没有和，发生了冷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四

# 关于《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

（1991 年 12 月 21 日）

你们写的这个稿子的材料很丰富。对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领导，显示了毛主席对新闻工作的历史贡献。这时确实是一个高峰，以后再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峰了。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社，党中央、毛主席除了指挥战争，花那么多的力量来参与新华社的工作，在新闻史上创造了后来难以企及的成就。这个题目很值得写一写。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确实是神采焕发，一天有使不完的劲。确实是大革命胜利前夜一代伟人的气魄。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打电报，写新闻、评论，也是高峰。像《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很自然，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历史不会重演，在西柏坡的那段时间很难得。党中央那么多的人领导新华社的工作，非常难得，为以后新华社的发展奠定了一

---

*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施肇域、龚育之、郑惠、石仲泉、徐永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个非常好的基础。转战陕北时期，新华社的中心还是在“陕北”，不必强调太行山的总社。

这篇初稿对《解放日报》改版，说得比较详细。解放日报一直是毛主席管的，改版前也是他管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合到一起时，在新闻的处理上有一个含糊的地方，国内、国际新闻，到底应以哪个为主。由于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办着办着，缺点就出来了。改版前确实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没有自觉的办成党报。毛主席说：不是党报，而是社报。这篇文章要说说改版后形成党办报的一些新的原则和特点，这些后来成为我们党的工作的优良传统。改版后，党怎么运用报纸，按照新的方针，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从全党办报可联系到以后的全党办社（新华社）。《解放日报》改版，根本的关键，是“宣传上要以我为主”。“以我为主”这个思想非常重要。联系到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可以看出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原则。宣传上总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叫做“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毛主席批评《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的报道，就是这个道理。对原子弹在战争中起的作用怎么评价？实际上，还是起了作用的。问题是不能跟资产阶级的报纸一样，宣传得太多了，客观上削弱了苏联出兵的作用。

毛主席作为一个宣传家，同时作为一个组织家，把报纸紧紧地抓在党中央的手中。对新华社也是如此。如果在解放战争期间不把新华社抓在自己手里，全部让太行的总社去管，那对于整个战争的指导就会不利，所以在转战陕北时毛主席把小分队留在身边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他在很多稿子上都注明在什么时候发表，用什么方式播出，抓得非常紧。这些都是很大的特点。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优柔寡断。

另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能不能在稿子的什么地方讲一下。还有，关于渡江的新闻写得非常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精彩。把你们写的这篇稿子的行文结束在关于渡江的宣传上，整个文章的气势比较壮。评白皮书可一笔带过。从毛主席怎么领导党报、领导新华社，毛主席怎样作为一个伟大的宣传家发挥他的才能，这样写下来，行文上比较完整。

至于我写的评论，都是毛主席看过的。因为我当时管这方面的工作，毛主席对我要求很严格，这方面可以讲一讲。这样可以穿插一些情节。

总的看，初稿有材料基础，可以写成一篇很精彩的东西。原来的题目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可把它改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这个题目是需要的。这方面的内容，用别的题目不容易表现出来。把毛主席这个时期对报纸、对新华社的领导和他自己写的东西写出来，说明他领导新闻工作，像领导作战一样。宣传战线、新闻战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与军事战线一样，也是一条战线。毛主席也领导得非常出色，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要把它写出来。能这样写出来，文章气势就比较饱满，有充分吸引读者的力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第二部分

# 初拟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一

# 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两国三方”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作战的主攻方向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向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国民党政府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转向了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武装摩擦事件。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八路军、新四军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以这种斗争来维护共同抗敌之局面。毛主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领导全党打退了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高潮。国共两党的这次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抗战期间的政局和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 从“皓电”到“佳电”

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端于1940年10月19日的何、白“皓电”。这一天(19日在电报上以韵目代日，简称“皓”)，蒋介石集团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限令驻守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是对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的通牒，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场史剧的序幕。

第二次反共高潮距第一次反共高潮仅半年时间。为什么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如此迫不及待地发动进攻？这与当时国际形势在一个方面的急剧变动有一定关系。

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使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身，得以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为此，德国再次出面调停，劝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日本进一步开展诱降活动。这个时期，英美政府也改变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进。为了拉蒋，英国表示重开滇缅公路，美国宣布给以大量贷款。另外，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国际上三大力量这样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蒋介石感到身份陡增，忘乎所以，好像历史给了他一个“解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共产党问题”的难得机会。

毛主席分析这一形势，指出：“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战争，加入德日意同盟，变为贝当政府。前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独立战争，拒绝贝当政府，变为戴高乐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将到白热化”。毛主席剖析蒋介石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候”。①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其有恃无恐外，还因为他们在苏北制造的反新四军摩擦中吃了亏，急切地要进行报复。自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在它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具体方针后，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寻机打击、削弱、直至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3 月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了，不甘心；1940 年 6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又在苏北挑起武装冲突。在他们看来，苏北的地理位置介于华北与华中之间，是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枢纽，占据苏北，可以阻止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合。在苏北，国民党的韩德勤部有十六万之众，新四军陈毅部只有七千人。蒋介石让韩德勤发动苏北战争，满以为会一举成功，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仅 9 月底到 10 月初的黄桥一战，就被歼两个师一万一千多人。苏北战争以韩德勤的惨败告终。周恩来同志谈到这段历史说：“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

① 1940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要报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① 10月中旬，蒋介石集团发出何、白“皓电”是决心要对华中地区的我党抗日武装力量给以致命一击。在“皓电”发出的同时，国民党军令部向顾祝同、汤恩伯、韩德勤等部发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10月24日，恩来同志向延安报告重庆方面的消息说：“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②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蒋介石发动反共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前一次规模较小，在国内产生的震动不大。这一次何、白“皓电”是以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发出的，气焰嚣张，势头猛烈，对社会各界震动甚大。无论中共的朋友或是中间派人士都为中共的前途担忧。替中共谋划对策者有之，为中共设法调停者有之，要中共发动反内战者也有之。但更多地还是劝中共作出让步。11月1日，恩来同志电告中央说：“现在各方都已感觉形势严重”，“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这须请中央以决策速告”。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毛主席表现出了大政治家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风度。他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了冷静的分析，提出了我党打退国民党进攻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毛主席首先分析了国民党的内外关系。他认为：从世界形势看，蒋介石集团“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

---

① 《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1页。

② 1940年10月24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① 从国内看，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在军政、财经、文化、人心方面一概不稳固，其危机是空前的。毛主席说：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是不巩固的。这个总的特点决定了国民党领导集团要结成蒋、桂、何联盟，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的两面战争。这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即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决非全面战略攻势。这是蒋介石政策的实质。②

毛主席尽管认为蒋介石还没采取全面反共的战略攻势，但面对严峻形势仍然确定我们党的方针要以应付最黑暗的局面为工作的出发点。他指出时局发展有维持现状、坏转、好转三个前途。所谓好转，只是对反共放松一些，对抗战加紧一点。但好转前途很少了，维持现状可能还拖一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办法。目前“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作出发点。”③ 毛主席还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④

---

① 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② 参见1940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和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

③ 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④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蒋介石可能对我军采取的军事进攻行动。中央最初认为，蒋介石可能对我军实施两步进攻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到陇海线以北，构筑多层纵深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军夹击消灭我军。11月1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征询意见。这两个方案的第一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犯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主动打入彼后方。若采用此方案，我军布置仍以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为主，而以反对反共进攻为辅。其利是政治上我方占上风，其害是将来军事危险很大，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第二方案，是政治上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八路军五十万人中至少抽调精兵二十万分数路打入彼后方。若采此案，由于人民不了解情况，则政治上不利，但军事上能制先机，不被封死，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经过对两案的反复比较，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中央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① 毛主席解释中央的这一方针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恩伯）、李（品仙）东进是吓，命令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办事处也是吓。蒋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我们“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② “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

①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等电。

②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等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①

上面是中央研究的对策。如何公开答复何、白“皓电”呢？尽管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基本对策已经确定，毛主席对发表对外宣言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几次起草，拟好又停，曾经准备过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转念又放弃了。这不单单是要反复权衡利弊，思考对策是否周全，还因为要看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待日苏关系的发展。11月3日，毛主席致电恩来同志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直到11月6日，毛主席才拟好后来被称为“佳电”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在11月9日发表了“佳电”（韵目代日，“佳”为9日）。陈云同志说过，毛主席最后写的“佳电”文字，写了一夜，改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

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佳电”是我党的严正宣言，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肠荡气的杰作。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

---

① 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李克农等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在皖南事变中

根据“佳电”，我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在华中取自卫政策（保卫皖东和苏北，坚决打击一切来犯者），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以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延长国共合作抗日的时间。这充分表明了我党相忍为国，维护团结的真诚愿望。

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于12月8日发出“齐电”，要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开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签发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在此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华中、皖南部队进攻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他们急调二十九个师约二十至三十万人向大江南北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密令宣传机关放出空气，要求政府严明“军纪国法”，以坚决手段惩戒一切“不服从命令之部队”。这样，国共两党之关系空前恶化，政治情势危殆万分，皖南的军事冲突已如箭在弦上。

面对作为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部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积极奋战，我江南孤军迅即北移。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电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指出：“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31日，毛主席代表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如何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中原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党与军队，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南方局的任务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全国其他各地党组织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中央决定对于蒋之命令和宣传攻势，报以冷静不言的态度；不论其如何谩骂与攻击，暂时都不理它，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讲话；蒋介石急，我们就不急，这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办法。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但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身份实行对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长期以来对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在何、白“皓电”发表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仍对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一方面，国民党下令新四军北移包藏险恶用心；另方面，新四军又不能不通过北移以求发展。正确的处置是应当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将计就计。项英则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严厉批评后才仓促决定北移路线。这时，国民党早已完成围歼北移新四军的一切布置。6日，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顾祝同、上官云相统率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多师八万多人，便对其展开了包围袭击。

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周恩来同志所在地重庆、刘少奇同志所在地盐城和叶挺军长所在地茂林地区之间，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过电台频频联系，作出了一系列指挥决策。全党对新四军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北移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1月7日，毛主席等即电告叶、项，不宜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有利。皖南北移部队遭到突袭后，项英同志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使已在东进中取得初步胜利的部队失去了冲出包围的时机；随后他与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同志又私自离开部队出走，使军部指挥极为困难。1月9日，毛主席致电叶军长，要他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同志负总责的决定。当得知北移部队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全体官兵已濒绝境，准备牺牲时，毛主席等一面指示叶挺同志速谋突围，注意与包围部队负责人进行谈判，一面电告恩来同志，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求援，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为挽救皖南新四军危局，少奇同志、陈毅同志还向中央提出发动苏鲁攻势，包围沈鸿烈、韩德勤部的建议，以便凭藉这种形势提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在皖南撤围。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向蒋介石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南方局已动员党的干部向各方揭露国民党军狙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发动社会名流向蒋、何、白提出抗议。蒋介石一面佯称“撤围”，一面下达生擒叶、项手令，对被围新四军发动全线总攻。这样，新四军北移部队与比它多五、六倍之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了七昼夜，终因处置失措，弹尽粮绝，基本覆没。除两千多人突围皖北、苏南外，其余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叶挺同志不辱重任，苦撑危局，在奉命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也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叶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蒋介石蓄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以新四军遭受血腥大屠杀震惊世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在皖南事变后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高压，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独立自主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力量的立场和方针。还在1月7日茂林战斗刚刚打响时，毛主席就电告少奇、陈毅同志，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党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在接到皖南新四军被围歼消息后，1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之后指出：今后我们的办法是抓住皖南事变，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1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继续分析时局，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① 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还任命了其他领导成员。这个命令于当日发表。随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宣布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

在1月20日这天，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严正宣告：亲日派反共降日的计划即使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这个谈话还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以下简称“十二

① 这次会议改组了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五人组成，负责军委实际工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条”)。

这以后,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或在致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彭老总等人的电报中,继续阐发了党的立场和方针。毛主席特别强调:(一)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和谈话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这对我们有利。破裂责任在他。我们应该紧紧捉住1月17日令坚决反对,绝不游移妥协。(二)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1月17日令。三个月来的让步阶段已经完结,立即转到坚决斗争的立场。一味担心破裂,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和我党我军,而且会中蒋之诡计。只有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目前惟一正确的政策。(三)我们政治上取全面攻势,揭破蒋之阴谋,军事上取守势,打防御战。同他全面决裂,目前不可能。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任何情势。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四)目前的破裂不应说成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对于蒋介石应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暂时不提反蒋,但要公开批蒋;蒋尚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与中央军。(五)我们表明态度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我们目前和他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在经过严重斗争之后,才能克服蒋的反动,达到争取时局好转之目的。

毛主席的这些意见在党领导的各条战线上得到了贯彻。蒋介石“一·一七”反动命令发布后,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冀中八百万军民通电全国,声讨皖南事变的元凶;苏北军区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皖南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等将领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血腥惨案。在重庆,当“一·一七”反动命令见报后,恩来同志即向国民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方面提出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7日深夜，他亲笔写了悼念皖南死难烈士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挽诗，用巧妙的方法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而在《新华日报》刊出，使新四军被围歼的真相冲破新闻封锁而传遍山城。恩来同志还和南方局工作人员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及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声援。皖南事变前，恩来同志还先后向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斯诺详细地介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并准备了一份国共关系的文件交给他们。毛主席“一·二〇”谈话后，恩来同志即电告在回美途中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在纽约接到周电后，即向美报界披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斯诺也发表了恩来同志给他的材料。①

我们党以尖锐对立的态度向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使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党的重大变化。各阶层人民、各派政治力量大多对我党的正义自卫立场深表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先生先后致信蒋介石和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当局在皖南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军长。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先生也对蒋介石、何应钦的举措表示不满，忧虑国内前途。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主角阎锡山、胡宗南等，在这次反共事件中站到了

① 在1943年9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恩来同志介绍当时的外交活动说：我们的外交活动以美为主，英为次。美英对我们也有一些帮助，如新四军事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当时我准备了一个国共关系的文件给美国女记者，嘱咐她在中国大内战爆发时，并得白劳德允许即可发表。恩来同志还说，当斯诺来重庆时，我也准备了国共关系的一封信给他，如果中国内战公开爆发，即可公开发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中间派立场。各民主党派对蒋介石使亲痛仇快的行径表示愤慨。海外侨胞也谴责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倒行逆施，呼吁政府停止内争。

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制造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拒不出席国民党驻苏大使原定举行的宴会。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白提出质问。潘大使会见蒋介石时还明确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内战对于中国意味着灭亡。美国担心中国大规模内战不利于实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美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恩来同志，对蒋介石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攻击。英驻华大使卡尔也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

国民党顽固派大规模反共除了面临国际上的外交压力外，还被日本人的军事进攻打乱了部署。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乘势将调集的三十万大军指向豫皖苏地区，企图“肃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军、新四军，然后深入苏北、山东，以达到“驱逐”华中我党武装至黄河以北的目的。但正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1月26日，日军以五个师团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犯，将十五万国民党军包围于平汉路以东。两军主力在信阳一带发生激战。在日军出其不意的进攻下，蒋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变成抗日部署，数万大军仓惶从“剿共”驻地撤回。

仅仅半月前还是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对于政治形势的这一转变，毛主席从中日间、国共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2月间的许多文电中，他阐发了这样一些重要思想：

第一，指出国民党在各方的压力下，虽然不会改变其反共的根本立场，但反共高潮正在下降。毛主席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① 国内外舆论都同情我们，“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②。皖南事变时，“蒋以硬为主”，皖南事变后，“因为我们硬起来”，蒋“没有那样硬了”，“以软为主”。“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③。“1月17日以前，蒋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月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④

第二，指出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是蒋介石全力反共造成的，也将在政治上给蒋以极大的打击。蒋介石以为，发动皖南事变，扩大国共冲突，日本人会坐山观虎斗，停止入侵。岂知日本人另有想法。东条英机在1月30日的讲话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再则，日本人不愿意新四军去华北。东条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毛主席在致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引述东条的话后指出，日本人认为“对我分区宰割于彼有利，将我集中华北反于彼不利，这是我们在华北反扫荡战争胜利的结果”⑤。“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⑥。日蒋之间的“这个矛盾很可利用”，这是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⑦

第三，指出目前国共僵局存在于我党有利，愈僵愈于我党有

---

①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② 1941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新四军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
③ 194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④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⑤ 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
⑥ 1941年2月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⑦ 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利，只有蒋对我党表示和缓，我党才可以表示和缓。毛主席说："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已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令北移、命令进攻华中等），并已收到了成效"。我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用蒋介石的手拉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①

在2月7日致恩来同志的电中，毛主席还预测到，"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时局正按照这个预测在发展，毛主席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向前走。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计划于3月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心急火燎，力拉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以摆脱窘迫困境。

中共参政员要不要出席会议呢？党中央、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反复电商后认为，不能无条件地出席。2月15日，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提出将1月20日宣布的"十二条"提交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条件。这是极高明的一着棋。它不仅有利于

①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扩大“十二条”的政治影响，又能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团结抗战的立场，博得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但是，蒋介石方面既拒不采纳，又无理纠缠着要中共方面出席会议。为打破僵局，在参政会开幕第二天，中共方面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的新“十二条”①，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基本条件。若不采纳，拒不出席。3月2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主席分析情况说：“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第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第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17日命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已到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态度，蒋介石于6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反共”决议，中共参政员无一人与会，但会议仍不得不选董必武同志为常驻委员。如毛主席在3月12日致恩来同志电中所说：这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

第二届参政会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时的一战。

---

① 它的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参政会草草收场，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 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我党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蒋介石一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了产。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力量得到了更大发展。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苏北解放区，而且使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如意算盘。此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明显的强于国内其他任何军队，成为顽固派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

——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了中间派的政治作用，扩大了中间派的成分。不仅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各抗日小党派和多数的杂牌军、地方势力属于这个阶层，连国民党中央军中的许多军官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许多官员也纳入了这个范围。尽管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的立场是动摇的，但是经过积极的耐心的争取工作，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重大关头，还是同情和支持了我们。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不断发展，抗击的日寇兵力几乎与国民党抗击的日军数量相等。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我党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我党日益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因素和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但是，他的估计全错了。我党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谈奠定了政治基础。

4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经验和基本政策进行了总结。毛主席谈形势说：

> 关于目前时局问题。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从属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起着决定的作用。现在指导中国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一面抗日，一面反共；而在抗日方面——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抗战反汉奸；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拉对拉，以打对打。
>
> 我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必须有整套战术，不可粗心。对其反共政策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斗争须是有理、有利、有节。
>
> 在反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将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地方实力派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与统治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一般的，应以中间派的态度对之。有人以为皖南事变后整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完全叛变了，这是把复杂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中国社会是中间阶级占很大的位置的。有些同志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对中日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发生动摇，对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所以对党的政策也发生动摇，以为三三制的政权不适用了，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不是统一战线政策了，而是土地革命政策了。

有些同志把对付国民党破裂的可能性，当作最坏的唯一的可能性，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

有些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战政策与阶级政策、统战教育与阶级教育的一致性。

有些同志不了解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政权社会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是他准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总结的报告提纲。这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赞同这个报告提纲的决议。5月8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对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政策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解释和概括。这就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这篇著名文章。

从何、白“皓电”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时间，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毛主席肩上担子沉重。但是，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那个时期他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三百多件，除少数几天没有发出这样内容的文电外，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1月和1941年1、2月，每月都是五十件左右。在11月初起草“佳电”前后和12月上旬顽固派的“齐电”发出之后，是毛主席发出电报最多的时候。11月3日和13日这两天，均发出了九件。在12月14日这一天则发出了十一件，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的最高纪录之一。这些虽多为布置工作、发布指示的急电，但并非全是事务性的应急处置。如上所述，不少文电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还有一些文电，对他的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的阐发。这些文电和这个时期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论政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可以说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从毛主席的文电以及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文电往来，还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为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从而他的这些认识或决策既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汲取别的同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高于别的同志的思想认识。例如，对于“皓电”，中央最初决定答之以强硬的“炸弹宣言”。在恩来同志反映了重庆各方意见，提出望“作表面的服从”，以分化顽固势力和“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全国，答复何、白”的建议后，采纳此议，改为发表前述产生巨大影响的“佳电”。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但在了解到国民党围歼皖南的某些布置后，迅即于12月26日发出了皖南部队立即北移的紧急指示，并在12月30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也没有发出文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少奇同志也曾向中央表示过这一主张，但在三天后他改变了想法，认为时机不成熟，力量不允许，“实行全面军事进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提出“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① 毛主席接受了这个建议，改为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正确方针。他在1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以前的一些看法作了修正，指出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国府命令是否全国破裂的开始，这一点要考虑。这样，实际上就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毛主席从善如流的思想作风使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更紧密了，党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个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对如何坚持团结抗战的认识走向统一了，同国民党斗争的经验更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趋于定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重要阶段。

① 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致毛泽东等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不久，1941 年 5 月 1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毛主席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可以说，这个文件的主要作者是毛主席。它的制定和发布，不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要制定和发布这样一个纲领呢？中共中央关于发布“五一施政纲领”的指示和纲领自身对此作了说明。中央指示指出：“此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国民党施行黑暗统治，全国人民彷徨无主之际，实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纲领的开头说：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特提出本纲领。这已把纲领发布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纲领制定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了。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纲领的形成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边区自身建设的关系。

## 1937 年和 1939 年的两个施政纲领

“五一施政纲领”并不是陕甘宁边区发布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937年和1939年,陕甘宁边区已发布过两个施政纲领,它们是"五一施政纲领"的前身。这三个纲领反映着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发展的历程。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1936年5月设立了陕甘宁省。1937年2月,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表示愿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随后,中央决定由林老(伯渠同志)筹组陕甘宁特区政府和进行"更名改制"工作。所谓"更名",即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改制",即将苏维埃制改为民主共和制。

在由苏维埃制向民主共和制过渡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造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任务。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模范区,第一步工作是进行由乡到边区议会的选举。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就是边区党委在民主普选运动开始前夕,于1937年6月20日提出的,名称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

这份纲领反映了由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时期的特点,全文共16条,主要内容有: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抗日战争;实行民主普选制度与议会制度;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保障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废除苛捐杂税,采用单一累进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优待抗日战士家属;实行社会救济;镇压汉奸活动,消灭土匪等。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因为全国抗战的爆发而停止进行。凡居住边区年满16岁的人民,"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办法。20人选乡代表1人,由乡代表选乡长;50人选区议员1人,区议会造区长;200人选县议员1人,县议会选县长;1500人选边区议员1人,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边区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至1937年10月底，乡、区、县三级选举完成，有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2月选出边区议会议员，进而组成了边区政府，林伯渠、张国焘分任主席、副主席。

毛主席对这次选举运动非常重视。1937年11月他致电八路军驻边区部队各级首长和政治机关，要求部队“积极的热烈的”参加边区议会的选举。他在电文中对边区实施民主政治的意义给以充分估计，说：“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这“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将成为“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动力”。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毛主席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突出特点，是把实行抗日同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主张采取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路线。1938年3月底、4月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由于这个纲领的主导方面是主张抗日，同时有“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等内容，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它采取了拥护和支持的态度。同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作出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省参议会临时组织条例。与这些情况相适应，陕甘宁边区政府于同年11月决定将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

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体现，它同由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和国统区的省市参议会具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它不是由一个党选定的单纯咨询机关，而是经人民普选产生的、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和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它有多种职权，包括：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委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员、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批准有关民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通过及审查边区政府预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发行地方公债；审议和决定议员各项提案；以及其他应兴应革事宜。边区的参议会制，实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它保证了边区各抗日阶级、阶层人民去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

1938年7月，毛主席在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对陕甘宁边区的性质、特点、意义以及我们党的建国主张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

他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的民众都有自己的组织，在抗日的原则下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边区的部队"也都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能够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边区的经济"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最重要的，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毛主席说，所有这些，就是"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全中国也应采取这样的制度，"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毛主席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各个民族是平等的"；"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说：“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①

这里用很大的篇幅来摘引毛主席的这篇谈话，是因为它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初步勾画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毛主席把边区的性质、特点、意义、作用归结为一点，就是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的结合，指出这也是抗日救国的惟一正确的道路。1939 年的施政纲领就是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在 1939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4 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制定的，4 月 4 日正式公布，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这第二个施政纲领共 28 条。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即主张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项原则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真诚拥护的；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也是支持的；国民党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的时间中，抗战比较积极，允许人民有较多的抗日自由，国共关系也比较好；再加陕甘宁边区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以纲领申明：它是“本着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与条件”制定的。

28 条政纲划分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个方面。

---

① 《解放》第 45 期，1938 年 7 月 15 日出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民族主义方面规定：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倾向；实现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权主义方面规定：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地位；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检举、告发权；实行免费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实行干部教育。民生主义方面规定：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废止高利贷，奖励合作社之发展；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工业生产，奖励商人投资和保护其自由营业；提倡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确定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工人利益；优待抗日军人和工作人员家属等。

不难看出，第二个施政纲领的内容较第一个施政纲领要充实得多，许多条文的含义也更加明确和完备。如果说第一个纲领主要还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规定，那么，第二个纲领就已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纲领了。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制定和发布

第二个施政纲领发布后的两年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为对内，反共“磨擦”活动愈来愈频繁，还掀起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思想理论上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他们阉割、抹煞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精神，把三民主义变成反共的旗帜。面对这样的形势，共产党一方面要高举自卫的旗帜，开展反“磨擦”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另方面要进行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并系统阐明自己对中国革命各项问题的基本观点。斗争的需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思想理论建设，在总结近二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又经过围绕三民主义问题展开的论战，使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达到了成熟。其集中表现，就是以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毛主席的著作不仅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及如何进行这一革命的问题，而且正确回答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过怎样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毛主席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运用到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1940 年 3 月初他在边区党政联席会上说：“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同年 9 月他在《时局与边区问题》报告中又指出：“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否新民主主义？我们的答复是的。过去苏维埃也是的。现在的安塞、保安依然是工农民主，因成分未增加，多数地方应该是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开明绅士是资产阶级化的对革命妥协的地主。新民主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东西，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如此。”

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抗日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有关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1940 年 3 月 6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正式提出“三三制”政权主张，规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年7月5日，毛主席在为《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向全国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主张。除政权政策外，毛主席还对根据地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政策等，作了规定和阐述。他还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中央关于“三三制”政权指示发出后，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首先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试行。194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以统一边区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这时毛主席肯定陕甘宁边区已是“一切上了轨道的正规化了的”①根据地，但又指出边区的建设仍有不足之处，要求由中央和边区共同努力，把边区的工作再推向前进。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绥德、陇东、富县等地试行“三三制”及延安中区五乡按“三三制”组织征粮委员会的经验，边区政府决定自1941年2月起，在边区进行第二次普选。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要求在选举运动中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以在边区“真正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政权”。到9月，乡、县两级选举结束，共选出乡、县参议员三万余名，同时普遍改选了县、乡两级政权。10月，边区级参议员选举工作结束。由于边区中央局所提候选名单中的非中共候选人很多未能当选，中央局特决定聘请46名

① 《时局与边区问题》，1940年9月23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

为了使“三三制”政权的各种社会政策得到立法的承认，边区中央局组织了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起草新的施政纲领。当起草委员会写出纲领初稿后，如前所述，毛主席亲自改写了其中的大部分，并由他最后修改定稿。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

毛主席不仅参加了纲领的改写和最后修订，而且直接关注对纲领的宣传工作。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示，对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宣传工作提出不同要求：边区党要“以此加重教育并且切实遵照实施”；“在国民党区域、日本占领区域及海外侨胞中，须广泛散布此纲领，在重庆、香港、上海、菲律宾、新加坡、纽约等地须召集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在其他压迫严重地方则秘密散布”；“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中须与当地已经发布之纲领一并加以讨论，其中有些为当地尚未提出的……尤须着重讨论，使我全党全军全民了解此纲领之严重意义”；“在军队中机关中学校中均以此作教材，须加熟读，并利用邮局及其他办法，散发至国民党军队中去。”

4月28日，毛主席为纲领的发布问题又写信给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并转边区中央局，要求把纲领“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须使之人手一张，识字少者当作识字课本读。并张贴于通衢。《群众报》上，须为文逐条通俗解释。”他还要求边区中央局在纲领发布的同时“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30日，边区中央局作出于五一节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要求党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并“均须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党员有违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反此纲领之任何条文者，予以纪律之制裁。”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很快得到贯彻。纲领宣传和民主选举相结合，在全边区形成了巨大的民主潮流。从边区政府委员会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都对施政纲领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由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于5月间合并组成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编印了纲领的解释材料。《解放日报》刊登一系列社论，对纲领内容进行阐述。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大会于11月17日通过决议，一致认为“五一施政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惟一正确的边区施政纲领，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督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

## 纲领的主要内容

“五一施政纲领”共21条。它比1939年的纲领减少了7个条文，但却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它更加全面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举凡军事政策、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卫生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对待外国人政策等，都一一做了明确的规定。

纲领的前言指出：本纲领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族统一战线原则”而提出的。这是纲领制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过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的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项原则，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是相通的。所以高举革命三民主义的旗帜，也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新民主主义方向贯彻在纲领的每一条文之中。“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也贯彻在每一条文中，并在第一、二条中作了具体规定。第一条与1939年纲领的有关规定基本相同，第二条增写：“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这是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所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在纲领中的体现。

纲领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一部分是1939年纲领相关内容的重申，一部分是1939年纲领所没有或作了重要改动的。这里着重讲讲后一部分。

第一，“三三制”政策。纲领第5条：“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一条突出体现了边区政权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共产党人愿与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民主合作的态度。它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鲜明的对照。纲领起草之初，《解放》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即真诚恳切地表示：“对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忠实抗战建国的各种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才，必须善为团结，珍惜爱护，推心相与，共同合作。”① 第二届参议会上，毛主席进一步说明，我们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他并对某些党员仍然存在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提出批评。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在党外民主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以“五体投地”来形容他对毛主席讲话的赞佩。

第二，人权保障政策。纲领第6条：“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这是对人民享有的广泛的民主权利的规定。凡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地主、资本家，都属于人民的范围，都享有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边区政府从法律制度和物质条件上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许下了一些民主自由的诺言，但并没有实行。当时《解放日报》专门发表题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社论，指出：“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得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主，给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础”，“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政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② 以民主保障抗战的胜利，以民主推动中国的进步，这是毛主席一再阐明的观点。纲领的这条规定，具体表达了这一观点。

---

① 《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解放》第124期，1941年2月1日出版。

② 1941年5月26日《解放日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三，廉政政策。纲领第8条："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边区的政治，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治。这里没有官僚制度，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各级领导人员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月津贴仅2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5元。他们不是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同国统区的腐化政治形成了又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边区政权机关能够得到人民真诚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纲领的这项规定，既是边区政治的反映，又是对各级公务人员的进一步的严格要求。"俸以养廉"，这在当时还只能是一个奋斗目标，因为尽管边区党组织和政府对于改善各种公职人员的生活作了努力，但在当时物质生活贫困的条件下，他们的廉洁奉公，主要还是靠共产主义觉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支持的，而不是靠俸禄养成的。

第四，土地政策。纲领第10条："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原则是承认现存的土地所有权和实行减租减息。土地已分给农民者，保证为农民所有。未经分配者，继续由原主所有，但地主必须减轻农民的地租和债务负担。在地主和债主方面要减租减息，在佃户和债务人方面要交租交息，政府对租佃和债务关系加以调整。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又可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这一土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政策到1942年1月又由中共中央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第五，工商政策。纲领第11条："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这是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在经济政策上的表现。边区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边区的经济，是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多种经济的组合。边区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包括外地来边区者投资办企业，主张贸易自由，同时提倡发展合作事业。此外，政府也根据需要与可能开办一些工厂和贸易机构。多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边区的工业、商业。

第六，文化教育政策。纲领第14条："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这里包括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十分广泛的内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对扫盲教育、新文字（指汉语声、韵母拼音）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公务人员学习等，都做了规定。由于边区绝大多数群众都不识字，所以纲领把扫除文盲放在各种社会教育的首位。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必须采取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1939年12月毛主席就为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纲领更明确规定要"尊重知识分子"。纲领发布后，《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提倡自然科学》等，对这条内容加以解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七，民族政策。纲领第17条除重申民族平等原则和尊重蒙回等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规定外，又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当然，这一主张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它的实行是在后来。

纲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内容，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前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发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如《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

所有这些施政纲领，在文字上有繁有简，在内容上有详有略，但它们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都是相同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由于发布时间较晚，在条文上更明确地写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字眼。它的第1条即规定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山东而奋斗”；第3条为“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加强民主建设工作”；第4条为“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促进经济建设工作”；第9条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学说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传播开来的情况。

毛主席曾讲到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对全国所起的作用问题。他说：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巩固和发展边区的民主政治，就可以“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①毛主席的这个论述也可以用来说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当时全国民主运动中所具有的意义。它以现实的榜样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提出了最有力的批判，为争取全国的民主和进步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

① 《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11月14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三

#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军队打开全国抗日战争局面和走向抗日战场的出发点。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

上一篇讲到“五一施政纲领”的制定，这本身就是边区建设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篇将涉及边区建设的其他一些方面。

毛主席对陕甘宁边区一直寄予厚望，并像对待亲人那样细心周到地关怀着、抚育着它的成长。他再三再四地强调：边区“是第一个根据地，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全国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尽管别的根据地人口比边区多，“但不能代替它的地位”。① 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② 要“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③ 边区建设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确定的。边区召开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会议，如边区党的代表大会、

① 《时局与边区问题》，1940 年 9 月 23 日。

② 《在边区议会开幕时之演词》，1939 年 1 月 17 日。

③ 《在边区议会上的报告》，1939 年 1 月 18 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边区参议会、边区中央局和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边区党政联席会议、军政联席会议、留守兵团会议、县长联席会议等等，毛主席无不亲自出席并作报告和讲话。边区建设的成绩，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智慧。

## 协调边区党政关系

讲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建设，首先应提到他在协调边区内部党政军民各系统和各类干部之间的关系上所做的工作。协调好这些关系，是搞好边区建设的重要保证。这里有党政、军政、军民、党与军队、政府与人民、上级与下级、新干部与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即所谓“洋包子”与“土包子”)、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这部分干部与那部分干部(即所谓“山头”之间)等多种关系。对于所有这些关系问题，毛主席都有精辟的论述，都做了大量工作。这里着重谈谈毛主席是怎样协调边区政府与边区中央局(及后来的西北中央局)的关系和增强军政军民关系的。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①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毛主席以很大精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

据谢觉哉同志日记和有关资料，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写给林、谢的信就有10封，并且数次当面长谈。毛主席写的信除涉及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外，着重从方法论上说明问题。1941年7月31日给林、谢二老的信写道："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以材料，尤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在8月5日给谢老的信中，毛主席写道："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的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

① 《时局与边区问题》，1940年9月23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毛主席的信说理透彻,词义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感到折服。在当时发生的争论中,主席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现行财经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缺点与问题。他殷切期望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求得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意见和行动的统一。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谢老在其日记中对毛主席给他的每封信的主要之点都一一作了摘录。

在对林、谢二老做工作的同时,毛主席又写信给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和组织部长陈正人,要求他们确实掌握现行政策执行中的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在1941年8月9日的信中写道:"下列两点请予示复:(一)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二)盐运正紧,国特操纵,须在庆富设栈收囤,否则等于白运,如谢老所说,两驮仅抵一驮,此事宜即解决,是否已在着手?"

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是当时财经政策争论的一个焦点。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因此,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其中的关键又是运输,即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边区中央局(后西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西北局于1941年5月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规定:从边区到乡各级都要组织食盐运销委员会,中央局书记高岗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或政正职干部亲自领导。林老、谢老对盐的运销问题作了专门研究,谢老并写出《花定池盐运销的研究》,送交毛主席。他们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毛主席对此争论发表了具体看法。他在1941年8月6日写给谢老的信中说:边区财经问题的决定点有二: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而盐的外销,又是“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边区1941年盐的运销量大幅上升,从1940年的23万驮增至近30万驮(每驮150斤),这对支持边区的财政起了重要作用。由此也说明,边区的运盐政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弊病,如出现有普遍动员到一切地区的一切人的现象及动员组织工作粗糙等,但从基本方面说,是正确的。林老等边区领导人也积极参加了运盐的组织工作,边区政府曾专门发出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完成运盐任务。

1942年9月1日中央作出在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边区政府的工作,协调政府与中央局的关系,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派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去政府工作,担任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维汉在党内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有多方面的工作经验,可以弥补林谢二老方面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些不足。为此事，毛主席特写信给谢老，希望他和林老在工作及生活上“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罗迈到政府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毛主席又找李维汉长谈，对边区政府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谈话中，他把延安比作英国的伦敦，意即要求边区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起带头和示范作用。此后，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边区政府的工作有了进一步开展。

## 拥政爱民运动

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实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也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光荣传统。边区的军政、军民关系，总的说是很好的。驻守边区的各部队在河防、清匪、反“磨擦”和其他保卫人民利益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在1937年、1939年、1941年制定的三个边区施政纲领中都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内容。1940年1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通俗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他说：“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①

但是，一段时间内，在边区部队中，由于纪律教育的放松、物质困难的增加以及某些旧思想旧作风的残存等原因，也出现了不尊重政府、违犯群众纪律、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如：不执行政府的法

① 《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02号。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令,不尊重政府工作人员,超越军队权限擅自代行政府职能,侵犯群众利益,甚至打人骂人等。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在一次会上,当留守兵团负责人报告他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之后,毛主席非常激动地说:成绩,成绩,成绩!用不着说这么多了,有成绩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讲成绩,而是找缺点。1940年8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8月13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对野战政工会议的意见,指出: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责建立起政权和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在这个指示和后来毛主席多次讲话中,一再申述了这样一条原则:"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一般应多要求多责备军队干部。"

为了彻底克服军队中存在的不尊重政府、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毛主席的推动下,从1943年初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

这年1月,边区政府公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林老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边区政府并决定从本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以后每年春节前后都要隆重地慰问驻军。《解放日报》还发表了边区拥军优抗公约。在拥军运动月的第一天,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决定》。政治部还做出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边区军队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决定。2月1日,贺龙同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同日，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此后便出现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热潮。这一运动又很快发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在第二年春节期间，“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由军队和群众两方面各自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举行联欢和劳军活动，“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1943年的缺点错误，而于1944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① 10月14日，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又强调：“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的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实行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来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与民是会爱军队的。”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加强了军政、军民关系，为保卫和建设边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增添了新的内容。

## 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它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鉴于当时的形势，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人的意见而确定下来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3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参议员们畅所欲言，提出改进边区工作的议案数百个，其中第81号便是李鼎铭等11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其内容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在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态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人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还提出5条具体实施办法。

这个议案提出后，在参议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多数议员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提案，应尽快实行；但也有些议员认为，时值救国紧急关头，敌人正以大量兵力向我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搞精兵简政，岂不等于束手就擒？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等人的动机是否纯正。毛主席对这个提案非常重视，认为这个办法"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8日，参议会通过了这一提案，"交政府速办"。

参议会闭幕后，12月6日，《解放日报》以《精兵简政》的醒目标题发表社论，论述精兵简政的意义所在。12月中旬，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结合。到1942年9月，毛主席根据10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要求各根据地都要把它"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来看待"。

毛主席为什么这样看重精兵简政政策呢？他在不少场合对此作过说明。起初，他是把这个政策同反对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1941年12月中旬的指示中，又把这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政策作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1942 年 9 月毛主席撰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进一步用“鱼大水小”这一比喻，来说明精兵简政之必要。什么是“鱼大水小”呢？就是当时正在缩小而且还可能继续缩小的抗日根据地，已经难以维持适应过去敌后抗战猛烈发展的情况而建立的庞大的战争机构。如陕甘宁边区，1939 年总人口为 200 余万，脱产人员 4 万多；到 1941 年，两项数字分别变为 140 余万和将近 8 万，脱产人员已占人口总数的 5% 以上。再加国民党政府从 1940 年 11 月起，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这就使“鱼大水小”的矛盾更加突出。边区政府不得不逐年增加公粮的数字，1939 年 5 万石，1940 年 9 万石，1941 年 20 万石。虽然由于各项正确政策的实行，边区人民承受了这一负担，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维持的。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4 月，裁减了各种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人。但总的说，由于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收效不大。毛主席批评了这次精简进行得不彻底，指示“现在要真正的精兵简政”。① 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边区政府为主并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领导人参加的边区总整编委员会。

1942 年 6 月底至 8 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一些必要的工作制度。在这次精简中明确规定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等四项办法。

---

① 《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1942 年 4 月 13 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三次精简从1942年9月开始，进行一年多时间，至1944年初基本结束。这次精兵简政，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力推动和边区政府的努力，较前两次大大前进一步。

1942年8、9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各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8月19日，毛主席写信给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同志和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同志，指出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信中说：“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① 11、12月，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两个长篇报告《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又都强调一定要把精兵简政搞好、搞彻底。他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

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精兵简政工作的进行。边区政府由秘书长李维汉同志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随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规则、条例、公约、方法，并通过召开各类人员的简政座谈会，进行研究和发动。“简政实施纲要”是一个全面体现精兵简政精神和要求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5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很好的文件，它从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等方面，对11个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这个纲要经过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于1943年3月由政府颁令执行。

经过1943年一年的努力，边区精兵简政工作获得预期效果。从精简机构说，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从精简人员说，边区政府的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物资局等6个单位，原有469人，减为279人，减少40%。

精兵简政的大力推行，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的办事效能，进一步统一了政策、法令、命令、指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另方面大大地节约了财政支出，节省了民力。以延安县为例，1942年动员民力6万个，1943年减为2.8万个。再如绥德县，1942年动员民力7.5万个，1943年只动员900个。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得到很大缓解。

## 边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主席对边区的经济建设，较早就给以重视。他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指挥者，又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这里主要讲有关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方面的情况。

边区经济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把这项工作摆在什么位置、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问题。这同边区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因为就整个中国、整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来说，毫无疑问，战争，即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第一位的。但陕甘宁边区却有着特殊的情况：一方面，它是人民抗战的总后方，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并已经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立了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另方面，从1940年下半年以后，遇到了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而能否克服这一困难，直接关系着边区的存亡乃至全国抗战的胜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项工作的位置究竟应该怎样摆法呢？毛主席果断地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41年8月22日毛主席给谢老的信中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①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又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教育一项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② 毛主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他的这个观点。在1943、1944年，他又一再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③ 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

当时边区的经济困难，集中表现在抗日经费来源问题上，即数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事业费供应困难，所以财政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如何使财政问题得到解决？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单纯从紧缩开支上打主意，甚至主张紧缩掉某些必要的开支；另一种是认为应通过发展经济（生产）使财政充裕，从而保障供给。毛主席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5—566页。

③ 《致彭德怀》，1943年1月25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后一种思路。在他看来:“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①

毛主席首先着眼于发展经济的主张,在前面引用的1941年8月6日给谢老的信就已表达出来了。那封信把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作为边区财经问题的两个“决定点”,强调:“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② 当然,毛主席并不是看轻节省财政开支的重要,他大力提倡精兵简政的目的之一,就是缩减开支;但就整个财经工作来说,他第一强调的是发展生产。他领导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也是这样。到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③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和公营两大类,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对待这两种经济,又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毛主席认为,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问题,同时以纳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党政军费用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的部分,休养民力。“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党和政府要“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建设”，同时“又必须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①

对政府应大力扶助人民经济发展的问题，毛主席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政府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给什么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此，“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毛主席说：“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把处理好“给”与“要”的关系，视为“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并说：只有在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②毛主席这里所说的“给”与“要”的道理，非常重要和深刻，它体现着我们党的根本性质与宗旨。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所以能够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同舟共济，一起承受困难和克服困难，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边区经济建设以发展农业为主，这是毛主席根据边区的实际所反复强调的一条方针，但他对发展边区的工业也非常重视，而且

---

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发行，第 751、752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563—564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随着建设工作的进展，对发展工业的问题就愈加重视。1944年5月22日，他在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会上有几段讲话，很深刻。他说："边区在五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还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共产党员应该"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在边区农业已自给有余、工业亦有一些发展的基础上，毛主席在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两年以内，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面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①

3个月后，毛主席在给博古的信中，又提出了这样崭新的论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②

---

① 1944年5月26日《解放日报》。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这个讲话和这封信里，毛主席已从边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工业建设问题了。这个讲话和这封信也表明，还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在农村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明确指出，中国民族复兴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是新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力提高。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边区工业建设一开始，毛主席就十分看重科技人员的作用。他在1942年12月所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专门讲到工业家沈鸿“自愿以其私有的十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的事迹，并指出，沈鸿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成了边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事情确实如此。边区工业就是在沈鸿等人到来后才迈开最初步伐和逐步得到发展的。

毛主席为边区经济建设制定的方针政策，还有其他一些。这里所讲的在不发生突然事变的条件下各项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通过发展经济来保障供给，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注重发展工业等，是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漫长探索中迈出的可贵的一步，它们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四

# 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

到 1941 年初，世界上还有两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没有卷入战争，这就是苏联和美国。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年中和年底，这两个国家也分别遭到德、日法西斯的进攻。从此，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重要国家能够置身于战火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终于演变成全球规模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之间的生死搏斗。苏联和美国的参战带来了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所要回顾的是围绕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党中央、毛主席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我党方针政策的调整，以及世界战局的演进对中国内部国共关系的影响。

## 苏德战争的爆发与我党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政策

苏德战争的爆发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关于国际形势，党中央、毛主席最担心的是美日两国可能达成妥协，造成牺牲中国反对苏联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对于德国的动向，党中央也有所注意，这是因为德国的一举一动常常影响国民党的抗战态度。6 月中旬，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我党做国际情报工作的同志从几个渠道获得德国即将发动对苏战争的消息。6月16日，恩来同志在一封电报中告诉毛主席，国民党政府内部传说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定在6月21日。党中央立即把这一情报电告斯大林。这个日期与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的实际日期只相差一天。不过，当时苏德两国政府正对所传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辟谣，苏联塔斯社甚至还痛斥这是英美企图挑拨苏德关系。我党领导同志的基本估计亦是尽管社会主义苏联与法西斯德国之间的矛盾终究是不可调和的，但近期内纳粹德国如不改变对英政策，不停止进攻英国，很难设想它会立即投入冒险的两面战争。然而，几天之后，苏德战争竟然爆发了。消息传来，延安的人们包括毛主席在内，和全世界一样感到突然和震惊。

苏德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毛主席迅速作出了反应。6月23日，政治局紧急召集会议，研究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中国局势和我党应采取的方针。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一份决定《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个决定不长，一共只有三段话。第一段指出，德国法西斯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第二段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最后一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三项任务：(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个短短的决定反映出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即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世界上出现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斗争；与此相适应，毛主席对我党的策略也做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重要调整，明确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这个决定所确定的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时期都起着指导作用。

对于我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变动需要做一点历史的说明。早在抗战前夕，毛主席就提出了建立反日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抗战初期，我党也实行了这个政策。不过，自从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接受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观点，认定当时的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纷纷放弃了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试图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这种变动曾在西欧共产党中引起很大混乱。但是，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苏德战争的爆发表明，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套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来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是不行的。因此，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政策。这种调整反映出毛主席善于把握急剧变动的形势，擅长捕捉事物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要求全世界人民立即联合起来反对德意日三国的侵略，因为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这就如同1936年至1937年形势要求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因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

事态的发展表明，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在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发表了广播演说，宣称“希特勒进攻俄国，只不过是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他还表示，英国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7月中旬，苏英两国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定。9月底，苏美英又在莫斯科宣告三国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并签订了英美向苏联提供武器和各类物资的第一个议定书。从此，世界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的变化，对于我党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对于我党对英美政策的变化，在党内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一下子理解的。为此，毛主席做了不少说明和解释工作。6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世界政治的新时期》，它是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后发表的。这篇社论开宗明义地指出："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的新的转折点，以前的世界政治的旧面貌，因苏德战争而终结；以后的世界政治的新面貌取决于苏德战争。"全文强调，苏德战争已经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今天的战争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全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7月7日，党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按照毛主席的布置，这篇宣言的主旨是"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体现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有所批评。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党在宣言中提出了十项主张，其中引人注目的第一项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为了使全党同志更透彻地了解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更确切地掌握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7月12日，毛主席又专门写了一个指示。这份指示用不寻常的口气直截了当地说："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国际局势发生急剧转变的时候，毛主席的文章和指示对全党同志迅速认清形势，统一步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为世人所瞩目。但是，苏德战争的前途究竟如何呢？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毛主席密切注视着苏德战局的发展，并对战争的前途作了认真的思考。6月28日，毛主席要求为《解放日报》起草一篇社论，题目是《苏必胜、德必败》。毛主席先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要说明苏胜德败的问题，必须抓住四点来写：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苏联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士气民气旺盛；第二，德国资源短缺，生产能力已扩至极限，而且其战略战术长短优劣经过两年的战争已多大白于天下，容易引起被侵略者的注意与防御，苏联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第三，德国法西斯四面出击，形式上是外线作战，实际却是内线作战，处于被包围被攻击之中，随着战线拉长战区扩大，供给和联络就有可能被切断，这些困难都是苏联所没有的；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毛主席又说，苏联的胜利并非唾手可得，重大的牺牲与一时一地的挫折也还不可避免；但全人类和全中国的战斗信念是：中必胜，日必败；苏必胜，德必败。毛主席说完就要求立即动手把文章写出来，他等着看。为扫除悲观情绪，树立必胜信念，这样一篇社论确属急需。按毛主席讲明的要点，只用了大约一小时就把稿子赶出来。毛主席看后稍作修改，就送到解放日报社去，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了。

## 日本的南进与北进

日本的动向如何，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这是苏德战争爆发后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有关各国各方都极为关注的问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国共两党、苏联和美国都估计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更大些，特别是因为1941年4月日苏两国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但是，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各国各方都不得不对这一问题重新作出判断。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党中央、毛主席首先考虑的是日苏战争在近期内爆发的可能性。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大，极紧迫，也极危险。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一旦处置不当，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遭受严重损害。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情况：一个是苏联非常担心日本将趁机向它发动进攻，使它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因而再三要求我党不顾一切地拖住日本，催促八路军打到东北去；另一个情况是蒋介石非常希望日苏之间爆发战争，以便从中渔利，借机反共。

7月，毛主席反复思考了有关我军配合苏军作战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方针。2日，他在打给彭德怀同志的急电中提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15日和18日，毛主席在打给恩来同志和少奇同志的两份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毛主席还嘱托在重庆的恩来同志，"此条请告崔兄并请他转告远方朋友"。这里"崔兄"指的是当时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苏联驻华武官兼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崔可夫，“远方朋友”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代称。

苏德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一样，对中国政局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最为敏感的国共关系上。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希望能借助国际上反法西斯势力联合的趋势，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国内时局好转。为此，我党领导同志曾在各种场合申明团结抗战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但是，国民党却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方针。据党中央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曾判定日本将于8月中旬以前进攻苏联。他的如意算盘是：日本北进必然会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压力，而苏联将会要求中共军队与之配合；他可以借机发动反共活动，迫使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等到时机成熟，再以“收复失地”为名命令国民党军队北进。这就是所谓“三家北进”的“三北”政策。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7月初，中央社编造了所谓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谣言，国民党政府公然阻止《新华日报》披露真相。与这种反共宣传相呼应，韩德勤、霍守义等顽军亦乘日伪军对我进行“扫荡”之机攻打我军，企图伺机占领我鲁南根据地。当时，在重庆还上演了一出滑稽戏。7月1日，德意两国为寻求日本的配合承认了南京汪伪政权；第二天，国民政府被迫宣布与德、意断交。但断交之后，何应钦却亲自出面为德国驻华使馆官员举行告别宴会，一时还传出他表示愿与德国人“在新疆相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对遭到法西斯德国侵略的苏联一直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7月中旬，毛主席在一份电报中指出：“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亲德活动，毛主席一连写了三篇短文，以新华社电讯的形式在7月23、24、26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这三篇短文是《何应钦的反共新阴谋》、《何应钦一手主持反苏反共》和《何应钦认敌为友》。在这组文章中，毛主席揭露了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亲德派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苏德战争爆发之机发动反苏反共高潮，其目的在于破坏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策应德国进攻，策应日本反苏，为日军巩固后方清除道路。他们主要的手法和步骤是：捏造事实，宣传十八集团军不执行军纪军令，造成反共舆论；在全国大捕共产党，打击各小党派及一切爱国运动；等待时机，实行“三北”政策，重演皖南事变的把戏。在最后一篇短文中，毛主席还就中德断交后何应钦欢宴德代办事发表评论说：“环球各国尚无此先例”，何应钦等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必胜，日本亦必胜，英美苏华四国则必败，对德绝交，实属错误”。毛主席的这些文章点的是何应钦之名，抨击的实际是蒋介石及其反共政策。由于我党的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反共宣传。同时，由于我方已在军事上加强防范，反共顽军也暂时放弃了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枉费心机，一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毛主席一度把爆发日苏战争放在首位来加以考虑并不意味着他把日军北进看作是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可能。考虑到最坏的情况，预先做出准备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总体的判断上，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日本在同时准备着南进和北进，伺机而动。一般地说，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日本早就垂涎于被英法荷瓜分的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欧洲战争爆发后，由于德国的胜利，法国投降，荷兰战败，英国自身难保，无力东顾，这就为日本南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毛主席认为，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北进的可能性虽然增加了，但日本要下决心北进尚需两个条件：第一是在苏德战场上德军迅速取胜，苏军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第二是美日矛盾能够得到某种缓解。从7月初起，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就估计日本不使用武力而实现南进的政策不易成功，日本与美国冲突终究不可避免。当时，八路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华北、东北日军动向的侦察，结果未发现日军将在近期内发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对苏进攻的迹象。在毛主席对日本动向的判断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不会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压力，因为中国战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线。10月20日，毛主席在致恩来同志的电报中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11月7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广播演讲时说："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采取那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我党的各项决策主要是依据这一判断作出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8日，英、美对日宣战。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11日，美国又对德、意宣战。正如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所说，"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1942年元旦，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各国保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对法西斯国家作战，援助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2月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并作出以下三点估计：(一)日本将在近期内占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二)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势，而对德取攻势，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三)在中国，日本将无大举增兵之可能，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我党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这些估计都具有很高的预见性。会议对某些问题的估计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过于乐观。例如，当时估计半年左右美日在太平洋上即可形成相持局面，英美将会较快在欧洲开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二战场等。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开展我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工作被提上了日程。12月9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这个指示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随后，党中央又就在东南亚开展华侨工作、保护日寇占领区英美人士等问题发出一系列指示。毛主席提出的我党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大大充实和具体化了。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虽然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但积蓄力量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阵线面临着严重困难。在苏德战场，虽然苏军在1941年冬至1942年春发动了反攻，消耗掉德军大部分预备队，但苏联的处境仍极其困难。德国占据着苏联的大片领土，其主力军团仍有能力向苏联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在太平洋战场，盟军被动挨打，日军连连得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就占领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以及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在中国，形势也十分严峻。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日本无论南进或北进都不会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压力。1942年初，由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以我军为主要对象的作战行动，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困难的局面。与此同时，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日军也没有放松对正面战场的压力。1942年5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月，日军切断滇缅路，断绝了美英输送援华物资的主要陆路通道；日军还占领了浙赣两省的大片地区，打通了浙赣路，控制了东南沿海原拟作为中美两国反攻日本基地的各主要飞机场。

对于我党来说，当时所需应付的主要问题除日军的扫荡和清乡外，仍是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1942 年上半年，苏联对此十分担心。蒋介石又一次抱着幻想。他认为，苏联困难，日德进展顺利，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必然会掉过头来与德合力攻苏，如此他便可实施期待已久的“三北”政策了。

1942 年上半年，毛主席几次提出，“对日苏战争可能爆发应有精神准备”。最紧张的情况出现在 4、5 月份。这时，苏联红军刚刚取得莫斯科保卫战和冬季反攻的胜利，苏德双方正全力以赴，准备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决战。斯大林十分担心，日本会在这个关键时刻配合德军从东线发动进攻。为此，苏联方面曾连续几次给我党打电报，要求我军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援助。毛主席反复考虑过这些要求，并指示八路军总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日苏战争爆发之时派遣正规军一部及游击队一部开赴东北地区南部策应苏军作战。根据我军实际情况，衡量利弊得失，毛主席决定还是坚持原订的以游击战为主长期配合的方针。据师哲同志回忆，这次为了得到苏联方面的理解，毛主席不仅请恩来同志在重庆当面向苏联友人作解释，还亲自致电斯大林，说明如果我们离开根据地不顾一切牺牲动作，我军就有可能被打败，无法长期坚持，这于我于苏都将不利。显然，苏联人对我党未按他们的要求去做有所不满。他们不了解中国党的政策、方针和实际情况，只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有个苏联代表，一到延安就责问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配合，不集中大的兵力打日本。这是当时苏联认为我们党搞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一个原因。历史地看，我们党量力而行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正有利于双方的。

事实上，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那天起，毛主席对苏德战场就非常关注。虽然毛主席对“苏必胜，德必败”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每当战局发展不利于苏联时，他就焦虑，而每当战局转为有利于苏联时，他便兴奋。苏德战争初期，德国侵略者虽然在苏联境内遭到前所未有的抵抗，希特勒未能实现他以闪击战取胜的梦想，但德军还是不断地向前推进。1941 年 9 月上旬，德寇逼近莫斯科。那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每天都极端焦急地注视着苏德战场上的变化。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领导同志坐在一起分析苏德战争形势。毛主席要警卫员去取地图，警卫员没弄清楚就把中国地图拿来了。毛主席为此发了脾气，厉声说：“我要的是世界地图！”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他那时对苏联战局的焦虑心情。这种心情直到德军从莫斯科外围撤退才缓和下来。1942 年夏季，在苏德战场上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希特勒率先发动这场攻势的目的是想扭转局势，夺取苏联最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摧毁苏联尚存的全部防御潜力，再度夺回战略主动权。8、9 两个月德军攻势如潮，苏军实行战略退却。10 月上旬，战局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德军攻势减弱，红军一部突破该区德军包围。一直密切注视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毛主席认为，这意味着双方的攻防地位开始发生转换，他断定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已近在眼前。看到这种变化，毛主席极为兴奋，他接连写了三篇文章，以《解放日报》社论的名义分别在 10 月 12、14、16 日发表。

第一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预见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在两天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历史的教训》中,毛主席号召所有反对法西斯的人们进一步团结起来,给敌人以最后一击。他说:“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就在毛主席发表第一篇文章的那天,德国法西斯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它虽然被迫承认“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但又自欺欺人地说,战局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轴心国已失掉战略上的主动,而是“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的地位”。毛主席的第三篇文章就是针对这个声明而发。他在这篇题为《评柏林声明》的文章中指出,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由攻转守与莫斯科战役后由攻转守大不相同。因为莫斯科战役后,德国尚有余力,可以再次发动攻势;英美是否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也不明确;日本还有可能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合力打击苏联。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三个条件一齐破产了。最后,毛主席总结说:“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战局的真正明朗化是在一个多月以后。11 月 19 日，苏联红军对德军发动了出人意料的凌厉反攻。在毛主席撰写这三篇文章时，相当多的人们还为法西斯德国的攻势所迷惑。然而此时此刻，毛主席不仅预见到这一伟大的战役本身的结局，而且预见到苏联的这一胜利将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带来影响。他那惊人的洞察力、预见性以及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仍令人折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共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结为同盟，这个形势对中国的抗战前途是很有利的。不过，蒋介石仍无意积极抗战。首先，他对美英两国的表现大失所望。他本希望珍珠港事件能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方针，但美国并无此意。他还以为美英参战后能迅速击败日本，但太平洋战争初期英美却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尽管美国很快同意给国民政府5亿美元的援助，但美国实际能向蒋介石提供的军事和物质援助是非常有限的。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不满。当然，蒋介石无意积极抗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放弃反共打算，英美的参战反使他觉得可以腾出手来从事反共活动。

1942年初，毛主席在考虑应付日苏战争的同时对蒋介石借机发动反共高潮的可能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对国共关系的状况作出了基本估计。2月20日，在一份内部情况通报上，毛主席加了这样一段话：“设想日苏战争发生后的各种情势及我党任务，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但滇缅路不久将断，英美援华物资必经苏联，国民党亦更困难，对我决裂是不会的。”毛主席估计到两点：其一是国民党不会放弃有利时机反共，其二是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受制于客观条件，不能不有一定限度。从1942年上半年总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基本准确。当然，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当日苏战争的危险加大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趋于活跃，国共关系也就随之紧张。4月中旬，国民党又开始积极准备进攻边区。毛主席也在此时告诫全党，无论什么时候对国民党都不要放松警惕，把事情放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准备它来打，一方面争取它不来打，我们要放在它来打的方面”。为防备国民党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队的进攻，毛主席加强了军事部署，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防司令部。为戳穿国民党顽军进攻边区的阴谋，5月19日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以朱总司令的名义直接送给胡宗南。信函的抬头很客气，称“西安胡总司令宗南兄勋鉴”，接下去说：“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实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以质询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厉警告，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斗争手段。

正如毛主席在1942年4月13日中央学习组讲话时指出，反法西斯战线所面临的困难，其性质都是“黎明之前的黑暗”。1942年年中，国际形势开始好转。特别是在苏德战场，主动权正逐渐向苏军手中转移。英美因此也更加重视与苏联的合作。5、6月间，苏英签订了军事同盟及战后互助条约，苏美签订了租借条约，苏、美、英三国还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达成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为加强反法西斯力量，美、英政府在内政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美国政府释放了美共总书记白劳德，英属印度也释放了一批共产党人。美英苏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以及美英在内政方面采取的步骤对中国都产生了影响。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压力，蒋介石的反共行径一时有所收敛。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对国民党有对其反共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的一面，也有对其争取团结以求共同抗战的一面。1942年下半年，我党为改善国共关系做了重大努力，毛主席对此倾注了很大精力。6月中旬，毛主席开始考虑改善国共关系的问题。其实，这时的国共关系还相当紧张。在西北，国民党仍在布置反共军事行动；在南方，桂林《新华日报》分馆被查封，廖承志同志被捕。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改善国共关系呢？毛主席有两点考虑：一点是国际形势的好转势必影响中国，有利于国共关系的改善；另一点是英美若能按其允诺在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反法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斯战争就有可能在一两年左右结束，我党需要预先作出准备，提出对战后中国前途的设想。

毛主席的想法在以下两份电报中说得很清楚。6月26日，在致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中说："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7月9日，在给少奇同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说："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

7月7日，党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这个宣言反映出我们党对国民党政策所做的重要调整，直接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这份文件是根据毛主席在6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综合大家的意见起草而成的。在宣言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重申了我党抗战初期的四项诺言，即：(一)中共愿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赞成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宣言阐述了我党对战后中国发展方向的见解和团结建国的方针。这就是"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这样的提法公开出现，在皖南事变后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我党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此外，宣言强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7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了我党提出战后团结建国方针的原因，指出这是“全国人民的需要”。的确，已坚持抗战达五年之久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岁月共同建设新中国。当时，团结合作也是世界的潮流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国民党采取抗日和共的政策，宣言发表后，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我军在日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时，给予国民党军队可能的援助和配合；为避免国共军事磨擦，曾分别致电我军将领，指示他们设法与周围国民党军改善关系，并强调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需避免；在宣传上，多次电告各地有关领导同志，不要公开宣传国民党的坏处，不要作国共好坏比较等等。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党中央决定加紧同国民党的谈判。除恩来同志已在重庆外，中央又加派林彪赶赴西安、重庆等地与国民党会谈。由于我党的努力和诚意，国民党也作出了某些和解的姿态。例如，允许《新华日报》有删节地刊登我党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表示对国共关系问题要采取政治解决的方针，蒋介石分别会见周恩来、林彪，并指定张治中等人同我党谈判等等。

人们都知道战后的重庆谈判，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42年夏秋之交毛主席就曾认真考虑过到西安或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8月14日，蒋介石忽然在重庆约见恩来同志，说他将去西安，拟在那里约毛主席一晤，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为此，从8月中旬至9月初，毛主席和恩来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志进行了反复磋商。从毛主席打给恩来同志的几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比较倾向于由他亲自出面与蒋会谈。毛主席认为,他与蒋介石见面的目的不在我党目前所得直接利益的大小,而在乘此有利的国际局势及蒋约见机会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毛主席说:“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一个具体问题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他还表示,如果蒋介石约他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应准备答应。恩来同志对毛主席离开延安与蒋会面的问题十分慎重,与国民党长期谈判的经验使他对蒋介石的政治手腕有更多的了解,对蒋的心思也揣摸得更透彻些。他认为蒋介石仍想打击我党领导人尤其是打击毛泽东同志,毛主席与蒋介石会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安全也没有保证。据恩来同志分析,蒋介石目前尚没有解决国共问题的诚意,他所谓的政治解决只是要中共全盘接受他的条件,而非我党主张的民主协商。蒋现在感到苏美英三国皆有求于他,他可借此机会解决国内问题。对于我党七七宣言,蒋介石认为是由于苏联对其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最后,中央采纳了恩来同志的建议,在进一步判明蒋介石的意图之前先派林彪见蒋,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毛主席是否与蒋会面以及何时会面。在此后的谈判中,毛主席要求恩来、林彪对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并向国民党表示,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北上条件时,我黄河以南的部队可开赴黄河以北。

由于苏联红军已取得对德优势,日本冒险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这对一直企图利用德日合力攻苏之机挑起反共高潮的蒋介石不啻是个重大打击;因此,国民党这时也作出了一些缓和国共关系的姿态。11 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宣称:只要共产党“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12 月 16 日，蒋介石在接见林彪时说：“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他还表示，希望看到国共问题整个地迅速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表面看来，国共关系似乎有所好转；但事实上蒋介石仍无意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他仍然采取“拖”的方针，等待新的反共时机到来。这样，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一次良好机会便被蒋介石拖过去了。不久以后，国共关系又再度紧张起来。

1943 年 3 月，国民党抛出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蒋介石集团的立场、观点和它的内外政策。这本书歪曲中国历史，变相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变相割据”等等。这本书的发表既是为了从理论上替中国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辩护，也是为国民党再次发动反共内战作舆论准备。4 月，国民党中央通知各省党部和政府，称我党为“奸党”。在军事上，韩德勤、蒋鼎文、庞炳勋等顽军亦开始向我挑衅，不断制造磨擦事件。5 月，由于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在报刊上大造舆论，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并提出“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等等。6 月，胡宗南在洛川开会，决定调集大军分九路闪击延安。7 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做试探性进攻。

尽管前一阶段国共关系有所缓和，但党中央、毛主席并没有放松对可能出现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警惕。不过，我党最初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采取了忍让克制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毛主席不愿打断前一阶段业已开始的改善国共关系的进程，他认为国际形势的大局继续有利于国共关系的缓和。3 月 30 日，毛主席将国民党侵犯我根据地的事实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林彪，要求他们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制止摩擦行为。4 月 6 日，毛主席致电恩来同志，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明我们对国民党的这次反共活动“应取守势，待到彼方进攻再据理反驳”。5月8日，毛主席再次致电恩来同志，仍强调“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可是，国民党却把我党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做法看作软弱可欺，继政治压迫之后又从军事上向我步步进逼。

7月初，党中央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来的可靠情报，蒋介石、胡宗南正在秘密调兵准备进攻延安。那几天，在毛主席发出的每一份电报中几乎都写着“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战事有于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为避免内战，为制止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毛主席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把蒋、胡阴谋进攻边区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内战运动；二是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国民党的进攻；三是请正在由渝赴延途中的周恩来和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向胡宗南交涉。7月6日，朱德同志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呼吁制止内战，维护抗战团结大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这一电报在送交蒋、何等人的同时亦送交英美苏等国大使馆，并分发给在重庆的中外记者。结果，重庆的外国人与蒋、何等人在同一天收到这一电报。“七七”纪念日那天，驻渝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质问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美英苏各大使也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即停止援助。7月9日，恩来同志抵达西安，紧急会见国民党各军政要员。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这篇社论驳斥了国民党所谓中共“破坏团结”的诬蔑，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此后，我党又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等文件，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坚持抗战的主力。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我党以“宣传闪击”的方式一下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由于国内人民的反对、美英苏三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压力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蒋介石被迫改变反共计划。10日，他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均复电朱总司令，声明无意进攻边区。12日，胡宗南命令原拟进攻边区的部分军队撤退。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还未形成便被挫败了。从此直至抗战结束，国民党再不能明目张胆地大兴反共之师了。

这次，我党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就使国民党进攻没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时我们不但有国内统一战线，而且还建立了国际统一战线。与皖南事变时相比，这是大为不同的。可以说，这次事件的结束是党中央、毛主席成功地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来制止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一个范例。由于我党及时制止了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中国政局避免了新的动荡。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也有利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五

# 编辑党的历史文献

## 编辑《六大以来》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之中，特别是整风运动开展之后，毛主席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

《六大以来》的资料收集工作，在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但当时中央并不是为了编印《六大以来》这么一本书，而是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因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

七大的材料准备工作最初是交给任弼时同志，并要他负责督促于1940年10月底印出准备的各种材料，其中包括六大以来的党的历史文献。但是，六大以来文献的收集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到10月份，找到的文件还很不完全。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人分头负责收集，其中陈云负责组织问题和青年问题方面的材料，王明负责妇女问题方面的材料，洛甫负责宣传问题方面的材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邓发负责职工问题方面的材料，限定在11月底完成。由于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很多，根本没有精力去收集历史资料，上述分工实际上不大可行。于是中央不久又决定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收集工作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主席负责督促与审核。

毛主席接手后，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央秘书处指定资料科的裴桐同志专门承担文献收集工作。他每收集到一份，便由王首道同志(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转交毛主席审核。毛主席审核完毕，再交王首道同志送印刷厂排印。以后王首道同志不再经手这件事，而由裴桐同志直接同毛主席的秘书联系。直到这时，仍然只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在为七大准备材料，而没有听说还要把这些材料汇编成一本书。

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是在1941年8、9月份。毛主席为准备“九月会议”，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是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主席的这一建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收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是一项既费时又艰苦的工作，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除了从六大召开的1928年至1941年，时间间隔达13年之久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此期间中央机关几经长途转移，特别是1934年被迫从中央苏区撤退到陕北，许多文件已经销毁或散失。当时收集资料的主要途径是：一、中央从苏区带到延安的，这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二、毛主席自己保存的，它们主要是毛主席本人的文稿，如井冈山决议（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给林彪的信等，这部分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三、从党的报刊中查找，这条途径查找到的资料也很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的报刊主要在江南、上海一带，长征到达陕北后，查找这些报刊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的决议、命令、指示、通告等在报刊上登载的很少；四、从国民党的报刊书籍中查找，国民党出于其反共需要在三十年代编辑了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有五六本，收集了我党历史上大量的文件资料，这成了当时收集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主要途径。但从这个途径查找到的文献，特别是党的重要决议、命令、指示等，要看有没有被篡改，这个工作由毛主席亲自审核。尽管通过这么多途径查找，还是有一部分文件在延安找不到。就连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当时也没有找到。为此，中央曾致电南方局，希望上海党组织帮助查找。那时，中央在上海有一个“秘密文库”（即中央从上海迁移到中央苏区后在上海存放文件的秘密地点）。上海地下党从这个文库中找到了一些文件，但没有赶上付印。

《六大以来》的印刷工作是由裴桐同志与印刷厂直接联系的。当时不是等全部资料收集齐全后一次交印刷厂排版付印，而是裴桐同志每找到一篇就送印刷厂一篇，印刷厂打出清样后由裴桐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志送校对，校完后再送毛主席审核。这就是为什么1941年2月初毛主席就已经开始校对六大以来文件的清样，而《六大以来》这本书年底才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1941年9月中央同意把收集到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集成册后，毛主席就开始了此书的分类编辑工作。毛主席是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排的，即首先将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八个专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然后将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这种编排体例，与1940年10月16日政治局会议给陈云等人的分工基本一致。毛主席编排好后，便交印刷厂排印。在排印过程中，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文献。毛主席将这部分文献分别放在相应的分类专题之后，在目录中则以“补遗”或“拾遗”标明。这部分的分量不少，上卷总共303篇，其中补遗就有125篇，拾遗2篇；下卷总共216篇，其中补遗有62篇，拾遗1篇。《六大以来》最后出版时，毛主席在原有“目录”、“补遗”目录、“拾遗”目录的基础上又编了一个“编年目录”。这样，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实际上有好几种目录。

毛主席对文件的审核是很认真的。他不仅把每篇文献都通读一遍，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如将《请看!!! 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个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这样使人们对文件的内容更加一目了然。

《六大以来》内容十分丰富。它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等，共约280多万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毛主席在编辑时还是有所选择的，特别是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挑选得格外认真、严格。比如有一篇刘少奇同志写的检讨文章，秘书问主席是否把它收入《六大以来》，毛主席说：不必要。尽管这样，《六大以来》的内容还是显得庞杂了些，通读一遍并非易事，研究就更谈不上了。毛主席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编辑过程中有意识地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筛选，先后挑选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86篇文献中相当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如：《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1930.12)、《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1.9)、《中央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1.18)、《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1.8)①、《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11.6)等等；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我党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如：《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8.1)、《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1935.12.25)、《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7.15)、《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洛川会议决议，1937.8.25)、《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上报告之一部)等等。这些文献在1941年12月合订成《六大以来》选集本。因此，1941年《六大以来》实际有汇集本与选集本两种版本。

① 经考订，遵义会议召开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该决议是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的，通过时间应为1935年2月8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六大以来》的发行，其汇集本与选集本是不一样的。

汇集本共印了500套，只发中央各部机关、中央局、军委、军分区等大单位，不对个人发放。1947年3月，党中央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撤离延安，由于携带不方便，汇集本由中央秘书处带出了几部，其余全部销毁了。

选集本印数较多，具体数目不清楚，约在千册以上。分发对象不仅有单位，也有个人。但个人只限党的高级干部。分发手续非常严格，不仅要逐一编号登记，而且凡受书的同志必须对中央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存，不得遗失，不得擅自转让他人；(二)如果本人离开原任工作，必须把所受书转交继任者，并报告中央；(三)万一遗失，须立即报告中央。中央还明确规定，如果违反上述各项，将取消其阅读资格，并交党务委员会议处。在《两条路线》一书出版以前，选集本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来》选集本只在延安出过一版，以后没有再版。其汇集本则于1952年4月、1980年2月分别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两次修订再版，内部发行，以适应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这两次再版在内容上都作了适当调整。

1952年4月再版时，内容的调整比较大。主要是：(一)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起草的文件，凡是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不再编入，只将题名列入目录；(二)增加了5篇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这两点已由中央办公厅在“再版说明”中申明。但还有几点则是中央办公厅的“再版说明”没有说明的。

一是废除了1941年版本的各种目录，根据内容调整后的情况重新编制了一套目录。此目录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编排，类似于1941年版的“编年目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二是在再版目录中增加了1941年版本没有收集的但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许多篇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篇名，通共有31篇。①

三是删掉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1938.2.2)一文。因为这不是毛主席本人写的，而是王明在武汉以毛主席名义写的。

四是把《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及结论》(1937.5.3—7)一文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1937.5.3)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5.7)两篇文章。

五是根据当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收入"选集"中的毛主席著作、谈话和起草的文件的标题作了修改。例如把《湘赣边界各县

---

① 它们是：《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8.20)、《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10)、《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1.23)、《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1.27)、《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12.28)、《实践论》(1937.7)、《矛盾论》(1937.8)、《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9.29)、《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10.25)、《论持久战》(1938.5)、《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11.5)、《五四运动》(1939.5)、《反对投降活动》(1939.6.30)、《必须制裁反动派》(1939.8.1)、《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9.28)、《〈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10.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12.20)、《纪念白求恩》(1939.12.21)、《新民主主义论》(1940.1)、《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940.2.1)、《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1940.2.10)、《团结到底》(1940.7)、《〈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3月、4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11.21)、《反对自由主义》(1937.9.7)、《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中国工人〉发刊词》(1940.2.7)、《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5.4)。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把《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改为《井冈山的斗争》,把《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凡此18篇。

由于"再版说明"对上述五点没有向读者作适当交待,致使某些党史研究工作者在统计《六大以来》所收文献篇目数时出现了误差,此其一。其二,使不少同志对由毛主席自己主持编辑的书籍中,过多地收入他自己的文章,却对其他领导人的著作收入较少的做法不理解,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不适当地突出自己的做法,助长了后来党史研究中个人崇拜的消极现象。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毛主席1941年编辑《六大以来》在选用党的领导人特别是他本人的著作时是很慎重,很严格的。那时收入《六大以来》的毛主席的著作,大多是他为中央(或苏区党组织)起草的决议、指示等文件和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与结论(这与他当时在党和军队中的特殊地位有关)。他个人的署名文章很少收入。1928年到1941年,毛主席写了许多能够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最高认识水平、且他本人很珍爱的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文章编入《六大以来》。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当时的谨慎与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了。第三,使一些同志错误地根据1952年再版目录来判断毛主席部分著作第一次发表(包括内部发行)的时间,从而得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最早发表于1941年的《六大以来》这样一些不准确的说法。

1980年2月的再版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档案馆委托人民出版社用1952年再版的纸型重印的。这次重印基本上保持了1952年版的原貌。据中央档案馆撰写的出版说明介绍:这次重印只增加了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还有两点小的变动:一是增加了《中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治的决定》(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文。二是删掉了《1939 年 9 月 14 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演》亦即《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一文。

## 编辑《六大以前》

《六大以来》编辑出版后,在党内引起了极大而良好的反响。一方面正如毛主席 1942 年 3 月 30 日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时所说,《六大以来》的发表,对同志们认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表过如此多的"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承认与改正错误。1941 年《六大以来》(包括散页)印发后,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 年 10 月,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大家才承认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正是《六大以来》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广大党员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许多同志指出,研究党史干脆从一大开始,要求中央像编辑《六大以来》一样,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为了满足同志们的这种要求,毛主席于 1942 年初着手编辑《六大以前》。

《六大以前》的资料工作主要由陶铸和胡乔木负责。由于六大以前党内文件很少,因此在文献取材上,《六大以前》同《六大以来》有所不同。《六大以来》汇集的主要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这占了全部篇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领导人署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只占总共 519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篇文献中的极小部分,《六大以前》则主要汇集的是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约占总篇幅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上登载过的。因此,六大以前的资料搜集工作相对而言轻松得多。尽管如此,也有不少资料当时在延安找不到。为此,毛主席电请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帮助收集。1942 年 3 月 29 日,毛主席就曾以他本人和任弼时同志的名义电请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查找有关资料。电报说: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电报最后要求将能找到的尽快送延安。后来,除汪陈联合宣言赶在《六大以前》付印之前送到延安以外,另三篇没及时找到,因而没有收入《六大以前》,但其目录中列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两文的篇名。

《六大以前》共收文献 184 篇,按时间顺序编排,分上、下两册,于 1942 年 10 月在延安出版,上册 121 篇,下册 63 篇,其中补遗 24 篇。另外还有附录 4 篇。

《六大以前》的发行与《六大以来》汇集本相同,只发单位,不发个人。由于《六大以前》出版时,全党正处于整风检查的紧张阶段,因此它不像《六大以来》在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它的编辑出版,为 1943 年编辑《两条路线》准备了资料。

《六大以前》1951 年 5 月和 1980 年 5 月分别由中央办公厅和人民出版社两次再版。

1951 年再版时,内容上作了些增补。主要是:

(一)把初版时的 24 篇补遗文章按时间顺序插入正文。

(二)增加了李大钊同志的九篇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十月革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命与中国人民》、《国际的资本主义下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三)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和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同时把初版时没有收全的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补充完整。

(四)补充了初版时没找到的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11 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和彭述之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两文。

(五)删去了附录中华岗写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

此次再版,中央办公厅又颁发一个发行原则,规定:《六大以前》为党内一般资料性文件,经过党的系统发行;发行范围除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党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外,不发给个人,只发给党委或党组织机关;受书同志应妥为保存,除发给个人的由秘书保存外,发给党委或党组织机关的,应由各机关资料部门负责保存。从上述规定看,此次发行范围比初版时扩大多了。

1980 年的再版,实际上是由人民出版社完全按照 1951 年纸型重印了一次。内容上没有调整,只是对个别文献的发表时间、文章题目及文字作了部分校订。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公布时间由原注明的 1922 年 5 月订正为 1922 年 7 月,《第二次北京政变与国民党》的题目根据《向导》第 89 期核对,订正为《北京政变与国民党》,等等。

《六大以前》这次再版,改为公开发行,成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学习与研究的重要的资料书。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编辑《两条路线》

《六大以前》在1942年出版后，毛主席紧接着准备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选编一本党的路线学习的材料，只因随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西北局高干会议、整风学习总结、打退国民党酝酿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得不搁了下来。

1943年7月，国民党准备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我党有力的政治反击下得以制止。从8月开始，毛主席一边为帮助部分同志纠正对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不正确了解，利用国民党挑起新的反共高潮的事实，布置全党进行认识国民党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一边着手选编耽搁了半年多的党的路线学习材料，即编辑《两条路线》。

《两条路线》是在《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是《两条路线》主要的资料来源。《两条路线》共收录文献137篇，其中大革命时期14篇全部选自《六大以前》，内战时期39篇正文中有37篇选自《六大以来》，抗日战争时期78篇正文，除1942、1943年20篇外的58篇正文有49篇选自《六大以来》。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两条路线》收集资料的工作。另一方面表现在《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的编辑为《两条路线》选目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两条路线》在取材上，只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无疑增加了选目的难度，决定了选目工作将是一件复杂的事。事实上，毛主席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如果不是在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过程中已经熟悉了材料，如此快地选定篇目是不可能的。虽然在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之先关于陈独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右倾投降路线、瞿秋白、李立三“左”倾路线在党内已有了基本的结论，确定代表这一时期的两条路线的文献也许并非难事，但是对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政治路线，要不是编辑《六大以来》时找到其错误的大量证据，就不可能召开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和开展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活动，也就不可能在党内，即使在高级干部中取得一致意见，做不到这几点，就没有法子确定代表这一时期两条路线的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条路线》的产生就不是容易的。

《两条路线》篇目选定后，曾送给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同志阅看过。他们圈阅同意后再交中央总学委，分时期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在编排过程中，毛主席又陆续选了几篇文献。现在档案中还保存着毛主席8月15、20日的两封信。前一封是：“乔木，加上‘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两个决定。即可付印。交弼、康、刘、周一阅。”后一封又提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并说：“党书（按：指《两条路线》）请于9月5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的干部带去敌后。”印刷厂的同志尽管加班加点，由于条件限制，还是直到10月份才装订成册。

《两条路线》分上、下两册，共印了两千套。分发范围很广，不仅延安的高级干部人手一套，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也差不多人手一套。同《六大以来》选集本一样，中央总学委规定了严格的分发原则：凡受书者都必须登记，并负责妥善保存，不得遗失，不得转让，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

《两条路线》出版后，取代《六大以来》选集本成为党的高级干部路线学习的主要材料，但同《六大以来》选集本一样，以后没有再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六

# 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毛主席说：“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整风主要整高级干部”，“将他们的思想打通”。又说：“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① 在不同的干部层次内，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对这两个层次，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这次整风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顺利召开党的七大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下一步的斗争——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新

① 1943年1月25日致彭德怀电和7月4日致聂荣臻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 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发动

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和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是在1941年秋毛主席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进行的，但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则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检讨抗战以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情况，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工作的评价和指示：“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国际希望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① 会议完全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式地确认和批准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对全党的领导。这为尔后整风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组织保证。

---

① 参见《王稼祥选集》，第138、141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六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① 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为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为副部长。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延安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毛主席出席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潮。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讲了坚持学习碰到困难怎么办？“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毛主席号召全党同志研究学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大家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很受鼓舞。在延安参加学习的达到四千多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都带头成立了学习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组织部学哲学小组坚持了五年，影响较大。在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

但是，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主席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主席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

① 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反投降提纲》报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有些修改。毛主席说，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这都是绝对主义。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讨论毛主席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名为《论政策》）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作准备。毛主席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那样惨重的损失，是毛主席事先未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还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该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惨遭失败的消息后，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像项英同志这样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了“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基于这些情况，在1941年春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从3月开始，毛主席连续地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

先是把在1937年10月就已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于1941年3月17日和4月19日分别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这些农村调查报告写于土地革命时期，那时的情况和政策与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和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毛主席出版这些调查材料的目的，如他所说，“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① 这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接着，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这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尖锐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② 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7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个报告在听讲的干部中引起了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教育的领导同志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它没有予以重视，因此，也没在延安报上宣传报道。只是到了第二年，毛主席作了另外两个整风报告之后，才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上公开发表了这个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没有立即发表，但是毛主席提出要在全党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精神仍在贯彻。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在毛主席看来，整风运动的重点既然是高级干部，那么通过以上准备之后，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拉开了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的帷幕。这次会议开的时间虽长，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毛主席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可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毛主席说：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毛主席在报告的最后还宣读了稼祥同志拟就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十六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毛主席的报告和稼祥同志拟的研究题目，为这次会议，也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

在政治局的五次会议上共有二十八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不少同志列举了历史上的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会上进行了沉痛的检讨，不少同志是两次发言，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三次发言，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

张闻天同志第一个检讨。他在9月10日和29日的发言说：对土地革命后期工作估计，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闻天同志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闻天同志说话算数，不是口头表示，而是决心补课。在这次会后三个月，从1942年1月起，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

博古同志也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稼祥同志在9月11日作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我回国后便参加四中全会的反立三路线斗争，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罗迈（李维汉）同志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在立三路线时期和中央苏区时都在中央担负过领导工作。这两个时期的错误，他都较为积极贯彻过。在会上，不少同志对他批评较重，说他检讨不好，有的同志用词还很尖刻。但他还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呢？这种勇于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的精神就是党性纯洁的表现，就是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表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党还幼稚，没有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水平也不高，领导中国革命是在摸索着前进。有摸对的，也有摸的不对的。没摸对，犯了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应当检讨，总结教训。但是这些领导同志犯的错误也为寻找正确的革命方法和道路积累了经验。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受到尊敬。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后来的历史决议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稼祥同志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弼时同志在9月12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而指挥打仗的事。他说：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书本子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弼时同志检讨说，从党的二十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9月12日会议以后休会近三个星期，在9月29日会议上，洛甫同志在检讨主观主义的错误时对狭隘经验主义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确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后来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吸收了闻天同志的观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关系的思想也写进了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是提出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同志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据此，陈云同志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第二天，弼时同志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康生在29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少奇同志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他当时反对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的影响，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九月会议上陈云等对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也成为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九月会议上，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也还有别的同志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批评态度。有的说，四中全会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有的说，四中全会的中央是书生式的领导。有的则说：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克服了某些明显的“左”倾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尚未克服，以致使白区工作完全垮台。有的还认为，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在党的历史上有其意义，如停止了暴动方针，恢复了中共与国际的正常关系等，都是正确方面；但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在思想上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另一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造成以后既反立三路线，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与立三路线合作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在会上是各谈各的，没有统一思想。只是在经过两年之后，到了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解决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九月会议上，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快。尽管他发言两次，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洛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抓住罗迈同志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会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想"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云云。谁都听得出，这是恣意歪曲，节外生枝。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二十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惟独未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这无疑是在转移目标，把水搅浑来保护自己。

## 同王明的争论和成立高级学习组

基于王明的恶劣态度，为了对他进行帮助，10月7日，毛主席偕同稼祥、弼时，找王明谈话。没想到王明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磨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主席同王明、弼时、稼祥、洛甫、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富春、首道和胡乔木列席会议。王明重申了他与主席等谈话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讲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党与国民党发展关系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王明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王明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发言介绍了7日晚上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主席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谈到武汉时期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鉴于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在会议结束时，毛主席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毛主席说：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书记处会议后，领导同志们准备三天，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大纲”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这些重点号是毛主席自己加的）。毛主席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①，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

① 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

但是，王明逃避会议。到10月12日，他突然声称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主席准备了的“大纲”没能讲。自此以后，王明一直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10月22日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就“因病请假”未到会。会议的总结，决定由毛主席写书面的结论。在会议结束时，毛主席未再作报告。这个书面结论，即是后来的历史决议的最初草案。这个问题将另节叙述。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这次会议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地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整风解决了认识上的前提。同时，这次会议还确立了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的组织形式。8月29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就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9月10日，毛主席讲话建议，思想方法小组除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外，还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提议王稼祥为副组长。9月26日，中央发出经毛主席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通知规定高级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中央学习组即思想方法学习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主席任组长，稼祥同志任副组长。由于参加高级学习组成员们的革命经历和文化水平很不一样，11月2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建议各地根据高级组成员的实际情况，把高级学习组组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延安高级组也如此，10月份扩大到250人，有130多人参加政治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各地在接到中央通知后，即开始积极筹备。譬如，重庆南方局很快建立了以恩来同志为组长、董老为副组长，包括25人的重庆高级学习组，向延安索取材料展开整风学习。

毛主席很重视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活动。在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其进行安排和指导。他认为，认真教育延安高级学习组的300个干部，是政治局和中宣部的责任①，各地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极重要的关键”②。他以“毛、王”名义起草了许多电信指示，及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他一再强调，学习要“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的”；学习的内容在实际方面首先阅读六大以来的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在理论方面着重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他还亲自开拟了这两方面的书目文件，指导编选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献。对于中央学习组，他强调重点放在中共党史的学习，要求将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通读一遍，进一步明确对过去路线的认识。1942年3月30日，他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不仅阐释了党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而且分析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状况；提出研究历史要采

① 1942年1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② 1942年2月20日致刘少奇、彭德怀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用“古今中外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要以中国做中心，“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要“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应当“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拘泥于个别细节，不应该只恨几个人，重点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从而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布置下，从1941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发动起来了。

## 1942年的全党整风

毛主席领导整风运动的思路是，从号召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入手，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对象是先党的高级干部，后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内容由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在高级班普遍建立，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已有半年，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毛主席认为，在1942年开展全党的普遍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就必要性说，毛主席认为，自“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我根据地在1941年受到了很大损害；再加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断绝对我八路军的粮饷和其他供应，加紧对边区封锁，使我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并将在1942年、1943年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怎样克服困难呢？除了实行生产自救、发展经济、精兵简政等政策外，就是开展整风，训练干部，一方面使他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们振作精神，正确对待困难；另一方面，整顿不好的作风，以迎接将来的光明。因为从党的干部队伍状况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到1942年初，全国党员有80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游击队）有57万，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在民族浪潮高涨时加入革命的。成百上千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在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90%。他们没有经过内战，没有参加过长征，共产主义的许多道理不熟悉，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不懂得，虽然有的读了两年书，但只记得一些教条，不懂得马列主义是什么。因此，在全党，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存在着，有的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我们这些学习好了的干部可以反对黑暗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都是全国性的”。①

从客观条件看，毛主席认为，无论在延安还是全国各根据地，让干部集中一段时期学习、整风，也是可能的。自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有所减少，两党的政治关系有所松动。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不能不有某种变化，总的趋势有利于国内局势的缓和，新的反共高潮在短时间内发动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上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

① 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关于整顿作风的发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评，极力忍耐，不要烦急”①，以争取一个积蓄力量、巩固内部、训练干部、开展整风的外部环境。

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按毛主席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顿三风就是要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个阶段持续了一年多。在整风检查过程中出现了王实味同志的“托派”、“特务”问题（实际上是错划，公安部于1991年2月7日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的文件，已为王实味同志平反昭雪），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不纯的问题，引发出对干部队伍成分的怀疑，于是从1943年4月开始，整风运动转入全党性的审查干部、清理队伍阶段。这一阶段进行了半年左右，直到在1943年9月以后党的高级干部重新讨论党史路线问题才基本结束。

在思想整风阶段，毛主席在1942年2月1日和8日先后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建国后编《毛选》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4月3日，中宣部作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和毛主席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最初为18个，后增至22个），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这以后，思想整风阶段基本上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每个小阶段大致为四个月左右时间。在延安参加这一段整风学习的干部有一万多人。为了加强对全延安整风学习的领导，也为了领导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6月2日，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

① 1941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致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主席亲自主持,日常工作由康生具体负责。总学委下按各系统设分区学委会,领导延安各系统的整风学习。总学委还承担解答各方面提出问题的工作,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王若飞、陈伯达和胡乔木一起参加这项工作。

毛主席对干部的思想整风抓得很紧。在整顿学风阶段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在5月2日至23日,毛主席多次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后面有专节介绍);二是从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同志错误思想的揭发转变为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为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毛主席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在整顿党风阶段,最重要的是长达88天(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的西北局高干会。它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主席除在开幕、闭幕之日到会讲话外,还用两天时间专门讲解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此外还为大会写了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由贺龙同志在会上传达)。这个会议对纠正党内闹独立性现象,反对地方工作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军队工作的军阀主义倾向,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党政军民各项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讨论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问题,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整顿文风阶段,主要是检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作风。由于前两段解决问题较为深透,这一段进展较为顺利。毛主席在1943年6月致彭德怀同志电中对整风运动各阶段的内容及各环节的相互关系作了一个简明的概括。他说,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如能真正做好整风,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毛主席的这个概括是比较客观的。尽管各地整风运动的实际进展参差不齐,但它说明了毛主席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风运动的基本过程。

毛主席1942年11月21日和23日两天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不仅是党风学习阶段的重要讲话,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有重要意义。这是研究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文献。毛主席对"十二条"讲得很详细,一条一条地联系我们党的实际状况进行阐述,思想很丰富,语言也很生动,大家很受教育。毛主席讲的这样几个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说,是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斗争的历史。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党的活动是没有理论的,只有他们才有理论。毛主席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主席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我们的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就能化得更好”。这个意见，毛主席在党内讲过多次。以后，凡是强调学马列时，毛主席几乎都要讲这个意见，并开列书单。

（二）党的决议、政策和理论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针对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轻视实践的“唯书、唯上”倾向，充分地阐述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个观点，后来在延安的不少讲话中都讲这个观点。比如1939年4月下旬，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讲我们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时，毛主席批评国民党的宣传说：有些人散布“共产党信仰的三民主义是假的，只有他是真的”，然而到底谁信仰三民主义是真的呢？要分清就要有一个标准。布用尺量，只有在这个尺的度量下才能分清谁真谁假。马克思主义者量一切东西的尺，就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标出一切是非。毛主席说，我们一查，这些人嘴上挂了很多三民主义，其实是空论，根本不实行。只有共产党真正信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且是真正实行的。一个比较深奥的哲学道理，经毛主席这么用生动的比喻一讲，连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干部都明白了。这是毛主席讲哲学的一个长处。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大家都熟悉，就不必说了。这一次，毛主席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第四条，“必须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时，又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绝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这样的话，毛主席还讲过多次。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对待群众工作上，这就是既要教育和指导群众，又要最大限度地和群众接触，并向群众学习；在处理统一战线关系上，既要以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要讲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妥协性，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毛主席说，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毛主席举彭湃同志搞群众工作的经验说，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出身地主，是个大学生，后来又做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但为了做农民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农民把他看成自己人，听他讲革命道理，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他本人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毛主席说，这里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行为进行斗争。因此，毛主席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四）对于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毛主席说，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毛主席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主席说，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致死。毛主席的这些思想，总结了二十年代后期到遵义会议前“左”倾宗派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教训。不难看出，这是建国后提出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的萌芽。有了过去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这样明晰的思路，在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毛主席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的必然了。延安整风运动，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按照这个思想进行的。

整风运动至此，才只进行了一半。毛主席的思想还在发展。1943年“九月会议”，是高级干部整风的又一个高潮。这些情况将另作叙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七

#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

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①。后者论及的九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发出的，时间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

① 这九个文件是：(一)《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二)《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三)《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四)《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五)《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六)《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七)《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14日)；(九)《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容。毛主席的批判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展开。批判文章根据九个文件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既相互联为一个整体，又可独自成篇。为叙述方便，权且称作“九篇文章”。这里先介绍“九篇文章”。

## “九篇文章”的写作和修改

关于“九篇文章”的写作年代，毛主席本人已记不很清了。1964年春裴桐同志从中央档案馆拿到原稿的照片通过田家英同志给毛主席看，接着又从档案馆里找出这几篇文章的原稿，毛主席才记起确曾写了此文。1965年1月2日他写信给一些中央负责人，请他们传看这几篇文章并提出修改意见①。信中回忆说：可能是在1941年春季写的，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5月12日，他在修改此文时又写道：“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但是，仔细查对文件的内容，“九篇文章”应完成于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因为文中有几处提到“九月会议”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在1940年或1941年上半年毛主席是不可能知道的。

毛主席当时对“九篇文章”非常重视。写完初稿后他请人帮助誊写一份。在这份誊写稿上，他前后作了好几次修改。仅标题就改了三次。初始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

① 1964年3月交中央部分同志传阅时也指出过“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内容也作了一些较大的修改。

毛主席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原是准备连同尚在起草的《结论草案》一并发给在延安的中央委员讨论的。事实上，在延安时，“九篇文章”只送给了刘少奇、任弼时两位同志看过。至于作为毛主席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毛主席所以改变初衷，在1965年5月他再次修改时解释说，这是因为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

“九篇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它难以为犯错误的同志所接受，也是可以预计的。

1964年春天，找出“九篇文章”的原稿送毛主席确认时，毛主席最初并没有发表的打算。他在1965年1月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中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在听取其他同志意见后，在5月修改此文时才有了重新发表此文的念头。他认为，由于年深月久，那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人们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

1965年5月的修改比较重要，带有“定稿”性质。首先，毛主席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原标题成了副标题；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他还把改好的稿子送给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传阅过，但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九篇文章”的历史价值和理论贡献

据档案部门的同志介绍，1974 年 6 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 1976 年 8 月，毛主席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他对“九篇文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毛主席所以如此重视“九篇文章”，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九篇文章”同下面将讲到的“结论草案”一样都是花费了毛主席大量心血的心爱之作。两篇文章虽然体裁不同，但都集中揭露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性质及危害等。相对而言，“结论草案”全面些、深刻些，它重在作结论，因而比较系统；“九篇文章”则注重于对具体错误的揭露与批驳，重在解剖文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它具有对“结论草案”的结论作注释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当初才考虑把“九篇文章”当作“结论草案”的姊妹篇一并发给中央委员们讨论。后来“结论草案”被作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蓝本，其中的主要思想都为《决议》所吸收。“九篇文章”对“结论草案”的注释作用，没有因为《决议》的形成而消失。

（二）“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在毛主席对这条错误路线的认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毛主席是三十年代初最早认识并坚决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苏区领导人之一。他也因此成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经常打击的对象，被他们骂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的保守主义者”，并在 1931 年 11 月的赣南会议和 1932 年 10 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认识到临时中央领导者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长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红军失败的原因，得出了临时中央领导者在军事领导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的结论，但对其政治路线还没有明确提出疑义。这从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的发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看得很清楚。决议认为，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即“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这种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总结我们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毛主席相继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文章，从政治、军事、哲学理论几方面分析了我们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是在党内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其思想基础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标志着毛主席对这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已深入到政治和思想层面。在1940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我们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方面执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这些“左”的政策使军队和苏区的损失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要大，因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这里所指的路线错误当然是指包括政治路线在内的党的整个路线的错误。这一认识表明毛主席对这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但是相对于“九篇文章”来说，这里的认识，依然是不完整的。“九篇文章”在“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所作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字尽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时间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其形成标志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一点,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毛主席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此外,“九篇文章”还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在形势估计上、在党的策略任务上、在党内斗争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阶级关系、土地革命、反帝斗争、革命战争等的解决上存在的错误,并列举了大量的证据。

(三)“九篇文章”在批驳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阐明了解决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正确原则、策略和方法,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革命形势做出完全错误估计的同时,阐明了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估计革命形势与确定行动方针,亦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应取的态度。“九篇文章”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犹如建筑一栋房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要建好这栋大房子，我们必须先有建筑中国革命这栋房屋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这几段话已在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现已收入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毛主席说的这种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反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于客观实际情况的估计。它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在我们脑子中产生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的反映。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然后根据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我们的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

第二，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犯了一系列盲动冒险错误的同时，阐明了在民族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都在展开的条件下，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运用的方法。“九篇文章”指出，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与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具体地讲，红军这种形式是国内战争的工具，执行土地革命任务的，就中国这类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说来，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是民族斗争的形式。在中国当时，只能存在于比较偏僻的农村与山地，在城市中与平原上是不能立足的。义勇军这种形式是当时最适宜的民族斗争形式，能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但在当时也只能存在于东北的山岳地带，要求在一切日本人统治的地方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建立义勇军是不切实际的与错误的。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些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用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即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非法的秘密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制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许多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因此在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只有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能一般地避免反动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有许多是非法的斗争，也只有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的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秘密工作包括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九篇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我们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的运用是一整套极复杂的政治科学，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否则，我们就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三，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不懂得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同时，对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的表现、产生及其消灭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九篇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与农民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工人较之于农民是先进的与领导的阶级，它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发布了纲领、口号，并且还派遣了自己的先锋队战士领导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并不等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事实。我们说工人先进于农民，是就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说的，是就工人经过共产党从政治上与组织上领导农民斗争说的。我们说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是就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说的，是就工人还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大规模的公开的工人运动（如像1927年那样）去领导农民说的。“九篇文章”继而指出，中国革命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说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是因为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是因为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等等。其次也在于主观努力的不够，或是说没有正确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发展革命运动。要改变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必须首先认清不平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然后按照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并适当地运用这些条件去解决。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有一个主观愿望，或是消极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待客观条件的变化，忽视主观努力，都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只能到处碰壁。

第四，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制造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观点和方法。“九篇文章”指出，要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保证拿了去衡量一切的自己的路线是根据客观实际确定的，而非仅仅根据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不然，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就会到处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处处见鬼一样。其二，要保证自己看待事物的方法必须是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否则就只会胡斗一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其三，必须懂得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两条战线斗争就是对于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以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例如要认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地主阶级之后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下允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以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就不能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其四，必须正确区分和使用对待敌人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不同方法。如果不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了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同志，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就会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这些思想，在毛主席以前的文章和讲话中有的虽然涉及过或阐述过，但不如“九篇文章”分析得这样深入、系统。这些思想的产生，无疑与毛主席清理六大以来党的文献，即编辑《六大以来》一书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它们本身就是毛主席在清理六大以来文献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 “历史草案”的基本内容和被搁置的原因

毛主席为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通称“结论草案”或“历史草案”（毛主席在这个文件的封皮上题写了“历史草案”四字）。决定由毛主席起草这个文件虽然是在10月22日那次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作出的，其实在这之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已经论及了“结论”的内容。

1941年10月12日讨论王明对历史问题意见的政治局会议未开成。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有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参加，并由王稼祥负责起草文件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了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他说：(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发展到最高峰。(三)对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的初步分析：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1927年下半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当时形势与工作政策没有具体决定，只说明交新的政治局讨论，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完成此任务；遵义会议以后，我党又恢复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抗战四年以来，我党的阶级自觉性比五四时更提高了，党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毛主席还对以上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又指出，罗迈同志在以上几个时期都犯有严重错误，但在近来的延安工作是努力的；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毛主席还说，通过这次历史问题讨论得到一个教训，为使犯错误的人逐渐纠正错误，要采用对病不对人的办法使犯错误者能客观地看问题。现在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问题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意见是他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即“历史草案”)的基本思路。前已指出,《历史草案》与《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毛主席当时写成的姊妹篇之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是对王明、博古时期的9个重要文件的具体内容的逐篇批驳。“历史草案”则是以此为基础,综合九月会议的揭发批判,对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问题作出的初步历史结论。这个“历史草案”共有16个问题,近2万字,从现存档案看是由江青抄清,用16开纸横写,有36页,毛主席编号时多算了一页误写为37页。上面还有胡乔木在正文旁边十多处批注的意见,毛主席改稿时还将几处的意见划去了。

下面先对“历史草案”的内容作一介绍。

“历史草案”采用论列问题的体裁。第一个问题“三个时期的路线”,开宗明义,说明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个时期的路线结论,即“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整个“历史草案”的纲。下面15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这三个时期的路线内容,并对其形成根据和特点进行初步分析。重点放在分析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的路线错误。这在16个问题中占了10个问题,是“历史草案”的主体。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路线的估价”,基本上是按照1941年9月会议的认识写的。毛主席首先肯定“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在于,指出立三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打击了罗章龙为首的反党右派,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克服了立三路线反国际的性质。此外,那时的中央放弃了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件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这些都应肯定。毛主席当时认为，“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尽管如此，在讲四中全会这一段时，毛主席把重点却放在分析四中全会的缺点和错误方面。就篇幅而言，讲“成功方面”是概述，只有一页多纸；讲“缺点和错误”则是展开分析，近五页纸。

毛主席论列了四中全会有五条错误：（一）四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水火不相容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二）四中全会没有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作出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没有具体指出中国革命特点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因而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苏区和白区的策略任务。他们只是抽象地了解立三路线，而不能反对其具体的错误策略，并认为白区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应当继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类的盲动策略，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政治根源。（三）四中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犯了类似立三路线“压迫政策”的错误，打击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关向应，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等，这些同志在本质上都是好的，这就埋伏了后来的“左”倾路线采取宗派立场的根源。在组织政策上的宗派立场还表现为，不相信苏区党与红军的原有领导，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去取而代之。所谓“钦差大臣”制度自此始。（四）四中全会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对反罗章龙来说是对的，但对全党来说是错的。当时党内情绪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为多，四中全会没有指出党内“左”倾危险的严重性，并强调反对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在全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五）四中全会“全靠共产国际”，只克服了当作政治形态（其主要部分）的立三路线，不能克服当作思想形态的立三路线，这是后来形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成新的立三路线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谓“富农路线”，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影响中农利益的严重局面。

“历史草案”的“三”——“十三”个问题都是分析九一八事变后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在这里，毛主席列举了反映这一时期路线错误的三十多个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文章、讲话，包括前述他所专门批判过的那9个文件。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毛主席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这些都发挥了他在九月会议上的讲话和《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长文中的观点。在作了这个总的评论之后，毛主席便逐一地对这条错误路线的具体内容、表现特点和形成根源进行了阐述。

（一）在思想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左”倾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按其性质来说，它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

说王明、博古路线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毛主席认为，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唯物论，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完全不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把马、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地装进党的指导文件里去，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研究客观实际的向导与行动的指南，绝对不应该断章取义的乱搬与硬嵌；他们还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而不知道对于苏联及任何外国的经验只应该活用它，而绝对不应该死用它；他们还否认中国苏区有马克思主义存在，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里的革命运动只是一群“狭隘经验论者”所干的盲目的活动。他们的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说王明、博古路线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毛主席指出："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把客观现实的一片面加以主观的夸张，迷惑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抛弃其本质，割断历史，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论"。这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观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国内各个地主资本阶层与中国革命人民之间的关系、观察国民党的情况、观察党与红军的力量和观察干部等等时，所采取的方法都是反辩证法的，反历史主义的，片面的，表面的，形式的，绝对的，独断的。他们的形式主义方法发展到了极点。

毛主席还指出，王明、博古路线把反唯物论的主观主义与反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而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这就是他们思想领导的全部。当然，说他们反对辩证唯物论，不是说在字面上、口头上，而是说在实质上、在工作上，他们是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毛主席说："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态，是比较陈独秀、李立三两个错误时期还要更加发展的，其流毒也最广泛，甚至现在在党内也没有肃清。

毛主席还对产生这种错误思想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国际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进行了分析。"历史草案"指出："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中国极其广大的生活痛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是我们党内右的，而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来源"。"左"倾错误的政治根源，一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外群众不甘心失败与痛恨反革命的激愤情绪所使然；二是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使得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两面旗帜的欺人者得售其奸。"左"倾错误的国际根源，是把理论与实践互相脱节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义”的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在中国谬种流传，至今还未铲除干净。就“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而言，则在于他们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个人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党、与阶级、与其他干部的关系。毛主席指出认清这些根源，对于我党肃清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残余，对于克服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是必要的与重要的条件。

（二）在政治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否认日本军队的入侵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会产生影响，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时又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不满10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及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等等；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建立上海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解决上，混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以及对于革命转变问题和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了解等等。所有这些，不但是立三路线的复活，而且发展了它。

（三）在军事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王明、博古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冬以后的长征中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四）在组织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1931年5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临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中央人选的委任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了在白区和苏区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彻底执行了“钦差大臣制度”;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在长征前夜,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至于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则是宗派主义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毛主席在论列了王明、博古路线的具体表现之后,还分析了这条路线的主要特点。在毛主席看来,这条“左”倾路线的第一个特点是形态完备。“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第二个特点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第三个特点是后果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几个据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据此,毛主席指出,“所以我们说,‘左’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对王明、博古路线尽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没有绝对化,仍然指出:说“左”倾路线是错误的,“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并以中央苏区为例,指出如在打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赣州一役失败后，随即纠正错误，执行正确方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实际指挥红军行动的同志接受了正确的意见，取得粉碎这次“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个别的战役作战中，改变了上面的死板的命令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及在形式上发布停战抗日宣言和与十九路军订立同盟等。此外，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因此，也就可能做出一部分成绩。

从第十四个问题开始，毛主席论述了同王明、博古错误路线开展的斗争和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路线的性质。毛主席指出，在三年四个月的长时期中，王明、博古路线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党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红军中，在苏维埃工作与党的工作中，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绝大多数的干部与党员，在一切可能与合法的范围内局部地暂时地抵制与纠正过这条错误路线，不顾诬蔑与打击，站在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立场上，忍辱负重，奋斗不息；在同敌人的战斗中，表现了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在工作中殚精竭虑，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因而才能在错误路线统治的长时期内，仍能坚持同国民党作英勇的残酷的斗争，并在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以后，通过事实的教育，使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和红军中的所有将领，在遵义会议上反对了错误的博古路线，恢复了原来正确路线的领导。毛主席说，遵义会议的决议，虽然在形式上只反对了错误的军事路线、领导方式与干部政策诸方面，还承认过去的政治路线是不错的，但由于这些方面是最主要的东西，又搬掉了博古的领导，因而“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克服了它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组织形态上一切主要的与重要的东西”。

对于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毛主席没有展开详细论述，只是概括地列举了几项主要的工作。这就是：(一)在惊涛骇浪之中，完成了中央与红军的长征，保存了干部，奠定了党的复兴的基础；(二)克服了反党的张国焘路线，汇合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坚持与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使得党的阵地更加巩固起来；(三)建立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合作与全民族的合作，支持了四年多的伟大的民族抗战，扩大与巩固了党的组织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与坚持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四)打退了国内两次反共高潮，训练了干部，克服了统一战线中党内在各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右倾与“左”倾的错误。毛主席说，由于遵义会议的路线转变和领导机关的革新，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做了上述工作，使得我党在国内与国际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

以上是“历史草案”的基本内容。如前所述，“九篇文章”尖锐、泼辣，毛主席个人的喜、怒、嘲、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这个“草案”则是理性的升华。毛主席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对“九篇文章”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科学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件基础。本来，这个“历史草案”是准备拿到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通过的。后来，毛主席取消了这个想法，划掉了原先写在题目下面的“1941年11月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行字。

毛主席所以改变想法，首先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有关。毛主席对党的历史问题达到这样的认识，一是与他过去长期遭受“左”倾路线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有关，而历史实践又证明他代表了正确路线；二是他着手编辑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对于“左”倾路线的主要文件已作了初步的研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但是，毛主席有这样的认识，并不等于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全党都有这样的认识。从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就可看出，尽管政治局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拥护毛主席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判，初步地统一了对1931年9月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的认识，但是大家的认识是参差不齐的，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本身的评价还不一致。中央领导层尚且如此，何况全党。当时还没有开展群众性的普遍整风，党的高级干部还没有集中学习党的历史，对过去的路线是非并不很清楚。全党还跟不上毛主席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局着手讨论和通过这样带有历史决议性质的文件，对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作出正式结论，显然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其次，几个比较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对这样事关重大的问题毛主席采取了慎重态度。1942年2月21日，他致恩来同志电，可作为一个佐证。该电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通过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这里说的"结论已写好"，即指"历史草案"。这两点，看来可能是"历史草案"在1941年11月后被搁置起来的主要原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八

# 大生产运动和组织起来

大生产和组织起来是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两件大事，这里主要讲毛主席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兼及其他地区。

## 大生产运动的发动

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是在整风之前由部队系统首先开始的。起初，是1938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主席当时对这一做法就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但这时还只是出于改善部队生活的目的，并没有把这种农副业生产与解决经常性的财政供给问题联系起来。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预见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于是便决定把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的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

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主席在许多场合、许多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会议上，反复讲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他说：武汉、广州失掉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样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他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他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①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在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同志作《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后，毛主席发表讲演，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6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及结论（即《反投降提纲》），进一步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他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

①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1938年12月12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大力推动下，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效。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场面十分壮观。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1938年3月，工业专家和技师沈鸿同志带着10部机器和7名工人来到延安，建立起边区机器厂。接着，恢复和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华寿俊同志在1940年用当地盛产的马兰草造纸试验成功，大大推动了边区造纸业的发展。

以上是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所以，如同毛主席后来所说：当时“我们还有饭吃，有衣穿”。这时，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党中央采取“储蓄民力，力争外援”的方针，边区政府所征捐税只有进出口贸易累进税、皮毛税、盐税、救国公粮四种。以公粮来说，1938年全边区只有1.7万石，1939年5万石，1940年9万石，分别占当年细粮(小米)产量的1.4%、2.8%、7.6%。

## 大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成就

进入1941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于国民党不但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敌后各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还由于华北各地连年遭受干旱，以及根据地各类脱产人员日增而土地面积却大大缩减等原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日根据地都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

1941、1942 年,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受到极大的重视,公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其中,359 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那里百年前曾是人烟稠密的地区,后因清朝政府制造回汉民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再加民国后军阀横行,土匪劫掠,该地便成了蒿蓬塞路、鸟兽纵横的荒野了。朱总司令提出部队实行屯田的主张,并亲自到南泥湾踏勘,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359 旅分四批开进南泥湾。部队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披荆斩棘,开荒种植,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就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部队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本着“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从事多种经营。他们养猪、烧炭,建起纺织厂、肥皂厂、木厂、铁厂以及磨房、粉房、榨油房,开挖了盐井、煤井,建起了运输队、骡马店,办了商店,各项经济事业都得到发展。1941 年,粮食自给 1 个月,经费自给 78%。1942 年,达到粮食自给 3 个月,经费自给 92%。到 1943 年,便做到了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1944 年,更达到“耕二余一”,而且向边区政府缴纳了公粮 1 万石。毛主席、朱老总、彭老总、徐老(特立)、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92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老(觉哉)、吴老(玉章)、续老(范亭)及其他不少领导人,都曾到南泥湾巡视,他们对359旅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欢欣。

359旅指战员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上自旅长兼政委王震和其他旅首长,下至勤务员和炊事员,一律编入生产小组,参加劳动。开始时没有房住,就在树林里露营;没有粮吃,就到百里甚至几百里以外去背;没有菜,就去挖野菜。他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劳动竞赛,使开荒进度不断加快。劳动英雄李位同志用过的一把5斤多重的镢头,最后磨得只剩下马掌那么大。他曾创造一天开荒3亩7分多的纪录,而另一个劳动英雄又很快以4亩1分多的成绩超过了他。718团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同志身先士卒,受到毛主席的大力表扬。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深情地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到不可名状。"他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他说只要这样,"我们就一定会胜利"。① 正是这种上下一致,艰苦奋战的精神,保证了南泥湾屯垦乃至整个大生产运动的成功。

1941、1942两年中,边区工业有较大的发展。首先是1940年冬,各机关学校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掀起手摇纺毛运动。接着各单位纷纷建立纺织、被服、制鞋、木工、造纸、榨油等工厂。1942年,边区政府提出"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纺织业"的方针,

① 《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方面对现有公营工厂进行调整合并，另方面以投资和订货等办法，扶助私营工厂的发展。这一年，边区生产的布匹（包括公私营）已能满足军民年需要的40%，接近了半自给，而公营纺织厂已能供给党政军学需要的70%。边区生产的纸张，已能自给。

这两年边区的农业继续有所发展，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可以向外输出一部分。植棉亩数大为增加，1939年仅3700多亩，1940年1.5万亩，1941年3.9万亩，1942年达到9.4万亩，每年都成倍以上地增加，这为发展边区纺织业逐步做到丰衣，奠定了基础。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至1942年底，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边区的财政难关已经渡过。对此，毛主席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①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毛主席的这篇报告及1943年写成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构成了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主席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5月1日，朱总司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4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对朱老总“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主席十分赞成。他风趣地发挥说：“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① 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口号基本得到实现。

1944年，边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观。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率显著提高，边区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已只占31%，因此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1941年财政最困难时，征收公粮20万石，1945年减至12万石。

从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向劳动英雄学习的生产竞赛运动。

在边区涌现的第一个著名的劳动英雄是延安县的农民吴满有。吴满有在土地革命时期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他早起晚睡，辛勤劳作，多施肥，勤锄草，深耕土地，及时播种，每亩地平均较其他农民多收粮六分之一。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吴满有的事迹，并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号召“成百成千的吴满有涌现出来”。毛主席对吴满有运动十分重视，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边区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② 1943年8月，他在一份电报中又说：“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此种方法（特别是劳动互助方

①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3年10月14日。

②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版，第777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法)”,不仅适用于陕甘宁边区,别的根据地也“正须提倡”。吴满有运动即是生产竞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劳动英雄辈出,大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业战线最著名的模范工人是赵占魁。赵占魁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入农具厂,任翻砂股股长。他的具体工作就是炉前看火。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他都坚守在熔炉前,工作极为平凡,又十分艰苦,但他几年如一日,从无懈怠。同时,他又努力改进技术,不断提高工作质量。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使全边区“有千个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涌现出来”。从这时起,赵占魁运动同吴满有运动一样,持续开展下去,成为工业建设发展的推动力量。

1943年末,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举行招待劳动英雄大会,毛主席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是人民的领袖”,希望他们“不要自满”,回去之后,要“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次大会把边区生产竞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初,毛主席看到林老制定了个人生产计划,他便向林老表示:“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他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老总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恩来、弼时、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弼时同志夺得纺线第一名,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

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是从1942年开始的,1943、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944年发展为普遍运动。敌后的情况不同于陕甘宁边区，那里战斗频繁，不像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确定的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的任务是战争，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但是，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生产也毫无例外地是所有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毛主席在1943年6月1日发给彭老总的一个电文中说：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为此就必须实行各项正确政策。在对人民的政策方面，“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10月1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又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① 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要求也应不同。以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率说，毛主席认为，陕甘宁边区应力争达到100%，其他巩固区要达到50%，游击区应达到15%—25%。

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是整个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涉及到社会分工和生产自给的关系这样一个经济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出现社会分工，而分工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比之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给型经济说来，分工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进步。但是，毛主席没有教条地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1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阐述了现时条件下生产自给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进步性。由于国内外敌人对我们的分割包围，使我们的经济事实上处于封闭状态，无法对外交往。由于根据地是处在经常被敌人摧残、经济凋敝甚至是枯竭的农村，要支持长期的战争，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自救，舍此别无出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仍是以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由于分散的游击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机会和条件，部队和机关也可以从事生产自给。毛主席认为，生产自给在形式上违背了分工的原则，是落后的、倒退的；但是，在我们的特殊条件下，这样做，实质上就是进步的，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支持了长期战争，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进行。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成为中外革命战争史上仅见的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是我们党在战争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经济活动，一次学习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地区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走上坚实发展的道路；它以具体事实证明我们党所指引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之路，因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它使根据地内部的各种关系都得到调整和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政、军民、上下级的团结；它给我们党积累了领导生产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专家和干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大业作了一定的准备。毛主席、朱老总等领导人都曾引用古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鼓励边区军民努力克服困难。事实正是如此。通过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在已经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的基础上，又在会办经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把群众组织起来

大生产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即发动和组织劳动大军的过程。毛主席在论述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确定的经济方针时说："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① 这是大生产运动取得伟大成绩的基本保证。在这支劳动大军中，部队机关学校本来就是有组织的人群，相对来说，把这部分劳动力组织到生产运动中来，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实际上，大生产运动就是从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开始的。组织劳动大军的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是把边区140万群众中的几十万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动员组织起来，使他们更有效地投入生产，而这正是发展边区经济的基础。

边区的经济，主要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落后，农田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短缺，劳力和畜力严重不足。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虽然有一半地区消灭了封建剥削，另一半地区削弱了封建剥削，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调动，但农业经济的落后状况并没有改变，而且就物质技术基础来说，短时期内也根本不可能有很大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呢？这是越来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对于根据地农业生产问题，毛主席早在江西苏区时就有所考虑。他在主持苏区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对农村经济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8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等主张。

在陕甘宁边区，民间很早就有变工、扎工、唐将班子① 等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用以解决农忙季节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府也曾根据江西苏区的经验，号召农民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农民生产小组、杂务队、优红耕田队等，但由于环境的动荡，这些组织基本流于形式。1937 年国内和平实现后，边区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农业生产逐渐回升。1939 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生产运动，不但部队机关学校行动起来，边区农村也掀起开荒热潮。这时，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越加突出。适应这种情况的需要，一方面，民间原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又自发地增长起来；另一方面，一些地区的党政领导也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组织劳动力的尝试。例如延安县，1942 年为了完成开荒 8 万亩的任务，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大力组织扎工和变工，全县参加扎工队和实行变工的劳动力，占到全县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结果，大大推动了开荒任务的完成。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它表明，即使在其他条件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以恰当的形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的提高。

延安县组织劳动力的经验，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把推广延安县的“劳动互助”，列为发展边区农业的重要政策之一，并且详加解释。他说：“在一村之

---

① 变工：即农户之间的换工，属于等量劳动直接交换的性质，有人工换人工、人工换牛工、技术互助（取长补短）等形式。扎工：即短工的集体出雇，也有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参与其间，流行于地广人稀地区。扎工队一般 10 人左右组成，内设功德主、工头、记账先生。唐将班子：类同扎工，为关中地区特有的名称，一般由 15 人左右组成，内设包头、领头、包班。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他还说：“此外还有一种扎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雇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在各种调剂劳动力的办法中，“特别是劳动互助社的办法最为重要，应在全边区普遍实行起来”。①

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全边区发出的号召，又是具体的工作指导。1943 年 1 月 25 日，《解放日报》根据高干会议和毛主席报告的精神，发表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社论说：“生产是目前边区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生产更是全盘生产工作的中心。要完成这任务，首先要依靠边区农村中的三十多万个全劳动力和三十多万个半劳动力。这六七十万人，只要组织起来，便是一支雄健的生产大军，便能发生雄厚无比的力量。”而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实行劳动互助”。

---

① 《毛泽东选集》1948 年东北版，第 771—773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力倡导下，边区的劳动互助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1943年春耕期间有10%—15%，夏锄期间有40%左右，秋收期间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这时的劳动互助继承了民间旧有的组织形式，但已带上不少新的特点。它已不再是农民自发地进行，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边区组织起来的广泛的劳动互助起到了这样几方面作用：一是通过劳力、畜力的调剂，保证了农活的及时完成；二是把小农个体经济所具有的分散微弱的生产因素结合起来，变成为较集中强大的因素，扩大了生产规模；三是一定程度的分工与协作，节省了劳力，提高了效率。因此，它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3年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就，是同广泛的劳动互助密不可分的。对此，毛主席给予充分的估价。他说：1943年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劳动英雄。“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① 大生产运动促成了劳动互助运动，反过来，劳动互助运动又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再向前发展的关键一环。

人民群众的成功的实践经验，使毛主席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43年10月1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向全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② 接着，10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的报告、11月29日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关于“组织起来”的讲话，对通过“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的问题，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2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一,关于组织合作社的意义。毛主席认为,合作社是当时根据地"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① 它可以调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大大提高"。"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继破坏封建剥削关系之后的"第二个革命"。②

第二,关于合作社的性质。毛主席指出,"变工队"、"扎工队"一类农业劳动互助组织,"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即"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是"新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对当时互助合作组织的性质作出的科学而又准确的规定。

第三,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方向。根据边区劳动互助运动的实际,毛主席提倡发展这样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一)"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变工、扎工等集体劳动组织,这是普遍推行的一种;(二)"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三)"运输合作社(运盐队)";(四)"手工业合作社"。他还认为,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也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

这里所列的第二种"综合性合作社",最著名的是劳动英雄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该社成立于 1936 年冬,第一年只有社员 160 人。由于经营有方,得到群众拥护,股金和社员数不断增加。到 1943 年,社员增至 1600 多人,包括了南区所有家庭。同时,经营范围逐渐扩大,除设有多处商店和营业部外,还成立了运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3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东北版,第 889—890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输队、信贷社，开办了饭馆、客店、手工工厂，把供销、生产、运输、信贷联为一体。毛主席称赞这个合作社为“模范合作社”，说它有四大优点：一是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从消费合作开始，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合作。二是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三是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四是根据人民的意见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由于南区合作社带动了全区整个经济事业的发展，所以毛主席认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①

第四，关于组织合作社的自愿互利原则。毛主席一再指出，在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愿和等价的原则”。必须是农民“自愿参加”，而“决不能强迫”。② 这是因为劳动互助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在他们切实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并真心愿意参加之时，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发挥出来，劳动互助也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强迫命令只会适得其反。当时也有一些合作社是硬性组织起来的，结果只能是流于形式。到 1945 年初，毛主席提出两个方针的问题：一是“强迫命令、欲速则不达的方针”，一是“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我们只能采取后一种方针，而反对前一种方针。而自愿是与等价和互利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关于组织劳动力的“按户计划”。这是延安县在组织农民生产中创造的一种办法，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被他列为组织劳动力的形式之一。其办法为：在春耕前，由政府派干部到每个农户（或找典型农户）帮助制定生产计划，并把计划贴在窑壁上，政府按

---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版，第 79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12、931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季检查、督促。

在毛主席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后，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毛主席进一步提出应把合作事业的范围扩大，举凡文化的、卫生的、社会公益的及一切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都应当像经济工作一样，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针。1944年7月3日，他在边区合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合作社的业务包括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又说："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① 7月5日，他改写《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决定》，指出："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大踏步向前发展"；通过"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不难看出，毛主席已把合作社当作推动边区所有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了。

毛主席认为，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不仅是发展农业生产、改造个体经济的正确道路，而且还能带动我国农村社会的全面改造。他说："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② 在边区，已经初步地展示了这些方面的变化，无论就个人，就家庭，就社会来看，组织起来前后都有许多显著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我们党思考、制定中国农村发展战略时，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经验，无疑起到了强化毛主席领导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念的作用。

---

① 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7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九

#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 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界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在内，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分管。

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 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每当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 年 5 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 年 5 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 年 11 月 22 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①。

1938 年 4 月 10 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

①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 1 期，1936 年 11 月 30 日出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向”。① 他还特别讲道:“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的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②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功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

---

① 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38.4.10),见《新中华报》第432期,1938年4月30日出版。

② 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主要是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① 这里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

① 《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450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主席交谈时谈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①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

① 鲁艺戏剧部整风学习快报第3号，中央档案馆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 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正式发表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烽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主席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他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毛主席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主席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对他作了开导，随后又于1941年8月2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① 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主席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在同毛主席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主席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4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四十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的不是勉强的、慢慢的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指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①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毛主席对整理稿表示满意。但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稿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

① 参阅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04—105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

谈到建国后毛主席对《讲话》的修改，除上面所说的情况及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订外，还应提到一些提法的改动。这些改动说明了毛主席对文艺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原稿的提法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毛选》本相应的句子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作。”这里虽然主要是加进了“继承”二字，但却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因为对文学遗产，有些就是只有继承，根本谈不到是什么借鉴。如诗体、语言之类。今人写七律，写菩萨蛮，就诗体而言，只是继承。各时代的语言尽管都有创新，但作家不可能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另外创造一套语言。二是在论到一些文艺工作者“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问题时，原稿说：这些同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毛选》本把“有些”二字去掉，改为“是不同的”。这也是原则性的改动，划清了两种脱离群众的根本界限。

## 座谈会以后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① 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

写过《还是杂文时代》的罗烽，把他来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交毛主席审阅。6月12日毛主席亲笔回信，对他既鼓励，又批评，希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这对推动作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6月中下旬，“文抗”和文协先后召开四五十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作家们还不可能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批地、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因为整风运动还在进行中。座谈会刚刚开过，艾青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主席回答他：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

---

① 1942年6月16日《解放日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因此，一段时间内，作家们还只能是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挖掘和运用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文娱活动，成为文艺家们的第一步追求。

1942 年 9 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分别由张仃、艾青、鲁黎等负责编辑。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 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这些活动和主张都表明了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态度。到 1943 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主席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而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而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和积极参加的艺术形式。

毛主席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极为重视。在 1944 年 3 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他要求多组织秧歌队，一个区至少搞一个。恰在这时，艾青根据他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论述。他认为: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5月,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赞扬文章"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印成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① 艾青遵照毛主席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一些改动,不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

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二百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同志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2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观看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如大家所知道的，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把这一工作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说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①

同年6月，丁玲、欧阳山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主席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② 毛主席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很大影响。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3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林伯渠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奉命随同前往,作大后方文艺调查工作,并负责向那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介绍座谈会和整风情况。他们遵照恩来同志的安排,到重庆后首先找到郭沫若同志作了详细介绍,然后由郭出面召集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三十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 "有经有权"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比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普遍的原则。但具体到一个专门家来说，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当时毛主席要求专门家去注意“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和“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群众的美术”，要像“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一样（按：这一句在收入《毛选》时删掉了），帮助与指导普及工作者，并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吸收群众的营养，来充实丰富自己。这种要求，在当时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为了纠正文艺家们一个时期内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是有其合理性、必要性的；但这种要求从来没有贯彻过，也不可能做到。如果文艺家们都这样去做，就无法从事自己的创作了。艾青同志可以写出《秧歌剧的形式》的文章，但他不可能具体地去修改民间秧歌剧。再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这是普遍的规律，但要求每个作家都长期地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厂、下乡、下部队，也是不可能的。1944 年春，毛主席提出“要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个延大、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搞“放假旅行，真正学习本领”。这当然更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

# 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

## 1943年春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

整风运动期间，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春天调整了领导机构。

当时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还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尽管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成员的地位和责任也有较大变动。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位较高，其成员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陈绍禹）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作调整。这样，直到开展整风运动，中央的领导机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朱德、康生、陈云、项英、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凯丰；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从组织上说，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负责，但由于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特别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已得到全党公认，并且也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界和国际舆论所确认，因此，在党的工作上，闻天同志有事都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很少独自决定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虽然由闻天同志召集，但在党内分工方面，他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主席拿主意，作决定。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以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闻天同志深感工作很不适应，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从1942年初起就离开了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博古同志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恩来同志常驻重庆，中央的全盘工作很难参与。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党的工作。因此，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随即由任弼时同志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弼时同志自1940年3月下旬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就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弼时等同志回国，主要是准备召开七大。1940年5、6月间，中央决定弼时同志担任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以后发生皖南事变，七大就拖下来了。这以后，在政治局内，弼时同志分工主管党群口和情报工作，并协助毛主席做些事情。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弼时同志兼任中央秘书长，实际上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42年初，闻天同志到基层做长期调查，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就完全由弼时同志负责了。因此，这次政治局会议由弼时同志作中央机构调整方案的报告，就在情理之中。弼时同志的报告说：现在中央机构比较分散，需要实行统一和集中，拟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设组织和宣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传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手。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之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前一时期多为书记处工作会议，实际上等于各部委联席会议，与政治局会议无多大区别。现在要确定书记处的性质与权力，使书记处成为政治局的办事机关，根据政治局的决议、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洛甫（张闻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十三人。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康生还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他说："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应当说明，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是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会议还决定少奇同志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是秘书（可以列席某些有关的政治局会议），每周（或每两周）召开例会一次，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八人组成，由少奇同志任书记，尚昆同志兼任秘书，也是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议。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均由书记处或者经过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管起来。由于毛主席要总揽全局，负责全盘工作，宣传委员会实际上由稼祥同志具体负责，胡乔木协助稼祥同志做些具体工作。

这次中央机构最显著的变动，是少奇同志参加中央书记处，并与毛主席一起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这个变动是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逻辑结果。前面已经介绍过，在那次会议上，陈云等领导同志认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毛主席在那次会上虽然没作什么表示，但实际上肯定了这个意见。他在会后写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处援引少奇同志的观点，赞赏少奇同志领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对少奇同志的责难。毛主席在“第八篇文章”中说，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对中央领导同志作这样高的评价是很少的。这足见毛主席对少奇同志是多么倚重。少奇同志自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就去了华中，领导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其间，在1939年3月到10月回延安半年，他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这以后又去了华中，发展新四军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都成绩卓著，与项英领导的皖南形成了鲜明对照的两种局面。在皖南事变后，被委任为新四军政委，负起了领导整个新四军和华中地区工作的全责。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即10月3日，毛主席电告少奇同志，中央决定少奇同志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10月11日，毛主席又去电询问，望少奇同志在两三个月后来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安，并在延安指挥华中工作。1942 年 2 月，刘少奇准备动身启程，毛主席又去电，要他路过山东时代表中央解决山东地区领导人之间的争论问题。为保证少奇同志回延沿途安全，中央还专门派员调查了解由华中到华北的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毛主席还多次去电嘱咐少奇同志，必待路上有安全保障，方能启程。当少奇同志在 1942 年 5 月到达山东后，毛主席又致电与他，委任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驻 115 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因通过封锁线安全尚无保障，不必急于西进。在少奇同志处理完山东问题，9 月下旬，少奇同志安抵 129 师领导机关驻地山西境内太行山涉县的赤岸村，毛主席去电表示慰问，望其休息短期后来延，并让他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同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二位，对少奇同志来延路上的安全保障作周密布置。于 1942 年 11 月到达晋北地区以后，毛主席又电告该根据地领导人，指示他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1942 年 12 月 30 日，少奇同志平安抵达延安。毛主席这才好像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了。1943 年元旦，《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新年晚会，并欢迎少奇同志从华中归来的消息。少奇同志在路上走了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毛主席无时不在挂念。对少奇同志的安全这样关怀备至，在不少人的亲见亲闻中是很少有的。大家深为党的领袖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所感动。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 年 3 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了。

## 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

还在中央领导机构调整之前，中央政治局已初步决定，延安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整风运动逐步地结束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第一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在3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从5月1日起恢复正常工作状态,一边工作,一边审干。(毛主席在11月13日的讲话中进一步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

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延安的机关、学校,事实上从1942年冬季已开始审查干部。第二个"四·三决定"发布后,延安整风运动正式转入第二阶段。

延安审干从1942年冬季开展后,毛主席密切地注视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少奇同志任主任。7月1日，毛主席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日，毛主席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九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的方针就是逼供信三字。”8月8日，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到会发表讲话。这是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毛主席第二次到中央党校讲话（第一次是作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也是中央党校在1942年2月底改组和调整领导班子由毛主席亲任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后，第一次到党校讲话。毛主席强调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是党校六门课中的两门主课（其他为党的历史、马恩列斯、军事班的军事课、文化班的文化课），他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就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

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主席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毛主席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不断地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主席就指示让它停下来。8月15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发布了毛主席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审干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10月9日，毛主席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11月5日，毛主席在致小平同志电中还对该政策的掌握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为了总结审干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于12月22日举行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会议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开展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好的方面看，(1)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2)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3)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4)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5)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从阴暗方面看，(1)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2)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3)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4)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5)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下降。会议分析产生上述偏向的原因主要是：对中央决议的九条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或估计不足，或估计过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掌握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还有一个原因是，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

在会议讨论中，弼时同志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三万人，主要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绝不会把三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因此，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他们是为了革命到延安的。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弼时同志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毛主席也在会上讲了话，同意会议的分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要教育干部用这次会议的方法去研究问题，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

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1944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主席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即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持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当处置。尽管过去一年内清出的“特务”曾高达一万五千多人，有的单位清出的“特务”甚至达到其人员的一半以上（如西北公学 390 人中坦白分子就有 208 人），但由于坚持不杀一人，不断进行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受到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而且，对审干工作中扩大化的错误，毛主席从 1944 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 1944 年 5 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曲，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 1944 年 10 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 1945 年 2 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主席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 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一阶段

在普通干部的整风转入审干阶段以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也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1941年“九月会议”本来主要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党的路线问题，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央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要到国际去告状，这就使认识的分歧加剧了。1942年底少奇同志回到延安，1943年3月闻天同志从农村调查归来，王明向他们宣传了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并要他们主持公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民粹派主张的观点。当时中央正在准备召开七大。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

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比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原准备开五次会，隔一天开一次，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检查。

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洛甫、博古、邓发、(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共11人;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共19人。

这次政治局会议与两年前的政治局会议相比,在历史背景上有一个显著的区别。1941年的时候,虽经历了皖南事变,但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特别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都对欧洲战争形势的发展甚为关注,到1941年秋国共两党关系走向相对缓和。这对于政治局会议检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环境,使大多数与会者认识问题有一个较为平和的心态,减少了外在因素的干扰。这次政治局会议则是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成为主要倾向。政治局会议在9月召开之时,尽管已粉碎了国民党妄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但强调对其坚持斗争的这一侧重点没有改变。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言词上要比1941年"九月会议"尖锐,涉及的人更多一些,会议的空气有时也紧张一些。这是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特点。

就对王明路线的批评来说,事实上早在7月中旬就已开始了。例如,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说:要"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地批评、纠正和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同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这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一语，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的。在7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事，进一步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对于中国蒋介石的流氓政治，我们屡次站稳阶级立场予以坚决反抗，都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实际的教训。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弄清楚，对党外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过去一切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改正错误；都能团结一起工作。在8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批评王明1941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意见，强调蒋介石集古今中外反革命的大成，是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我党的反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还可进行四个月，直到国民党向我有所表示时方可停下来。毛主席的这些认识，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评论来说是正确的，就对王明错误的批判来说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对抗战初期跟着王明犯错误的一些领导人的情况没有强调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因而有的批评也失之偏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种状况影响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时期路线问题的氛围。

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由于王明没有到会，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同志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也有一些没犯过大错误的同志作整风检查的），并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在9月7日、8日和9日三天，博古、林老、剑英同志和朱老总发了言。

博古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我同意毛主席提出有两条路线，一为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这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武汉时期是否有两条路线，过去有过争论。我认为有两条路线。我参加了当时长江局的领导，根据今天的认识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林老批评王明的路线错误，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

剑英同志谈到与国民党的关系，指出：我们主要做一篇半文章，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半篇文章，与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国民党只做半篇文章，对抗战也是想半途而废的，因此我们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

朱老总总结了在党领导下革命近二十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的错误，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朱老总还比较了新旧陈独秀主义的异同,指出: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的相同点是,(1)都不要革命的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2)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4)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5)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两者的不同点,朱老总认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老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

9月13日,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康生首先发言,对前三次会议情况提出了意见。他说,这样的讨论不仅问题不能彻底解决,还会延误很多应做的工作。因此,会议如何开法要研究一下。他提出,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还要联系内战时期来找王明主义的来源。王明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在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王明是扩大立三路线更加孟什维克化,因为他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而是反对立三的右。王明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中造成的恶果来检讨。康生说,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这就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有更多的揭发。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说,他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的言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如说蒋介石是全面抗战的，要时时、事事、处处帮助政府，这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第三，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康生批评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对王明也只是抽象地批评一下，这是不行的。同时康生自我吹嘘：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队。我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他派了人来侦察我。抗战以来，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一个幸福。但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个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个问题。

康生的这个发言，显然含有严重的错误。他对新华日报等的批评不合事实，混淆了错误的性质。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

毛主席发言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还在8月8日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他就提出：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这次发言中，他比较展开地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主席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害，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洛甫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为洛甫。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

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主席说，这些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称雄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教条宗派。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这成了1943年“九月会议”与1941年“九月会议”相比较，不仅在整风内容，而且在整风方式上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主席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研究文件，允许交头接耳、交换意见；要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火力不够，不能克“敌”制胜。9月30日，书记处举行会议（到会者有毛、刘、周、康、洛、任），就检讨党史问题作了如下决定：（一）在彭德怀回到延安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继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结论。（二）从10月起的五个月内，组织在延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七大代表已审查确定有问题者不参加），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参加人员名单由刘（少奇）、康（生）、任（弼时）负责商定；讨论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或个别漫谈等方式，中央政治局负责领导这一讨论。（三）在讨论时期内，参加讨论者以一部或全部时间参加，一部则须以一半时间照顾日常工作或负责继续审查干部。（四）由康生负责拟定研究党史计划。五天后，即在10月5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到会者增加了朱德、彭真），听取康生提出的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增加五六十个比较纯洁有前途的干部（包括吸收青年妇女干部）参加；总学委仍以毛主席为主任，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并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请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主席报告时局和学习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学习时间暂定三个月，学习讨论历史从抗战后开始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可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

10月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在讲话中，毛主席肯定了9月的会有收获，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他回顾错误路线发展的历史，指出：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目的是希望他们慢慢觉悟。但到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竟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这时，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六中全会时可以改造，但那时条件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还没认识自己的错误。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会很困难。另一关键是上月的会议与现在的学习。毛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

在毛主席讲话后，康生报告学习计划。他说：现在参加学习的，总共约有七百人，按单位或部门编组，每组约10人到15人左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右,但太大的可设分组。小组长大多数都参加中央的会议。中央的同志编为第一组,起核心作用,即核心组,也可以自由参加其他小组。讨论某个专门问题时可以打破原来分组界限。

接着,少奇、朱老总、恩来同志相继发言。少奇同志主要讲了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少奇同志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朱老总发言主要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通过学习,客观地看那些文件,有些问题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在上次9月9日的发言中,朱老总回顾自己的历史曾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这次发言，朱老总又继续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恩来同志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但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长期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经历过党内许多重大斗争。这次检讨党的历史，批判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他不可能不感到会议的分量。8月2日，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他回延的大会，他发表谈话，热情地赞扬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他说：我这三年在外，“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这些话表示了对毛主席心悦诚服的信赖。8月30日和9月1日，他连续两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和对中央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情况，并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整风学习。从9月16日到30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日的半个月内，在阅读大量档案文件的基础上，写了四篇共五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一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通过对 1928 年到 1930 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的研究，分析了这个时期党犯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第二篇笔记是《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探讨了产生新立三路线和新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第三篇笔记是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 1931 年 8 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认为四中全会决议所批评的三中全会的有些错误同共产国际指示有关，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无穷恶果。第四篇笔记是阅读 1941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恩来同志在发言中回顾党的历史说：中国党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与陈独秀的土教条。王明的教条，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作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恩来同志也对经验主义者的品质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品质有三类：一是为人的品质，有的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够格；二是革命者的品质，如勇敢、不怕牺牲，联系群众等，作为共产党人，这些品质是需要的，但还是不够的；三是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要开展思想斗争，既要联系群众又不做群众的尾巴，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经验主义者或者有革命的品质，但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求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故要整风。有些人连革命者的品质都没有，更要反省，通过整风来提高自己。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毛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席强调,犯路线错误或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他说:我们讲以斗争求团结,有这样几个范畴:一是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坚决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进行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与他们的落后性、狭隘性、动摇性斗争;三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本阶级中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才能达到;四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要通过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来实现。前年"九月会议"是中央现在能够团结的关键。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毛主席说,我们是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赞同少奇同志的意见。他说:过去党内斗争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传统。这次整风要避免党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这次整风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的这两条意见解除了一些同志的思想顾虑,使大家更加明确了中央整风的目的和要求、政策与方法。

## 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二阶段

根据10月5日书记处会议精神,10月14日,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将原定的有学习小组长参加的中央会议的范围扩大了)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毛主席在过去政治局会议发言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王明路线的特点作了初步概括。这就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这是一条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全党各地差不多都受了影响，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毛主席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

自此以后，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暂停了一个多月。从11月13日起复会，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在11月13日的会上，毛主席首先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明宗派，指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当时仅仅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在前年“九月会议”前没有在党内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毛主席还进一步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关头时各中央领导同志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的，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则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

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还讲了一些原则意见。如他强调整风与审干要经过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说：马列主义原则在方法上就是分析与综合。过去许多同志喜欢做结论而不会分析，其实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是老练的，但在马列主义方面是幼稚的，这是犯错误的一个认识原因。他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光明。

在毛主席讲完后，由博古作第二遍检查。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博古个人检查和别人插话，以及大家讨论提意见，共花了两天时间。

在博古同志13日检查之后，罗迈同志在14日，洛甫同志在21日，还有其他同志又相继作了整风检查。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检查后，还与博古一起在高干大会上讲了四天。

11月27日，恩来同志在会上作整风检查。自11月15日始，恩来同志就在准备检查的发言提纲。光是提纲，就写了两万多字。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恩来同志的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五大讲起，一直讲到当时。

恩来同志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间，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因此，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他对党史的回顾有这样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尽管检讨不可能涉及党的全部历史，但是基本上鸟瞰了党史的主体面貌。

二是既高度概括，又具体详细，对党史人物、党史事件如数家珍；对许多疑难问题的来龙去脉条分缕析，讲述得非常清楚。

三是贯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尽量不以偏概全，避免了一些片面性。如将“国际”区分为“真假”两种，认为从马、列到季米特洛夫代表真“国际”，米夫等人是假“国际”。区分“真”“假”的说法不一定确切，但意即“国际”内也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两条路线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思想，是清楚的。再如对反对、抑制立三路线的情况也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可分五类：(1)在实际工作中的正确抑制和反对，如毛主席领导的许多苏区党组织和白区的实际工作者；(2)贯彻立三路线失败而认识立三路线错误的，如苏区的周以栗。(3)犯过立三路线错误而逐渐改正的，如关向应、罗登贤；(4)大批的投机者，以米夫集团为主要部分，还有罗章龙等分裂主义者；(5)中央领导层内对立三路线的不同意见者。关于宗派问题，恩来同志认为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宗派观念的(有这样的观念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一类是有宗派行动的，这行动可能自觉，但是一时的，如继续下去，必会成为派别组织；一类是有小组织活动，即有政见、有组织的行动。像这样的分析都给人以很大启发。

四是对一些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总结。如对李德指挥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的错误，恩来同志概括为：“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逼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这是一针见血的分析。再如对王明路线的分析也很有见地。恩来同志说：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这样的概括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能引人去深入思考。

恩来同志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中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并根据毛主席讲的“两个宗派”的思想，检查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 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恩来同志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上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总结教训，才会少犯错误。他说：这样才能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当然，相对于三十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说，第二阶段会议既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像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由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即将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七百人学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中央政治局也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他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由孟庆澍代笔，王明本人签名，给毛主席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的加以检讨”。他写道：“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在这封信中，他承认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主席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他还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在讨论“两个宗派”问题后，中央总学委于12月初发出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文件的通知。这个文件摘录了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负责同志的几段文字，旨在认识统一战线与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及反对统战工作中的右倾投降错误的必要性，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的自觉性。1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和《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辑录，把整风引向深入的高级阶段，为将来七大讨论历史决议作准备。同时，中央政治局还发出指示，对王明抗战时期的路线错误作了进一步概括，将前述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的四点明确化了。①通

① 文件指出，抗战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知要求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内容，但应使党员和干部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这样，关于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以及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批判，实际上已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逐渐展开了。

## 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三阶段

如果说以上算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二阶段，那么，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三阶段则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整风过程中的一些缺点。这对于整风运动取得圆满成功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

政治局整风会议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暂停了一段。根据学习计划，安排一千多名干部到1944年4月底前集中学习七本书，即“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党史》和《两条路线》上下两册。其中三分之一干部要读完七本，多数干部只读《两条路线》即可，文化理论水平低的以读党内的正面文件为主。在学习过程中，请中央领导人作辅导报告。中央要求参加学习的干部认识到，中国22年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轰轰烈烈的，只有在某些关节时，某些领导人犯了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要把各个时期的历史关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作普遍的宣传。

1944年开春后，中央的整风会议继续进行。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4)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

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3月3日至4日,恩来同志到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已编入《周恩来选集》上卷),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出了科学的评价。3月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书记处会议精神,对上述党中央的几个问题作了阐释。他说:(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发生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毛主席说,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有在上海的"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法律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至于四中全会,经过"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的问题。毛主席说:自整风以来,我们就是"治病救人"。有人曾怀疑不是这个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未做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弄清思想。中央指定学习五本理论书,是要使同志们了解,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等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倒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倒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点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五）关于六大方针。毛主席说：在讨论中，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这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这是书记处会议上没提到的。毛主席说，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还说，“经验宗派，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在党政军民的关系上，在新老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地与外来干部的关系上都有表现。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对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明确总结。这个讲话很好，与会同志都很赞成，犯过历史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根据上述精神，在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有洛甫同志。5月19日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六届七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时，又决定增加博古同志为“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是经不起胜利，自以为了不得，趾高气扬，轻视敌人，必遭失败。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一个冷静的科学的分析。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和3月以来的一系列讲话，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已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

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的负责人近三十人。这次会议主要是审议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关于党的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毛主席向全会作报告，汇报了政治局对上述6个问题的结论。最后表决，全体一致通过了毛主席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并形成了正式的决议文字。这里不妨抄录于后：

“同意毛主席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成立如下决议：

1. 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2. 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 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经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展开的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历经两年八个月，圆满结束了。它也宣告从1941年5月毛主席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整整三年，也最终以全党空前团结的形势结束了。这是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一

# 党的历史决议

## “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成立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主席倡导成立高级组和中级组，花了很大精力领导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同时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来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通过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认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再回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的《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例如它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完整，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以及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他在4月12日和5月20日的报告——《学习与时局》，可以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七大”召开在即，许多代表和高级干部聚集延安，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就历史决议提出修改意见。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召集，成员有少奇、康生、恩来、洛甫、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加博古为成员。弼时同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① 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会议记录。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原准备开两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

## “历史决议”重新起草和多人修改的情况

为了使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

① 出席会议的17人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洛甫、邓发、陈云、博古、罗迈、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孔原、陈郁；因病请假者4人：王稼祥、王明、凯丰、关向应；因公外出者3人：林伯渠、董必武、李立三；参加者12人是：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这12人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写出了第一个稿子，这就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这个稿子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分六个问题：（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 1943 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弼时同志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见到的就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一万两千字，到第三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 1943 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弼时同志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独未因立三路线受着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弼时同志还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的。”虽然这里的概括还是初步的，但这个思想是很好的。三是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弼时同志在决议草案中说：“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在弼时同志改过几稿后，又由胡乔木以弼时同志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稿子。这个稿子近七千字，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强调了毛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怎样空前地丰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第二个问题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怎样占据党的统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内容，基本思想是根据《历史草案》和弼时同志的稿子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四年之久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也是根据《历史草案》写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的论述来发挥的，指出个人品质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第四个问题是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七大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了。

这个稿子是由弼时同志的秘书兼中央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同志抄正并复写的。弼时同志在抄正稿上对胡乔木写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每次修改后都由树德同志抄正，先后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在第二次修改稿上加写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对文字表述的修改这一次更多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修改，则是对第三个问题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作了较大改动，加写了近五百字一长段话。弼时同志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致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在第三次修改稿上，弼时同志除继续进行一些文字修改外，主要在文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这七条意见是：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条意见是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它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虽然弼时同志对胡乔木写的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感到不满意。中央指定闻天同志参加修改。因为弼时同志工作很忙，具体负责处理中央的许多日常工作，无暇继续用大量精力来专门修改稿子。闻天同志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发展历史，理论分析能力又很强，且整风以来对过去的历史错误认识深刻，高级干部对于他的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讨比较满意，适合承担这一任务。闻天同志改写的那份稿子虽然参考了以前的改稿，但基本上是在重新构思。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稿的全部内容已寻找不到。现在保存的是闻天同志修改过的不完全稿。这个稿子有前面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概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了研究和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历史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里，闻天同志修改较多。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有分量的话："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定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第二个问题，叙述"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产生，是有着它的历史渊源的。"这个标题是他加的。这个问题介绍了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六大的介绍，是根据恩来同志在1944年3月3日和4日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和毛主席在3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结论写的，肯定"党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对其基本正确的方面和缺点作了初步的概括。对立三路线的"左"的内容及三中全会怎样纠正立三路线的情况也作了概略的分析。闻天同志对介绍三中全会以后的文字作了较多修改。这个稿子突破了此前的决议草案只从四中全会写的框框，把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作结论的起点从1930年12月的四中全会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因而这个稿子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不只是对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作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在这个问题的末尾讲到经过1942年全党整风以后的党的状况时，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天同志加写了一段重要的结语:“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第三个问题,专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改变了以前的稿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四个方面进行叙述的写法,基本上以前述弼时同志归纳的七点提纲式的意见而展开论述。对这个问题,闻天同志作了较多的文字性修改。闻天同志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 毛主席七次修改“历史决议”

闻天同志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以后有46页,大约有一万三千字。这个“抄清件”有第四、第五个问题,并有题目。前面几个同志的起草稿和修改稿反复磨了半年多。到这份“抄清件”为止,关于历史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来了。从1945年春开始,毛主席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他至少参加改了7次。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从闻天同志修改的那份稿子涉及的内容来看,这是符合实际的。历史决议的题目从此也就定下来了,再没改过。毛主席对“抄清件”的第一个问题改得较多,加写了许多话。后来历史决议上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这句话,就是这次加上的。只是“彻底”二字,毛主席写了又圈掉了,“完全”二字是后来添的。“对于这十年内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段话的意思，也是毛主席这次加上的。这第一个问题，经过毛主席修改后，基本上是后来历史决议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对其他部分，毛主席这次改动的不是很多。

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件上，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增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如对党的六大进一步强调了它的正确方面，指出：后来的“左”倾思想主要地不是由六大来的，相反，是违背了六大的基本方针。对于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既进一步肯定了它的积极方面，也指出了它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及相当时间以来就有了的若干“左”倾错误政策并未加以清算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严重错误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指出：四中全会除了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及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外，还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全体同志。毛主席还写道：其实，当时的反党的右派，是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至于所谓右派大多数同志，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十余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与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虽然他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接着不久，这十余个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但是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长留在全党同志的心中。这段话在以后的决议改稿中基本保留下来了，并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这段话反映了毛主席对这些受迫害的同志的深厚的怀念之情。这个改稿还强调了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此时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的作用，以及遵义会议实现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转变对于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团结全党同志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结尾部分加写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一段话，为后来的改稿一直采用。作为历史决议结束的那一段文字也在这次改稿中基本定型。在这个稿子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去写的由党的七大讨论历史决议的提法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第七次扩大的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①，并且在稿子的第一页上写了两段批语，第一段批语是：“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此时如在）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第二段批语说：“此次决议如通过，只发七大代表，将来再考虑是否发学路线的人，其他都不发。”第二个批语虽然是规定发决议的范围的，但也补充了第一个批语的意思。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将历史决议交七中全会做结论，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讲了产生这个想法的缘由。他说：要使大会代表们有这种自觉，就是历史问题应由七中全会做结论，以便大会只集中注意力于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精神是弄清历史，团结全党抗日建国。不采用大会的武器来算旧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为了使与会代表们都同意这个想法，毛主席还建议让各代表团对这个建议进行讨论，然后写信上来请七中全会通过，“这样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政策问题，才真正是团结党内党外抗日建国”。毛主席的这个建议为与会

① 在1944年9月22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已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人主张七大开七天，历史问题不在七大讨论，七中全会讨论写一决议再由大会通过。七大只搞政策纲领，成为一致对外的团结的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同志所赞同。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解释了起草决议的一些指导原则。他说：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嘛！那时采用此态度是正确的，这次还采用此态度。

经过第二次手抄稿修改后，决议草案于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成铅印稿。对这个铅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这次修改虽然主要是文字上的增删，但也有不少重大改动。比较重要的修改有这样几处：(1)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与此相联系，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特点是不但不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却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以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来掩护它自身的“左”倾路线。改稿还增加了不少文字来叙述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2)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明确提出，“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会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3)对于“左”倾路线的8条基本错误内容增改得更为充实，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英勇斗争，指出：“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与人员群众，将永远被我党与人民所崇拜。”(4)在分析“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右摇摆、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等特点，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5)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关于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路线和方向是正确的，党在一个时期犯错误是局部现象，以及党通过克服错误而更加坚强的一大段话，从而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第七部分的主要内容。

经过第三次修改后，在同年4月5日又排印一次清样。此后，第4次、第5次、第6次修改的底稿，都是这一次铅印稿。在这些修改稿上，除了主要是毛主席的修改笔迹外，也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少量修改的笔迹。这说明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稿凝聚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

对第四次修改稿，毛主席在题目的“草案”二字后加了“修正稿”三字，此后三稿都称“草案修正稿”。第四次改稿基本上是文字润色，是几次改稿中变动最少的一次。

第五次修改稿与第四次修改稿是在4月7日同一天改出的。因为四稿改得少，故紧接着改五稿。第五次修改稿主要在开头加写了一大段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1921年以来的廿四年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并通过与党内机会主义作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我党发展到已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领导者。这段话是后来历史决议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

第六次修改稿，是委托胡乔木汇总毛主席的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而作一次局部性修改。胡乔木将毛主席修改稿上所加写的开头那一大段话，加以展开，强调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廿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并将这段开头语写上(一)，使其成为单独一部分。这样，决议草案至此改成了六部分。对其他部分只作了些文字改动，毛主席在审看这次改稿时也作了个别文字修改。稿子经过一天改好后，胡乔木在4月9日将改稿交弼时同志，附有一个便笺："弼时同志，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敬礼　乔木　九日。"对这次改稿，大家还是不甚满意，于是又着手进行第七次修改。

胡乔木参加修改过的第六次修改稿于同年4月9日再次排印。第七次修改主要是对第四部分讲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重新改写了。将前几稿讲的八点又恢复为从政治(包括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篇幅大大地扩充了。政治方面基本上是由别人改写的。在组织上和在思想上两个问题是胡乔木改写的。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采取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来展开叙述的。毛主席在这些改稿的基础上又作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写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援助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二八战争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这段分析是实事求是的，避免了简单化和片面性。后来的改稿保留了这个内容，并把它进一步充实了。第二段话是在政治部分的结尾处写道：“在上述三个政治问题上，就是说，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的问题上，在对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在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的问题上，左倾路线都是犯了错误的。而这三种错误是互相联系的，第一种错误（混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第二种错误（混淆农村与城市）与第三种错误（混淆先锋队与群众）的总根源。”这段话后来虽被删去了，但是毛主席对这几个问题间的关系的思考还是富有启发性的。对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社会根源，毛主席在修改这一部分时加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轻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这个思想后来经过修饰和润色，成为毛主席的名言之一。

以上七次改稿都是毛主席或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的。为了提交4月2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的大会讨论，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按照改稿的标明情况计算，第一至三稿称“草案”；第四至七稿为“草案修正稿”，此稿在清样上标为“草案第三次稿”（如果连算过去的七次改稿，这应是第八次修改稿）。这个改稿除了一般性的文字和段落的增删调整外，主要修改是：（1）删去了第三部分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特点的分析与第四部分相重复的内容，相关有用的思想和文字集中在第四部分去叙述。（2）在第四部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分析“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的政治方面说到革命转变问题时，增写了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明确提出了“我们现时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段话。(3)在第四部分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组织上的错误时，增写了一段话，即“扩大的七中全会在此宣布：一切被错误路线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其处分或其错误的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给予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后来的定稿用了这段话，只对它作了个别的文字修饰。(4)在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社会根源论及小资产阶级时，增写了关于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应采取与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同态度的内容；在分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方面的表现时注意了从好与坏两个方面来阐述，改变了以前几稿只讲一面的缺点。(5)将几次改稿的第六部分的最后两段话独立成第七部分，从而形成了历史决议稿的基本结构。这就是说，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

## 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历史决议”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第三次稿。这次会议是在杨家岭召开的。到会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彭德怀、洛甫、博古、李富春、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高岗、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罗迈、吴玉章、邓发、凯丰、朱瑞、林枫、陈郁、谭政、孔原、陈伯达。石磊(曹瑛)和胡乔木担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会议记录。

会议开始时，由富春同志宣读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此前，王明一直没有参加会议。三次决议草案都送给他看了，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五位同志（毛主席、朱总、少奇、弼时、恩来）都先后和他谈过话，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这次是讨论历史决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于是他在开会之前写了一封信来。在信中，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历史决议。他写道："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他还对他那本小册子，从对革命性质和动力的分析，对策略方针的提出，关于进攻防御及先锋队与群众关系的观点和党内斗争问题第四个方面进行了检查，承认"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次我所提出的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这封信较长，富春同志只宣读了上述第一部分。

弼时同志作为会议主席，报告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情况。他说：上次会（即3月31日会议）后，各代表团讨论决议一致赞成委托七中全会解决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已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无原则的修改，只把讲"左"倾路线错误的8条系统化，把毛主席的思想正面提出加了头一段。第三次草案讨论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补充，主要提出了这样几条：（1）王明同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的内容应加入；（2）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应单独写；（3）张国焘路线的内容要指明；（4）1927年11月会议盲动路线毛主席未赞成的情况要说明；（5）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还要彻底一些;(6)对六大的错误,一部分同志要求指出,我们考虑后还是不写为好。这些意见请各代表团秘书整理成书面材料,以供最后修改参考。弼时同志还说:王明同志刚才也写了声明拥护此决议,我们应表示欢迎,并望他今后在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今天讨论决议草案,望七中全会最后考虑本决议有无原则修改,对基本内容加以讨论,作为基本结论。

与会同志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博古同志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这个态度是诚恳的,可以说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还有一些同志发言谈了对历史决议的感受和对若干历史问题的看法。陈毅同志发言,仍然表现了他那特有的豪爽气概。他说:决议内容完全同意。这个决议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敢于彻底指出党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经过三个时期的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沾了边的。我对党外阶级斗争是英勇的,在党内斗争中就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是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最好的教科书。恩来同志讲了三个相关的历史问题。第一,何谓忠实于共产国际。他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对国际的决议要发展,六大决议毛主席发展了好的,教条主义者发展成坏的。六大时,斯大林对我说,形势不好,你们可到四川去,意即讲革命高涨并不排除退却。但那时没理会这句话,了解为一直高涨。1930 年打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下了长沙，就说实现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当然，也有的同志到国际去反映情况是不忠实的。王明到国际去就只按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反映，老是夸功，说如何又取得了胜利，国际也只好肯定。与这有关的错误，我们自己有责任。第二，三中全会问题。恩来同志说：三中全会有好坏两方面。王明攻击的恰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次决议未讲。三中全会的决议比三中全会本身还要坏些。第三，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系。恩来同志说：经验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教条，这是两者合作的思想根源。所谓宗派，不是说有什么秘密反党的小组织，而是说以错误思想、纲领为基础而形成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对不相投者即反对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不巩固的，思想变了，这种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恩来同志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使与会者对研究历史决议，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很受启发。

毛主席最后发表讲话。他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决议的重要意义。毛主席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与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是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二十五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虽然要看马、恩、列、斯，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对于各党派往往不清楚，但晓得根据政策来判断。国民党开头是激进的革命民主派，但后来国内政策反动，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也犯些错误。现在的决议案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人民的。二是对历史决议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毛主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现在弄清楚了，根本上是错的。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问题。毛主席说：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有效的。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前年十二月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去年就加了些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所以有些同志在有些时候需要攻一下，这就是帮助他。去年怕伤了元气，又温和些。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到了这个文件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决议要点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于他们几个。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四是好事挂账的问题。毛主席说：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相信也还会逾矩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五是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作，人家就利用。现在做了决议案，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主席讲完话后，决议案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在第二天即4月21日开幕的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讲到他的想法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写过多少次，经过三翻四复的研究，经过多少双眼睛看。单有中央委员会几十双眼睛看还不行，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昨天七中全会是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精雕细刻。毛主席还讲，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都写进去很不容易。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就是说，在党的历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决议案，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 “历史决议”的最后定稿和编入《毛选》时的修订

七大闭幕后，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弼时同志为首组织修改，并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

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于7月24日又印出“草案第四次稿”（就修改的总次数言，应为第九稿）。这次修改的工作量还是相当不小的。主要改动是：(1)根据七中全会以来广大代表们的要求，加强了毛泽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同志在一些重大革命关头作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一部分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的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成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总的论述。(2)对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3)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对第一点错误，由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弄错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改成“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对第二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战略性质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论断，对于如何使革命在全国得到胜利这个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也就不能不采取错误的方针”，改为“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对第三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的策略方针两类基本问题上都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它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上，也就不能不随着犯同样的错误”，改成“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与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在这一点的叙述中不但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策略思想的阐述，而且在决议稿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对其策略思想展开地作了分析。由于对“左”倾路线政治上三条错误的概括改变了，原来讲三条错误关系的那一段话也相应地删去了。(四)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这次修改对于历史决议稿的最终形成是带有决定性的，无论从整体结构、思想观点、段落调整和文字表达来看，经过这一次修改已基本定稿。

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8月5日排出了历史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实际上是第十次修改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会议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它的功绩，使其评价更为全面；将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是有功绩的”，改为“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这次具体化为“1932年8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准确时间现已考订清楚是10月)。在第四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增写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时,增写了“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与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突出了它的政治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思想方面论及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否的根源时,将原来写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改写为“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与此相联系,也将原来写的“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改成为“毛泽东同志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从而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也相应地增写了“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话。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补中委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者对历史决议稿再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历史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当时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1950 年 8 月 19 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 1953 年 4 月出版。这个公开发表稿作了这样几点重要修改：

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改的。如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毛主席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已萌生了。还在 1949 年 1 月他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历史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但是，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二是根据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分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这个修改是陈伯达提议的，毛主席赞同了。

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了引号，即一律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就沿用了这个用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以及将“与”改为“和”等。

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新版《毛选》按照建国初期的编排，仍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二

# 抗战后期延安的外交活动

我们党的外交工作在抗日战争后期有很大发展。从1944年中至1945年抗战结束，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外记者团访问边区，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和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那时的外交工作是与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的外交虽然还不是正式的，但我党在态度上、方法上非常郑重。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的，参与外交方针政策制定的只有毛主席和恩来等少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事实上，凡涉及外交，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有时甚至连一些细小的事务也由他亲自布置安排。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表明，对外政策问题已成为党的整个革命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接待中外记者团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红色根据地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随着我党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在华人士特别是一些新闻记者对了解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延安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

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党中央、毛主席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收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来电后，毛主席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主席又特地致电董老，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在外国记者起程之前有一段精彩的过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党与国民党在宣传上的尖锐斗争。蒋介石批准这次访问实际上是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因此他竭力想把这次访问控制起来，以便为他的反共目的服务。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原定的外国记者旅行团由国民党官员带队并安排一些中国记者参加。国民党当局还规定，旅行团要先到西北国统区考察，然后再到共产党边区访问，期限是三个月，写出的报道必须送交国民党宣传部审查之后才能发表。同时，蒋介石还训令西安地区国民党军政要员，要他们收罗所谓"中共叛徒"、"受害者"、"知情者"等事先准备材料，专门向外国记者进行反共宣传，"以造成中外籍记者对中共知其如何可恶，而无足重视之心理"。西安地区国民党当局秉承这个旨意积极布置特工人员炮制伪证，乔装准备。不料，蒋介石的训令和其他有关情况很快被我党掌握了。4月初，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打电报给董老，请他把这件事迅速透露给各位外国记者，使他们在精神上有所准备。这样，蒋介石的反共把戏没来得及上演就露馅了。

中外记者团5月17日离渝，6月9日抵达延安。

记者团共有21名成员，实际只有6名外国记者。这6人之中，一人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名叫普罗岑柯；其余5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国二、三家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这5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史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个很严肃的记者但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部有较密切的关系，天主教神甫夏南汗则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视态度。

10日，朱总司令设欢迎晚宴。晚宴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演出以雄壮的“同盟国进行曲”开始，以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结束。这些隆重的活动一半是为了欢迎记者团的到来，另一半则是为了庆祝盟军终于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12日下午，毛主席会见了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看到中外记者终于来到延安，毛主席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会见时，他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

以后，毛主席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这些谈话中，毛主席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我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我党在抗战胜利后将要采取的方针路线及中国革命前途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通过与我党领导人的交谈，外国记者对我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深入切实的认识。同时，我党领导人也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例如：英美人士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盟军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等。有的外国记者还十分友好地向我党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些改进我们对外宣传的建议和办法。

外国记者不仅访问了延安，还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统区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对于外国记者的反映，毛主席非常注意。他曾在一些指示中说：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他们从延安所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夏南汗神甫亦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由于外国记者访问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当局重新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新闻封锁。

## 对美军观察组的争取

与中外记者团的访问相比，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抗战后期，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我党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国。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工作，希望在共同的抗日战争中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发展关系。不过，有很长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并不重视我党的力量，而是把国民党视为中国抗战的主力。虽然恩来同志早就向美方人士提出过一些合作建议，例如向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派遣军事观察组等，但美国方面迟迟没有作出回应。直到1944年初，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出现了转变。

毛主席得知美国政府准备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是在1944年3月初。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给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一位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顾问职务的美国人士告诉我们，罗斯福总统已致电蒋介石，要求派遣一个军事考察团去西北。据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位友人介绍，蒋介石起先拒绝了，稍后又勉强表示同意，但条件是不得与中共接触。以后，罗斯福又来电说明派遣军事考察团到西北的目的就是要考察中共军事，但蒋介石却迟迟不作答复。这件事一直拖延到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才得到解决。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华莱士几次提出要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迫于无奈，蒋介石最后总算同意了。6月28日，林老、董老电告毛主席，美国军事人员赴延安一事已确定，不久即可起程。毛主席当即复电表示欢迎。

美国政府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来等于是和我党建立起一种官方联系，这同以前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个别接触很不相同。当然，观察组级别不高，并不办外交，但具有外交性质；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不能决策。最初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共有成员18人。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批在7月22日，另一批在8月7日。观察组最初的成员对我们党的态度基本是同情的、友好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离开重庆前曾私下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表示，他感到这次与中国新生力量合作，任务重大，如果做得不好，这一生就完了。

毛主席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使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他对宣传工作也抓得很紧。观察组来延前夕，适逢美国建国168周年。7月4日，延安举行了很热烈的庆祝会。我党主要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外国人以及中外记者团的记者们都参加了。为了这一天，毛主席特地指定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提出修改意见。这篇社论对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价，对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也很赞许。社论中还有一段话，表达了我们对美国外交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后，为表示郑重欢迎，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8月15日的社论。这篇社论的题目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主席修改时所加。在社论中，毛主席醒目地提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因为经过七年的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解放区军民的力量终于逐渐被同盟国所认识，"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毛主席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加快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进程。

为了使美军观察组尽快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组织安排我军的高级将领向他们做了有关敌后战场的全面介绍。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都参加了。这些介绍是非常细致的，例如彭总的报告就讲了三天。此外，还召开了一些专门问题的座谈会，组织了各种参观活动。美军观察组也向我方提交了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情报的清单。负责接待工作的剑英同志根据他们的要求，很快向各军区下达了详细指示。中央军委还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司令部增设联络处，专门担负向盟军提供战略情报的工作。

在令人鼓舞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以极其冷静的态度进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了分析和思考。当时看来，美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急于与我党建立联系有三个原因：第一，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抗战不力且要价越来越高甚为不满，美蒋之间的矛盾有所增长。南方局从一些中外友人那里了解到，华莱士访华期间曾说，美国尽力武装蒋介石的军队，但他的军队一战即溃；而华北及华中等地的抗日军队又被封锁，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华莱士还说，以前对蒋介石的传闻虽然很坏，但不能十分肯定；这次来华亲历后，乃知所见比所闻更坏。第二，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不容忽视。当时，美军为轰炸敌后日军迫切需要我军提供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飞行员；更重要的是为最后击败日本，美军正考虑在华北、华中沿海大规模登陆作战，此举需要八路军、新四军配合。这些军事上的需要从美军观察组向我方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三，美国政府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全面了解我党情况，以便为制定战后对华政策作准备。林老和董老在6月28日致毛主席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美国之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与华北，不仅是为了今天轰炸日本的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这就是"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题"。

8月16日，党中央收到南方局打来的一封长电，内容是对我党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毛主席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份电报，并用笔勾出重点。特别引起毛主席注意的两个问题是有关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分析和对我党外交政策基础的看法。南方局来电中指出：目前美英人士已逐渐认识并承认有两个不同的抗战中国，今天美英对华政策，对太平洋战略，乃至对战后的世界和平计划，已不能不在蒋政权外同时估计我党的动向，了解我党的意见。但是，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谨慎。对于国民党，罗斯福一面不满意蒋介石的法西斯倾向及抗战不力，一面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实行宪政的方法争取多数人拥护来和我们对抗。对于我党，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着很深的戒惧。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因此，我们要实际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斗争的过程，只有在现实已经造成我党的中心地位，而美国不能否认时，它才可能被迫承认。关于我党外交政策的基础，南方局同志认为，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我们的出发点是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独立、民主、统一、和平、繁荣的新中国，无论今天和将来，我党都不是走南北分治的对立，而是坚持自己的阵地与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促成全国进步，为承担起这一责任，我们必须使自己力量更加强大，成为决定中国问题的主要因素，只有如此，才能主动地利用外援，而不是被动地受人支配。对于南方局同志所作的深入分析，毛主席是肯定的。应该说，我党当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

8月18日，恩来同志草拟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经毛主席批准，下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这份文件很好地说明了我党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我们的民族立场。恩来同志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的，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合作，扩大我们影响。他还指出，我们的外交目前还是“半独立的外交”。这是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挂着中央政府的招牌，我们的许多外交往来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开展外交往来，所以它又具有独立性。尽管那时我们党还缺乏足够的外交经验，但从一开始，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就提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些最初确定下来的原则对我党以后的外交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9月初,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个是放手与美军合作,同时也向美国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另一个是在国民参政会和国共谈判中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这两个决定是互相配合的。当时,从总的形势上看,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问题正随着欧洲战争接近结束而突出出来。中国局势的特点是,一方面,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下接连遭到惨重的失败,大西南形势极度危急。一时看来,昆明乃至重庆都有可能不保。朝野人士纷纷要求蒋介石尽快作出重大改革以挽救时局。另一方面,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决定作用。9月初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和赫尔利抵达重庆访问,9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将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这两个会谈显然都关系到对日战争的前途。在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之后,党中央、毛主席希望抓住这个新出现的时机,进一步推动我党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发展,并借此推动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共谈判的进程。

为了推动与美国的军事合作,9月9日,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对于开展与美军的合作,各抗日根据地是积极的,但也存有一些顾虑。例如,新四军有些同志就担心,美军人员经常来往华中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扫荡,对我们害多利少。毛主席打电报去解释说:我们应对美军人员的到来表示欢迎,"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

任何有效的合作必须是相互的,在向美军提供帮助的同时,我党也慎重地向美方提出给予我军援助的要求。9月8日,党中央电示董老,请他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同时,代表我党我军向赫尔利等人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几天以后,毛主席又两次致电林老、董老和王若飞三同志,说明我们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分配盟国援华物资,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分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日报》也按照这些指示的精神于9月15日发表了新华社电讯“延安有资格人士评论盟国援助物资分配问题”,稿件经毛主席亲自修改。这些情况表明,毛主席对外援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是极力争取的。抗战期间,我们常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为辅”的外援究竟来自哪里呢?这对我们始终是个问题。苏联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援助。抗战后期在舆论上对我们的支持是有一点,登了几篇文章;但那时国际舆论已对蒋介石政府群起而攻之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有所表示。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后一度出现了获得一些外援的可能性。当时看来,这种想法并非不切实际,因为美国人确实有求于我们。我们党向美国提出援助问题还有其他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打破国民党在接受外援方面的垄断地位,另一个是测试美国与我们进行合作的诚意。不过,后来情况有所变化,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外援。

为了推动与美军的合作,毛主席不仅制定了有关的方针政策,而且还亲自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8、9月间,他曾指示山东我军迅速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报;指示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并说明这一工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必须由首长负责专门指导;美军观察组成员考林和琼斯赴晋西北、晋察冀考察亦是由他拟电向当地作交代。毛主席还批准陈纳德率领的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在我新四军五师所辖范围内设立一个无线电网。此外,像营救盟国飞行员一类的事情,他也时常过问。当然,毛主席考虑更多的还是怎样从战略上作好准备。针对美军有可能在战争最后阶段在华东沿海大批登陆一事,毛主席在8月下旬要求新四军总部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1月初,毛主席再次指示新四军,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要他们采取步骤以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建议请新四军领导同志考虑,例如增调部队南进;抽调大批干部进行训练,陆续派往苏浙;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以统一指挥苏浙地区的斗争等。后来,虽然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军放弃了在中国登陆作战的计划,但毛主席这些战略部署的意义并未因此丧失。这是因为毛主席的部署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配合美军,反映出我党对发展与美国关系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这些战略部署还有更为重要的意图,那就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的反攻阶段时,使我军掌握先机,发展和壮大我党力量,以便应付各种复杂局面。

在延安,毛主席、恩来同志和我党其他领导同志还多次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谈话,直接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对我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有更深入的了解,争取他们同情和赞助我党领导的抗战事业。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毛主席与谢伟思的谈话就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我方的记录还有待查找。从谢伟思的记述来看,毛主席与他谈话的内容不仅包括国共关系,我党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这表明毛主席考虑我党的对美关系不仅是从战争时期的现实需要出发的,而且有更为长远的设想。毛主席强调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在这些谈话中，毛主席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介石选择内战道路。这些谈话中阐述的政策思想，可以说是为我们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时，我们与那些来到根据地的美军人员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我方的周密安排和坦诚合作的确赢得了他们的心。美军观察组成员认为，我方所提供的材料“超出了他们的希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评价是：“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一位被我根据地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临走前曾恳切地说，“中国共产党前途之大，除苏联外无可比拟，而蒋介石的不进步为世所闻。”他甚至表示，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向八路军进攻，造成内战；如八路军有所需要，他愿以个人的一切来相助。当时还没有人发明出“洗脑筋”这个词。如果说美军人员来到根据地后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变化，那并不是因为我们进行过什么说教，而是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们深受触动。不是洗脑筋，而是开眼界。

## 毛主席同赫尔利会谈

在发展我党与美国的关系时，党中央、毛主席原先的设想是先从军事合作入手，然后再根据情况和可能逐步开展其他方面的合作。但是，赫尔利来到中国以后便急于插手国共谈判，这就使整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与赫尔利的谈判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也是他亲身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谈判中的第一次。可以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次谈判对国共关系、对我党与美国的关系、对这段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4年是战时国共谈判最关键的一年，毛主席对国共谈判问题一直抓得很紧。年初，毛主席在致董老的一封电报中指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年中，华莱士访华以及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促使党中央决心加快与国民党谈判的步伐。9月初，党中央判断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由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公开提出我党建议，召开有各党各派参加的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我们党与赫尔利的接触是从10月开始的。在重庆的林老和董老曾于17、18和24日三次与赫尔利会面。在前两次谈话中，赫尔利作了如下几点表示：第一，他说蒋介石对我党的态度已经缓和，蒋介石允许他与我党接触，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他对我们党欢迎他去延安表示感谢。第二，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抗日领袖，但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他认为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第三，他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援华物资也决不偏重某一方。第四，他准备在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之间撮合，得出合作的初步结果再与蒋介石商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与毛主席商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由蒋介石与毛主席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在第三次见面时，赫尔利告诉董必武和林伯渠同志，蒋介石已于21日交给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了。他打了个比喻，说蒋介石的方案是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赫尔利还说，他告诉蒋介石，如果他是共产党也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方案。他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并肩作战？蒋介石回答说，无适当的人指挥。赫尔利说，我去，但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不是指挥，而是作两军的连锁。最后，赫尔利表示，蒋介石现在正起草新的方案，他看过之后将带往延安。为拉拢国共谈判，赫尔利最初力图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对我们讲了不少好话。

在接到关于董老、林老与赫尔利第一次谈话情况的报告后，毛主席、党中央对谈判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毛主席认为，蒋介石对罗斯福、丘吉尔的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现在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11月6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赫尔利来延安进行谈判的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涉外重要谈判，中央领导同志共同出谋划策。毛主席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谈判的中心还是政治问题、联合政府、政治纲领等。根据朱老总、恩来、弼时等同志的意见，会议确定谈判是可以的，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会议还确定我方应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因为如果赫尔利来而谈不成，则过在我方，使蒋介石可以振振有词，但我们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8日上午，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与赫尔利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时间不长，只有50分钟，以赫尔利的发言为主。

赫尔利首先申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到延安来也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他表示，美国不愿意干预中国内部的政治，美国相信民主，中国亦相信民主，他本人也是民主主义的信徒。他的任务是帮助中国统一一切军事力量来与美国合作，以击败共同的敌人。赫尔利说，他曾和蒋委员长详谈，蒋愿与共产党取得谅解，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蒋将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也承认有必要在公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平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在这种机构里，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接着，赫尔利拿出一份提纲，并说：这个提纲蒋委员长认为是可以同意的，愿请毛主席、朱总司令考虑以此作为谈判基础，提出应该增改或不同意的地方。说完，他便读了起来。

这份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致力于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原则，双方将遵行提倡进步与发展政府民主程序的政策。四、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所有军官与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宣读完毕，毛主席立即问："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理解毛主席的意思，解释说原来的草案很长，他把它压缩成五点，他相信这五点可以作为谈判的适当基础，但这五点并不是必须接受的，而是试验性的方案。包瑞德这时提示说，毛主席是要知道赫少将所说的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回答，原来是他的意见，后来蒋委员长作了若干修改；他尽力提出民主自由，希望中国实行多党政治。然后，赫尔利又讲了一些罗斯福如何希望中国团结自强以及蒋介石如何爱国并愿与毛主席见面之类的话。随后，他建议会谈暂停，以便毛主席考虑他的建议。毛主席答称："感谢你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团结抗日。团结一切力量，快快打倒日寇，重建民主、自由的中国，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我们的共同意志。”

8日下午、9日下午和10日上午又分别举行了三轮会谈。其中，以8日下午的会谈最为重要，毛主席发言阐述了我党的基本主张，并针对赫尔利所带来的五条提出了我党的意见。

8日下午会谈一开始，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已有一些时候的包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惟有中国的正面战场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来到，想帮助中国人民，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援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毛主席说，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意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从未放弃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团结，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接着，毛主席简略介绍了敌占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情况。毛主席说：对于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同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于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这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打日本，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对解放区施行的包围、进攻、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在国统区，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300万减至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针对赫尔利带来的五条，毛主席说：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求，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但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毛主席强调的第一点是："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毛主席说：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化达于极点。国民党总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无济于事。对此，蒋先生历次表示的是拖，想拖到战争结束一年以后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主席强调说:“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我们共产党人在沦陷区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在解放区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抗日民主活动,在195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77万多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我们在那里的党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和西安的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6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毛主席强调的第二点是关于军队的问题。他说:“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参观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十七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五十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最后，毛主席和缓地说：“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帮助中国不辞劳累，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深表感谢……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后来，毛主席讲他同赫尔利的谈判说，我与赫尔利谈话的章法是先把国民党攻一攻，把赫尔利带来的五点中心内容驳掉，指出目前局势不民主造成了各种危机，强调国民党政府有崩溃的危险因而需要改组。

毛主席刚一讲完，赫尔利便说，毛主席把问题精彩地提出来了。但是，他显然没有料到毛主席会对国民党政府提出这样尖锐的批评，因而言谈中露出了颇为失望的神色。在替国民党政府辩护了几句之后，赫尔利说，直到今天上午，他还没有了解到在国共之间存在着这样深刻的鸿沟和这样严重的对抗，如果局势已经无望的话，那他何必枉费心力。他曾要求蒋介石合理一些，以期有助于全中国的利益；现在，他也要求毛主席合理一些。赫尔利还指责说，毛主席刚才的话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是不公平的；蒋介石抗战八年，他的周围的贪污腐化分子利用了他。

毛主席问：“你承认那里有贪污腐化分子？”赫尔利答：“是的。”接着，毛主席以严肃和沉重的口吻说：“我所重复的，在外国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在中国是孙夫人和孙科先生的话。我想重复这些人的话，是可以的吧！说我重复敌人——日本人的话，那是不合事实的。”赫尔利解释说，他指的不是日本人，而是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毛主席接着说：“正因为不团结，我们才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团结，正因为不民主，我们才谈民主。如果中国已经团结，已经民主，那么又何用我们来谈它呢？说中国不团结不民主的，有两种人。一种人的确希望中国继续分裂。还有一种人希望中国团结民主，他们批评中国的缺点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使中国团结民主。我的话决不反映前一种人，而是反映后一种人的意见，就是反映希望中国团结民主的人们的意见。”

听完毛主席的话，赫尔利又高兴起来：“现在我们有一致的意见了！”他带着歉意说：“在几分钟以前，我误解了毛主席的意思，现在我了解了！你是要团结民主的。如果毛主席和我一起工作，我们可以使蒋介石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就可以促成中国团结，发展民主，肃清贪污。为此我们必须一起工作。”“现在我们所应做的，就是设法找寻毛蒋可以会面的基础。他们两人知道中国情形，当然非我局外人所能及，以他们的智慧和他们手中的材料，他们可能得到协定。我现在再问毛主席，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声明。”

于是，毛主席就对赫尔利所携带的“为着协定的基础”逐条表示了意见。毛主席说：“赫尔利将军所提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有几条我是同意的。”“第一条很好，我们完全赞成。”然后，毛主席建议把原先的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以强调提倡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各种自由权利。恩来同志补充说：这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赫尔利接上去说：“再加思想自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平反冤屈之自由。”这样，修改后的第二条成为国共双方所需遵循的共同原则。在讨论关于政府的问题时，赫尔利说：“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现在请毛主席写一条，作为修改后的第三条。”毛主席提出：“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由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国民政府；并宣布和实行关于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民主政策。同时，改组统帅部，成为联合统帅部，由各抗日军队代表参加。”毛主席增写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一条其实是最重要的，但赫尔利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当即表示："可以加这一条，我们应尽可能公正，以期取得国民政府之同意。"随后，毛主席又建议将原先的第二、四两条合并，作为新的第四条，内容是一切抗日军队将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将被公平分配。第五条没有什么变化，仍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问题。经过第二次会谈所形成的修改稿与最后的定稿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后来又将第二条和第三条的顺序颠倒了一下，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

会谈结束时，毛主席说："就是这几条，为了妥协不再多提了。"赫尔利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我刚才误解了毛主席的意思，后来明白了。请各位将我误解毛主席的话，从记录上完全勾去。"

9日下午，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我方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然后，双方就各自认为的关键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毛主席首先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介石先生同意，那就非常好"；"以前未解决的问题，今天如能解决，那是中国人民之福。"赫尔利回答："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表示，毛主席不仅有非凡的智慧，而且有公平的态度。他这次能和毛主席一起工作，实为平生快事。尤其使他感到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得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赫尔利还提出，如果蒋介石表示愿意见毛主席，他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不管会谈成败如何，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谈后能安全返回延安。毛主席回答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

接着，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同意我们的五要点。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我很希望在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以前见蒋先生，问题也解决了。”赫尔利当时十分兴奋，他根本没想到还会有什么麻烦。他再次表示回到重庆后当尽力使蒋介石接受五要点，并问：“如蒋接受了，毛主席愿意做些什么？与蒋见面在什么地方？不要在重庆见面，是否可另选一地点？”毛主席回答说：“见面地点当然在重庆。”赫尔利高兴地说：“顶好！就这样解决吧。”

随后，赫尔利提出：“毛主席是否可签字于五要点之上？”毛主席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这上面签字！”毛主席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插话说：“这五要点，在赫尔利将军见证之下，毛主席已予以接受，蒋如拒绝，赫尔利将军就可以很清楚地告知罗斯福总统，‘这五要点，我认为很公平，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如蒋问，‘接受五要点，是否是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对这问题，请毛主席告我如何答复。”毛主席说：“仍要他在政府里面。”赫尔利还不放心，又问：“我要再证实一下，你是否和他合作，要他当政府主席？”毛主席再次回答：“要他当主席。”赫尔利这才放心地说：“很好！”以后，双方又交换了一些有关文件修改的意见。

这次会谈是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的。毛主席再次感谢赫尔利为帮助中国人民所做的努力。赫尔利作答说：“我们的谈判进行得这样顺利。我敬佩毛主席的宽大态度。你所希望的各种改革，我完全同意。”他还愉快地说：“明天早晨我们签字后我还要赶回重庆去。请毛主席不要笑我迷信，明天星期五是我的吉日，我生日是星期五，结婚在星期五，第一个小孩子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个勋章也在星期五！”

10日上午，毛主席与赫尔利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毛主席首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讲了三点:第一,请赫尔利将双方商谈的协定转达给罗斯福总统;第二,这个协定已经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同意;第三,周恩来同志将和赫尔利将军一同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主席说: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共同纲领,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纲领上签字。抗战八年来未能得到的东西,今天在赫尔利将军帮助之下,有了实现的希望。在这个纲领下,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建立新中国。随后,赫尔利提出,请毛主席立即写一封信由他带给罗斯福总统;同时,他也将交给毛主席一封感谢信。他还表示愿意设法使毛主席和罗斯福总统商量问题,以使全世界承认毛主席的地位。

中午12时45分,双方举行签字仪式。毛主席与赫尔利在文件上签字,并交换了信件。最后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于当日下午2时乘机离延返渝，恩来等同志与他同行。

对于这次会谈及所达成的协议，党中央、毛主席是满意的。在致罗斯福的信中，毛主席写道："这个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在信的末尾，毛主席对罗斯福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事实上，赫尔利并没有及时地将这封信电告罗斯福，而是用军邮投递，结果过了很长时间才到华盛顿，以致罗斯福迟至1945年3月10日才给毛主席复信。

在毛主席与赫尔利达成的协议中，我们党作了重大让步。11月9日晚，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上，毛主席在报告同赫尔利会谈的情况时指出：我们的极大让步是与极其腐败的政府合作，他们的目的是不要踢开蒋；我们是在不破坏解放区，不损害民主的原则下同蒋妥协。我们应当知道国民党有200万军队，得到国际国内承认，我们还只有63万军队，因此在现有条件下，我们还不能不予妥协；但是，我们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将来我们自己组织解放区的政府。在国民党方面，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与赫尔利所进行的谈判看上去是顺利的，但是我们党的领导同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预料蒋介石绝不会轻易同意这个协定。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蒋介石所谓的让我们参加政府和我们主张的建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但赫尔利却把二者混而为一,他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我们则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这次会谈所作出的协定提出修改。

## 赫尔利斡旋期间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恩来同志到重庆后,蒋介石对在延安商定的协定草案迟迟不表示态度。一直拖到11月21日,国民党方面又另行提出了一个三条反建议,由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同志。它的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此后,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这三条建议实际就是要我党交出军队,接受国民党的"招安"。

与此同时,赫尔利也改变了态度,一屁股坐在蒋介石一边。在当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同志询问蒋介石对于联合政府的态度,赫尔利回答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告诉周恩来同志,蒋介石一定不会接受。他还表示,他原来不知道实际情形,所以在延安时,毛泽东提出意见之后,他也添上一大堆;现在,国民党的这个建议也许是个基础。当周恩来同志追问赫尔利本人是否仍同意我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时,赫尔利狡辩说:"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我认为你们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但我并不处在同意的地位。"为劝说我党接受国民党的反建议,赫尔利唠唠叨叨地说:"我们是准备帮助你们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就无法帮助你们。"由于国民党毫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赫尔利亦背弃了他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延安与我党签订的协定，国共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面对这种情况，在坚持联合政府主张的前提下，我党有两种选择：一个办法是使谈判继续下去，并设法寻找一个折中方案，作为成立联合政府的准备步骤；另一个办法是固守五条协定，不怕谈判陷于僵局。当时，在重庆主持谈判工作的恩来同志和董老比较倾向于前一个办法；毛主席态度很慎重，一时没有作出决断。所以，恩来同志就先起草了一个复案。这个复案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参加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由其颁布各项新民主政策，改组行政院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各抗日军队组成的军委会；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中共军队编列为正规国军，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公平分配等。这一方案的特点是以三点的形式放入原先五点的内容，但不直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因估计到蒋介石仍不会接受这一复案，所以恩来同志还建议，我党可同时向国民党提交一份备忘录，说明国民政府如一时不能改组其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其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中共将根据战争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同时，提出在中国战场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这后一点以往外国人士曾提出，我党领导同志也一直表示赞成，只是没有作为我方正式建议提出过。当时，恩来同志的考虑是以要求建立解放区委员会来逼蒋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并设法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他估计，目前美国作统帅利多害少，将来我们力量壮大了，而且有“北方”（指苏联）的加入，美国束缚不了我们。这些想法，他在12月29日和30日致毛主席电中作了说明。

恩来同志在前台谈判，在后台决策的还是毛主席。复案写好后交不交，这是要由毛主席来拍板的。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哪一种办法更符合我党目前的和长远的战略利益。在作出重要决策的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候，毛主席总是集思广议。收到恩来同志的复案后，他请来延安参加七大的陈毅同志作参谋，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陈毅同志看过各种有关材料后，连夜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了一封长信，于12月1日送到主席那里。

在这封信中，陈毅同志首先分析了国共谈判两种可能的趋势：第一种是蒋介石顺利地在赫尔利和毛主席的提案上签字；第二种是按照蒋介石目前的作法，一不签字赫毛协定，二则提出符合他愿望的办法。陈毅同志认为，第一种情况仍然挽救不了西南大局，反而增加了美国对蒋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因为蒋介石的病症是一针强心剂不能挽救的，它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不会因签字而能改善。在国民党方面，签字后能允许共产党加入一、二个阁员，已算是大大让步；但仅有我党一两名阁员并不能挽救西南大局，要来一个带革命性的改良就必须在几个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这一点蒋是不能做的，美国的压力再大也达不到。至于蒋介石目前的作法，目的只在和缓空气，使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其结果只会更促进其腐烂，加速日寇的进攻。陈毅同志说：本来如蒋决心改变，学唐德宗下罪己诏，起用良将，西南危急是可以缓解的；但蒋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更是恐慌、动摇、害怕，他决心不这样做而宁愿走上反动的绝路。关于赫尔利斡旋，陈毅同志分析，美国的企图不过是着眼其军事利益，认为我党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但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体系，并无诚意要改革政治。赫尔利与毛主席的谈话着重高兴我们要蒋那一点，而不高兴毛主席所提出的改革政策的本质，对此批评十分明显。如谈判顺利，赫尔利可能把每月二万吨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的其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公平分配，同时要我在敌后反攻，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花费中国特别是我们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装潢得十分漂亮。陈毅同志强调，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这是非常对的；而赫尔利与我党谈判所涉及的全部是挽救西南大局，而不是抗战全局；今天抗战全局逐渐转到敌后和我，它是在蒸蒸日上着，并不依赖那个协定有所裨益。依照我党目下和将来的战略利益，蒋不走第一条赫毛蒋合作的路而走现时的第二条路，反而对我们的战略利益好得多。陈毅同志的结论是，肯定蒋无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不能做为其“殉葬”之事。陈毅同志建议，我党应付赫尔利和蒋介石所选的现局的办法是：五个原则，暂作整案，即“五点协议”所包含的内容不拆开提出；同时我不入阁，也不宜急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我党应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二年的时间大发展，“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看了陈毅同志的信，毛主席立即致电恩来同志，指示他坚持五条协定，并说明过早提交复案是不利的，准备七大开过之后再议复案。随后，毛主席又给陈毅同志写了复信，说：“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12月2日，在返回延安之前，恩来同志约见赫尔利，转达毛主席就国民党提出的三点方案的复电：第一，政府方面所提建议三项与我们在延的五条协定距离太远，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不能获得蒋委员长的同意，因此也就无法挽救时局。第二，国民党的态度至今未变，仍宣称中国目前所需要者只是军令统一，至于党派合法问题，须待战后一年再议。第三，根据目前形势，我党中央必须召开会议，我这次回延安后要留下开会，不再随原机返渝。恩来同志讲完后，赫尔利仍不断劝说要我党参加未经彻底改组的国民政府，并说你们“先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进来一只脚”，便能得到美军援助。恩来同志回答说：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要我们参加进去而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们拒绝加入。

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毛主席曾考虑发表五条协定草案，并为此征询赫尔利的意见。赫尔利听说后大为震怒，认为我党故意使其难堪；同时，美方还怀疑我党态度转趋强硬是因为苏联施加了影响。12月12日，毛主席指示当时在重庆的王若飞同志，请他转告美方，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至于赫在五条上签字以及他与毛主席交换的信件，我们自始即无公布之意。我们所想发表的仅是我党向蒋建议的五条，因其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毛主席强调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在获悉毛主席的来电后，包瑞德向我方表示，赫尔利原误以为我已将协定全部发表，现在完全释然了。为消除赫尔利的疑虑，12月15日，毛主席给他去信，说：“11月间，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一切中国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请你转达给罗斯福总统，我对于他的这个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向他致谢。”此后，双方继续就国共谈判问题交换意见。

1945年1月20日，赫尔利致函毛主席，说他深信国民政府已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建议我党再派周恩来同志到重庆谈判。1月24日，恩来同志再次前往重庆谈判。这一次，我党提议首先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尽管我党又一次采取了积极态度，但国民党无意作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任何实质性让步，僵局仍然无法打破。2月初，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在雅尔塔召开，赫尔利急于搞出一点东西。2月10日，他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谎称“谈判已有趋于一致之良好进步”。对于这种掩盖事实的声明，周恩来同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恩来同志说：如果发表声明，就要说明中共的要求和国共双方意见不同之点何在，以明真相。2月13日，周恩来同志与赫尔利一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会谈中傲慢地宣称：他不会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鉴于蒋介石的顽固态度，谈判已无法进行，恩来同志随即返回延安。直到抗战结束，国共双方才又重新恢复了谈判。

1945年初，美国疏远我党的种种迹象已显露出来。1月中旬，在重庆的王若飞同志向党中央报告说：美国各报对重庆的批评突然缓和下来；对我党持友好态度的包瑞德、戴维斯已被调离美军观察组，不再返回延安；同时，美国正增加援华物资，以加速装备重庆军队。当时，有的美国人向我们透露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第一个朋友是重庆，第二个朋友是延安，不能因延安得罪重庆。”赫尔利用软的一手拉拢我们党不成，又反过来使用硬的一手。

出现这些情况之后，毛主席出于全局利益的考虑，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政策，依然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政治方面，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我党对赫尔利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我们虽然对他在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但没有公开批评他，而是继续与他保持联络。在军事方面，我党仍旧执行与美军合作的政策，已开始的合作项目继续进行，其他可能的合作也仍在接洽之中。例如，1944年底，毛主席、朱德、恩来和剑英同志曾与包瑞德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就美军向敌后派遣特种部队以及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美方试探我方可能提供何种支援，并表示最低限度可向我军提供2.5万人的武器装备。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过，当时参加谈判的美方代表和我们都明白，双方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已经很困难了；因为赫尔利一心想拿援助作诱饵，换取我们同意蒋介石的谈判条件，而我党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尽管以后的合作并不顺利，但美军观察组与延安总部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工作关系。直到抗战结束前夕，双方仍有一些关于军事合作问题的磋商。总的来看，这种合作是我们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帮助。据八路军总部的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提供给美军经过整理的情报书面报告有 120 多份；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共 102 人，为此，我方付出牺牲军民 110 余人的代价。

由于情况的变化，我党在与美国保持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警惕。在内部讨论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方案时，恩来同志强调我们的配合必须是有条件的，双方事先要订立协定，美军要为我军提供武器装备，并必须服从中共的政策法令，不得带国民党军队入境建立政权。1 月底，赫尔利在国共谈判中提出，要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恩来同志当即拒绝。毛主席亦指出，这个方案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军队，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2 月初，毛主席又指示恩来同志，今后“史迪威式之指挥全国军队，请勿强调”。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首先，赫尔利扶蒋反共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4 月初，他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武装的政党和军阀”。同时，我解放区发现了大批由美机散发的宣传蒋介石为抗战领袖的传单。6 月，美国又发生“美亚事件案”，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五人以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

面对美国政策的变化，毛主席最初仍采取了留有余地的做法。赫尔利讲话以后，重庆《新华日报》立即发表评论，批评他的讲话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同时，毛主席决定“延安暂取不理的态度”。直到6月底，“美亚事件案”发生之后，《解放日报》才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他。那时，我们批评赫尔利还是与美国政府分开的。7月，毛主席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几篇文章。党中央决定在这个时候严厉抨击赫尔利是为了发动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的错误政策，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我们的目的仍是为了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由于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结束了，国共谈判问题、我党与美国的关系问题都在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说，在我党与美国接近的过程中美方更主动一些，而我党则看到当时美国确有此种需要，因而抓住时机，采取了积极姿态。当时，国际国内都要求中国民主、团结、进步，中美两国面对共同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希望发展与美国的合作，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是很现实的考虑。当然，美国政府的政策到底怎样，我们原先不很清楚，要有一个摸底的过程。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我们那时抱有幻想，受骗上当，这不符合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和我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处置得当。我们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国际影响也扩大了。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党的政策也及时得到调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三

# 党 的 七 大

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七大会期很长,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

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在1930年12月写就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对中共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此后战事连绵;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转移到中央苏区;及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日渐安定。

第二次提出召开七大是抗战开始以后。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发表为召集七大告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这次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这一年4月14日,任弼时同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若干规定。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从这时起,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再一次研究召开七大,是在1941年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这是在刚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会议决定一切准备工作在"五一"前完成,初步议定"五一"开会。会议还决定七大议程只要三个大报告,即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组织报告(周恩来),并相应作三个决议;原定的党章报告并入组织报告,职工报告不单另报告,改为就职工问题作专门讲演;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开始准备报告材料,各种政策条例由政策委员会加快讨论,编集成册,作为大会材料。这次会议还审查了代表情况,重新指定个别代表,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准备工作讨论的较为具体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以后,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未能举行。

又一次讨论召开七大,是在1943年7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上。这时整风运动早已全面展开，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参加七大。这一年的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改定在年底举行，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来延”。随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7月内开预备会，8月内开大会；各种公开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须做到，是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道理是充分的，人家驳不了的；在5月内将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6月上半月写成文字；正式大会前的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大会各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成员。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委员会成员有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来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决定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提上了日程。

## 六届七中全会

5月21日下午2时，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全会前一个小时，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通报了11天前的书记处会议内容，说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七大以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决定七中全会期间设主席团，由书记处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加朱德和周恩来担任，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七大议程，除拟作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与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周恩来）、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任弼时）外，还拟安排关于边区（高岗）、华北（彭德怀）、华中（陈毅）三个地区工作的讲演；七大先开预备会，后开正式会（准备对外界公开报道）。在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又讲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作了简单的中央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说：从六大到现在16年，要作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很难。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报告，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过去中央的工作，到会的同志都是知道的。现在即使要作工作报告也不能发表，准备将过去的中央工作放在历史总结中讲。

毛主席在报告中，主要回顾了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国土的情况下，中共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他说，抗战以来都是实行这个方针，方法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在大部分时间，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个别时期对如何发展自己，团结友军曾经也发生过争论，关键是要不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到六中全会，这个问题解决了。抗战以来，“发展自己”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0年，是发展游击战争，采用“麻雀满天飞”的办法到处发展。第二阶段，1941—1942年，日本主力对我，我根据地与军队缩小，一面坚持反扫荡、反蚕食，一面注意了许多政策，十大政策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1943年以来到现在一年半，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得到了发展；开展整风，搞透思想，团结了全党，高级干部学习路线的方法是有效的；注意经济工作，陕甘宁边区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

在报告中,毛主席还谈到关于七大议程准备的一些变化情况。他说,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曾指定了一个准备委员会,并安排了一些议事日程。在六中全会上对"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些改变,即将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不要另外的工作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到1940年,又根据季米特洛夫同志意见,决定恩来同志作组织报告,最近又改为少奇同志作组织报告。过去的准备委员会亦未做工作,这工作是由中央自己做的。目前各个报告准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即将开始工作。

6月5日,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工作问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应否把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全会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彭真、朱瑞、洛甫、朱德等先后发言。毛主席首先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城市工作问题是从国民党战场,尤其在河南汤恩伯不战而溃的情况引起来的。要靠国民党来收复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这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意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家,取得政权)。要有夺取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军事上有近百万军队和根据地,将来还可以大发展。列宁在准备暴动时还没有现在我们这样大的力量。政治口号,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们进了城还是讲团结。你要来打,就自卫回击。不管将来情况怎样,我们都要夺取大城市。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现在应该提出这个任务，下决心加强城市工作。毛主席提出这个方针是我们党的一件大事。现在要立即发出指示进行布置，不一定要等待七大来讨论。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主要讲了策略问题，指出争取伪军也是城市工作的一个内容，可以利用伪军起义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主要是里应外合，而不是以前欧洲式的单独的城市暴动。在宣传上，要强调民族的口号与人民的口号。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洛甫同志强调，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七大战略计划，就是夺取城市，提高我们的自主性。朱老总认为，城市工作的主要方针是抓住民族解放的旗帜，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组织群众，过去许多人怕“暴动”这个词，现在我们可用“起义”、“光复”等名词。最后，毛主席总结说：现在提出城市工作问题恰是时机。国内国际的舆论都对我们有利。从现在起，在思想上、物质上都要积蓄力量，有所准备。在根据地主要是巩固、练兵整训和生产；大后方要有所发展；对外交工作要加强；我们要处处有理，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用人民的口号，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央指示；决定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少奇、陈云同志等 14 人，以彭真同志为主任；并建议七大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这以后，国内外形势在进一步发生变化。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延安，我党与美国方面建立了直接沟通的渠道。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湘桂战役，国民党军继续溃败。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社会舆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9 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这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仅成为重庆国共谈判和在延安同赫尔利谈判的中心议题，也为起草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主题。但是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在11月至12月间，六届七中全会及其主席团多次举行会议，准备组织解放区联合会，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并且成立了由党内的恩来同志、林老等14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先生等19人共同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映，毛主席会见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时还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想法。后来，中央全会反复讨论，还是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明确肯定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即将召开的七大也要取这种态度。在1945年2月3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肯定了提出联合政府的意义。他说：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否错了？不提，别人将提，我们反而被动。提了，蒋介石至多不理我们，我们反而主动。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蒋介石的政府，我为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实行联合政府的原则，抗战期内搞联合政府。这样，尽管在重庆的国共双方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但我党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坚决了。

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主席对《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作了说明。他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这是与蒋介石有根本区别的。在报告中对国民党蒋介石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还是批评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指出希望，虽然只是一分，这一分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犯错误。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都采取联合态度，但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显示区别，各有批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中间派是有前途的，他们的壮大是对我们无害的，他们可以听我们的话，但他们是动摇的，要坚决领导。现在国际国内的人心向我，连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在报告中我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毛主席在说明中还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在报告中对孙中山是否讲得太多？毛主席说：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的东西。他的遗嘱，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做自己的旗子，我们就拿孙中山做旗子。而且我们与孙中山还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一道开过会。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现在不同了。党内厌恶孙中山的情绪相当广大，应该说服。二是共产主义要不要讲？毛主席说：在报告中，共产主义，我括去一次，又恢复了。不讲不好。对党名，党外许多人都主张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姿势搞坏了。所以这里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但提过了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里着重区别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与党内是很广大的。这次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这里也说明了有三种成分。国有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好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得，富农存在得更久。这些都比《新民主主义论》有发展。三是关于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毛主席说：这个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在讨论中，与会同志都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和说明意见，并对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董老说：我们提的纲领这样完善，蒋介石他们再提也很难超出我们的范围。吴老还认为，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可比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成熟了，党外的人都同意我们联合政府的主张，要集中全党精神，团结全党力量来实现党的纲领，迎接新的胜利。毛主席在总结中又对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作了分析。还在2月18日中央全会讨论恩来同志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两党谈判的报告时，毛主席就曾经讲过联合政府的几种可能性：以蒋介石为主，希腊式；以我们为主，波兰式；还有第三种可能，即蒋与我们合作的政府，这要看政府设在什么地方，若设在重庆蒋介石的刀尖上则本质上仍是蒋介石的，独裁加若干民主，这样的政府我们也要，因为可以宣传，可以做工作，但不要幻想。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这样，他们的文章就不好做，我们的文章就好做。这次，毛主席又讲了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他说：第一种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即要我们交军队而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官做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做，也不要就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宣传。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1亿5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对这个方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毛主席所准备在七次大会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方针”。

这次全会还讨论了党章报告，少奇同志在会上对党章报告作了说明。他说：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少奇同志说他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在讨论中，对“任何”二字是否要写有不同意见。恩来同志以亲身经历表示，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要好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主席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因此，最后决定“任何”二字还是保留。弼时同志将此议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刘少奇同志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军事报告、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的议事日程等问题。朱老总就军事报告作了说明。他说：这个报告写了两次。第一次写的报告是准备大会不公开时对内讲的。后来改为对外兼对内。因为时间匆促，大家没有充分讨论。昨晚谈了一下，认为报告主要缺点是对内意义不足，战争关节说得不清楚。现在请大家提出意见，以便基本上通过后再修改，好在大会上讲。毛主席提议，赞成就基本内容通过。基本内容就是人民战争与打败日本侵略者。文字上在讲话以前与发表以前再加修改。这样，“全体一致通过朱德同志拟向七次大会所作军事报告的基本内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前节已作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对七大各项议程，均已按主席团提出的意见一致通过。这样，六届七中全会胜利地完成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几经延期并为全党关注的七大就要召开了。

## 七大预备会议

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大会代表，无论正式的，候补的，除有病、有事请假者外均出席了会议。大家把参加七大看做是非常崇高的荣誉。七大代表总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共分中直（包括军直系统）、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除中直代表团外，其他是以地区为单位划分的。各个根据地有6个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是指蒋管区和沦陷区的，包括两广、两湖（云、贵在内）、闽粤边、江西和四川等地。恩来、剑英同志都参加这个代表团。各个代表团又根据人数不等分成若干小组。如中直代表团分杨家岭一组、杨家岭二组、党校组、王家坪组、枣园组和解放社组。

在预备会议上，弼时同志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一百二十万，党领导的军队近一百万，解放区人口近一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非常伟大的。弼时同志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毛主席的这番话,赢得了全会的热烈鼓掌。

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这就是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以彭真为主任的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七大会场规则。七大议程确定为: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 七大第一阶段议程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弼时同志首先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七大开幕,并发表了简短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演说。毛主席致开幕词，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他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主席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肯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预祝七大成功。此外，彭真还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胡乔木担任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的记录。

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书面报告的内容很丰富。现在读起来，仍能被其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严谨的逻辑和高屋建瓴的气势所吸引。报告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比如说，关于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思想很好，把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说清楚了，并且讲得很尖锐，值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深思。又比如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问题。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所谓"私人经营",即是允许自由发展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主席解释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由此,毛主席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一段论述:"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既属于根本原理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再比如说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思想。毛主席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能否做到这些,至今仍是我们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经毛主席本人作了修订。这里要指出的是,毛主席的修订主要是文字性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就内容言,除在国家、政权、军队等问题上有一些段落的删节外,有关国际形势与涉外关系部分删节得更多些。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这样一段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删去这段话,与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有关。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的思路是很开阔的,思想是很开放的。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有意义。

毛主席在4月24日的大会上主要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这个报告在档案文献里也叫"政治报告"。它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主席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同时,毛主席也讲了另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主席讲了11条。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毛主席这样反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党内存在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妨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实施。在我们这个党里，这样的思想是会经常冒出来的，需要不断地警惕。毛主席这里讲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党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另一条是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主席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就是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如果'八大'还要在延安开会，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主席当时讲这番话，似乎是随便说的，其实是很认真的。因为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七中全会上中央一直在分析。日本人战败投降已成定局，国民党腐败无能有目共睹，中国的天下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人心所向。中央早已作了加强城市工作的安排。因此，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第三，关于党内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主席讲的方面很多。他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主席从哲学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毛主席还谈到干部问题。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毛主席还十分重视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的团结，走向胜利。最后，毛主席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了教育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毛主席再次提议读五本马列著作。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主席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很丰富，虽然没有发表，但是这个报告的精神和许多思想在党内传达了，使全党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4月25日，朱德同志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被找去写了个初稿提纲，并写过部分初稿。这个报告最早是准备讲讲建军的几个问题，其中第六个问题是拟为“论毛泽东军事学派”，写了数千字。报告初稿阐述了毛泽东军事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理论上同古代的孙吴兵学、近代取法西欧的中国的军事学派，以及同苏联革命军事学派之间的区别；并分析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特点，毛泽东军事学派基本理论、战略战术和革命本质及研究方法等等。但是后来没有被采用。因为“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不如“毛泽东军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思想”覆盖面广。

毛主席和朱老总报告后，大会进行讨论。4月27日，毛主席和朱老总都出席了在枣园召开的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两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原拟七大的会议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会议议程不断改变。原定大会发言人数也不很多，后来也突破了。从4月30日始，在继续讨论政治、军事报告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到5月11日，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洛甫、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质忠、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和李富春同志。在刘少奇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5月14日、15日）后，从5月21日至23日，继续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林彪、马凤舞、刘澜波、张鼎丞、傅钟和叶剑英。大会发言一共进行了10次，有26人讲了话。除两位外国党代表的发言外，其他发言主要是报告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过去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情况作了检讨。这些发言都贯穿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尽管各组讨论对一些同志的发言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总的说这些发言普遍地受到大会欢迎。

少奇同志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大会的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两天。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 七大第二阶段议程

大会在听取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即进入第二阶段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程，一方面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方面也是主要的，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选举标准是什么？犯过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各个方面包括“山头”要不要照顾？是不是主要看能力强，有各方面知识和经验的同志才能选？等等。对许多问题，人们不甚清楚。大会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40、50还是70？）与提名方式（由主席团提，各代表团提，还是由各代表团的小组会提？）进行过讨论，曾决定由弼时、少奇、恩来、彭真、富春5位同志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与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在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联席会议请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一讲。

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由毛主席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回顾六大选举以来的历史教训，摆了许多情况，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回答代表们提出的疑问。首先，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主席说：犯过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这10年，中央的主要成分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在25个中央委员里头，六大选的现在只剩下4个。但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我们和这些同事一道共事，没有犯大的错误，工作还算有进步。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的身上，其实，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负有很重要责任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不仅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毛主席说：这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三，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毛主席说：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的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毛主席还解释了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所谓庞杂问题、落伍问题和不公平的问题。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他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定的人数。有大、中、小三个方案。大的100人左右，中的70人左右，小的30人左右，在这三个方案中间，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比较好。七大应当选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25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状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毛主席的报告把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讲透了，大家拥护毛主席代表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

5月2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提出94人的预选名单，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会议还研究了军事报告和政治报告的总结问题。刘伯承同志提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问题应着重讲，这是正本清源。在他看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武装与人民结合的问题，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思想。二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5月30日，朱德同志向大会作军事问题的结论报告。他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他在前几天的联席会议上谈过，大家赞同他的基本观点。在大会上的报告，他对这些问题讲得更充分。他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全部系统是和国民党完全对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军队的产生、发展、壮大也要依靠农村，依靠根据地。军队来自人民，取自人民，既靠人民打仗，也靠人民养活。因此，军队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军民关系。人民军队的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它的战略战术特点，多半采取游击战、袭击战、运动战或者大规模的运动战。毛主席的这些思想在井冈山是萌芽时代，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初步发展，到现在完全形成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军事思想的整个系统。朱老总的这个报告是对他前次报告的补充。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5月31日，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这是他在七大的第6个报告（包括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在内）。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着重讲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国际形势问题。毛主席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英、美联合一切反动力量反对苏联，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降，但不是讲英、美资本主义明天就要死。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部分资本主义还是有用处的，落后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关于国内形势问题。毛主席讲，我们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三万份，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消灭我们。但是很多人说，共产党有办法，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到光明，但是要准备困难。于是，毛主席论列了七大以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如英美大骂；国内大骂；根据地丢失几大块；损失若干万军队；内战全面爆发；跑掉若干万共产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困难；国民党实行暗杀政策；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外国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等等。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包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的方针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可能暂时吃亏，但终究我们要胜利。第三，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主席共讲了领导、方法、民主集中制、干部关系、准备转变、理论等十三个问题。讲到领导和准备转变问题时，毛主席强调了预见的作用，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既要预见前途，也要预见偏向，要去掉盲目性。东北四省是极其重要的区域，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工厂，大城市，如果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四省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但大会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不能解决，对于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二十五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过二十五年不解决，就要灭亡。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这些东西，还能活下去。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把转变问题，把掌握工业问题的认识提得这么高，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使代表们的思想再一次豁然开朗。毛主席对党性与个性问题作了进一步发挥，说：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不仅承认个性，独立性，人格，自由，而且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还大大地发展了这些。《共产党宣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每个党员没有个性，而我们党有党性。不能把党员变成纸糊的人，没有一点个性、独立性。只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在这个大框子里尽量使大家能发挥能力，发展各人的长处。毛主席还说，个性有两种，有创造性的个性，有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党性完全不矛盾，是统一的。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要创造性的个性，不要破坏性的个性。毛主席的讲话再次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呼。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三个报告的总结作完后，大会剩下的惟一任务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6月2日，七大主席团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继续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各代表团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党史上空前的民主，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情况汇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后，毛主席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有的同志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述。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大会休会几天后，6月9日开始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这天选举正式中委。6月10日宣布正式中委选举结果。毛泽东、朱德等44人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接着酝酿候补中委的选举。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他讲了这样几点意见：(一)关于候补中委的作用。他说：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主席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毛主席说：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在这里，毛主席进一步强调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了东北问题的作用，这说明毛主席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毛主席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举行闭幕式。首先，大会宣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会议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闭幕会上，朱德、吴玉章和徐特立同志发表演讲后，由毛主席致闭幕词。它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主席对这次会议评价非常高，认为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达到了预期目的。谈到选举时，他说：这次选举，大家非常慎重，考虑分析，调查研究，比我们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的选举都民主些，但也很集中。整个大会可以这样说：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相配合的模范。这种制度，这种方式，全党都应采用。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毛主席也作了些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可以经过从小半个中国（即目前有一亿人口、一百万军队和许多块解放区的状况），到大半个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华北、东北等解放区联成一片，打下若干大城市），到整个中国（人民最后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一是长期的；二是可能和平转变；和平的与浴血的两种可能都有，但和平转变的可能性大；三是由人民来决定何时转变。毛主席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坚决执行大会的路线。

开了50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开得长了些，但由于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会议的气氛始终是热烈的，代表们的情绪始终是高涨的。当时国民党正在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我党七大形成对台戏。根据毛主席的意思，胡乔木对国民党六大文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作了些研究，为《解放日报》写了篇题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的社论。这篇评论的最后结论是："每一个客观地比较过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共产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一贯的，它从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出发，它不说中国人民在现在条件下不能做、不必做以及不准备做的事，它所提出的任务坦白、确定，而且有切实可靠的行动基础。相反地，国民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矛盾的，反动的和表面'漂亮'实质反动的东西支配着并取消着'漂亮'的东西；它没有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因而它所规定的工作，如果不是不应做的，就是不能做的，或者虽然应做能做，但是不准许有实行的前提；因而它的措辞也就既武断，又暧昧"，"只能乞灵于两面三刀的官样文章与阴谋词令。"当时的这篇评论对国民党六大采取了非常"客气"的态度。历史为这两个大会做了结论，对国民党六大是报之以无情的否定。

## 七届一中全会

七大以后，大多数代表陆续离开延安回到原来的地区和部门去了。6月15日，七大主席团举行会议，七大各代表团主任列席会议，讨论七届一中全会议程，酝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人选。6月19日，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正式中委27人，候补中委17人。曹瑛同志和胡乔木仍作会议记录。全会由弼时同志主持，报告了主席团会议的酝酿情况。最后全体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还选举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正、副秘书长。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次会议上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本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曾决定不再成立解放区联合会一类组织，但由于国民党不赞同组成联合政府，并宣布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在七大期间党中央决定，也唱一出对台戏，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说：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蒋介石过去每当摇摇欲坠之时，就说要召开国民大会，以欺骗人民，但说了就放下了。这次蒋介石一定要开，我们决定不参加，把难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中间派劝我们不参加。蒋介石一定要开，就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即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以前没有这样一个斗争形式，现在找到了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反日、反反动派的斗争形式。

50天后，即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除通过前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主要讨论了时局问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议，宣布对日作战。这次会议就是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位同志作了发言。毛主席作了两次讲话。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引者注）。目前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关于配合作战，毛主席说：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这不会犯冒险主义。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关于制止内战，毛主席说：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大块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个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关于集中统一，毛主席说：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比如中等城市的问题归各解放区管，大城市问题则归中央管。关于国共谈判，毛主席说：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依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党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而增加。

抗战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七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许多干部纷纷要求到前方去，各根据地干部一批一批地离去。许多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当时也动了心。但毛主席说，后方总是要留人的，不能都到前方去，要提倡不动心。大家听从组织安排。随着日本军队的投降和抗日战争的迅速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开始为新的任务运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四

# 重　庆　谈　判

## 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估计

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战局进展得非常迅速。在七大开会过程中，1945年5月8日，希特勒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估计，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才会投降。但七大闭幕后一个半月，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这就大大加速了对日作战最后胜利的到来。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终结束了。尽管我党在七大时已作了迎接最后胜利的部署，但胜利这么快就到来了，还是使我们感到很突然。

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会谈，共商国是。16日，毛主席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20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主席赴渝。22日，毛主席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恩来同志赴渝。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24日，毛主席回电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从这几封往来电中可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看得很清楚，几天之内，我们党对与国民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就是从准备观察一时到决定毛主席立即亲赴重庆。

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是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呢？不是的。事实上，党中央、毛主席对两党领袖的会谈早就有所考虑。这样讲有两个理由：第一，正如本书前面所提过的，早在1942年下半年，毛主席就认真考虑过与蒋介石会面，以解决战后的国共关系；1944年冬季，赫尔利来延安会谈时也提出了毛主席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毛主席再次表示他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蒋介石会面。但由于蒋介石一心拖延，无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抗战期间，两党领袖会谈的事情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第二，战后初期，我们党执行的方针政策是经“七大”确定下来的，而七大方针主要是为着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前途而制定的。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仍然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我党取得妥协；中国因此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就得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两党领袖举行会谈是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当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出，我党即开始考虑恢复国共谈判的问题。8月11日，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其中提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现在，人们不大了解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最初估计，原因是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后编辑《毛选》时，把七大期间有关英美苏三大国团结的内容全部删掉了。

既然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此早有考虑，那么我们党在蒋介石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电相邀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同意呢？这是因为抗战结束阶段的形势很复杂，与我们党在七大时预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中央需要一段时间判明情况，以做出正确的抉择。特别是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很可能在抗战结束后立即发动反共内战；对此，我们不能不严阵以待。

抗战结束前后，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有一个变化过程。6月上旬，我党七大即将闭幕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根据这种新动向，毛主席告诫说：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抗战中国民党依靠美国，战后中国可能变为以美为主，英国插一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他提出，战后可能发生类似英国武装干涉希腊革命那样的美国干涉中国的事件，全党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以便应付最坏的局面。毛主席当时估计，抗战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党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战后制止国民党反动内战并迫使美国改变政策。但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我党的力量没有来得及得到预期的发展。抗战进入尾声时，国共关系更紧张了。7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对我陕甘宁边区爷台山发动进攻。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敌伪向我军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说这是“非法之行动”。11日，蒋介石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二是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些都是蒋介石决心争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和积极准备内战的迹象。因此，毛主席一度认为，内战危机十分严重。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同日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这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和《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两篇文章。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针，他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然而，日本投降后，经过一周时间的观察分析，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美国也还不愿中国发生内战，我党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于是，毛主席和政治局书记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快决定以审慎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

## 谈判前夕的决策

8月23日下午，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大约五十人左右。由胡乔木和石磊同志做记录。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候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接着，毛主席全面分析了抗战结束后的形势和我党准备采取的对策。

毛主席说，我们曾经估计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但没有成功。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外援。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另一条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此外，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做好。由于这几点，我们力争的那批果实就没有得到。我们只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没有得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关于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毛主席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了，由于英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是否还是半殖民地值得考虑，这就使民主民生的问题突出出来。我们的情况：有利的方面是，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蒋介石无法封锁，我们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沿有合法地位。

关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影响。毛主席说，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中苏条约是日本投降后签字的，内容还未发表，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冀察是临时性质。战争这样快就结束，使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主席说，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再加上伪军共280万，无论如何弱于日本人加伪军，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团结、民主”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毛主席还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他这个暂时的和平。

关于我党在谈判中所提的条件。毛主席拿出恩来同志草拟的《目前的紧急要求》，请大家讨论通过。这些要求最初是十二条，毛主席补充了两条，成为十四条，后经博古同志提议，又将十四条归纳为六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这六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国民大会。毛主席说，最现实的要力争的是第一条，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这一条，双方的争论一定非常激烈，可能要打打停停。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十二个师，就是为了等到得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拖不下去了。

关于谈判期间的宣传、军事和解放区工作。毛主席说，对国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的批评，本来决定要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士气松下来就谈不好。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毛主席还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作与军队工作是和平时期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后要认真的下全力做，过去没有做好，而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关于我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毛主席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不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从外国得不到帮助，军队可能由谈判缩小，内部出现不一致等等。决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最后，毛主席说：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以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平、民主、团结的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去了请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毛主席讲完后，有十来位同志发言。恩来同志说，我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关于谈判问题，他说，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苏联今天不直接援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实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但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情况如何再决定。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发言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一致同意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赞同我党在战后必须实行力争和平的方针，认为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苏军不进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许多同志表示，对于在新形势下发展我党力量具有信心。闻天同志说，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的方针，我们在这个时期是赚了钱还是折了本呢？我说是赚了很多钱。这样大的胜利就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得正确。有些同志所以失望，是由于希望高于实际，而事实上是我们得到很大胜利。这一点应该在同志们中间解释，应该更高兴。新阶段的战略是巩固我们已得到的胜利，并且还得从国民党处要点民主。这不是革命低潮，而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要在这种特殊情况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力量。

关于毛主席是否必须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多数同志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担心，认为毛主席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两位老总支持毛主席出去；不过，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朱德同志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同志说，毛主席是否出去的问题，我想出去危险性不大。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会议最后由毛主席做总结。他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也就是抗日时期方针的继续。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必须的。进攻还是退却？当然，主要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进攻，在合法工作中进攻，但会有部分退却。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占了又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与北伐、内战、抗日时期均不同。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做这许多工作才有能力搞大城市、搞全国。毛主席还说，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最后，毛主席说，我是否出去？我们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故回赫尔利电为先派恩来出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和他们出去这个姿态好些。

23日下午的会议把毛主席将亲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决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没有确定。实际上,在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已经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下了要去的决心。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重大,需要党中央集体作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先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风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做好准备。

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的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搞不太清楚。关于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同志在他最近撰写的回忆录中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据他说,斯大林的来电有两封。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份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主席当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打来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等等。

有一种看法认为，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来了电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切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主席从来是根据我们党的利益、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做出决断的。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

就在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当天，蒋介石发出第三封邀请电，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通过美军观察组转来一封邀请电。当天，毛主席便起草了复魏德迈电，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先派周恩来赴渝接洽。24日，毛主席又发出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25日，魏德迈再次致电毛主席。在当天的回电中，毛主席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鉴于局势的迅速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同志与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同志一起，经过一夜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作出了同意毛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一起动身，立即前往重庆的决定。

26日，在枣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了这一决定。毛主席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本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资本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就需要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有些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针对党内许多同志的担心,毛主席说,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将来,中外的注意力集中于上海、南京,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情。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工作,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才能保住。为了巩固我们党的地位,毛主席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安排,决定把我党的力量集中在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内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最后,毛主席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这个文件概括了毛主席在两次政治局会议讲话的主要精神。《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预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并说明"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飞抵延安。28日清晨,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由他们陪同乘机前往重庆。随行人员在飞行途中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主席说:"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毛主席所谓的"不了之局"就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毛主席一开始就下了两个决心：达成协议，照协定办就停战，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

下午3时，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毛主席在机场只发表了极为简短的谈话。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宴会。从8月29日开始，毛主席和代表团就投入了紧张的谈判工作。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毛主席决定亲自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成为众望所归。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毛主席不去，人民群众不了解情况，国民党就会把不要和平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仅去了，而且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就振奋了国统区民主力量的精神，争取了人心。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一着，毛主席下了非常高明的一着棋。

## 艰难的谈判

这次谈判从开始至最后达成协议历时43天，经过三个阶段：从8月29日至9月3日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从9月4日至9月21日为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的阶段；以后，谈判停顿5天，从9月27日至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在渝期间，毛主席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对于这次谈判，我们党做了充分准备。8月30日，毛主席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告延安，恩来同志将向国方提出我党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内容是：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部队参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事，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军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11)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取消特务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十一点意见，既包括我党主张的原则立场和我党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我党为力争和平、民主向国民党所作的重要政治让步和我党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办法。这些意见对整个谈判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从这十一点中可以看出，我党对国民党所作的让步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我党承认了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同时，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上，我们的开价是比较高的。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人民在抗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有利于以后的谈判斗争，因为双方总还要讨价还价。事实上，我党提出的这个较高条件也并没有脱离现实，它是依据抗战结束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所处的态势提出的。

9月2日上午，毛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就谈判将涉及的八个问题表示了原则意见，实际是把我党提案的关键之处，预先向国方作了通报和强调。这八个问题是：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9月3日，恩来同志将稍作修改后的十一点意见作为我党提案正式向国方代表提出。

蒋介石再三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准备认真谈判。在毛主席抵渝当天，蒋介石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谈判方针。他确定的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

9月2日晚，蒋介石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宴会后，蒋介石与毛主席单独谈话。在毛主席抵渝后，蒋介石曾说："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我党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开出了他的价码。关于军队问题，蒋介石说，中共部队整编为十二个师是中央政府所能允许的最高限度；至于改编后的驻地，可由中共提出建议，经讨论后决定。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说，要求承认所谓的“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可酌予留任，省行政人员甚至省主席中央也可能邀中共人士参加。关于政治问题，蒋介石说：他拟改组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其成员由各党选举其人员参加组成，但中央政府的组织与人事暂不变动；国民大会旧代表仍应有效，等到国大召开，新政府产生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可参加政府。作为一种姿态，蒋介石表示，如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中央政府，可予以考虑；如中共要求增加在国民大会的代表，也可以酌量增加名额。简而言之，蒋介石的算盘是，按照他的条件，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实现他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

蒋介石开价之低并非出人意料，我党领导同志早就做出这样的估计。由于南方局出色的情报工作，我党还很快摸到了国民党的底牌。毛主席和恩来同志不仅了解蒋介石确定的谈判方针，而且获悉国民党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至十六个师，所谓允许中共参加政府是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省主席之说是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大会则要保证国民党代表占十分之七以上。对于我们党的方针和目的，国民党也有相当了解。从台湾方面现在公布的一些材料来看，他们那时知道我党希望通过谈判避免内战，也知道我们的要求首先是要让他们承认现状。重庆谈判对国共双方都可以说是一场知己知彼的政治较量；正因为如此，斗争格外艰巨。

经过几天的一般性交换意见，从9月4日起，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两党代表开始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至22日，共举行了八轮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准备，双方所持立场又距离很大，谈判时断时续，形势复杂微妙。

简要地说，在第二阶段会谈开始时，双方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关于总的原则，也就是和平、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我党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国民党则提出“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其实质就是蒋介石所说的“统一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第二，军队问题，我党要求中共部队整编为四十八个师，分期实施；国民党只允许中共部队编为十二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第三，我党要求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四，国民大会问题。我党提出，国大代表为抗战前选出，任期仅六年，现已失去代表资格，应当重选；国民党则坚持认为旧代表资格仍旧有效。在这四个问题中，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事实上，对我方提出的十一点意见，国方在答复中仅对“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一点表示满意，说了些“承明白表示，不胜赞佩”之类的客套话；其余十项，国方代表或提出附加条件或认为根本无从讨论。

经过五轮会谈，双方除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立场比较接近外，其他问题几乎一无进展。国方代表翻来覆去地强调，必须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要我党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始有保障”的观念。我方代表则据理驳斥，恩来和若飞同志一再向国方代表指出：(一)中共已做出重大让步，国民党的前途已获保障；(二)国民党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共，观念是自大的，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的军队、解放区及其经普选产生的人民政权；(三)解决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过程。

9月15日，双方举行第六轮会谈。从这一轮开始，谈判气氛明显地恶化了。由于国民党拿不出任何办法，只是一味拒绝我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建议，张群不得不尴尬地承认：中共提出的办法事先经过党内决议并经公布，而国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甚至连蒋介石的主张也未经党与政府讨论。尽管如此，张群强词夺理地说，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太远，无法再谈；而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和赫尔利大使共进午餐，并一起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谈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反复考虑，决定根据我党预先拟定的方案率先作出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9月19日，在第七轮会谈上，恩来同志通知国方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依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同时，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21日，双方举行第八轮会谈时，国方代表对恩来同志前日所提让步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五个军十六个师。同时，国方代表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提出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项建议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我党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我方当然不能同意。在这两轮谈判中，尽管我方和国方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做了让步，但这些让步都不足以打破僵局。

21日，在国共谈判的关键时刻，赫尔利从上海、南京视察后返回重庆。由于他第二天将返回美国述职，所以急于见到国共谈判达成某种结果。为此，他先与蒋介石会谈；随后，又约见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在会谈中，赫尔利向我方施加了很大压力。他对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说，中共军队的数目蒋委员长可同意增至二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编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北方五省主席和两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这实际是想以再增加四个师的数额来换取我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在赫尔利回渝之前，国共双方已考虑在军队数目达成协议之后就发表会谈公报；但这时赫尔利却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公报。他还说，无论谈判是否成功和无论发不发公报，毛主席随时可以回延安。赫尔利说完就要求周恩来、王若飞同志马上请示毛主席，做最后决定。这时，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我方答复。情况十分紧张。接到恩来同志的报告后，毛主席当即表示，因赫尔利明日要回美国，他将亲自面见大使，说明情况。在随后的会面中，毛主席告诉赫尔利：我党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毛主席还说，我党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部分编为二十个师的提议，但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此后，谈判停顿了五天。对赫尔利的卑劣作法，毛主席是很愤怒的。回到延安后，他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不过，在当时那种场合，毛主席坚持以大局为重，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另一方面又以委婉忍耐的态度尽量解释，不使谈判破裂。

21日前后的几天，是谈判期间最紧张的几天，因为当时看起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我方的担心不仅由于谈判出现紧张局面，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抗战结束后，美国就以接收为名帮助蒋介石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并派美军驻守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陈诚的部下当时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另一个是我党情报机构获悉，国民党中统局某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表面是因蒋总统常有国事咨询，实际是因为毛、周在中共位居头两席，把他们扣留在重庆可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军总攻。根据这些动向分析，蒋介石等待华北受降结束，军队调遣完毕，即发动"剿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党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25日，恩来同志向延安电告了谈判中出现的紧张局面。少奇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第二天，延安的电报来了。政治局的同志们认为，必须加紧执行我党原订计划，再无谈判必要，建议毛主席回来。由于前一段谈判不顺利，毛主席也曾考虑过返回延安的问题，但这时他决心继续留在重庆。毛主席认为，目前的斗争既不能作原则退让，也不能使谈判破裂，而是要利用蒋介石的高压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的同情。为向国民党的高压发起反击，我党代表团积极活动，恩来同志几天内接见了文化、产业、新闻、妇女等各团体和各党派人士，揭穿了国民党宣传部门制造的谈判十分融洽的谎言。当各方人士了解到真相后，纷纷指责国民党，为我党鸣不平，认为我方已仁至义尽；有些民主人士还提议，立即召开政治会议，结束党治，让各党派参加谈判，组织联合政府等。与此同时，重庆代表团还要求延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消灭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以支援谈判，让蒋介石知难而退。

事实上，谈判停顿三天后形势即出现转机。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宴会上，张群主动向我方表示要继续谈判。他说，军队问题基本有了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与解放区问题。从现已公布的各方材料分析，当时的情况恐怕是我们紧张，国方也紧张。一方面，他们冷淡我们，向我方施加最后压力，想要我党再让一步；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谈判结果只能大体如此，继续施压有可能迫使我们关闭谈判之门而适得其反。我方担心达不成协议，国方也担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心，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9月27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将我方在谈判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情况电告延安。

## “双十协定”

从9月27日至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又举行了四次会谈，重点讨论了军队整编问题、解放区问题和政治会议问题。最后一段谈判，我们理直气壮，他们完全被动。鉴于谈判已取得进展，恩来同志于10月2日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就其中的重要问题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方代表表示同意。10月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时，恩来同志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交给国方。在谈判告一段落之后，10月8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一起商讨了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文本。

这份《会谈纪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党谈判的结果，内容共十二条；其显著特点是既记载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十二条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有必要作些分析和补充说明。

《会谈纪要》中，双方明确达成一致的有三条：第一条，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其内容是“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共两党就建国基本方针达成一致很重要，它是双方作了较大妥协的结果。这一条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是条文回避了先前关于“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谁先谁后的争论，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将四点并列作为两党合作的共同基础；二是条文比较具体，这是国方的要求，而我方原希望简练笼统一些。

第二条，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主要是确定了“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决定首先“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重大突破，这一条对此后政局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四条，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内容是“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这一条在会谈一开始时即由张群提出，毛主席表示赞同，谈判期间未发生争论。

双方意见十分接近的是第五条，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其内容为：“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在党派平等合法问题上双方的不同表述，实际反映出谈判期间的一个争论，即：我党代表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给予各抗日党派合法与平等地位；而国民党代表则强调“平等非均等”，以确保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此外，国方的表述中还含有党派合法为“宪政常轨”，而非“训政”时所必须的意思。

双方还就两个问题表示了相同意见：第六条，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第八条，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不过，这两条并未指明何时开始执行，因此很难被看作是明确的协议。

从整体上看，国共双方达成一致、意向相同或十分接近的共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六条。这六条实际在第二阶段谈判结束时就已基本达成协议。双方分歧甚大但仍有部分协议或完全没有协议的也有六条。这六条的情况如下：

第三条，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我方原提出三项主张，即：重选国大代表，延缓国大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大已选出的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增加。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我方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最后，双方表示："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第九条，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表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可将江南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逐步撤退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具体计划有关军队整编的各项问题。这一条是要害问题。从条款中可看出，双方虽基本接受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额，但各自提出了履行的前提条件，实际都作出了极大保留。

第十条，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我党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这一条虽然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详细记载了我方先后提出的四个解决办法，即：(一)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二)在现存有解放区的各省区内，按实际控制情况，分别任命中共推选的人员担任省府主席、副主席、特别市副市长及委员等职；(三)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之省区县三级政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律呈请中央加委;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省区加委方式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四)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或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最后,双方表示愿就此继续商谈。需补充的一个情况是,在最后一轮会谈中,张治中提过一个"折中方案",即: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联成一片的可设立"行政专员区"。周恩来同志答复说,在苏北、皖北等地可以用此办法解决问题,至于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之下则不可用此方法。这表明经过谈判,国方立场稍有松动,双方关于解放区问题的斗争最后集中在省一级权力机构上。需说明的一点是,解放区问题始终是谈判的症结所在,谈判最后无结果,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它使蒋介石想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特别是想取消解放区,实现其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意图完全破产了。

此外,第七条,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我方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国方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第十一条,关于奸伪问题,我方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国方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第十二条,关于受降问题,我方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国方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这三条双方各自陈述己方意见,表面看来分歧不很尖锐,但要达成协议仍十分困难。

在谈判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发表公报比较积极。两党代表讨论通过《会谈纪要》之后,张治中对毛主席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不过,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据说国民党中常会当日进行讨论,多数人反对,经邵力子说是总裁倡导的才得到通过。《会谈纪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全称原拟为“政府和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最后把“国民党代表”几个字也删掉了。

8日晚上，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晚会的气氛还不错，张治中发表了一篇热情友好的讲话，毛主席也作了即席讲演。毛主席说：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正在继续商量解决，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毛主席的这番讲话不仅是一个姿态，实际也是我党当时的愿望。晚会中间，传来八路军办事处李少石同志乘恩来同志轿车外出办事，不幸遇难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的人当时都非常紧张，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幸好很快查明这不是一起政治事件，而是如事后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因而没有影响到《会谈纪要》的签署。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保护是很周到的。李少石案发生，他们一晚睡不着，动员军警宪连夜破案。群众愤怒，外国人要发电报，可见他们的威信是很低的。”

## 谈判期间的统战、外交与军事工作

在渝期间，除参加和指导谈判之外，毛主席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特别是在统战方面和军事方面。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斗争中，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来到国统区的心脏，使我党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个新发展。在重庆，毛主席广泛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包括各党派、各界、各阶层。短短四十几天，与毛主席会面谈话的仅知名人士就不下几十个，政治上左、中、右都有。这里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法一一列举。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来到重庆之后,毛主席首先拜访的是我们党的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以前没有机会见面的著名民主人士,像宋庆龄女士、张澜先生和冯玉祥将军等。与我们党的这些老朋友在一起,毛主席开诚布公,谈得很深,许多问题都与他们共同切磋,一起寻找解决办法。例如,当张澜先生听说,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国共谈判的症结时,就征得毛主席同意,由他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共谈判。毛主席曾为此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有了毛主席和各民主党派领袖们的直接交往,我们党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密切了,特别是我们党与民主同盟之间的合作一直是非常默契的。

对另外一些中间派人士,毛主席也十分注意做他们的工作,如青年党的左舜生、《大公报》的王芸生等,在谈判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他们的态度、反应和意见。这些人士对我们党并不很了解。国共谈判之初,他们有不少疑虑和担心。通过与毛主席交谈,特别是在看到我党为争取和平所做的重大努力之后,他们的态度和观点起了变化。这里以毛主席提到的两件事为例。回到延安后,在向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毛主席说,我党提出四十八个师的要求之后,国民党在各地散布了不少我们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谣言,引起中间人士对我们的不满。左舜生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赃会议”。但是,我党在军队数量上让至七分之一,四十三个师;中间派民主人士即表示赞成,但蒋介石还不赞成。最后,达成二十个师的协议,许多中间派就开始为我们着急。左舜生说:“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再例如,《大公报》的王芸生在宴请中共代表团时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主席告诉他:“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后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为此,他主动向蒋介石做工作,推动尽早召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政治会议。在这次谈判中，我们党没有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军队问题让步大，同意谈判过程不公开，有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出于好意，批评我们“调子低，失立场”，说我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背信弃义，绝不可靠”。但是，毛主席的做法是要争取大多数。由于我们党的让步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心，这就使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党可以有力地从政治上反击国民党的高压，掌握谈判斗争乃至整个政治斗争全局的主动权。

毛主席还利用在重庆的机会尽可能地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会面、谈话。这种接触，一方面带有统战意义，是为了使国民党各派系都对我党政策有所了解，争取他们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通过这些接触，毛主席把国方的动向、困难看得更清楚了。在向政治局汇报时，王若飞同志说，与我们谈话的人都不是死硬派，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 CC 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毛主席谈到，宋子文的态度尚好，对谈判有兴趣，但蒋介石不要他参加；CC 派反对和谈，但看来很多 CC，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陈立夫与毛主席谈话，一方面企图劝说我党放弃“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又要表明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当时，毛主席对前途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还拜访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宴请了一些外国人，并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除美国大使赫尔利之外，毛主席接触较多的是苏联大使彼德罗夫。毛主席说，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不过，毛主席也流露出一些不满，说苏联使馆胆子小，请我们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吃饭要走后门。此外，毛主席还会晤了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这些基本是礼节性的访问。当时，在外国人之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做美国人的工作。例如，在八路军办事处，他曾请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吃饭，还抽空接见三个年轻的美国士兵。毛主席认为：美国政府对我们很坏，但是“美国广大人民对我们好”。

谈判期间，我们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两手对两手，一手和谈，一手武力，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毛主席身在重庆，仍肩负着指挥我军的重大责任。凡重要战略决策，延安都报请毛主席批准，各地军情也及时向他通报。谈判最后能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一方面，是我党领导人在谈判桌上斗争艺术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我军在战场上有力配合的结果。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这说明蒋介石一直未放弃发动内战的打算。不过，国共军事冲突首先还是围绕接收问题爆发出来的。双方都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更大的地盘，用自己的力量填补日本失败后出现的真空。由于我党长期坚持敌后斗争，抗战一结束，我军捷足先登，率先收复了许多战略要点，而国民党军队即使靠着美军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帮助也还是姗姗来迟。国民党要进占大城市，要控制交通线；我党则要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阻止国民党向已被我解放的地区进攻。这就在全国广大地区造成了我方处于防御，而国方处于进攻的基本态势。这种军事斗争有两重意义：一个是为了在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另一个是谈判一旦失败，为打内战作准备。

谈判期间，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个决策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前已指出，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是毛主席和我党其他领导同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反复考虑的问题。在七大，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过，那时还很难预料将会出现怎样的具体情况。苏联出兵之后，在东北发展我党力量就成了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毛主席赴渝前夕，中央已决定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并尽快建立东北局；我军则进至察哈尔和热河两省，东北可去则去，如苏方一时不允许，就在热河发展，伺机进入。当时，党中央的估计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同情，加上国民党接收东北尚有很多困难，我党有很好的机会争取热、察和东北各省。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由于美苏矛盾的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变得比较强硬，不允许由美舰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在大连、营口等地登陆，这就为我党向东北发展提供了便利。毛主席在渝期间，党中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积极调兵遣将，赶赴东北开辟工作。9月17日，中央致电赴渝谈判代表团，明确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两天后，毛主席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就最后确定下来。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并没有就东北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不过，周恩来同志曾明确向国方提出，我党应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尽管国方置之不理，但几个月后，蒋介石就再也无法回避我党在东北已形成强大力量的这个现实。

谈判期间，我军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是上党战役。上党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属于我晋冀鲁豫解放区。8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毛主席赴渝前夕，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我太行军区集结主力部队，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军和向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从9月初开始，经过四十多天的战斗，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俘获一批敌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高级军官，大体消灭了阎锡山部主力。这一仗加强了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完全贯彻了毛主席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以支援谈判的精神。在重庆，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也常被称作"双十协定"。

## 返回延安

毛主席原来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夕返回延安，因蒋介石请人挽留他过双十节，所以又住了两天才离开重庆。返延前，毛主席与蒋介石又见了几面，并作了两次长谈。据毛主席说，蒋介石总要找我长谈，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指蒋和毛）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主席向他谈起土地革命。蒋说，很好，将来这些事情都给你们来办。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主席回答，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毛主席还告诉蒋介石，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通过在重庆的一段接触，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那时,毛主席确实有一种乐观情绪。

前些年,台湾方面公布了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所写的几篇日记,其中包括他与毛主席谈话的一些情况。据蒋介石说,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解放区问题。毛主席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蒋则表示,如政协会议能在本月底召开,则国民大会可考虑改期召开。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这些日记中,蒋介石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我们党,并"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主席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他两面派搞得很厉害,气量也狭小得很。

10月11日,上午9时45分,毛主席偕若飞同志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抵达延安时,受到党政军民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在机场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已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当晚,毛主席和王若飞同志向政治局作了全面汇报。毛主席说:重庆会谈发表公报十二条,这个会议纪要是蒋介石的提议,恩来同志起草,根据国方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蒋介石主张不给省,省以下可以;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毛主席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然后,毛主席和若飞同志介绍了谈判经过、国方动向以及各方人士对谈判的态度反应。最后,毛主席请政治局作出决议,追认会谈纪要。

第二天,毛主席草拟并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在这份指示中,毛主席向全党说明了《双十协定》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解放区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全面的和平建国局面还不能出现;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我党在东北地区一切照既定计划执行。毛主席还解释了我方答应退出江南八个解放区,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当时,中国人民对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寄予无限希望的,希望中国能由此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毛主席返回延安之后,国共谈判仍在继续。经过一个边谈边打的阶段,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召开了,中国的大地又一次露出和平的曙光;但几个月以后,大规模的内战还是爆发了。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它留下的印迹似乎只有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会面。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一方面,毛主席和我们党当时确曾为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作出了重大努力,重庆谈判确曾为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提供了一次可贵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谈判,我们党不仅保卫了八年抗战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五

# 战后国际形势和内战的爆发

## 马歇尔使华

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共关系并没有因此缓和下来。双方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谈判也很快陷入僵局。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为蒋介石无意执行“双十协定”,他幻想依靠战场上的胜利取得谈判桌上的优势。同时,美国政府虽然一面拉拢国共和谈,但另一面却继续执行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向国民党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国民党运兵,甚至出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替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企图以此迫使我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种政策的惟一结果是造成了中国内战的严重危机,引起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由于我们的坚决反击,大约到了 1945 年 11 月,双方在军事上形成僵持状态。事实说明,蒋介石还没有做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准备;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根本行不通。

11 月 27 日,名誉扫地的赫尔利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任命马歇尔为驻华特使。此后,形势开始发生转变。12 月 15 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扩大政府的基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武力干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1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27日，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苏、美、英一致表示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赞成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内部冲突；三国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美、苏外长还宣布，两国一致同意双方军队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尽早撤离中国。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是推动中国走向和平统一之路的一股很强大的力量。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饱经战火蹂躏的中国大地再度露出和平的曙光。马歇尔乘着这股风来到中国，一时被视为三大国赞助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的化身。

我们党对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最初抱着欢迎的态度；不过，在处理这件事时极为慎重。赫尔利辞职前夕，党中央已预见到美国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某种变化。赫尔利辞职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明确提出要“中立美国”。这个策略的目的是设法使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以减缓我党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所面临的一时的或某种程度的困难。在杜鲁门发表声明之后，党中央又发出指示，说明美国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改变了扶助蒋介石的一贯立场，但美国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表示愿意援助中国和平统一，这种变动有利于当前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我们党采取的策略是灵活的，也是稳妥的。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定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无论欢迎与否，我们无法避免这种干涉。当时，出现了美国干涉的压力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抓住时机，一方面减缓美国对我方的压力，另一方面，争取运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压力来迫使蒋介石走上和平改良道路。党中央决定采取“中立美国”的策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并不意味着我党放弃同美国的斗争，相反，这种策略的本质恰恰是一种反干涉措施。我们接受美国的调解，就剥夺了美国政府采取援蒋反共政策的借口，取得了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权。

在马歇尔的斡旋活动刚刚开始时，党中央曾希望争取英、苏两国同意，让它们的大使也参加调解，成为三大国联合调解。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少奇同志以中央名义给重庆代表团打了两封电报，要他们对此深加考虑。在一份电报中，少奇同志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这个设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它反映出党中央当时的一个策略思想，就是要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们党的独立地位，在国际国内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

马歇尔来华初期，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他的调解活动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分别颁布了停战令。此后，关内的战火一度基本平息下来。停战令的颁布受到全国人民普遍热烈的庆祝。当时，《解放日报》发了一篇社论，题为《和平实现》。其中说："中国在民国以来的三十五年间，每年不是内战，就是外战，或是内外战同时并作。人民长时期渴望国内和平，但是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还经过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才第一次看到国共停战命令所带来的和平。"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是非常珍视的。社论中写道："国共停战协定，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是开始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可以说，这是我们当时的衷心希望。

在停战令颁布的这一天，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开幕了。经过各方人士 21 天的努力，1 月 31 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这些协议规定：成立联合政府，国府委员名额的半数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规定国共军队在六个月内按五比一的比例整编，然后全国军队再统一整编为五、六十个师；规定实行地方自治，这些地方可以保存人民的武装等。以后，经过进一步谈判，2月25日，国、共、美三方又签署了《整军方案》。

对于政协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我们党是准备坚决为之实现而奋斗的。政协会议闭幕后，党中央立即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当时党中央认为：由于政协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毛主席也亲自接见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这是个很重要的姿态。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过于劳累，回到延安后身体一直不好，当时正在休养，很少公开露面。在谈话中，毛主席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他表示"共产党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出而参加"。在那段短时间里，我们党内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我们准备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同时也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甚至准备允许他们参加解放区政权。

对于马歇尔最初三个月的斡旋活动，我们党给予了积极评价。政协会议闭幕后，毛主席要恩来同志向马歇尔转达谢意，感谢他为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所做的努力，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在向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毛主席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那时，外界纷纷传说毛主席要去苏联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病，美国人对此当然十分敏感。针对这种谣传，毛主席特地要恩来同志带话给马歇尔说，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马歇尔听到后非常高兴，表示要立即向杜鲁门总统报告。3月4日，由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小组抵达延安视察。毛主席特地要求写一篇《欢迎马歇尔将军》的社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三人小组在延安期间，毛主席又当面向马歇尔致谢，并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必用全力坚决贯彻三个协定"。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党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说过他个人什么。

然而，和平之光转瞬即逝，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形势就恶化了。2月中旬，重庆各界举行大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国民党右派指使特务暴徒袭击会场，酿成"较场口事件"。2月下旬，全国一些大城市出现受国民党煽动的反苏、反共"示威游行"，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有组织的暴徒捣毁。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怂恿和支持下，会议通过五项决议，公然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并只字未提国民党准备执行《整军方案》。这是局势全面恶化的标志。形势的恶化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军事方面 。由于东北地区的停战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国共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首先从那里爆发出来。3月中旬，苏军撤退之后，国民党军进驻沈阳并开始扩展他们控制的地区。22日，国民党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四平街我军发起猛烈进攻。激烈的四平街保卫战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形势逆转之后，我党作出巨大努力以挽救时局。这个阶段，重庆的谈判斗争和东北的军事斗争是最重要的两条路线。毛主席身居延安，担任这两条战线的总指挥。4月中旬，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恩来同志曾考虑在谈判中向国民党和美国两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面同时施加压力。毛主席致电指示他:“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毛主席还要求恩来同志与马歇尔之间“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直到5月上旬,毛主席仍认为,力争和平的可能性还存在着。因此,他一方面要求恩来同志继续执行“中立美国”的政策,避免美国转向公开援蒋内战;另一方面,又要求东北我军坚决顶住和挫败国民党对四平、长春的进攻。毛主席设想,东北如能实现停战,全国的局势就有可能稳定下来。然而,我军那时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国民党军队精心策划和准备的大规模进攻。这样,我党挽救时局的全盘努力也就难以奏效。5月下旬,四平、长春失守后,挽救和平的可能性实际已不复存在了。

## 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

1946年上半年,国内局势的恶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际紧张局势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当时中央为迅速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给恩来同志的指示所说,“世界各大国之国内情况及国际关系之变化”已到了“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程度。

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个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要求苏联人民对此有所准备。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以“铁幕”一词闻名于世的讲演,鼓吹“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对抗共产主义。这两篇演说后来被看作东、西方的两纸“冷战”宣言。更严重的是这一年在亚洲和欧洲一些地区先后出现了美苏两国军队直接对峙、甚至剑拔弩张的局面。国际关系的变化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集中到一点，就是美苏关系变了，但这种变化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一时难以看清。那时，“冷战”这个词刚刚发明，还没有流传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有了“热战”的经验，但还没有“冷战”的经验。于是，世界舆论对美苏战争议论纷纷，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

在中国，人们对爆发美苏战争和第三次大战的担心甚至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苏联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国家，中国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苏关系的晴雨表。“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不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就是在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影响。当时，苏联是全世界进步力量的中心，在战争中遭到很大损失，战后需要恢复元气；苏联和世界进步力量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的进步力量也担心这一点。不过，“美苏必战”的观点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一方面，蒋介石及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想发动内战，但对打赢内战又信心不足，因此寄希望于美苏战争，幻想从中渔利，四处散布“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之类的言论；另一方面，美苏两国的斗争与国共两党的斗争有密切的联系，假使美、苏打起来那的确会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各方面人士和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对美苏战争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内战的担心。

那时中国人担心美苏战争，美国人和苏联人则担心中国内战，害怕由此引起它们两国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苏联非常紧张。这是当时世界局势与中国局势相互影响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战后，苏联希望与美国取得妥协，想让我党也与国民党取得妥协。苏共领导人始终有一种倾向，就是对美国估计过高，对中国人民估计过低。马歇尔来华后，苏联友人通过恩来同志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共中央的意见，要我党无论如何应决心停止内战，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实行民主化。苏共中央特别提醒说，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如果再不停战，美国的陆军和空军就会压下来。

国内形势已经恶化，国际形势也很严峻，两个形势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毛主席对战后国际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对我们党来说，能否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这时是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党总的方针政策。从七大到重庆谈判，再到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政策的主要方面是争取国共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这个方针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党曾预计：战后，国际上美苏矛盾虽会有所发展，但双方仍能维持某种合作关系，两国的亚洲政策也相距不远，在国际压力下，国共两党有可能取得妥协。现在，前提条件变了，这就使得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考虑。

4月，毛主席写了一篇短文，这篇东西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在这篇短文中，毛主席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第二，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而是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妥协目前短时期内还不会很多。第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毛主席的这篇短文，一是针对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二是针对国内形势的逆转。它明确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美苏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我们要不要同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争。其实,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问题,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结束之后就讲过。他说:“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时隔半年,尽管国际形势显得十分严峻,但毛主席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为反动派气势汹汹所吓倒,看出世界战争还是打不起来。在美苏妥协的问题上出现的变化只是时间早晚,范围大小,我们没有理由惧怕中外反动派发出的种种战争叫嚣。在这篇短文中,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美苏两国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同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斗争,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这里牵涉到国内一些同志和朋友的担心,也牵涉到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一些不同看法。毛主席提出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的提出实际上打破了以往各国的斗争必须服从苏联外交需要的传统;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国际范围内的斗争与各国人民的斗争如何配合,特别是各国人民的斗争如何与苏联的斗争互相配合。这在思想上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短文写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仍在反复思考,国际形势究竟如何发展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这个重要文件当时仅在中央部分领导同志之间传阅,没有立即下发。直到 1947 年底,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毛主席的这几点估计才在党内传达。到那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基本证实了他当初的判断,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与思考,他的看法也更全面、更充实了。在十二月会议上,毛主席非常自信地指出:最近时期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美国没有战争意思,苏联也没有战争意思,所以打不起来。他还说,要揭露战争贩子,战争只是远景,说得如此之近,是为了吓人,是宣传战,不能上当。这一点与我们建国后有一段时期越来越强调战争危险有很大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不同。

从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1946年4月所写的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起点。时隔不久，毛主席就在这几个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著名论断，由此形成特色鲜明、对我们党和新中国外交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国际问题理论。

## 内战爆发前后

从1946年5月底开始，国内形势日趋紧张。我们不仅面临着与国民党全面破裂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与美国破裂的问题。一般地说，大规模内战是从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算起的，但双方完全破裂还有一个过程，实际经过半年多时间。在破裂过程中，我们党同国民党和美国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无疑是在军事方面，其次是在谈判桌上。不过，这里着重叙述的是思想方面和舆论宣传方面的情况。

6月底，恰好在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党内有两位高级领导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提出他们的看法、疑虑和不成熟的政策建议。一方面，供中央参考；另一方面，希望中央能作出判定。

关于国际形势，这份报告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革命势力的中心苏联却严重受伤了，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在战争中打死打伤，极大地削弱了，但美国却相对地打强了，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目前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都依赖美国来恢复自己的元气，帝国主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暂时相对地潜伏着与减弱着。这两方面情况造成的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力量无法发动有力的进攻，形成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样的大规模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内部则暂时地相对平静,未发生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严重的危机;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与以苏联为中心的人民势力的矛盾,更加尖锐了。目前世界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反动势力,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世界人民革命势力特别是苏联则采取防御巩固的状态。报告估计,这个基本形势可能持续三年或五年;此后,苏联元气恢复,美国经济大恐慌,英法与战败国恢复元气,已解放各国全面巩固之后,世界形势才又能发生基本的变化。

关于国内形势,报告认为,经过八年抗战,人民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尚缺少一个更有实力、更坚强的中心,目前也不可能得到来自国际革命的实力援助。中国整个反革命势力在抗战中削弱了,但反革命的中心势力蒋介石 CC 派反而在抗战后加强了,嫡系军队增多,特务网遍布全国,官僚资本有所发展,又得到美国空前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援助。反革命势力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例如经济恐慌、内部矛盾、人民不满等,但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今后数年内,在美国的强大援助下反革命派还可能克服困难,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力量。但是,随着中国更殖民地化,人民群众灾难更加深重,反抗运动也将更有组织地不断兴起。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分析,这两位同志建议,我党应采取力求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并提出三种对策供中央考虑:一,让步以达和平;二,拖延以待时机;三,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少,只有一、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第一个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军队与部分解放区,求得全国范围内部分民主改革,还是让步以求和平为宜。但他们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党让步就放下屠刀,相反他会把刀拿得更稳,随时可能发动大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杀，杀得鸡犬不留，铲草除根而后已。这样，则不如采取最后一个坚决打下去的方针。但这个方针也有危险，胜利把握不大，如打得好则可能打打停停，求得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形势的根本变化。

这份报告的观点和所反映出的疑虑在当时带有普遍性。毛主席阅读了报告，并立即作了批示。毛主席指出：报告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毛主席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一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予以坚决斗争，其结果比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立即面对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 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 1946 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地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毛主席在形势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坚决斗争的决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

内战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宣传工作一方面担负着迅速向全党说明形势、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力量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与美、蒋作舆论斗争的重要武器。舆论宣传战线和军事战线、谈判战线一样，都由毛主席直接领导。毛主席不仅向党内发出许多指示，还根据情况，发表声明、谈话。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重要社论、文章也往往由他提出立意，指定人撰写。毛主席指导宣传工作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分注意把握时机，根据形势的变化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对不同的问题加以说明。

反对美国援蒋是内战爆发前夕我党宣传的一个重点。为此，毛主席要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了两篇社论，一篇是6月5日的《美国应立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另一篇是6月25日的《要求美国改变政策》。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最具权威性的是6月22日毛主席发表的《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在马歇尔来华后，这是我党对美国政策的第一次态度强硬的批评。毛主席在声明中指出：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极大地加强了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政，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是目前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将军火交给国民党独裁政府，坚持反对美国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一切对华的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的宣传重点迅速转为动员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七七事变”九周年前夕，毛主席要弼时同志转告，准备七七发表宣言。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这个宣言首述日本投降后我党发表宣言，主张和平建国；继述“双十协定”及内战；继述政协表现光明；继述“较场口事件”以来中国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向解放区及人民大众的进攻及人民应取之方针。全文着重强调，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正在合作将中国变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任务仍是争独立、争民主，表明我党坚决反对内战的立场，坚信历史不会开倒车。宣言写好后，毛主席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中外反动派的反动企图是可以被打败的。”“七七宣言”发表之后，7月20日，毛主席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以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再次强调“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8月16日，毛主席又要求按照这个精神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澄清对美国的幻想是我们舆论宣传的另一个重点。内战虽然爆发了，但我们党一时还没有退出谈判，马歇尔的调解活动仍在进行。因此，我们对美国的批评也还有一点保留，或者说在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有一点争取的味道；不过，实际上，我们所要争取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对美国还抱有一些幻想的中间人士和群众。8月10日，马歇尔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实际是宣布美国的调解已经失败。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七个月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毛主席增写了最后一段话：“美国政府改变政策，废止片面援蒋，撤退海陆空军，诚意帮助中国人民及各党派实现和平民主，这是一条路。继续过去的欺骗政策，一只手‘调处’，一只手助蒋反共反人民，这是又一条路。何去何从，愿美国政府当局三思之，更愿一切民主的美国人民起而注意。”8月29日《解放日报》社论《一年的教训》点明了美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新教师”，一个反面教员。社论中写道：“美国政府过去讲给我们听的，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中美平等，美苏合作，肃清日本侵略势力”；但是这一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帮助蒋介石‘漂亮’地实现独裁和消灭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民主”。

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由陆定一同志执笔撰写的社论《蒋军必败》。这篇社论表明我党的宣传重点从澄清对美幻想转为以澄清悲观思想为主。社论发表前，定一同志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说写了一篇社论，已请任弼时、饶漱石和胡乔木三位看过，并说我们宣传上的主要目标是揭露美国，澄清同志中对美国的各种幻想。社论发表前一天，毛主席写了批语，指出：“不但澄清对美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按照毛主席意见修改后的社论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对我们与美国以往的关系作了总结，表明我们对美国现行政策的反动性已没有任何疑义。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只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特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第二，是说明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三个基本保证和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原因。这就是我方解放区的存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强大和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国方民心反对、军心厌战和存在经济危机，即使有美国源源不断的接济，国民党总要失败。9月27日，毛主席又给定一同志写了一封信，再次强调：在解放区军民中对美蒋存在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那时，形势发展非常迅速，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常感到跟不上形势变化，而毛主席高瞻远瞩，总是及时地指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使我们的宣传工作与我们党的整个斗争密切配合。

9月底，我们党已基本做好面对两个破裂的准备。29日，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蒂尔发表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尖锐指出：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除揭露美国政策、表明必胜信念之外，毛主席的谈话也暗示我党不打算继续接受美国的调解。内战爆发后，我党继续参加谈判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揭露美蒋和平骗局，争取中间势力。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10月4日，党中央电告恩来同志，在马歇尔、司徒雷登声称要退出调停时，我方不必再表示挽留。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开幕，这表明国民党已关闭了和谈大门，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19日，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

调解彻底失败后，马歇尔仍在中国滞留了一段时间，直到1947年初才离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马歇尔先是一手促成停战，后来却又放手让蒋介石打内战，这种行为似乎是前后矛盾的。现在我们得知，在使华之前，他已和杜鲁门定下了一张底牌，即如果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反对顽固地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得支持他。这就决定了美国的调解在本质上不可能是公允的。马歇尔斡旋国共关系是战后历史中一段不协调的插曲，但这一年留下的痕迹却不易磨灭。

## 毛主席对国内斗争与国际形势的总结

1946年底，毛主席对一年来的斗争和国际形势做了重要总结。中共谈判代表团返回延安后，11月21日，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三个人在延安枣园开会，由胡乔木做记录。会上，恩来同志首先报告国共谈判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情况以及蒋管区的形势等。恩来同志说，经过谈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已为群众所认识，我们和平民主的方针以武装斗争为根本。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说：在七大时我们即估计，在日本投降后不克服蒋介石与中国的斯科比，则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在今年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二月间似乎变了，后头还是证明七大的估计是正确的。战后的世界变为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世界上三块地方：美国、苏联、美苏之间，这三块地方的人民都反对美国反动派。世界在进步，苏联在高涨，美国在面临危机。毛主席估计，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还会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毛主席在小范围内对国际形势所做的一个总结。

为尽快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我们党对形势的看法，以便彻底肃清悲观思想，树立必胜信念，毛主席要定一同志就战后国际形势问题写一篇大文章，新年的时候发表。任务布置以后，毛主席对写作情况十分关心，现在找到他的两次批示。第一次是在12月15日，毛主席在文章初稿上写道："已看过一遍，大体要得，惟发表前尚须略作修改。请送少奇、恩来、乔木一阅，看他们是否同意这样写，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送我一阅。"第二次是12月31日，毛主席在修改稿上批示："定一同志，你的文章长处极多。其缺点是斟酌、推敲、分析不够，以致有时逻辑上欠周密，鼓动性强，科学性弱。此次论国际文章，反复研究几次，好得多了；但仍有些漏洞，修改的地方请再阅。"

1947年1月2日，这篇大块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标题是：《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署名陆定一。不过，正如定一同志自己所说，这篇文章虽由他执笔，但思想完全是毛主席的。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我党对战后国际形势的看法已基本形成了。它所总结的是毛主席和我们党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自己的外交接触和在国内斗争中的切身感受得出的结论。这与以往历次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变时的情况不同。文章的重要性从毛主席对写作关心的程度中即可看出。

这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文章共分七部分，重点谈了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个大问题。首先,文章回顾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战后世界形势所作的预测,说明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基本点是:第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各国民主势力的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民主势力发展的规模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势力的规模来大得不可比拟;战后,虽然反民主势力必然会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动进攻,但是民主势力必然能够战胜反民主势力,取得自己的胜利,取得巩固与持久的国际和平。第二,战后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斗争将充满于世界大部分地方,现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也不是在苏美之间。对这一点,恩来同志在年初一份关于国际形势宣传的指示中特别解释说,由美苏矛盾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虽然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矛盾,但美苏矛盾并不是现实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重申两个基本点指明了当前并没有美苏战争的危险,廓清了中国民主阵营中一些人士对美苏战争、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忧。

其次,这篇文章指出: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反苏口号与以前德意日法西斯的反苏口号,其含意有所不同。美国离苏联很远,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欧亚非三洲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中间地带"的存在,加上其他条件,使得美国很难进攻苏联。美国帝国主义施放反苏战争烟雾的真实目的是要压迫美国人民,并对苏联以外的国家进行控制和实行军事占领,在世界各地制造许多"珍珠港事件"。这就指明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现实意义,号召各国人民应认清敌人,救亡图存,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和侵略。我们知道,"中间地带"这个观点是毛主席在 1946 年 8 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的。在那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次谈话中，毛主席第一次向外界表明他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主席的谈话是在半年多以后才由斯特朗发表在《美亚》杂志 1947 年 4 月号上的；6 月，我党在香港办的《群众》杂志又加以转载。所以从实际影响来看，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思想还是由陆定一同志的文章首先披露出来的。

最后，定一同志的文章还指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事实证明，世界进步的速度是很快的，由各国民主力量组成的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力量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目前的任务是大家努力渡过困难。现在回顾起来，当时对某些问题的估计是不准确的，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例如，在分析世界民主力量与反民主力量的对比时，为强调反动势力的脆弱性，对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了一点，对美国人民与美国统治者的矛盾、对英美之间的矛盾都估计高了。关于战后必然出现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也是当时的一贯想法。尽管有这样一些缺欠，但人民的力量终究胜过反动派的力量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全文由毛主席加上一段结束语：“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蛮横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将达到高潮的时候，毛主席讲的这段话是非常有气派的，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恰如毛主席所预料，三年以后我们就把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赶出了中国大陆。历史的确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要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六

# 《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

## 创办《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

四十年代的《解放日报》是我党历史上一张有巨大影响的、正式的党报。它的前身是1937年1月创办的《新中华报》。《新中华报》又是由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展而来的。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

毛主席从事新闻报刊工作,几乎是同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同时开始的。大家知道,五四时期,他创办《湘江评论》,接办《新湖南》周刊,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参与《湖南通俗报》工作等,构成了他参加革命新闻报刊工作的起点。当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前锋》创刊后,毛主席积极为这两个刊物提供稿件。1923年,他在湖南创办《新时代》月刊。1925年,他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身份,创办和主编《政治周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的环境里,他仍然重视报刊的宣传工作。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会上,他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当时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具备出版报纸的条件，他便组织大家写传单、办墙报。1931年，他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起草了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撰写了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

在抗战时期，决定创办《解放日报》的直接原因，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新中华报》四开四版、三日刊的篇幅和刊期，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完成党的宣传任务。在国统区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因为受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加之受特定的宣传内容和宣传对象的限制，出版发行遇到困难，以致每日改为出半张。同时，由于形势的骤变，“左”的思想有所抬头，在有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上，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政策和中央指示的言论。再加各根据地处于分散隔离的状态，各地报刊、通讯社的宣传报道往往发生偏离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创办一张大型日报，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全党宣传舆论口径，更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为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党中央的其他刊物，如《解放周刊》等相继停刊。

5月1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①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4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由博古同志为首的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具体负责。在5月14日举行的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社长博古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有鲜明的立场，在政治上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事变的演进，文字要生动，写作反对公式化。这时，原《新中华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转到《解放日报》社工作。此外，马列学院、《解放周刊》、鲁迅艺术学院及其他有关单位一些适合作报纸工作的人员也陆续调到报社。

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出版。毛主席为报头题了字。创刊号第一版刊登了他写的发刊词，阐明了报纸创刊的宗旨和任务。其中写道："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本报同仁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① 这个发刊词论证了党报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一致性，党报就是要准确地宣传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及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教育人民群众、指导革命工作的武器。

《解放日报》出版后，新华社的通讯业务，除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供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国内国际的大事外，还收译一些电讯供《解放日报》选用，同时选播《解放日报》的稿件。这时是以"报"为中心，"社"是附属"报"的。不过，新华社本身的组织也已略具规模。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新闻日益重要，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5—57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新华社建立了英文翻译组和日文翻译组，并增加国际新闻编辑，以更好地为党中央和《解放日报》服务。

最初的《解放日报》为四开中张两版，从1941年9月16日起，根据中央决定，改两版为四版，增加国际、国内消息，多反映边区情况，增设副刊。这时的《解放日报》，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文章占压倒优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报道甚多。1941年6月26日，该报发表经毛主席修改的社论《世界政治的新时期》，说明“苏德战争已经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6月29日又发了经毛主席修改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在国内方面，一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苏反共活动，毛主席于7月23、24、26日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发表了《何应钦的反共新阴谋》、《何应钦一手主持反苏反共》、《何应钦认敌为友》三篇文章。二是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游击战，敌占区人民的斗争，揭露敌伪罪行。三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如实行民主选举，“三三制”，精兵简政等，也有少量报道。

## 《解放日报》的改版

初期的《解放日报》，尽管在总的办报宗旨和指导思想上接受党中央的领导，然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些错误的东西，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当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版面安排上，固守于“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的不成文规定，而不是根据党和群众的需要进行安排。四个版面，一版主要是国际新闻、国内要闻和社论；二版全部是国际新闻；三版是国内新闻；四版是陕甘宁边区（上半版）和副刊（下半版）。这就从版面上把本应突出报道的有关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放到了很次要的地位。第二，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力。国际新闻、社论、文章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对我党我军的重大事件和有关国内、根据地的实际报道少而且浅，对当时已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没有进行及时的宣传报道，甚至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这样重大的消息，也只在第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消息。第三，当时学习苏联《真理报》和中国《大公报》的做法，坚持“一天一篇社论”，结果有些社论质量不高，影响了报纸的宣传效果。第四，有些新闻不真实，曾出现过《富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那样失实的报道，不少文章表现得不切实际、空泛议论、贫乏无味的八股文风很浓。另外，报纸还发表过一些有缺点错误、产生了消极作用的文艺作品。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解放日报》未能在党和群众之间起到应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对此，毛主席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称当时的报纸“不是党报，而是社报”，是在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指出：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全党整风开始后，报纸未作应有的报道，反而连载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毛主席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鉴于上述情况，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改版。

“改版”也就是改造。这一工作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之后进行的，同全党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展开相伴随。

1941 年 9 月 14 日，《解放日报》刊登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和毛主席为该文写的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① 毛主席的按语和他推荐的调查报告，对改进报纸的文风提出了要求和具体范例。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放日报》增加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宣传教育的内容，并要求中央各部委多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以使《解放日报》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指导全党工作的机关报。

1942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给《解放日报》写稿与供给党务广播材料的决议。决议写道：“同意毛主席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必须坚决废除党八股。并决定由中央各部委（中央同志在内）及西北局每月供给广播新闻消息一件，写社论或专论一篇。”2月上旬，毛主席在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讲演，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后，随即在2月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要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委托博古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意见，拟定改革方案，交中央讨论。3月8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三八”纪念特刊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同志提出的关于《解放日报》的改革计划。14日，毛主席在给恩来同志的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

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31日，毛主席和博古同志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党内党外负责同志及作家七十多人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会议临结束时毛主席发表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①

与此同时，报社内部也为改版做了准备。1942年2月，党中央调派陆定一同志参加报纸改版准备工作，办《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8月总编辑杨松逝世后，陆接任总编辑）。报社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如开办“信箱”专栏，刊登读者对报纸改革的意见；记者分头走访各界，征求意见等。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当天发表社论《致读者》。这篇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报纸存在的缺点，宣布“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社论提出《解放日报》需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改版工作的总的方针就是贯彻全党办报的原则。这是报纸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倾向的有效方针与根本措施。而所谓全党办报，主要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改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作出了给《解放日报》写稿的决定。改版后，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0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又就《解放日报》问题作出决定:(一)必须改变重大问题不事先请示中央的做法,报社的日常政策须在中央会议上作通知,其他事项须作明确规定者,委托博古、定一协同王稼祥、陈正人起草党报工作条例与报馆管理规则,交中央讨论。(二)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必须管理所属机关、学校人员在报上发表的消息和稿件,不得任其随便乱发,以明责任。(三)《解放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又是西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应积极管理边区范围内的事项,并决定陈正人参加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后,同年9月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通过《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对各级党组织如何利用报纸,给《解放日报》写稿的具体任务、培养通讯员的具体方法、如何发展和正确对待报纸上的批评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西北局又发出《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为办好《解放日报》,向各级党委提出进一步要求。

当时,党中央对党报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报纸每一阶段的宣传方针,都由中央讨论决定。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都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文章,模范地执行政治局关于给《解放日报》写稿的决议。其中,毛主席写得最多,形式也多种多样,除写社论和消息以外,还用"中共中央发言人"、"新华社记者"等名义发表谈话和撰写述评。

关于贯彻群众路线,主要是大力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陕甘宁边区的五个专区和延安市都驻有特派记者,县委设通讯员。到1944年初,陕甘宁边区已有一个由六百名通讯员组成的经常给党报写稿的通讯网。这样,以往那种由于报纸与地方群众没有组织关系,记者仅凭道听途说,写出严重失实的报道,或缺乏稿源的情况开始得到克服。另外,毛主席还要求党报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他在1942年3月给恩来同志的电报和为中央起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决定(草案)》指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收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①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对改版后一年又十个月的工作和经验作了总结。这篇社论指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版面安排上,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不成文规定,而变成"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四个版面的具体安排是:一版为以根据地消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为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为国际消息版;四版为综合副刊版。改版两年后,版面又进一步调整为:一版:要闻、战况、社论;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思想、艺术、文化、科学知识;四版:国际。第二,在宣传重点上,突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我军前线战况,根据地(1944年抗日根据地改称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第三,社论不再是每天必有,生拼硬凑,而是有的放矢,注重质量,且一般以国内问题——特别是解放区的重要事情为主。第四,在新闻的真实性,各版栏目的编排技巧,文风的讲求实际,语言的新鲜活泼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

当然,报纸的改进,不会是一蹴而就、从此再无问题了。对改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4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版后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仍及时提出。如1942年9月解放日报社一次编委会上，定一同志传达了毛主席这样的意见：《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的机关报，“七七”宣言以后的社论、印度问题、参议会、自卫军几篇社论有些错误，另外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1942年4月10日二版发表的一条消息：“党校一学生失恋自杀”）是不应该刊登的。报纸尚未与中央息息相关，虽然总的路线是对的。以后凡是新的重要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社内部的事务亦须如此。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毛主席倾注了大量心血，许多具体事务他都亲自安排，具体指导。1942年9月15日，他在给凯丰同志的信中提到：“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人帮助征稿。”① 9月20日，他又拟订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方法，约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人为第四版征稿，并规定每个人负责征稿的具体内容、字数以及征稿、编辑原则②。10月4日，毛主席在博古同志陪同下，到清凉山西侧山腰上的中央印刷厂礼堂，接见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接见中，毛主席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很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

当报纸上发表了好的社论和文章，毛主席及时给予肯定。1945年2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贯彻减租》和《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一文。12月又发表了张平凯的文章《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毛主席看到张文后，当即写信给博古同志，要求将全文分数日广播，认为“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00页。

② 同上书，第101—103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①

《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整风运动。在整风中，开展无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理论的教育，清算了党八股的文风。《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大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奔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富有热情和理想，但缺乏实际锻炼，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往往在工作中反映出来，党八股的毛病也相当普遍。在整风学习中，他们结合工作实践，对于新闻的党性、真实性，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解放日报》在当时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党报与新闻工作的社论、评论及理论文章，如《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1942 年 7 月 18 日社论)、《报纸与新的文风》(1942 年 8 月 4 日社论)、《纪念九一记者节》(1942 年 9 月 1 日社论)、《党与党报》(1942 年 9 月 22 日社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1942 年 11 月 17 日社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1943 年 1 月 26 日)、《政治与技术》(1943 年 6 月 10 日社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 年 9 月 1 日)、《本报创刊一千期》(1944 年 2 月 16 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5 年 4 月 4 日社论)、《提高一步》(1945 年 5 月 16 日社论)、《从五个 W 谈起》(1945 年 12 月 13 日社论)、《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1946 年 9 月 1 日社论)、《人人要学会写新闻》(1946 年 9 月 1 日)、《短些，再短些》(1946 年 9 月 27 日)等等，就是结合改版、整风及历来的实践经过总结经验教训而写出的。

正是通过改版、整风以及总结报刊新闻工作经验，逐步形成了我党关于报纸和新闻工作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如报纸和通讯社不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56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但要忠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以及人民群众的要求息息相通，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报纸和通讯社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推进革命事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人民的编辑记者不做“无冕之王”，而要做人民的公仆，一切新闻报道都要真实，编辑记者在工作中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等等。这些基本原则成为我党关于报纸和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经过思想和业务方面的教育与锻炼，迅速成长起来，许多成为我党报刊新闻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 毛主席对《解放日报》的指导

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记录，《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留下了许许多多闪烁着时代光芒的不朽作品。它们记载着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历程，凝聚着人民革命的丰富经验，构成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多是出自毛主席之手的那些作品。前已指出，1942 年 10 月，毛主席接连为《解放日报》撰写关于苏德战争的三篇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10 月 12 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历史教训》，10 月 14 日；《评柏林声明》，10 月 16 日），对于改变当时人们悲观的观点，坚定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鼓励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3 年 7 月，毛主席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的《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7 月 11 日）、《质问国民党》（7 月 12 日）、《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7 月 12 日），以及 10 月 5 日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新闻和评论，运用舆论，以闪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之势出其不意地给国民党顽固派以狠命打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反共计划，声明“误会”，下令撤退进攻的军队，从而迅速地克服了内战危机。这是与国民党进行激烈的宣传战以及在这种宣传战中注意运用策略从而获得成功的典范。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仗没有打起来，舆论宣传的揭露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在宣传的同时，有作好准备的人民的武装做后盾。

抗战胜利前后，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评蒋介石在双十节上的演说》(1944 年 10 月 11 日)、《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1945 年 3 月 8 日)、《中共不出席这届参政会》(1945 年 6 月 15 日)、《评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1945 年 7 月 10 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 年 7 月 12 日)、《再评赫尔利的政策》(1945 年 7 月 20 日)，以及《爷台山战事扩大》(1945 年 7 月 25 日)、《新华社记者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的评论及蒋介石的命令》(1945 年 8 月 13 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945 年 8 月 16 日)、《中共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45 年 11 月 5 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等评论和消息，摆事实，讲道理，嬉笑怒骂皆成绝好文章，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深刻地教育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

根据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把握住舆论宣传的中心问题和立论重点，是保证党报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毛主席也对《解放日报》给予了具体的指导。1946 年 9、10 月间，毛主席给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写了三封信和批语。一是 9 月 11 日在定一同志上送的《解放日报》社论《蒋军必败》(9 月 12 日发表)的附信上批示：“不但澄清对美的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二是 9 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27日致定一同志的信中又指出:“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① 信中还要求陆定一同志将这个方针与余光生(时任《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和胡乔木二同志商酌实行。三是在为修改10月3日发表的社论《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而写的信中说:“必须说蒋之‘停战’全是假的,他的目的在打到底。他在征兵,在杀人,在借款,在调兵,一切为着打,不要受其欺骗。这样说才恰当。”

从1942年改版以后,《解放日报》逐渐走向成熟,但并不是说它就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毛主席对《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态度是:有进步、有成绩,就及时给予肯定,出现了缺点和错误,就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帮助改正。前面已经讲到一些事例,这里再举一例。

1945年8月6日,即苏联对日宣战的前两天,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美、英的报纸、通讯社和蒋介石的宣传机构对原子弹的威力大肆渲染,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8月9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以《战争技术上的革命　原子弹首袭敌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75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国广岛》为题，不加分析地转发了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路透社等发的八条关于原子弹爆炸威力和破坏力之大的消息，并在同一版还以《传盟国将发出新公告促使日寇迅速投降否则即将以原子弹摧毁日本》为题转发了合众社三条消息。在同一天报纸的第三版又以显著地位转发美国、英国及国民党中央社发自伦敦的关于原子弹的报道。8月10日，报纸尽管在第一版发表了毛主席《对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声明、《红军四路进入东北》的消息以及《苏联对日宣战》的社论；但在第三版上继续宣传原子弹，三版头条以《原子弹又炸长崎》为题，转发了美国新闻处、路透社、合众社的七条消息，还以《一个原子弹威力的估计》为题，采用了合众社和美国新闻处的两条消息。如此宣传原子弹，客观上抹杀了苏联红军对日本军国主义以致命打击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和美、英等国及国民党的宣传划清界限。为此，1945年8月10日，毛主席把余光生、陈克寒同志（当时任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叫到他的窑洞，整整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这次批评的内容，与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针对夸大原子弹作用的错误所讲的那一段话相同，那一段话是：

>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①

《解放日报》立即纠正了这一宣传失误，在8月13日第四版“关于原子弹”的答复读者来信中，就原子弹的制造原理、爆炸威力及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

## 新华社的改组及其在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新华社已由三五个人组成的小机构，发展成为由一百多人的总社和遍布抗日根据地的四十多个分社组成的新闻通讯系统。在发布新闻的职能上，也由原来单一的国内文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等三种广播，各项业务建设也已初具规模。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和指示，抗日战场的胜利捷报，根据地政权、经济等方面建设的消息，不少都是用《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登，又同时通过新华社及时地向边区、解放区、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布。如这一时期，毛主席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都是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的。这不仅适时指导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而且对世界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国人民了解被封锁包围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华社的大发展，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4月，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全党办通讯社，改革和加强新华社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是适应形势发展的决断。当时国民党已完全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我党正面临着同国民党进行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斗争。因此，迫切需要加强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华社通讯网，用无线电广播这一迅速快捷的武器，以文字和口语广播为主要的舆论工具，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并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最新指示迅速及时地传播到各个解放区以至全国人民中去，动员、鼓舞和指导人民群众提高信心，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而这些，只靠发行报纸地面传递，不仅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而且报纸在战争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出版和发行也更有一些特殊的困难。

4月30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编委会举行重要会议。5月8日至28日，编委会又召开几次会议，提出改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具体方案，制定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明确提出今后要以全党办报的精神来办通讯社。

《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是新华社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规定：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之直接指挥。这个管理规则上报以后，5月27日，少奇同志报毛主席："此件书记处已批准，请你审阅并修改。"5月28日，毛主席批准了这个规则。同一天，编委会根据管理规则及中央批示，具体施行两社组织机构的改组工作。

这是一次重大的改组。经过这次改组，报与社虽然还是统一领导，但编委会的领导重心和主要编辑力量转移了，从以《解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日报》为主变为以新华社为主。《解放日报》的一大批采编人员调入新华社，只留下少数编辑负责版面。报纸或广播的一切新闻稿件，统由新华社编发（惟陕甘宁边区稿件由报社通采部供给）。这次重大改组，使新华社的通讯事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在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中承担更为繁重的宣传任务，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改组不久，1946 年 7 月，廖承志同志调任新华社社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这时，战争的风云临近陕北。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战争的情况下，新华社的文字、口播不能中断，对外广播的功率还要加强。对这个指示的执行情况，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在 1946 年 11 月到 1947 年 3 月期间，还曾关照检查过多次。这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又必须实现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使命。1947 年 3 月 18 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以后不久，《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重任，成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的有力工具。

1947 年 3 月到 1948 年 3 月这段时期，新华总社的机构一分为二：总社主体转移到太行解放区，由廖承志等同志领导，组织新华社的中外文字、口语广播的全部工作；由范长江率领的番号为“四大队”的新华社小分队，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直到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这两部分人员密切配合，把电讯的电头改“延安”为“陕北”播发新闻，使新华社照常起着党中央的耳目喉舌作用，特别是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中断，从而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并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

这个时期“四大队”的工作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这时中央给新华社的重要社论、评论，都是由“四大队”传到远离陕北的太行总社，再播发全国的。这些社论和评论，有许多由陆定一和胡乔木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写，并经恩来、弼时同志审阅，最后由毛主席修改定稿。

这个时期，一些解放区的新华分社在报道中曾出现或“左”、或右的偏向。1947年夏秋新华社在各解放区陆续开展反“客里空”运动，从反对新闻失实开始，发展到反对政治上、政策上右的倾向。可是，从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在反右、反“客里空”运动中，受当时土改运动的影响又发生了“左”的偏向。其主要问题是一些报道土改工作的稿件片面地宣传了贫雇农观点，违背了党的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当时，有47篇稿件宣传了“左”的观点和做法，占全部关于土改工作的稿件的六分之一。为了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1948年2月11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同年3月，他又批转了《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的通讯，对这篇通讯写了批语，并要求将此通讯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作为土改中纠“左”搞得好的典型经验推广。

1948年3月，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转移。4月，为便于就近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新华总社由太行解放区涉县北上，和四大队在平山县胜利会师，重新融为一体。这样，党中央在西柏坡，新华社在陈家峪。党中央、毛主席更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为迎接全国解放展开了更紧张的工作。

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在离开陕北途经晋绥解放区时，会见《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采编人员，发表了讲话，即《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篇谈话，对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这篇讲话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集中表述。

新华总社抵达平山县后，中央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同时，为了加强对业务工作的领导，总社成立了编委会，掌握报道方针，处理编辑业务，领导各总分社。胡乔木任编委会主任委员。编委会下设主管编辑部的第一编委会（由胡乔木负责）和主管广播部的第二编委会（由廖承志负责）。从1948年5月起，特别是10月以后，中央为加强对新华社编辑业务的集中领导，并为了严格训练新华社的主要干部，决定抽调这两个编委会的部分编委和有关编辑部门的一些干部范长江、陈克寒、石西民、梅益、吴冷西、朱穆之、黄操良、方实、王飞、丁树奇、赵棣生、吴玉森、许诺、刘祖春、田林、王宗一、左荧、曾彦修、温济泽、廖盖隆、余宗彦、沈建图、陈龙等二十余人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编辑部（总编室），从陈家峪搬到西柏坡胡乔木住的小院里办公。这个小院和少奇同志住处为前后院，共走一个大门；这里距毛主席、恩来同志住处也只有几百米。新华社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文广播的主要稿件都在这里编发，重要战报和其他重要稿件由总编辑修改后，都要送少奇或恩来同志审阅，有的最后送毛主席审阅和修改。最重要的由毛主席亲自撰写。

新华社小编辑部的工作是紧张的。每天早8点左右上班，到晚上12时左右，除了三餐饭和午休的时间外，大家都集中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那时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休息的制度，有家可归的除了一两个星期到总社住地看望一下家属外，都在坚持工作。小编辑部经常在晚上举行评稿会，大家戏称为“记者招待会”。每天发稿完毕，下班前夕，大约晚上11、12点钟左右，总编辑把大家召集拢来，一面吃夜餐（挂面汤），一面便谈。谈话内容不外三个方面：一是传达毛主席、少奇、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中央最新精神，传阅他们审批修改或亲自撰写的稿件；一是分析战局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政局形势，例如三大战役最新的发展情况，北平和谈的进展情况等等；一是对当天的发稿清样作评论，把两尺多长的粗麻纸印成的竖排清样在菜油灯下摊开，从头到尾，对哪条稿子写得好，好在哪里，哪条稿子有缺点，缺点在哪里，一一评判；有时也谈些写稿应注意的一般原则和方法问题。当时强调新闻要在政策、观点、事实和文字技术这四个方面经得起推敲，编辑对稿件要精益求精。

西柏坡的这个小编辑部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49年3月新华社迁往北平。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对新华社的重视和关怀，以及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新华社的主要成员和业务骨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一次集中而紧张的、严格而生动的政治和业务训练，提高了新华社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新闻业务水平，为新华社迎接全国胜利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作了准备。在西柏坡工作过的这些同志，1949年3月进入北平后，有许多成为中央各新闻机关的重要负责人。这是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新华社迁到北平后，广播部独立建制，改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廖承志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这个时候，新华社为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还以组成记者团这种形式集中培训干部。1948年8月，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组成华北记者团共二十人，由华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带队，到西柏坡总社学习。刘少奇、彭真、李克农、廖承志、廖鲁言、齐燕铭、薛暮桥、范长江等同志，另外还有陈伯达，都作了报告。少奇同志的报告就是现在收入《刘少奇选集》中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胡乔木在到华北记者团住处对记者的思想状况作了一番了解的基础上，作了《记者的工作方针》的谈话。延安整风以来，党中央号召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倡学会分析事物的辩证方法。这次学习的重要收获，是使华北记者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团的同志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教育，并把辩证的方法推广应用到新闻工作领域。

在迎接全国解放的历史时期，毛主席光是围绕新华社应该如何报道、应该怎样写文章而写给胡乔木的信件，就达二十余封。这些信的字里行间既反映了解放战争中的新闻宣传任务是何等的繁重紧张，又充分体现了一位领袖对下级的谆谆教导、亲切的关心和爱护。例如：1949 年 6 月 24 日毛主席的一封信中写道：

>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 6 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 6 月 28 日发出，6 月 29 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 7 月 2 日写好，3、4 两日修改好，5 日广播，7 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于 7 月 2 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①

就在这一天，中央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社长。毛主席要胡乔木写篇七一论文。稿子写出以后，结果没有用。毛主席自己写了纪念七一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社，无论是在宣传党为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而奋斗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还是在动员人民行动起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阐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从而坚定人民的信心方面；也无论是在报道各个战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27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场上我军的节节胜利，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支援前线的壮举，党的新区政策和新区人民迎接胜利的热烈场面，还是在揭露国民党军队的土崩瓦解，以及解放军的历史性大进军方面，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 毛主席为新华社所写的作品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文稿是很多的，可谓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分秒必争，达到了他一生中从事报刊新闻工作的辉煌时期。包括新闻、社论、评论、发言人谈话、广播讲话等等的作品，大约有一百余篇。其中，以新华社消息、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作品有 17 篇；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作品有 21 篇，改稿有 14 篇。

毛主席所写的这些作品，是他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灵活巧妙地运用新闻宣传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强烈的指导性，“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在政治、军事和宣传上收到了振聋发聩、克敌制胜的非凡效果。同时，这些作品又体现了作者雄伟的风格与激越的情感，几乎都是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名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读了毛主席的这些作品，都会使人们感到，我们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在新闻和宣传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 1948 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伟大的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主席在英明地指挥着从当年 9 月开始到次年 1 月结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同时，也具体指导着新华社对重大战役的宣传报道。既指挥武战，又指挥文战，真可谓文韬武略，两全其美，相得益彰。

1948 年 10 月 22 日，中原我军解放郑州。当天，毛主席为新华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社写了郑州前线22日24时急电，即《我军解放郑州》的消息。该文通过交代地理背景来突出占领郑州的重要战略意义。其中指出："郑州为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点，历来为军事重镇。蒋介石因徐州告急，被迫将驻郑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按：国民党从10月起整编师均改称为军，整编旅均改称为师）东调，郑州守兵薄弱，我军一到，拼命奔逃。现郑州东西之中牟县、北面之黄河桥均被我军切断，逃敌将迅速被歼。"①

同年10月27日，即在我军攻击锦州，蒋介石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我军立即回师，将廖兵团五个军包围在黑山、大虎山及其以东地区时，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著名的辽西大捷新闻：《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新闻形容我军包围敌人时说："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新闻最后指出：在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②

就在这时，党中央得知担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准备偷袭已被解放的石家庄，窜扰西柏坡的中央机关。当时我军主力在远处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座空城。面对这一形势，毛主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一方面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暂时撤离的准备，并调兵遣将，多次指示恩来同志电令我有关军事首长，率领所部急速到达指定地点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在10月25、27、29、31日，每隔一天为新华社写一篇新闻稿，导演了一幕别具一格的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56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57—258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空城计”。其中,25 日的新华社电讯稿是毛主席修改的,29 日发表的是他写的口播稿,而 27 日写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的消息和 31 日写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述评,已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为大家所熟知。特别是后面的两篇消息和述评,仅各用了四百五十字和六百字,就把敌人面临垂死挣扎的局势,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和后顾之忧,说得一清二楚。新闻播出后,傅作义大吃一惊,既然自己的意图已全部被看穿,石家庄军民已做好了迎击准备,取胜已无希望,只好作罢。毛主席在写了新闻稿后,则密切地注视着傅作义及其所部的反映。他在 29 日给胡乔木一封信中谈到:“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 27 日 21 时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广播谓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等语。”

执导这个“空城计”,毛主席挥笔写就了几篇新闻,避免了敌人的一场窜扰。这是新闻报道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特殊作用。当然,当时如果仅有新闻攻势,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的话,敌军也不会乖乖地撤兵,因为我军确实做了准备。郑挺锋向傅作义报告说我方预有准备的话不是假的。这里顺便提一下,毛主席对文稿的要求是十分严格仔细的。如在《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上方,他批示:“乔木:此件,最好今天能口播,并发文播。假如可能,请谷羽抄正一下。毛泽东三十一早”。手稿发出后,他又写了一封便信:“乔木:蒋介石现在是住在北……,‘现在’二字应改为‘最近期间’,方不与下文业已溜回‘南京’相矛盾。不知还改得及否? 毛泽东。”此件播发时,已按毛主席的意见作了修改。

11 月 5 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是一篇罕见的杰作。这篇消息绝妙地运用历史背景,说明南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战略地位和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其中写道:“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然后笔锋转向今天,写蒋介石如何在此设置重兵,企图遏止解放军南进,而最终不得不弃城而逃,以此为引子进而综述我军一年战绩,纵论战局,以古论今,趣味无穷。如其中写道:“去年7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是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① 这条消息发表不久,毛主席写信给胡乔木,指出要加强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

在淮海战役的决胜阶段,毛主席采取了武力突击与政治攻心并举的策略。在黄维兵团被围困,走投无路之时,为促其投降,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刘伯承、陈毅的名义,分别为广播电台写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随后又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为配合这个战役,新华社共播发了五篇广播稿。这些讲话阐明了我军对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实行宽大政策,晓之以理,动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264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之以情，陈明利害，指示出路，极大地发挥了瓦解敌军斗志的作用。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毛主席及时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新的和平骗局，号召党和人民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起，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一系列评论：《评战犯求和》(1月5日)、《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2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2月16日)、《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2月18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4月4日)。这些新闻评论，在当时极为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也为党的新闻宣传业绩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部队于21日晨，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2日2时，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第一条渡江新闻——《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即著名的"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时电"。这条不到两百字的消息以极其精练生动的语言写道："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①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86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同一天的22时，毛主席又为新华社写了第二条渡江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条新闻报道了“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的壮举。

4月24日，毛主席写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新闻稿。其中写道：“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①

以上三条新闻不仅文字简明、精练，而且写得气势磅礴、有声有色。这些具有高度文献价值的新闻和毛泽东那首“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诗句所体现的意境相辉映，将成为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珍品。

1949年，当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彻底破产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于8月5日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7月30日国务卿艾奇逊编好白皮书之后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的经过。

白皮书发表后仅7天，在8月12日至9月16日的一个多月里，新华社编辑部发表了六篇关于白皮书的评论。这六篇评论，除一评白皮书，即《无可奈何的供状》（8月12日）是胡乔木写的外，其余五篇，即从二评白皮书直到六评白皮书，都是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把从二评白皮书到六评白皮书的题目改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题目，即：《丢掉幻想，准备斗争》（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8月18日）、《为什么要讨论白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93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皮书?》(8 月 28 日)、《“友谊”,还是侵略?》(8 月 30 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9 月 16 日)。这些评论揭露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评论写出了中国人民从此已经站立起来,从此不再忍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的豪情壮志,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的高度。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七

# 1947年在陕北

1947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出乎人们预料地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那么，这个“伟大的事变”是怎样发生的？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是如何达到的？当时，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外。可是，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一切可以说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 1947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6年7月，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忍让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他调集193个旅约160万人（占其总兵力的80%），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其势汹汹，不可一世。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令召集分裂的“国民大会”,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延安,从而关闭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大门。11 月 15 日,伪国大开幕。18 日,毛主席起草了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19 日,恩来同志从南京返回延安。21 日,毛主席约少奇、恩来同志在枣园谈话,胡乔木作记录。毛主席发言的内容,前面已经作过一些介绍。他在这次发言中首先指出,南京谈判是有成绩的,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至失去人心。还说:教育人民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任务,对党本身、对党中央本身也有一个教育的过程。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破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毛主席强调,要胜利就要统一战线,就要孤立敌人。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敌人是孤立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不能直接援助我们,而美国反动派则直接援助蒋介石,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所在。毛主席继续说,我们的问题是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要好转。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就开始反攻。当然,美国还会加强援助蒋介石,新的困难又会产生。所以,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坏一些,不但要准备打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打十年到十五年,最坏就得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一切要照长期战争打算。毛主席的这番话在小范围内传达过,统一了高级干部们的思想认识。

1947 年 2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党中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较多，有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德怀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有从中原突围到达延安的李先念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它的前夜。

这个“高潮”指的是什么呢？毛主席在会上说：二十年前，1927年的北伐，是有共产党以来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十年前，1937年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现在，1947年，将要出现第三次革命高潮。北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形式上以国民党为主体，最后以国民党的叛变而失败。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共产党却坚持抗日，壮大了人民的力量，成了抗日的主体。北伐、抗日，国共两党分掌领导权，这次不同了，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人民革命的目标，共产党成了中国革命的惟一领导者。

毛主席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绝不是凭着主观的想像，而是根据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所依据的基本的事实是两个：

一是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月，我军七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如果今后几个月再歼敌四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几乎要占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半，那么，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是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1946年11月上海市民骚动和12月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由北平学生带头开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反蒋统一战线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断扩大，和抗日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

正是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的事实，毛主席在2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一方面指出要准备五年到十五年的长期斗争，一方面预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也许就在今年、明年、后年。

尽管毛主席和我党中央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预见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和敌人作斗争，但是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又重视敌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兢兢业业”。特别是，当时我军还不强大，在数量上还处于劣势，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很强大，还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毛主席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他对许多事情总是“估计”，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肯定地作出结论。2月1日指示（即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发出以后，对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提法，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和接受，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也存有疑虑，有的同志还专门打电报问中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当时大多数同志看到的是敌人的强大和凶狠，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威胁。当然，他们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但那只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和信念。而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英明之处就是善于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时局能作出清醒的估量，能预见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因势利导地组织和调动一切力量促成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一步一步地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2月1日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延安的形势就越来越紧张，因为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向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延安的命运如何，便成了国共双方和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为此，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主席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放弃延安。过去有人认为毛主席从一开始就要放弃延安以诱敌深入，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即奉蒋介石之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央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瓦窑堡等地。从11月1日至14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给贺龙、薄一波、陈赓等，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渡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12月1日，毛主席电告刘伯承、邓小平：由于我采取坚决措施，迫使蒋介石放弃攻打延安的计划。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提问时，毛主席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由此可见，毛主席尽管从最坏处打算早已准备在情况于我不利时放弃延安，但他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保卫延安并对打垮进犯军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作战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有国民党军队39个旅，共23万人，即南面胡宗南的15万人，西南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7万人，北面榆林地区邓宝珊部1万余人。边区我军最初只有一万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了。因此，毛主席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方法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3月6日，他电令陈赓率五个旅渡河攻占陇海路上的潼(关)洛(阳)线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军队。他在电报中说，胡军17个旅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为配合陈谢纵队渡河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战，毛主席又电令刘邓同时攻击平汉线以“直接援助陈谢”。3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参加保卫延安之战。3月11日，胡宗南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延安。第二天，当常驻延安的美军联络官赛尔斯上校等三人乘飞机离去不久，国民党飞机就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3月14日，胡军第一线部队十万人，从洛川、宜川之线全面向北出击，而我军用于保卫延安的只有五千多人，敌我兵力为二十比一。蒋介石动用一百架作战飞机（占其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三）轰炸延安，最多时一天达四十多架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于14日停止播音，由预先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中央书记处书记少奇、朱德、弼时同志于3月12日凌晨离开延安去瓦窑堡，毛主席、恩来同志留在延安，经常在防空洞里开会、办公，指挥延安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3月16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内称我边区部队必须“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16—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的企图”，为此特组织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右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的左翼兵团，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命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然而，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陈谢纵队没有渡河从外线加以配合，边区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胡军依仗优势兵力和炮火，在飞机掩护下走无人荒山向延安猛攻，于3月18日早晨逼近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军死守延安，必然招致重大伤亡，这样，毛主席才决定主动地放弃延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延安的窑洞住了整整十年的毛主席，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于3月18日黄昏和恩来同志一起离开了王家坪，告别了延安。

## 紧紧抓住蒋介石的“两个拳头”

胡宗南部队于3月19日占领延安，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这一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在政治上，蒋介石采取打延安的步骤完全是“自走绝路”。在军事上，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进攻延安，就是妄图首先“豁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迫使我党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我解放区军民自然也非常关心我党中央的去向和前途，各解放区领导同志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对党中央是不是要离开陕北到其他解放区去，即使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坚持我党中央在撤离延安之后必须留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一方面，在政治上，不但使蒋介石的计划破产，灭了敌人的威风，而且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长了自己的志气，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党中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必然要牵制住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二十几万大军，使其不能东调来进攻东北，从而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为我以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三面有二十几万敌军、敌我总兵力为十比一的情况下，毛主席留在陕北确实带有“冒险性”，而且后来真的两次遇到了危险。另一方面，也正如在他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毛主席科学地预见到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将要起的作用，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终于两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此可以说，党中央留在陕北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盲目的冒险行为，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英明决策。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党中央到底什么时候决定留在陕北的呢？应该指出，毛主席早已下了两步走的决心。第一步，坚决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以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3月19日夜，毛主席在延安附近送别王震将军的时候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0日，也就是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新华社电讯称：“此次保卫延安，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此项目的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3月25日，当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之时，毛主席、恩来同志正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到这里的少奇、朱德、弼时同志会合，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9日凌晨，他们从王家坪到了枣林则沟，一下车连觉也顾不上睡就继续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弼时同志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而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反复阐述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意义。经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仍然留在陕甘宁边区，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刘少奇、朱德过黄河，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中央机关大部分同志随他们到晋西北。这次会议后，毛主席化名为李得胜，恩来同志化名为胡必成。仅从“得胜”和“必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恩来同志面对强敌那种一往无前的气概和战胜一切的信心。

彭老总对党中央的去向极为关心。因为他是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中央留在陕北，他不但要消灭十倍于己的敌人，而且要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毛主席非常了解他的心情，所以在枣林则沟会议结束当天，即3月27日，他就电告彭老总：“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一天，毛主席又给贺龙、李井泉同志打电报说：“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为了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也为了有意迷惑敌人造成党中央东渡黄河的假象，以掩护毛主席在陕北向安全地带转移，恩来同志特意在群众场合公开露面后，过了黄河到达晋西北。为刺探我党中央的去向，国民党早已派遣大批特务到陕北搜集情报，并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毛主席的行踪必须绝对保密。3月29日，毛主席电告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我们昨夜移至绥德以南地区，为迷惑敌人之目的，先向东移，下一步则准备向西移。”就在这一天晚上，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二百多人到达田庄。大家以为要向东走，过黄河，不料毛主席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令队伍于深夜悄悄地向西走去。这是以“昆仑”为代号的中央纵队第一天夜行军。第二天凌晨，人们看见毛主席拄着柳条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既不乘车，又不骑马，而且是背着太阳往西走，无不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怀疑走错路了。当天，即3月30日下午，弼时同志召集各大队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宣布由中央机关二百多人组成的“昆仑”纵队成立，司令为任弼时（代号为史林）、政委为陆定一（代号为郑位），参谋长为叶子龙，副参谋长为汪东兴。会后，各大队进行了传达和讨论，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

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党中央做些什么，又是如何工作的呢？毛主席后来对人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毛主席最关心的是如何多打胜仗。他认为“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到了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抄收各战场来的电报，或者拍发毛主席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到1947年4月，全国各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在冀鲁豫和晋南两个战场已处于完全的劣势，在晋察冀与东北两个战场上已开始变为劣势。对于他的收缩和集中兵力的所谓重点进攻，毛主席曾经打着手势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这一生动的比喻反映了他在撤离延安前后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思和战略部署。

毛主席的注意力首先放在陕北战场。但是，应当指出，彭老总仍然是陕北战场的直接指挥者。说毛主席亲自指挥了陕北的各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战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主席有言在先，要彭老总放手打仗，不要因为中央的安全而有后顾之忧。我军撤离延安以后第三天，即3月22日，彭老总致电中央军委称，胡宗南似判断我军主力在安塞及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的企图，令31旅到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因此我拟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31旅。毛主席虽在行军途中，仍于接到电报当天电复彭老总说："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25日，敌31旅四千多人即被我全部歼灭。这就是撤出延安以后陕北我军打的第一个胜仗——青化砭战役。当人们担心和怀疑陕北我军的兵力如此薄弱，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一仗作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士气，提高了信心，所以有人说它为党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26日，毛主席打电报给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庆祝你们歼灭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在陕北战场的指挥方面，毛主席和彭老总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关系是非常融洽的。4月2日，毛主席在行军间隙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彭老总，内称："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31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老总接到电报当天晚上即复电说明情况，表示异议，内称："敌自青化砭战役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毛主席看了这个电报很受启发，经过缜密的思考，于4月15日致电德怀同志，提出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应该是，"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西北战场的一连串胜利，意义重大。4月18日，毛主席在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敌135旅被西北我军全部歼灭的新华社社论中，亲笔增加了如下两段话："可以预计，从四月开始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紧紧拖住蒋介石伸出来的另一个拳头——山东战场，毛主席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常常为山东战场的严峻形势担心，特别是从延安撤出以后，中央军委与山东电台失去联络长达十天之久，更使他忧心如焚，日夜不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60个旅、约45万大军向山东进攻，企图将我华东人民解放军聚歼于沂蒙山区。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山东战场已成为扭转全国战局的主战场。因此，在陕北战争形势好转之后，他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山东战场上。为及时掌握敌情，他电令陈毅、粟裕同志每天或每两天以当面敌情变动电告一次，主要是敌第一线各军的每日变动要以急电报告中央军委。5月份，毛主席和陈毅、粟裕同志间的电报来往极为频繁。由于毛主席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才胸中有数，指挥若定。但是，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毛主席也只能向陈毅、粟裕提出原则性的看法和建议，由他们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机断处理。

山东战场即将拉开大战序幕。5月4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5月6日，毛主席在电报中再次强调："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胡宗南以31个旅攻入只有人口150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11个旅，有时10个旅，有时9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之方阵，使我无歼击之机会，我们即……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可作你们参考。所不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山东地区较狭，你们兵力甚大，转移不易，自应因地制宜，一切望按情况决定。”5月12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山东战场打响了。5月14日和15日，毛主席连续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同志称：“你们以四个纵队歼击74师极为正确。此次作战，战果大小决定于你们是否集中七八个纵队于一个战场作战，如此则歼灭74师后可以再打83师、25师，连续打两三个大仗，完成中间突破，则全局好转。”经三昼夜激战，我陈粟大军在沂蒙山区之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74师全部及83师一部共3.2万余人，击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74师师长张灵甫。孟良崮大捷标志着山东战局的转变，敌人被迫停止进攻，我军开始夺得战争主动权。

捷报传来，毛主席欣喜万分，当即致电陈粟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不几天，毛主席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陈粟，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

## 刺向蒋介石的“胸膛”——决策进军中原

在把陕北和山东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并给以严重打击之后，毛主席就在思考和部署如何使刘邓大军早日向蒋介石的“胸膛”——中原进军了。中原腹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谁要得到中国，谁就要夺取中原，即所谓“中原逐鹿”。如今，鹿死谁手，决定着战争的命运。1946年6月，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就要消灭我中原解放区，以三十万大军团团包围我中原六万大军。我军中原突围后，毛主席曾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同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提出中原我军之任务，第一阶段是“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第二阶段是“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由此可见，刘邓向中原进军早已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中心一环。1947年1月，毛主席电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止，准备五月开始向中原出动变为外线作战”，同时也电令陈毅同志争取“五一”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准备配合刘邓到外线作战。我军经过几个月内线作战，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毛主席于4月27日电询陈毅、粟裕同志：“你们对刘邓下一步行动意见如何？是出鲁西南及豫东较近地区协同你们作战？还是出中原较远一点配合你们作战，由你们出一部至鲁西南，互相联系？以上两项何者最为有利，盼告。”经过几天的酝酿和讨论，5月4日毛主席致电刘邓、陈粟等，认为现在可以确定，刘邓十万大军立即开始休整，于6月10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机动作战，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5月8日，毛主席再次电令刘邓争取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渡河作战，并电令陈粟集结全力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在指挥打仗的同时，毛主席极其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通过文的一条线——新华社，指导舆论战线，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能听到我党中央的声音。当时，新华社绝大部分人员已由社长廖承志率领由陕北转移到太行解放区。设在瓦窑堡附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3月28日播送了青化砭战役的捷报之后，由于敌人逼近和敌机轰炸而停止播音，从此便由先行准备好的在太行的新华广播电台接替，但仍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播音。留在陕北的新华社人员，起初只有二十多人，编为中央纵队四大队，由范长江任大队长。这支小小的队伍，不管白天黑夜，即使长途行军，也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缝插针，坚持工作。每到一地，他们便架起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文字广播，抄收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等英文广播，译成中文后送毛主席、恩来同志等参阅，供他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新闻等通过四大队电发太行新华总社，再由太行以文字和口头广播传遍各地。此外，四大队还每天将抄收到的新华社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通讯，编辑油印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纵队各大队人员阅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军从延安撤出以后，蒋介石千方百计寻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企图将它一举摧毁。他把在美国训练有素的无线电侦测人员调回国组成测向总队，分驻西安、徐州和陕北的清涧进行“三角测向”，以判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位置。结果是枉费心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每天照常广播，把真理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当人们为战争的结局和中国的前途而忧虑的时候，党中央通过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对各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到处派兵寻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也就是寻找我党中央的所在地，但到处扑空，一无所获。他甚至怀疑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否真的还在陕北。他急于想把他的主力从陕北调到山西，因为我陈赓纵队在晋南作战一个月，连克22座县城和禹门口、风陵渡，严重威胁着胡宗南的后方。可是，蒋介石却一再命令他在陕北捕捉和消灭我党中央首脑机关，这就使胡宗南的二十多万主力深深陷在陕北的泥潭之中，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的。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之后，毛主席于5月5日打电报给彭老总，告他“我们已转到旧安定城西北地区”。事实上，早在4月13日，“昆仑”纵队已离开青阳岔到了王家湾，并从此改名为“三支队”。为了使彭老总不因顾虑中央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全而能放手打仗，毛主席一直未把中央住地告诉他。蟠龙大捷之后第二天，恩来同志找新华社同志去王家湾口授了一篇述评，内称："胡宗南这个'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这篇述评由新华社发出之后，毛主席又从收音机里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感到非常高兴，连声夸奖女播音员讲得好。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尤其是陕北和山东连连告捷，既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在他的意料之外，所以，那些日子，毛主席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提出要开个庆祝大会，决定派恩来、定一同志到真武洞去，代表他和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5月14日和15日，恩来、德怀等同志在真武洞检阅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游击队。在有五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上，恩来同志发表讲话说，这个会既是庆贺陕北战场取得胜利的大会，也是庆贺全国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大会。他在会上庄严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各解放区和全中国人民为之振奋，而蒋介石则气急败坏，恼怒万分。

## 坚持留在陕北——神机妙算化险情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5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无论在战争的第一条战线上，还是以学生运动为主的民主运动的第二条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的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为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毛主席要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一篇社论，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这篇社论写好后，毛主席亲自修改，并将题目改为《破车不能再开》。毛主席在社论中加了两段话，说这个参政会连同蒋介石政府在一起是辆破车。就在这次参政会开会的“第一天，即五月二十日，南京六千爱国学生结队向参政会请愿表示要饭吃，要和平，却被全城军警展开巷战，不许请愿，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们亦溜之大吉，不愿接受请愿”。这一天以后，全国学生展开了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的悲壮神圣的伟大斗争，并且引起了教授、记者、工人和市民的普遍同情。

这篇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即6月6日，国民党飞机就到“三支队”住地王家湾一带盘旋侦察。早在5月15日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就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果然，蒋介石从广播中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并对此确信无疑，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了延安。测向结果发现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蒋介石判断毛主席可能在这里，于是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捕杀。一直犹豫不定的胡宗南也下了狠心说：“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捕捉中共首脑！”

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以后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危险降临了。

6月7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来。“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可是，往哪儿转移呢？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毛主席和弼时同志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毛、周、任、陆定一、胡乔木住在一排两间半相通的“套窑”里。所谓“套窑”，就是一进两开，一进门的过道窑住着恩来、定一和乔木，三个人睡一个炕；毛主席住在左边的窑洞，靠窗户是炕，炕上放着小炕桌，他就日夜伏在小炕桌上办公；弼时同志住在右边只有一个炕的半截窑里。毛主席、弼时同志出入都要经过恩来他们中间的过道窑，平时开会、谈话，即使声音不大也能互相听得见。何况毛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席和弼时同志争论的嗓门都很大。弼时同志提出:我军主力远在陇东作战,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能调兵来掩护中央;敌军四个半旅两三万人,而我们中央警备团只有四个半连,才二百多人;敌人从西边来,如果我们向西走,万一和敌人相遇怎么办;除了刘戡军,西边还有马鸿逵的八个骑兵团,向西回旋余地小,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越往西,人烟越少,粮食也越困难。因此,他认为,往东走比较安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东渡黄河。一听"过黄河",毛主席就很火。他尽量克制地解释道,敌人就是估计到彭德怀远在陇东,离我们有几百里,救不了我们,那么我们只好往东转移,这样他就设下一个圈套,想把我们往东赶,从南边来的这股敌人,就是想在东边拦截我们,即使消灭不了,也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毛主席说:"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他还说:中央机关的安全,不用担心。这点队伍算什么,再大的队伍我也能指挥。天快黑了,"三支队"打前站的早已向东走去,可大队人马还在原地集结待命。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毛主席和弼时同志差不多争论了一天,最后还是恩来同志出面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不一会,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安安静静住了53天的王家湾,上山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主席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半夜雨停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毛主席忽然灵机一动,要"三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同志带一个排到王家湾附近骚扰侦察敌人。汪东兴同志立即带着队伍出发了。

向东追赶的刘戡扑了个空,立即掉头上山向北追去。6月9日,"三支队"到达小河,刚要做饭、架电台,敌机就来低空盘旋,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兵侦察员也来报告，敌人越来越近了。队伍出村不久，天又下起雨来。夜里，只见左边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连敌军的人喊马叫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敌人离得这么近，但是陕北地形之险、地区之大，正如毛主席所说："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敌人没有群众，如同瞎子、聋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乱撞。"三支队"有老乡做向导，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过，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宿营。不料，敌人紧追不舍，也向天赐湾逼近，和"三支队"只隔一个山头，隐隐传来机枪声。情况十分紧张，各大队紧急动员，干部、战士纷纷表示决心，要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除一部电台坚持工作外，全部人员整装待发。雨过天晴，烈日当空，人们在一条狭窄的光秃秃的小山沟里暴晒，闷热无比。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了解敌情，连毛主席身边的内卫排也派出去侦察了。毛主席临危不惧，地图摊在面前，仔细分析敌情。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此十二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果然，下午侦察小组纷纷回来报告，敌人在东南方没有发现我一兵一卒，便不再继续西进，通过尖山一带顺沟向保安方向去了。人们惊叹毛主席神机妙算，成功地唱了一出"空城计"。后来，毛主席指着地图介绍其中之奥妙："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

遇险那几天，中央和各战场的电台联络中断了，加上国民党中央社大肆造谣，说"周恩来受了重伤，毛泽东下落不明"，等等。远在河北平山县的少奇、朱德同志和各解放区领导同志，都为党中央机关、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心焦。脱险当天，电台一架起来，各地就纷纷来电询问中央社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毛主席当即起草了一份给各解放区领导同志的通报，说中央社所说胡军占我保安、青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阳岔、卧牛城是事实。通报称，撤出延安后的三个月来，第一个月陕甘宁边区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步入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对敌斗争。敌以31个正规旅加上保安团队为数二三十万，压迫我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及四万余军队的边区，约为七个半人对付一个敌人。以敌人部署的力量论，山东第一，边区第二；以地区人口与敌人力量相比较，则边区为第一。但三个月战争已使敌人士气沮丧，对前途无信心，我军则士气甚壮，信心甚高。中央机关于4月中旬移青阳岔卧牛城附近差不多两个月，6月9日至11日刘戡军到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通报称，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 一着要棋：陈赓纵队调往哪里？

调陈赓纵队过黄河到陕北作战的问题，一直是毛主席战略部署中的一件大事。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3月，毛主席曾多次电令陈赓纵队渡河以保卫延安。因形势急剧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撤出延安后，毛主席又电令陈赓纵队迅速开展晋南战役，以威胁胡宗南的后方，配合陕北我军作战。晋南战役结束当天，即5月4日，毛主席又决定陈赓主力4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渡河到陕北受彭老总指挥，以歼灭胡军主力，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彭总收到电报后，于5月8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陕北与陈赓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至为重要，六个月即可能完成此任务。但陈赓部队何时何地渡河，须等数日后看清敌军行动再定。为进一步研究和落实西北战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主席于5月10日电告彭总，派恩来、定一同志“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5月14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彭总，要陈赓兵团休整待命准备渡河。5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24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陈赓并贺龙、伯承、小平、德怀等同志，命令陈赓纵队6月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于7月上旬渡河，先到陕北作战然后再到宁夏、甘肃作战，以歼灭胡军夺取大西北。6月6日，毛主席电令陈赓要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反复说明在陕北作战和在晋南条件有很大不同，要准备吃很多的苦，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要有消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雄心，总之，要有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充分准备。6月12日，即“三支队”脱险后的第二天，恩来同志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电令陈赓兵团准备在6月底和7月初西渡黄河到陕北，带足五天干粮和弹药，注意保密不要暴露，并要陈赓沿大理河来中央面谈一切。

6月17日，毛主席率领“三支队”返回小河村，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时候，毛主席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实现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其中心一环就是刘邓大军何时向中原出动。5月4日毛主席曾经电令刘邓军休整，6月10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刘邓接电后曾提出不同意见，要求从6月9日开始以半个月时间歼灭安阳附近之敌并争取再打一仗，以减轻野战军将来出击中原的负担，因此要推迟一个月即于6月底或7月初才能渡河南下。6月3日，毛主席电复刘邓，同意6月刘邓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到6月底，指出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资上的各种准备工作。6月20日，毛主席以迫切的心情电询刘邓：“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定计划出动，盼告，以便令山东与你们配合。”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七个纵队十三万余人，在鲁西南、郓城等横宽三百华里地段，乘一百二十余只木船，开始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斗争的高涨为标志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新高潮快要来到了！毛主席四个月前在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新高潮“一定要来”的预言快要变成事实了。听到刘邓大军安全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河进军中原的消息，党中央所在地的小河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尤其兴高采烈，喜笑颜开。第二天是“七一”，中央机关在小河召开了纪念建党二十六周年大会，恩来同志在会上作报告，回顾了党所走过的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五个特点：一是最彻底的革命的党，二是群众的党，三是武装的党，四是有理论的党，五是团结的党。

为纪念“七一”，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努力奋斗”四个字是毛主席加的。毛主席在修改社论时还加了三段话，第三段话说：“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7月4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为此，毛主席要胡乔木为新华社赶写一篇社论。两天后写出《总动员与总崩溃》一文送给毛主席修改，新华社于7月14日以社论名义发出去了。按照毛主席的意思，这篇社论的中心是：蒋介石的总动员救不了他的总崩溃。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他却偏要大讲特讲，他企图用这个象征的总动员来挽救那个实际的总崩溃。

按照毛主席要求，社论从三个方面作分析。（一）先看军事，蒋介石故意使和谈破裂，在1946年6月底开始全国大打，将他的正规军248个旅中的226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这还不算总动员吗？可是一年作战被我消灭了100个旅，今后一年我军必将再消灭蒋军100个旅。（二）再看经济，蒋介石早已总动员了，这就是总动员保甲长一年四季勒索农民的粮食，总动员印刷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印钞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800倍，而这次总动员前夜的物价约为6万倍。蒋介石的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夜是14亿，日本投降前夜是5000亿，而这次总动员前夜至少在16万亿以上。所谓总动员，就是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人民固然遭殃，蒋介石也难逃财政总崩溃。（三）再看政治，从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就开始总动员了。在政协会后，他就制定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的计划，包括伪造国民大会和宪法，借以欺骗群众。蒋介石多年以来，无论内战打得多凶，总是不放弃宣传他的政治解决。但是，随着他的军事失败，经济困难，“政治解决”这样的残脂剩粉，他也不要了。他决心不顾一切而宣布总动员以求统一内部。可是，一切都挽救不了蒋介石的总崩溃。连孙科也在答记者问“动员令下后，内战是否提前结束”时说：“无法估计，除非上帝谁也不晓得。”

在蒋介石颁发“总动员令”和通缉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这一天，毛主席正在陕北靖边的小河村，和恩来、弼时同志一起讨论如何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为此起草一份电报给彭总，提出两个方案征求他的意见。第一方案是照原来所议调陈赓纵队来陕甘宁边区，在内线歼灭胡军相当数量后出外线作战。第二方案是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新战场，协同彭德怀消灭胡宗南。因为考虑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困难；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敌兵力空虚，如使用陈赓纵队于该地区必然要吸引胡军一个军（5个到8个旅），从而大大减轻陕北负担利于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大军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陈赓纵队到鄂豫陕对刘邓作战亦有帮助。这两个方案究竟以何者较为适宜，请彭德怀、习仲勋考虑，并希望他们到小河来开会面商。

这样，陈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先后来到小河，贺龙、杨尚昆、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小河会议从7月21日下午开始举行，到23日下午结束，一共开了三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会，每天上午自由交谈，气氛极为融洽和愉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毛主席几次在会上发言，由胡乔木作记录。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还说，对蒋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说五年，用不着讲出来，还是讲准备长期奋斗，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又说几个月，现在又说才开始。毛主席反复强调，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向全党全军解释。敌人的把握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内部要精简节约。从全国战略上考虑，也从陕甘宁边区的粮食考虑，小河会议同意中央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即陈赓纵队不到陕北，而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小河会议还专门讨论了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财政、土改等问题，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的资格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并决定在边区成立以彭德怀为首的前委。

## “前有黄河，后有追兵”

小河会议结束后，彭总、贺总、陈赓等立即分赴各地，党中央也准备转移。8月1日，太阳刚刚出山，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大队人马离开小河。从这天起，党中央的代号“三支队”改名为“九支队”。队伍沿大理河川向东北方向进发，开始了连续十九天的长途行军。毛主席或者骑马，或者走路，一边欣赏陕北的大好山川，一边思考着各种问题。每到宿营地，电台立即架起来，和各战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把胡军主力吸引在陕北，以利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彭德怀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开始围攻榆林，毛主席也有意在白天行军诱敌北上。果然，蒋介石于8月7日匆匆到了延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钟松率36师北上解榆林之围，由董钊、刘戡率胡军全部机动兵力九个半旅“尾追毛泽东”，企图将我党中央消灭或赶过黄河。8月8日，敌机即在“九支队”行进途中跟踪侦察、扫射、轰炸。8月9日，彭总电告中央：“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河，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最快也要到十五日才可攻克”，而钟松增援甚急，故决定“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后再攻城”。毛主席当日复电同意我主力先打钟松后攻榆林。可是，没有料到狡猾的钟松率部从横山出长城，沿沙漠急行军，绕过了我军的伏击圈，三天即赶到了榆林，使我既打援扑空，又攻城不下。这时，胡宗南神气十足，急令董钊、刘戡抢占绥德以拦截我党中央。形势急剧变化，敌情越来越紧张。8月13日夜，毛主席率“九支队”急行军，赶在敌军之前到达绥德，过了无定河大桥，终于把敌人甩在后边，暂时脱离了危险。8月14日1时，毛主席致电彭总称，在目前情况下，宜集中八个旅迎击刘戡。8时，毛主席又电告彭总称，钟松今晨在榆林接受空投之粮食，“估计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堡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如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堡、镇川堡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但不知部署是否来得及”。彭老总当即电复毛主席，刘戡令钟松率36师向米脂前进，我军准备迎击该敌。不出所料，钟松率36师离榆林南下了，这一方面使我军有了歼敌主力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党中央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长地带，敌我双方集中了十几万大军。钟松南下，刘戡北上，将我军主力和党中央压迫在佳县及其西北一隅，妄图实行南北夹击。为摆脱被敌军包围的危险，也为了使彭老总放手打仗而不必顾及中央的安全，“九支队”原想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一带，插入敌人后方。可是，派人找船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有找到，又不能涉水过河，无奈，“九支队”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于8月16日到达神泉堡附近。刘戡率大军紧追不放，距离我党中央只有半天行程。而黄河已近在眼前，真如毛主席所说：“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这时，不但原先主张过河的弼时同志，就是原先不赞成过河的恩来同志，也不能不劝说毛主席过河暂避一时，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恩来同志甚至说：“等打了胜仗，我们再过河来。兵不厌诈嘛。”毛主席还是坚决不同意过河，但他却命令西北局机关和伤病员东渡黄河以确保安全。这样，“九支队”又沿着黄河边北上。行军途中，恩来同志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大家再三劝说才上了担架。8月17日，刘戡军扑向黄河边上，但却扑了个空，于是分几路向佳县、神泉堡等地围追，咄咄逼人地向我党中央所处的位置进逼，使“九支队”处在极端危险之中。中央警备团一早接到三道命令，派团长率一个连赴前沿侦察、警戒。队伍又一次在夜间冒雨行军，沿佳芦河往西北方向潜行，中午抵达白龙庙。眼看人困马乏，一个个筋疲力尽，毛主席往石头上一坐，说道：“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敌人上山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8月18日，刘戡和钟松两支大军愈加靠拢，将我党中央夹在当中，就像两块大石头中间的一条缝，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九支队”又出发了，中央警备团大部留在山上，准备狙击敌人。山洪暴发，奔腾的佳芦河拦住了“九支队”的去路。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恩来、弼时同志亲自指挥战士和老乡们架设浮桥。毛主席若无其事地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拿着铅笔专心致志地批阅电报。木桥架好后，恩来同志在桥上来回走了两趟，才让毛主席过河。可毛主席却要机要人员把电台、文件先运过河，然后他才慢腾腾地走过桥去。人刚过河不久，雷雨大作，桥被洪水冲垮了。“九支队”在大雨中行军，在电闪雷鸣中默默前进。8月19日晚11时，彭老总电告中央，我军准备在20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因此不能到中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住地去，请中央转移到刘全塌（离梁家岔20里）以靠近主力。“九支队”当即离开杨家园子到达梁家岔。8月20日凌晨3时，毛主席电复彭总，完全同意对36师的作战计划。电报说，据区政府报告，刘全塌西北15里之刘庄到有小股敌人，因此今天在梁家岔不动，如该敌向梁家岔前进，我们拟向槐树湾方向转移。由此可见，当时我党中央的处境是何等险恶，稍一不慎即有落入虎口的危险。尽管彭德怀主力已经在沙家店附近将钟松36师分割包围，但刘戡主力近在咫尺，敌人两支人马加在一起共有十万大军，而我军只有八个旅共三万多人，这一仗能不能打赢，还要做两手准备。因此，毛主席下令，各大队轻装，备好七天干粮，把文件烧毁，随时准备向西突围。他说：“沙家店一带要打大仗，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这天中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沙家店战役打响了。经八小时战斗，歼灭钟松36师，西北战场我军从此由防御转入进攻。消息传来，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欣喜万分，第二天即到德怀同志总部所在地，向西北野战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又和指挥员们一起研究了西北我军下一步作战方针和部署。会后，他们来到山上观看了沙家店战场，一路上谈笑风生。人们议论的中心自然是全国各战场的形势，想不到这样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3月19日撤出延安之后只有短短的五个月，我军便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毛主席在2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预言的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终于来到了！

##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为了争取这一新高潮的到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做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尤其是六七八三个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最紧张最危险的关键时期。在这三个月内，毛主席经历了陷入刘戡四个半旅包围的极大风险，然后又准备和主持了小河会议。离开小河之后，毛主席连续十九天长途行军，又一次经历了“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大风险。即使在如此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下，毛主席也时时都在关心着、注视着全国各战场敌我形势的变化，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毛主席日夜辛劳，呕心沥血，经常看见他一边拿着电报，一边看着地图，或者一个人踱步，苦苦思索，或者和恩来、弼时同志一起交谈，直到深夜。单在六七八三个月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个战场的电报就有二百多份，占 1947 年他起草的全部电报稿的三分之一。在最危险的 8 月，毛主席利用行军间隙起草的电报就将近九十份，几乎每天平均要起草三份电报。通过这些电报，毛主席作为我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各路大军从劣势变为优势，从防御转为进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不要等到我们的作战力量超过敌人以后再来进攻，而是要不失时机地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向敌人进行战略进攻，使革命战争尽快地发生伟大的转折。“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

一翼，即陕北。小河会议后，彭总即挥师北上攻打榆林，把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全部机动兵力十二个旅吸引北调，以便陈赓兵团从晋南过河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向大别山进军。

另一翼，即山东。小河会议后，7 月 27 日，毛主席电令陈毅、粟裕同志：“主力须移至诸城、莒县地区，吸引敌人向滨海及胶东前进”；同时，“陈（士榘）唐（亮）和叶（飞）陶（勇）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据此，华东野战军组织了东兵团司令部，由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指挥四个纵队在胶东发动进攻，把敌人十五个旅吸引到海边，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同志在山东西线和刘邓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进中原的作战。10月3日至9日，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在昌邑以南歼敌万余人，胶东战场我军转入进攻。10月8日，毛主席电贺许世友、谭震林同志称："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

三军之一，即刘邓大军，如何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一直是毛主席关注的中心。按照毛主席的第一步计划，刘邓大军十三万人于6月30日开始在三天内顺利地渡过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实行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二十八天，歼敌四个师部和九个半旅共五万六千人，打开了南下大别山的通道。按照毛主席的第二步计划，刘邓军准备向中原出击，直下大别山。如果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是1947年毛主席所布下的关系到战略全局的第一步棋，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那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则是1947年毛主席所布下的关系到战略全局的第二步棋，同样也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在他看来，刘邓大军好似一把尖刀，如能突然插进蒋介石统治的心脏——中原腹地，必将致敌于死命。因为我军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可以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这样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动其进攻山东和陕北的主力回援，使我们能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主席认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独特的史无前例的进攻样式：决心不要后方，一举跃进到敌人后方去，先占领广大乡村，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毛主席既充分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也充分估计到在外线作战的各种困难，指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7月30日，毛主席电令刘邓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除告以各种有利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8月7日，毛主席在行军间隙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刘邓军“至少一星期不动”，可就在这一天，刘邓大军十几万人兵分三路向大别山进军了。为什么会如此突然呢？因为刘邓军渡过黄河歼敌九个半旅之后，蒋介石大为震动，果然如毛主席所料急忙从陕北和山东战场抽调部分兵力，加上从中原各地抽调的兵力，共达二十八个半旅、三十多万人，企图乘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之际，用重兵对我实施合围，并扬言要决黄河大堤放水淹没我军。时值雨季黄河水位猛涨，决堤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所以，在此紧急情况下，刘邓下决心不再按计划休整到8月15日，而提前于8月7日全军出动。8月9日和10日，毛主席两次致电刘邓，称赞“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并提出“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那些日子，毛主席的心情极不平静，在陕北是“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在中原是“前有淮河，后有追兵”。刘邓大军的处境也像陕北一样十分险恶。敌48师、7师、58师、10师、3师、65师、52师、骑一旅等十九个旅，紧紧追赶着刘邓军，敌65师的先头部队距刘邓军只有三十多里，而前面却是汹涌澎湃的淮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征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8月30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称，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任务，敌人追截计划完全失败。毛主席看了电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三军之二，即陈粟大军，如何直接配合刘邓进军大别山，也一直为毛主席所关心，尤其在七八月为毛主席所担心、所揪心。在孟良崮战役打破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以后，我陈粟大军五个纵队于七八月间先后西渡运河，进入鲁西南地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和敌人周旋，拖住了敌人在鲁西南的全部驻军和8个机动旅，有力地掩护了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军。但是，由于敌人狡猾地龟缩一团，我军兵力分散，加上气候恶劣，天天下雨，南麻战役、临朐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役等接连几仗没有打好，部队士气大受影响，敌军气焰嚣张，扬言要把我军赶过黄河以北。7月30日，陈粟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接连几仗未打好，待检讨后详细具报。"毛主席非常体谅战场指挥员的困难，总是说"天下没有常胜将军"，鼓励他们总结失败的教训以利再战。8月6日，毛主席在给刘邓陈粟的电报中说："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便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当然，毛主席为了全局的利益也敢于批评，而且往往是毫不客气的。8月30日，毛主席未见陈粟大军采取更加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给陈粟的电报中说："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我们对于陈唐叶陶二十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罗广文、张轸、王敬久等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第二天，即8月31日，陈毅、粟裕即来电说明情况，因船太少，天雨夜行，道路泥泞，在渤海渡黄河迟缓，在惠民多留几天，以便坐催新兵弹药等西运接济陈唐，24日晚到聊城，定9月3日晚率6、10两纵队于寿张东南渡河与陈唐会合。9月1日，陈粟致电所属各部称，毛主席于8月24日"电示我们担任黄河以南、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的新任务，完成此任务要相当长时间，主力会合后要连续歼敌，破击陇海路并迅速向南扩张，支援刘邓，策应山东，吸引敌主力在陇海路南北与我争夺"。9月7日，我军发起沙土集战役，全歼敌整编57师二万余人。这是陈粟大军外线出击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后，陈粟大军六个纵队十八万人挥师南下，越过陇海路，在豫皖苏平原地区连续作战，大大减轻了刘邓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大别山的压力。

三军之最后一路，即由陈赓、谢富治、秦基伟、孔从周等领导的太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按照毛主席8月14日电示，应于8月20日开始由晋南渡过黄河，25日前渡完，和陕北我军攻打榆林以吸引胡宗南主力南北呼应。可是，陈赓当天电复中央称，“4纵已出动三日，先头部队已到达阳城西，但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交通全断，我们异常焦急。”毛主席在复电中说：“你们推迟几天待水退后渡河是好的，并可以迟几天惊动胡宗南，以利陕北我军配合行动。”8月23日，陈赓大军八万余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25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训斥胡宗南在陕北连连失利，如今陈赓军又威胁西安，要他令董钊、刘戡率部“迅速南下”。26日，毛主席在给陈赓的电报中说：“一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你们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27日，毛主席电告陈赓：“胡军六个半旅今开始南退，我军正跟踪追歼。胡主力只有三个旅，歼灭此三个旅，胡即毫无办法了。总之，兰州以东、长城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广大地区，主动权业已转入我手，望你们放手发展”。29日，陈赓电告中央军委称，“我们对军委意图了解有偏差，过河后主力向东南，准备乘虚抢占洛阳西边。因渡河经验不够，组织欠周密，雨中走山路，驮骡死病很多，河岸道路狭窄等关系，先头部队过河后炮兵、担架等隔断，故发展迟缓。”30日，毛主席电复陈赓，指出：“你们现在作战比晋南时环境大不相同，每一次大的行动计划，必须事前报告军委，必须迅速报告敌情我情民情，我们方能及时帮助你们。此次渡河你们重点放在东面，而洛阳附近为敌所必争，不应用主力，西面敌人空虚，攻取较易。现在改变，调头西向，致使丧失几天宝贵时间，给了胡宗南在西面完成其部署的机会，极为可惜。但胡军主力尚在绥德、米脂地区为我军所抑留，洛川以南只有几个旅及若干特种部队，这点对于你们极为有利。望速以全力抢占陕县至虎氏一线，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制洛阳之敌，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薄弱点，在运动中歼敌。”此后，陈赓兵团在豫西纵横驰骋，节节胜利，歼敌一万二千余人，将豫鄂陕解放区扩展到南临汉水、北至陇海、西越丹江、东至平汉路的广大地区。

## 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和中原敌后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所以能够实现，是和我军在东北、在晋察冀英勇作战以及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分不开的。

1947年4月初，东北我军结束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在东北的进攻，扭转了东北战局。这时，正值党中央撤离延安，和东北失去电台联系也长达十天之久。毛主席对东北战场的形势十分关注。5月13日，东北我军又展开了夏季攻势，毛主席非常高兴，于5月20日致电林彪、高岗称：“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13军、92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一年以后进行的辽沈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早已在毛主席的战略构思之中。7月1日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胜利结束，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县城四十座，迫使敌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转取所谓“重点防御”，从而改变了东北整个局势。7月10日，毛主席专门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高岗，就战争第一年作战总结和第二年作战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8月29日，毛主席致电林彪、罗荣桓，希望东北我军9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希望东北我军“能于明年四月底五月初，以三至四个有力纵队开始平绥线上之作战，首先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鉴于林、罗来电建议中央迁往东北或毛主席能到东北去一趟，毛主席电报的最后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9月14日，东北我军发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到11月3日结束，历时五十天，共歼敌六万九千人，收复中长路、北宁路沿线广大地区。至此，东北之敌被我完全孤立于长春、吉林、沈阳、营口、锦州等点线及其附近地区。

毛主席对晋察冀战场极为关心，曾经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1947年4月8日，晋察冀野战军向石家庄外围发动进攻，歼敌一万余人。这时，保定以北敌军正在进攻冀中解放区。晋察冀我军不为敌人行动所牵制，继续西进攻占正(定)太(原)路阳泉以东各据点。毛主席收到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电报后答复称：“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太原之敌两个师来援，我军将其包围歼灭。正太战役至5月8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余人，收复了阳泉工矿区和平定、寿阳等县，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的联系，并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应该指出，少奇、朱德同志离开陕北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之后，对晋察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推动。9月19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同意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为着加强晋察冀工作之目的，决定派彭真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帮助与指导晋察冀工作”。10月22日，晋察冀我军于清风店附近一举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生俘敌军长罗励戎、副军长杨光铚等，毛主席立即打电报表示祝贺，指出清风店大歼灭战的胜利有巨大意义。11月1日，晋察冀我军准备攻打石家庄前夕，毛主席致电少奇同志，提出朱总司令到部队帮助整训很好，但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11月12日，晋察冀我军解放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石家庄，歼敌二万四千人。毛主席当天打电报“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敌二万余人之大胜”。

对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毛主席经常提起并发出由衷的敬佩之情。这里不能不提到，1947年5月28日，毛主席在构思“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之时，特地亲自为中央起草了一份慰问电，给郑位三、李先念并转中原军全体同志，该电称：“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位三、先念二同志领导之下，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陕北我军在沙家店战役之后，先后进行了岔口战役、清涧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而使党中央的安全有了保证。“九支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神泉堡过了一个欢乐的中秋节。毛主席在神泉堡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由毛主席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在六十七条口号中,由毛主席加写上的有十五条。在“坏人悔过自新”后边,毛主席又加了一句:“准许将功赎罪”。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个《宣言》、两个《训令》的发表,使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人们感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真的来到了!

## 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1947年12月会议

11月22日,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九支队”从此改为“亚洲部”。来杨家沟之前,毛主席在佳县的谭家坪住了几天。他走门串户,访问了十几家贫苦农民。由于支援前线、敌人摧残,加上庄稼受冻,陕北人民的生活很苦,有些人家眼看就要断粮了。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非常焦急、难过,立即找到佳县县委书记说:“一定要把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切切实实地安排好。我讲的切切实实,就是说不是一个区、一个乡地安排,而是要一村一户地安排。”来杨家沟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弼时同志商量决定,“亚洲部”全体工作人员和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一两粮,帮助群众渡荒。毛主席每次吃饭都要问管理员:“今天我的一两口粮节省下来了吗?”他还对饲养员说:“把大青马的料减上一半,我以后出门可以少骑马。”很快地,“亚洲部”全体人员节约了七十石黑豆和三十石小米,分给杨家沟和邻近各村的贫苦农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杨家沟是陕北地区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十八万亩土地。其余二百户人家中，除一户中农外，全部是贫雇农。毛主席不但派出一批工作人员参加杨家沟的土改，而且还抽空亲自参加土改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在部分区、乡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毛主席听到有的干部随便没收粮食时说："贫雇农生活困难，中农有粮食可以借，将来逐步还，但不能没收。"他一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打了一个比方说："贫农好比骨头，中农是肉。一个人只有骨头没有肉，那就不成其为一个人了。"

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叶剑英、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罗迈(李维汉)、李涛等人。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决定指出，毛主席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这次会议的其他重要决定有：1.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 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林彪在1947年春夏之交曾经打电报给毛主席，建议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在7月25日复电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在12月会议上，又有一些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这一决定。这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主席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在撤离延安八个月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在使毛主席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分析敌我形势时说：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很孤立，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根本解决，直到这一两年来才解决。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困难严重，我们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但可以解决，根本出路是土改，而蒋介石没有出路，况且我军主力又打出去了。

毛主席说，从现在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以前我们希望高潮有城市暴动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困难的。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战争需要不间断的，不让蒋介石喘息，但也不能说死。我们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政策，依靠群众。

毛主席说，关于统战，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以便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害怕到国民党区去，害怕美国。到国民党区，我们三路出兵，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证明了并不可怕。第二是对中间派认识模糊不清，但政治上打击与经济上消灭不同，内战时期混淆了这两点。因此，对中间派问题也是既反右又反“左”。对消灭封建阶级，如同对美蒋斗争一样，在全局问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中则要谨慎。有的同志则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

毛主席最后说，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会议讨论时非常热烈，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王明、贺龙、任弼时、习仲勋等同志先后发言。恩来同志说，半年转入进攻，各战场无例外地转入主动。现在切忌骄傲，我们才四分天下有其一。彭总说，毛主席的报告现在发表很好，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中易于怯敌，军事上如此，地方工作亦如此。华北各根据地土地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均由“大体上已解决”的估计而来。贺总说，陈赓一出去就搞土改，我觉得是太早了。伏牛山土地很集中，地主都有寨子武装。要先消灭胡宗南反动派，统一战线要广泛些，等站住脚再保护群众翻身。西北野战军到关中也要注意这一点。另外，部队中非战斗员太多，要精兵，提高质量。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结论。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二十年未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北伐时期局面也很开展，但优势问题未解决，反而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战争频繁，党内纠纷太多，一直到长征，这是革命的最大难关，幸而渡过。抗日时期，特别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本投降，形势一直严重，我们处于只有招架不能还手的地位。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严重的内战危险临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本投降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份心，对形势只能估计“有利于我”，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作出结论。现在不同了，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现在能作出结论，不是估计，而是事实，我们确实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占了优势。毛主席还说，我们这次会议，同今年7月小河会议不同，要解决新的问题，即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中农问题所以提出，因为划成分在晋西北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了不团结中农的问题。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

在报告中，谈到10月13日少奇同志主持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时，毛主席说：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是最伟大的一次整党，增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及党员的地主思想洗掉了，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一个伟大的会议。今天，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谈反“左”问题，才不会给群众泼冷水。毛主席又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反“左”。

谈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毛主席说，12月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作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1. 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肯定了的。2. 宣布蒋介石是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垮他是肯定了的。有些人赞成打倒蒋介石，不赞成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不懂得蒋介石是代表，官僚资本是基础。3. 推翻地主阶级，这是不错的。我们要打垮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但不能用打蒋介石一样的力量去打千百万地主富农。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三条不错，其余就不会错。此次会议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

12月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经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营垒中引起了不安和恐慌，也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开会期间，正是毛主席五十四岁生日。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很想给他做寿。但是，毛主席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五十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更用不着祝寿。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这样，12月26日那天，毛主席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同志从晋绥带来的平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1947年快要过去了。毛主席把“亚洲部”各大队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辞旧迎新。人们的心情都很激动。正是在这一年，如毛主席在解放后一次谈话中所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总理补充了一句：“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一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的这番话,各大队负责人体会最深刻,感觉最亲切,因为他们从延安撤出以后跟随毛主席转战千里,亲眼目睹了这个伟大的事变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尤其钦佩毛主席的预见性,由衷地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列宁曾经说过:"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① 人们亲眼看到,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预言"三个月到五个月"、"半年之内"要"消灭共军"等等,最后都变成了昏话而破产;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也许今年、明年、后年"等等,最后都变成了事实,而且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原因是,蒋介石依据的是反革命的主观愿望,而毛主席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回顾以往,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心情激动。他对各大队负责人说:"1947 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这个年。"

当 1948 年元旦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又一次预言:"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而毛主席在陕北的杨家沟,热情地向大家举杯祝福:"1948 年,我们要以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胜利!"

---

① 《列宁选集》1972 年版第 3 卷,第 576 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八

# 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中国革命的高潮迅速到来了。从1948年初到1949年中，毛主席领导全党为夺取全国政权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指挥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并为新中国绘制了蓝图。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气魄。他做出的战略决策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仅使我们党赢得了军事上的辉煌胜利，而且为新中国奠定了立国之基，使我们把军事胜利成功地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胜利。

## 土地改革中的纠“左”与具体政策策略的制定

1948年上半年，战局的发展比较平稳，这使毛主席有可能把相当精力用于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从陕北的杨家沟迁移到河北的西柏坡，毛主席沿途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土改情况。

对旧的土地制度实行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就已展开。1947年10月，党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度，原则上采取平分土地的办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土地改革运动按照新方针迅速深入地发展。但是，在纠正了前一阶段右的偏向后，土改运动中又出现了“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以及在一些地区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这些新问题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

1947年底，中央召开12月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的问题，讨论了对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证土地改革的主流必须反对“左”的浪花。新年前后，他反复告诫党的高级干部，既要反对右的倾向，也要反对“左”的倾向，当前尤其要反对“左”的危险倾向。对于这次纠“左”，毛主席在方法上很谨慎，但态度很坚决，尤其对高级干部抓得很紧。元旦过后，毛主席在致各地领导同志的电报中不断询问纠“左”的情况。在元月、二月，他草拟的重要决定和指示大都与此有关。其中几篇重要指示后来被收入《毛选》第4卷。此外，他还审阅修改了弼时和恩来同志起草的有关文件，并主持制定了其他一些文件。

回顾起来，毛主席亲自掌握的这次纠“左”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纠正错误倾向与充实党的土改政策结合在一起，重点放在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上；第二，中央提出的政策在贯彻之前，先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经过几上几下才形成正式决定。那段时间，毛主席不仅与在中央工作的少奇、恩来、弼时等同志讨论土改政策问题，还经常与小平、仲勋、陈毅、彭真、一波、粟裕等许多同志通电交换意见，及时对不同地区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因此，这次纠“左”很有成效，纠“左”的过程也就是把土地改革引向深入的过程。

大家知道，正确地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是土地改革面临的一项十分复杂、十分细致而又工程极其浩大的工作。可以说，这是保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土地改革沿着正确轨道顺利进行的关键。毛主席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要求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分成分的问题,发现错误必须纠正。当时,错划了一些人的成分是各解放区土改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毛主席发现,在观察及划分阶级的问题上,在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广泛地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参加土改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不懂得划分阶级成分的方法。他认为,要纠正和避免这类错误仅由领导提出批评是不行的,还必须制定一个完备的文件,在土地法大纲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具体明确地提出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政策,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有所依据。

1948 年 2 月,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准备了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这个文件有 25 章,共 2 万余字。前 5 章分别论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划分阶级的标准,通过阶级成分的方法,家庭成分和本人的成分,以下各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我党的政策逐一做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最后两章是关于犯罪分子的处理和人民法庭的工作原则。像这样一份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中国社会阶级问题的文件,以前还没有过,因此,毛主席对它的重视是不同寻常的。他先后召集恩来、弼时等同志开了几次会,就有关问题给他们写了七封信,并确定由胡乔木起草。在前两章,毛主席增加了较多的理论论述,可以说基本上是他的思想。后面各章,他逐段做了推敲、修改。2 月 15 日,初稿完成,毛主席立即让新华社电台拍发全国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召集会议,逐条讨论,向中央提出意见。这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讨论延续了几个月。后来,这个文件没有公开发表。原因可能是毛主席始终觉得它不够成熟,形势的迅速发展又使他无暇再思考这个政策性非常强,文字要求十分细密的问题。但是,由于文件对划分阶级的方法从基本理论和具体政策两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在各地高级领导干部中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它对土地改革运动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解放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毛主席还请少奇同志参阅此件。

土地改革中,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是把解放区划分为三类,在实施土地法时采取不同策略。在这个决策形成的过程中,各地领导同志的意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月4日,仲勋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西北局并中央。他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与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基本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不超过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许多原先的地主富农土地早已被没收,参加劳动最少在八年以上,成分已经转化。他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几天后,报告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非常重视,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同时,他还提议仲勋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到各县巡视。1月20日,根据仲勋同志再次汇报的西北老区情况,毛主席批示,要求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相同情形的,一定要密切注意"左"的错误,并指出"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仲勋同志的建议是针对西北老区的,毛主席在吸收和采纳这些意见时将老区的范围扩大至包括抗战时期建立的所有根据地。

这段时间,毛主席考虑更多的是新区土改政策问题。1月14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日，毛主席给小平同志一封电报，提出几个问题请他回答。主要是新区土改究竟是按照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暂不动富农和某些小地主；是否要把新区划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政策；以及在新区如何争取更多的阶层和人士与我党合作。1月22日，毛主席又就新区土改给粟裕同志一封长电，初步提出新区土改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第二阶段，再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他还修改了原先在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的设想，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骤地完成土改。毛主席说，土改工作不能性急，“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

在考虑比较成熟之后，2月3日，毛主席在致少奇同志的电报《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中，概括地提出了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基本原则。即：在日本投降以前建立的老解放区，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不是再来分配一次土地；占解放区绝大部分的半老区，也就是在日本投降至大反攻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平分土地；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应分两个阶段实施土地法。随后，毛主席又分别致电各大区的领导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对各地的经验和建议毛主席十分重视。例如，收到小平同志2月8日关于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他很快就批示转发，并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2月15日，在进一步吸收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毛主席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对新区如何开展土改工作做了全面细致的说明。22日，恩来同志起草了《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经毛主席修改后，公开发表。区分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策略实施土地改革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使老区半老区更巩固，我们的农村工作可以顺利地转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有力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支援前线;在新区使我们能够避免乱子,很快站稳脚跟,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我们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已经大大丰富和成熟了,土地改革运动也迅速走上正轨。

这次"左"的倾向虽然主要出现在土改运动中,但波及范围较大,实际是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土改运动触及面极广,它影响着我们党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影响着革命队伍内部的众多成员,特别是那些非工人和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同时,土改政策也与我党的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段时间,朱总司令提出了关于工商业职工运动中"左"的问题,彭德怀同志也报告了工商业税收政策中的冒险主义问题。毛主席都做了批示。

在纠"左"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它的提出解决了土改中"左"的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1948 年 4 月,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后,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非常重视。7 月,经他们审定,以"新华社信箱"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其中指出,毛主席所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

① 见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书标准本。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但其结果，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倒退。因此，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实行土地改革后，要避免农民群众重新分化，绝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而是实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最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

由于毛主席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一度在基层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左”的情绪和平均主义思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基本得到纠正。这不仅对土地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党不久将实行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左”的和平均主义思想如果不及时解决，我们党很可能过不好接管城市这一关。

## 集中权力于中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为保证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为使我们党能够胜任即将负担的领导全中国的使命，加紧党的自身建设已变得刻不容缓。在贯彻实施土地法大纲以后，党中央有步骤地开展了清理基层组织的工作。这主要是为配合土改，解决党内存在的某种程度上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在1948年，除继续完成上述工作外，毛主席又强调集中权力于中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为此，他提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宣传工作，培训大批干部等。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强化全党的指挥系统，提高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政策水平，为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做好组织上的准备。

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是毛主席抓得最紧的一环。1月7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他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3月25日,他又草拟了一个补充规定。这两份指示要求,从这一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应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财政经济、整党、外交、工青妇运、宣传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报告不必长,每次着重写几个问题,但必须带有"政策性的综合"。不仅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要报告中央,而且下级向上级所作的报告凡涉及重要的政策及策略也要告知中央。为防止压制不同意见,毛主席还说明,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他们中的任何人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照转。在这一制度开始实行之后,毛主席经常督促,要求各兵团及各地负责同志"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4月10日,毛主席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出,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这种必要准备之一。当时,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往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甚至还有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毛主席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我党我军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和农村的环境之下，为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能够发挥自动性和积极性，中央曾允许各地方保持很大的自治权，以渡过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有损革命事业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阐明了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

在中央发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指示之后，各地区领导同志一般都能按时向中央报告。例如，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中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毛主席十分满意。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因迟迟不做报告而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其中，要数林彪受到的批评最多。3月下旬，毛主席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途中，他打电报给林彪并东北局，批评他们已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8月上旬，毛主席以中央名义再次批评林彪和东北局，指出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3月、5月、7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8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致电催促林彪并严厉地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均无如你们那样畅通的交通工具”，何以他们能按规定做报告，而你们则反而不能做。“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在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一再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1347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促之下，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出检查。收到东北局来电后，毛主席于20日、22日两次复电，指出："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毛主席还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经过毛主席的严格督促，各地加强了请示报告。当年秋天，中央召开9月会议时，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这一点已经有了充分一致的认识，一些地方存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也基本克服。

我们党即将成为全中国的领导者，但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怎样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许多同志并不清楚。1948年上半年，毛主席在一些文件和指示中对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问题，对政策和群众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这些思想对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是很有教益的。

在1月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着重谈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他强调："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统一战线，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侵犯了一部分中农、中小资产者、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利益，毛主席说："我们的政策要正确，如果我们这方面的政策不对，统一战线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那么，怎样才能保证统一战线的不断扩大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呢？在几天后通过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毛主席对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 这段话言简意赅，道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实质和实现领导的基本条件。它既是有感而发，也是对我们党从大革命时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深刻总结。

不久，毛主席又对党的政策与群众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做了总结。在3月6日致少奇同志的电报中，毛主席说："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涉及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这段话有两个要点：第一是说政策的正确与否有待群众实践活动的检验，而群众实践活动的结果又取决于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第二是说直接指导群众行动的政策必须具体明确，仅作一般原则性的说明是不够的。毛主席对第二个要点是很强调的。根据从土改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他说：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分清界限,“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后,政策问题,凡属需基层干部党员或连队战士加以贯彻执行的,毛主席一概要求制定得具体明确。有了正确的政策,这还只是问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如何把正确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关于第二步的问题,毛主席有两段非常著名的话,这就是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时所说的:“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

要加强党的领导,仅提出正确的原则和政策还不行,还必须健全领导制度。5月27日,毛主席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合。从这时起,为便于研究形势和处理各种重大政策性问题,毛主席决定中央领导同志实行集体办公。这就为全党树立了集体领导的榜样。当时,集体办公会议一般由恩来同志主持,参加者除了少奇、朱德、弼时同志外,还有董老、剑英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为使集体领导成为各级党组织自觉遵守的一项制度,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必须加以改变。决定规定,今后从中央到各级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通讯社和报社等党组都必须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提出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19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发展党内民主。他说:“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足,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会议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决议。不久,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具体提出了党委会工作的十二条方法,进一步充实了党委制的内容。

这些措施的提出使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变得比较完善了。历史地看,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搞得最好的时期之一。

## 两次政治局会议和三大战役的决策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

决战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开了 6 天,从 9 月 8 日至 13 日。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彭真、董老 7 位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14 人,以及重要工作人员 10 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从一个侧面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解放区,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大的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谈了八个问题。随后,大家围绕毛主席提出的要点结合自己负责的工作进行讨论。大家发言时,毛主席经常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会议的气氛很活跃也很热烈。最后,毛主席作会议总结。这次会议反映出我们党内的思想、意志和纪律已达到高度统一。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重申了 1946 年提出的对国际形势的三点估计。即:世界大战的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美苏之间在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干国际问题上将或迟或早达成妥协，美苏之间的妥协是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他说："反动派从古以来，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两条原则，我们今天是第一条。"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谈道，几次看到美国气势汹汹，担心世界战争会打起来，担心美国会直接干涉，但两年多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毛主席的估计，美国是纸老虎，外强中干，这就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个很大顾虑。不过，党中央当时并没有排除美国在局部地区实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恩来同志在发言时提醒说，还有一种可能，即是美帝出兵，我们不能不作此估计，但大批的、几十万上百万恐怕不可能。美国可能由此控制一些最大的城市，使我更需组织大的力量去围歼，夺取胜利所需的时间可能长些。

毛主席讲的第二点是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这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毛主席当时所说的5年时间是从1946年中算起，预计到1951年中完成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他在作结论时又补充说明，所谓蒋政权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也不要紧，蒋的力量80%在江北，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把它打倒了。

关于要不要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毛主席说，我原则上不反对，但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毛主席估计，可能遇到两种困难，一种是大的，我们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还有一种是比较小的。他说，我们党曾遇到过两次大困难，是在两次大错误之下产生的，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5年的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里长征。后来的困难比较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的困难就是假设我们估计错误，世界战争爆发了，而且爆发得很快。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国际方面可能援助我们，再有三年就能打倒国民党。如果我们估计不足，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干？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也不怕，我们对此有了精神准备。其他的困难有大的旱灾，指挥失误、军事上不顺利。毛主席说，这些都有可能使战争延长。在讨论中，来自前线的同志大多谈道，经过两年战争国民党更加困难了，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为了支援前线，各解放区的负担已达到极限，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十分缺乏，继续从解放区征兵扩军几乎已不可能。许多同志提出要把战争负担加到敌占区去，部队兵源的补充主要依靠俘虏敌军。在总结时，毛主席强调既要充分估计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在会上，毛主席还明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毛主席说，如果李宗仁等人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那时有两种情形，或拒绝和谈，或进行和谈。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则打之；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努力做到继续打下去，不上他们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关死门；那时如果说要谈，就派代表去谈，在谈判中教育群众。毛主席预计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快就出现了。由于思想上策略上已有所准备，事到临头处理得很好。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如加强纪律性、发展党内民主和准备干部等前面已作了叙述；还有一些问题，因与对新中国的构想有关，留待稍后再叙述。

9月会议一结束，毛主席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到对三大战役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指挥。经过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敌军则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大约在1948年初，毛主席就开始考虑要打几场大仗，但想法还不明确。此后，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到7月至10月间，三大战役的轮廓陆续变得清晰起来。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总的战略形势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国民党军在总兵力上还占有一定优势，但它的大部分力量已被钉死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大城市和交通线上，处于被我军分割的状态，机动兵力比我们要少得多，因此我军掌握着战略主动权。第二，在组织辽沈、淮海、平津这三个决定性战役时，我军在各个战场上面对的都是敌方拥有数十万人的重兵集团，而在各战区的敌我兵力对比上，我军尚未占优势或仅占相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寻求战略决战，每战务求全歼敌军，不仅需要极大的魄力、决心和勇气，还必须全局在胸，有周密细致的安排，并准确把握每次战役的时机以及每个环节的衔接。一旦指挥失当，发觉处境不利的敌人就可能实行战略撤退，与其他军事集团靠拢，重新组织防御，使我军失去大规模歼敌的机会；特别是每场战役的首战，如果受挫就可能影响整个战役。任务很艰巨，战场形势又瞬息万变。说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高超，高超在什么地方，不了解这些情况就难以理解。关于三大战役，人们已写得很多，特别是许多亲身经历这些战役的老同志写了回忆录。这里仅就毛主席决策的关键之处简略地说几点。

在辽沈战役中，毛主席最重要的决策是以极大的决心，选择敌人防御相对薄弱而对全局来说又最关键的锦州作为突破口，实施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取得整个战役的主动。从东北战场局部来看，依次打长春、沈阳、锦州似乎更为稳妥，风险较小。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比如我们的部队还不善于对设防坚固的大城市作攻坚战。但是，这样打最大的问题是有可能迫使原先处于是撤是守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棋不定的卫立煌集团拼全力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一带，守住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要道，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从消灭蒋军有生力量的全局来看，这是很不利的。因此，早在1948年2月7日，东北我军正开展冬季攻势时，毛主席就根据这种可能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他们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路，截断敌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首长于4月中旬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南下北宁路及入关作战极为困难，提议先打长春，并以此吸引沈阳之敌增援而歼灭之，得到军委同意。此后，他们又数次变更计划，至7月中旬，提出还是以南下作战为好，但仍有所犹豫。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9月7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最后决心，作出战略决断，指示东北野战军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至唐山一线，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而置长、沈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主席还要求林彪、罗荣桓等“确立你们前所未有的打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发动至11月2日结束，完全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并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创造了条件。

辽沈战役刚一结束，淮海战役就开始了。这场战役是我军在数量上仍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发动的大决战。毛主席在决策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根据全国形势的巨大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扩大战役规模，将原先准备分几步实现的战略意图一举完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从“小淮海”到“大淮海”。9月24日，在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粟裕同志向中央提出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毛主席复电同意并加以指示。至10月中旬，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根据这一部署，淮海战役后尚需根据情况再打几仗，才能把固守在徐州一带的敌人全部吃掉。但是，在战役发起前，战场形势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预订部署顺利攻占郑州、开封，主力得以挥师东进；第二，辽沈战役于11月2日结束，全国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敌我力量的总对比改变了。这两点变化，特别是第二点变化促使毛主席下决心打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11月1日，毛主席根据粟裕同志的建议，决定淮海战役由小平、陈毅同志统一指挥。11月7日，战役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第二天，毛主席发出指示，扩大淮海战役原定规模，准备全歼以徐州为核心的刘峙集团。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的总前委出色地贯彻了这一战略意图。经过两个月零三天的激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万余人。这场战役的结果，正如毛主席在11月16日致淮海战役总前委电所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辽沈战役结束后，面对不利形势，傅作义集团需要迅速作出抉择的严重问题是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还是实行战略撤退。对我军来说，这场战役决策的关节点首先在于能否稳住傅作义集团，为将其就地歼灭创造条件。毛主席形容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他巧妙地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使这只"惊弓之鸟"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灭顶之灾。11月18日，毛主席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隐蔽入关，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11月23日，战役第一阶段开始，我军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示，首先攻击张家口、宣化诸点，吸引东面之敌西援，拖住平津之敌，使其难下从海路逃走的决心，同时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完成对天津、北平、塘沽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争取时间。随后，毛主席又提出"围而不打"、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隔而不围”的战术原则，以待整个部署完成之后，再各个歼灭。到12月20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毛主席的部署完全实现了，我军此时已胜券在握。平津战役决策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在进行战役部署时，毛主席就提出要“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并指出“此种可能很大”。从12月中旬起，毛主席陆续发出指示，直接指导与傅作义的谈判。但是傅作义一直犹豫动摇，直到我军解放了天津、张家口之后，才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我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此役歼灭和改编了52万国民党军，并创造了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后来实行的“绥远方式”三种形式，这对进一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大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在9月会议上提出的把国民党军队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设想，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还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激烈展开时，毛主席就对全国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1月14日，他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兴奋地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两个半月以后，平津战役的结束进一步加快了全国形势的变化。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着重揭露了中国反动派和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和平”阴谋，说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革命人民对垂死的敌人绝不能妥协，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允许半途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废。

1949年1月6日至8日，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对9月会议以后全国形势的发展作了总结，提出了全党在新的一年里的17项任务，包括：渡江南进，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正规化；提高工农业生产，继续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组织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等。显然，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我党的工作重心正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

在1月会议上，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值得全党警惕的几个问题。首先是“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列宁说过“推翻敌人容易，建设国家难”。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其次，毛主席指出，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群众脱离国民党转到我们方面来了，自由知识分子也向我们找出路。现在，站到我们这方面来的民主人士中，有的是右的，来不轻易，风色看好才来的。我们已有了胜利的把握，国民党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极大混乱与崩溃状态中。他再次强调，在这种时候，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妥协。最后，毛主席提出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政策的问题。他说，关于美国出兵的问题，不去讲它不出兵，而是准备它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而不至于手足无措。应该认识到，我们力量越大，美国干涉的可能越小，帮助国民党打的可能也越小。半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对蒋介石的兴趣也不那么高了。美帝在中国已经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对看不见的东西，人们就容易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美帝的政策有两面，一面是帮助国民党打我，另一面是唆使右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将来，美帝甚至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派人搞破坏工作，必须提高警惕。以上三个问题，毛主席在1949年初反复讲过多次，目的就是一个，防止胜利前夕再出现曲折，防止取得全国政权后又出现李闯王式的失败。

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使蒋介石政府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在军事上已无计可施，国民党果然如毛主席预料的，开始了所谓“和平攻势”。蒋介石在元旦发表的声明中宣称，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①。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人物则在密谋策划倒蒋活动；他们打算在蒋介石下野后，与我党谈判，达成所谓“局部和平”，以争取时间和美援，摆脱困境，实现划江而治。

为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毛主席立即为新华社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对于举行和平谈判问题，毛主席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1月14日，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毛主席提出了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②。为避免党内干部和民主人士发生误解，第二天，毛主席

---

① 蒋方提出的和谈条件是：“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② 我方宣布的和平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向党内发出指示，说明我方提出之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五个条件的，双方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提出这些条件的目的是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

在我方公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后，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到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可以说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 七届二中全会与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已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不过，当年年底在杨家沟举行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时，毛主席还是说，现在不考虑组织中央政府，要等蒋介石更困难，我们更胜利。1948年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主席在9月会议结束时说：“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未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也无结论……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来讲了。”到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建立新国家所要解决的各种基本问题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设想。1949年初，大局已定。1月政治局会议具体规定了迅速解放全中国的各项任务，并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便决定和通过各项大政方针，为建立新中国做好直接的准备工作。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村召开。全会期间，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在3月5日下午开始，由毛主席作重要报告，讲了10个问题。此后，每日开半天大会，由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负责同志汇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工作，围绕主席的讲话进行讨论。13日大会闭幕，毛主席作总结发言，简要评价了各地的工作，对个别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并系统地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报告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后来都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

胜利前夕，我们党各方面的工作都面临着转变，七届二中全会可以说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枢纽。从1948年9月会议到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几次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总的来说，这个转变是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当务之急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从长远来看，还将有一个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着重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他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进入城市，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他提出，进入城市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还说，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现在看来，由农村到城市，好像问题很简单，似乎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大多数同志思想上并不明确。所以，毛主席提出来之后，会上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邓子恢同志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今后工作中心转入城市，进城后依靠工人阶级，抓紧恢复与发展生产，毛主席把这两个问题明确肯定地提出来非常必要。进城后依靠谁，思想上模模糊糊，郑州、开封首先抓贫民及苦力工人，忘了产业工人，这是普遍现象，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明确。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生产，这一点我以前就不了解，以为要在发动工人之后，才搞生产；不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你怎样搞工人运动呢？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要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当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大批干部从哪里来？毛主席历来重视干部问题。从1948年初起，他多次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干部，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加入革命队伍。在9月会议的通知中，他提出准备干部不仅要依靠老解放区，还必须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干部，那里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一系列措施基本上解决了缺乏干部的问题。当然，在准备解放大城市时，我们还是深感有知识懂技术的干部太缺乏。例如，中央决定让陈毅同志负责将来接收上海。陈毅同志就在二中全会上提出，“希望全党抽调干部帮一把”，“最头痛的”是接收，二十几个部门要配干练的干部，还要懂高等技术，“希望中央如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那时，全党齐心协力。这里特别要说一句，在接收城市的工作中，白区地下党的同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七届二中全会还讨论并通过了有关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大政方针。这些大政方针实际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已基本确定下来。为此，毛主席作过长时间的思考，党中央也进行过多次讨论。这三方面方针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只能谈几个对新中国后来的发展最有影响的问题。

在政治方面，国体和政体是建立新国家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论述。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抗战时期的思考有承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关系。不过，在这两个时期的转换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虽然没有改变，但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国内的阶级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国体必然与原先设想的国共联合政府有重大不同。1945年底，毛主席曾一度考虑重新采用土地革命战争时“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但这个提法有比较明显的缺陷，它不能反映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毛主席那时已明确主张在未来新中国的政权中应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

建国前夕，毛主席对国体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严谨的论述和提纲挈领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主席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4月，他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论述。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列宁在本书中所说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目前查到的最早使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的文件。随后，毛主席在政治局9月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年初的那段论述相比，这里肯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在1949年1月会议上，毛主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独裁，人民民主独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民内部是民主，对敌人是独裁。他特别指出：对这个问题宣传得不够，甚至党内也有人弄不清，一听独裁就脸红，其实独裁是对敌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阶层、集团、党派。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半年以后，毛主席自己动笔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

关于政体问题，毛主席一直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主张，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建国前夕，这个问题在党内没有不同意见，但需要进一步明确；更重要的是，需要向与我党合作的民主人士解释清楚，得到他们的赞同。在9月会议上，毛主席说：“建立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琨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到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这个政体的问题已经成为定论。因此，毛主席的报告在讲到政权问题时，着重强调的是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必然要求一个与它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毛主席是以变动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思考的核心是怎样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保证这种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也是与革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命的转变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建国前夕，除在全国广大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之外，我们党还作出了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个是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另一个是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方针。这两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现代产业最主要部分的社会属性，从整体上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主席首次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是在1947年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他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在1948年9月会议期间，毛主席解释说，官僚资本在六大以后20年中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六大决议里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采取"经济上根本不动它，政权里根本不要它"的政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之区别当时尚未在我们脑子里明朗。现在政权里可容纳资产阶级代表，这一条缓和些，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激烈些。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否为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以往讲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无产阶级领导，而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一经没收就属社会主义部分。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总结了这一步骤的意义："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坚持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从整体上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毛主席十分强调的。他在1948年9月会议上说，我们的政权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民主主义的，但由社会主义领导。我们政府、企业、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也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针对当时流行的“新资本主义”提法，毛主席说，这个提法有毛病，因为“新”字可能了解为新性质，但应该是新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即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资本主义，它处于被领导地位。在1949年1月会议上，毛主席又说，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历来反对。国营经济量不大，但是占统治地位，依靠国营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很有前途。

怎样对待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另一个问题。解放后，我们党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在当时的条件下，毛主席的思想中主要是“利用”和“限制”两条。在9月会议上，毛主席说，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个发展，原因是它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太少了，还需要它。现在，是有条有理地向官僚资本及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进攻，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则根本不是进攻，而是合作妥协。不久，毛主席又点明，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有所限制并有所斗争。10月下旬，他在致少奇同志的一封信中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持续较长时间，大约十几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因此，毛主席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在1949年1月会议上，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方面必须反对右倾，向资本主义发展；但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现在我们掌握了命脉，对于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怕，对它的积极性要利用，在若干计划性统一性之下，允许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要利用一切无害于新民主主义的私人资本主义，而对有害的则加以限制。在十几年之内解决这些问题。总之，这就是要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当然，以后的实际进程和这时的预想有所不同。1953年，我们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了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这是后话。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大约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这个过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的外交政策和基本的原则立场已经提出；但某些重大的外交决策直到后一个阶段才确定下来。这是因为外交事务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在成立新政府之前，党中央、毛主席还需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

建国前夕，我们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我们在外交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作了概括，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把“不承认”作为一项主要的外交政策，是在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恩来同志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概。他指出，在外交上应注意三个区别：新民主主义阵线与帝国主义阵线的划分，帝国主义与人民的区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要加以利用。要宣传帝国主义不足畏惧，要认识能够自力更生，但并不拒绝外援。在对各项具体政策作出说明时，恩来同志说，总的精神是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坚决禁止帝国主义分子的一切非法活动。我们现在已摆脱了锁链，家务很大，有些事他非找我不可，我们不必急。现在经验少，将来会摸出一套办法来。会后，由恩来同志起草并经毛主席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全面反映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并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建国前夕我们采取的另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过去我们与苏联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现在要从国家关系的角度加以考虑，这是很不同的。毛主席对中苏关系极其重视，把它置于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1948年4月初，他曾准备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讨论关于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和中苏关系等问题。但那时斯大林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不愿意让毛主席去。以后，毛主席又几次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成行。1949年1月底，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委员阿·米高扬来华了解中国革命形势，这使毛主席有机会直接向苏联领导人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次会谈对以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久，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主席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较薄弱，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现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此后，毛主席又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著名的"一边倒"。不过，他所说的并不是倒向某个具体国家，而是"倒向社会主义"。

建国前夕，还必须明确提出外国与我国建交的条件，并着手做好与此有关的准备。在建交的问题上，毛主席、党中央既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有高度的灵活性。4月中旬，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破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南京解放。30日，毛主席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言人起草的《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严正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①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提出建交的条件？南京解放前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这就是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美国和多数国家的使节仍留在南京。这个动向引起了毛主席和恩来同志的密切注意，并有所布置。4月上旬，恩来同志派遣黄华同志随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并指示他可以与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中旬，在向一部分民主人士作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时，恩来同志就外交问题说：和平实现后，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4月28日，在宣布建交条件之前，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5月初，司徒雷登提出与黄华同志会面的要求。10日，毛主席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并按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声明表示我们的原则立场。6月上旬，司徒雷登又经其私人秘书傅泾波表示，希望访问北平，与周恩来会面。经恩来同志指示，6月28日，黄华正式答复司徒雷登，"已获北平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1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来电: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但美国最高当局很快作出了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

那个时候,党中央、毛主席的内部考虑是,在建交问题上,帝国主义提出足以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但我们可以采取积极办法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活动;也可以等一等,不急于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肃清内部,避免麻烦。两种做法各有利弊。不过,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决定采取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我们就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7月初,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时,曾把党中央的上述考虑和基本的意见向苏方作了通报。尽管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但我们确实也作了在具备条件时与它们建交的准备。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它表明党中央、毛主席是以非常现实的态度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迅速宣布继续支持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这样,中美之间根本谈不上建交问题了。

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是我党在建国前夕采取的重大外交步骤。这次访问为建国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访问期间,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全面介绍中共内外政策的书面报告。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赞成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赞成中共采取的外交原则。斯大林估计,列强很快就会承认新中国。他建议,中共不必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他说,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作买卖,你们可能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得很多让步,你们可以先和他们作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关于中苏关系,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两国关系建立之后,毛泽东同志就可以访问苏联,如他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便来，苏联可派代表团到中国去。双方还就如何解决中苏条约问题交换了意见。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提出三个方案：(一)由新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当时，斯大林说，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他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他还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从毛主席 1950 年访苏的情况来看，斯大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并不像他表示的那样痛快，双方还是经历了一场斗争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采纳了我党提出的第二种解决办法。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是对我国最为有利的方式。少奇同志的访问，不仅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迅速承认我国的问题，还解决了苏联向我国提供援助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援助，还有技术专家，这都是我们建国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所需要的。

在会谈中，斯大林高度赞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他说，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斯大林还委婉地就苏共在中国抗战结束后所提过的一些不恰当的建议表示了歉意。他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 等特务有害他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对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他还询问了中国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产党在美国政府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遭到损失。少奇同志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负责同志对和平有所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这时，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能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九

# 共同纲领的制定

建立新中国准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从开始起草到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曾三次起稿，三次命名。至于修改的次数就很难统计清楚了。

## 第一次起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就提出了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1948 年“五一口号”发布之前，4 月 27 日，毛主席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同志的信中，即让他明确告诉北平的民主人士，我党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的事项包括：“（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这里把加强与会各党派、各团体的合作及为加强这一合作而制定为各方认同的“纲领政策”，作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任务之一。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其中经毛主席亲自改写的第五条，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各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为了促进召开新政协主张的实现，毛主席于5月1日又致信民革主席李济深先生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先生，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他还亲自拟了一个联合声明的草案，由当时中共派驻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一并送达。

中共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一个规模巨大、催动新中国诞生的新政协运动在全国兴起。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原城工部所管的解放区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统战部在毛主席、恩来同志的领导和李维汉同志的主持下，为筹备新政协和拟定共同纲领，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1948年八九月份，已有部分民主党派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到达华北解放区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和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为了更具体地同这些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毛主席向恩来同志提出：“似宜将名单及其他各项拟成一个文件，内容字句均须斟酌”。恩来同志和中央统战部在同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商讨后，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诸问题》草案。这个草案经毛主席审改后，于10月8日由中共中央电发东北局。中央指示高岗、李富春约集在哈的民主人士“会谈数次”，告以这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意见”，请各民主人士“过细加以斟酌”。之后，中共中央又通过华南分局征求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的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该协议第二项第五款规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决定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共同纲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这是正式使用“共同纲领”一词较早的文献。其中所说“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即指中共中央第一次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一稿是在李维汉主持下，1948年10月27日写出的，然后上报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又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李维汉等人审阅。该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共46条。

这个草稿的着重点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按照维汉同志给恩来同志的信的说法，稿子是“勉强凑来”，意即比较粗糙，但它还是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定了出来。如它规定：纲领的基本原则，即新政协各成员“共同奋斗的准则”，是“新民主主义亦即革命三民主义”；“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出自人民大众，属于人民大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各级政权的构成，不采取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鼎立制，而采取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度;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国有经济为全部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应定为全部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工业,争取若干年内“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上升到工业国地位”;“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与教育”;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等。这些规定,反映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立国思想,因此大都为后来各个稿本所采纳。

同年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形成第二稿。第二稿的结构不同于第一稿,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主要经验及其要完成的推翻三大敌人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任务,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的彻底胜利”。第二部分规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第三部分就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巩固人民解放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三个方面,做出34条规定。

这一稿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作了新的规定。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时提出:由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计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协议草案时,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一项,产生不同意见,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赞同这种意见,在11月3日给东北局指示电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迳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这一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随后,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相应决议。这样，关于政协的使命，又有了新的规定。

这一稿明显地带有宣言的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1949 年 2 月 27 日，恩来同志对该稿作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一起编印成册，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

## 第二次起稿：《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

中共中央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展开了有关纲领问题的讨论。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多种意见。除大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外，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有人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人主张用不加“新”字的“民主主义”。个别人还拟定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一些疑虑，我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

1949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我党对待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党中央的指示还要求，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由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作有关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报告，以及通过举行座谈会、同我党负责人谈话、进行日常接触和交谈、组织参观、提供学习材料和资料、关心生活及健康等方式，做民主人士的工作。当时不少部门的负责人都作过报告。毛主席本人同许多著名民主人士都有书信往来或直接交谈。他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宣布同国民党谈判八项条件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更对广大民主人士提高认识起了推动作用。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革命立场。其中说："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对毛主席提出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彻底支持"。"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大体说来，从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6月底毛主席发表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从而也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阐述了我党的经济政策，指出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构成，"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又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以此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五种经济成分”理论和“四面八方”政策，构成了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篇著作中，毛主席已详细讨论过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原则。1948 年 1 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文件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此后，毛主席在 1948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1949 年 3 月七届二中全会、尤其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对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及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作了充分阐述。他指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基本经验、基本纲领。这个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它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的这些思想，澄清了当时在新中国政权性质问题上仍然存在的模糊认识，构成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政权部分的主要内容。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之一。到人民解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战争后期，这一统一战线达到了空前广阔的规模，并已集合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新政协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正是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认为，不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政协全体会议将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也将作为政权以外的统一战线组织长期存在，对政权机关起着参谋、协商和推动作用。共同纲领关于政协地位的规定，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筹备会由 23 个单位、134 人组成，以毛主席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各项筹备工作。每组均为自愿报名参加。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是第三小组，由周恩来、许德珩担任组长、副组长。组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严信民代）、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罗瑞卿代）、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

6 月 18 日，第三小组成立。恩来同志在成立会上说明了起草共同纲领工作的重要及以往工作的情况。他说：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这个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一个草案，中共方面也曾两度起草。但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加和支援解放战争，而现在的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长期性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的第二稿也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会议决定委托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而小组成员则按照自愿参加的原则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问题）五个分组进行讨论和拟定具体条文，供起草人参考。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各代表及第三小组各成员亦可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至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

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仍在恩来同志领导下进行。大约过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个草案初稿。由于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所以把题目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8月22日，恩来同志将草案初稿送交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这份初稿，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

这份《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同前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相比，它删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一部分，在具体条文的规定上，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一般纲领中规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单位，要以“奉行新民主主义”作为“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是“统一战线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此外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国际关系”。具体纲领部分，按“解放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侨务”六个方面，共列45条。这份草案初稿，构成了此后不久正式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基础。

讲到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政协会议名称的改变问题。最初，在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和其他一些文件中，沿用了1946年使用过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这将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具有新的性质、新的阵容、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会议，所以便很快采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待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首先感到只以一个“新”字来区别于旧政协，并不够确切。第一，旧政协包括国民党在内，新政协排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新政协虽然沿用“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但它并不完全发源于旧政协，它是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特别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中共历来倡导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第三，新政协就其参加成分来说，已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名称与实际应该相符；第四，政治协商会议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名称也应该是正式的、固定的。因此，应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已开始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随后，恩来同志把这一意见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得到常委们的赞同。毛主席也曾就这一名称问题，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行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到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正式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第三次起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进入1949年9月以后，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纲领的名称随着政协名称的变动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结构也做了改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序言之后平列七章。这已是第三次起稿。在这个阶段，毛主席直接参加了各次过程稿的修改工作。

根据有关档案材料，从9月3日至13日，毛主席至少对四次草案稿进行了细心修改，改动总计有二百余处。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9月3日，他写便条："乔木：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把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稿送到他那里以后，他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竖写的题目左侧亲笔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9月5日晚，毛主席修改后的稿本送去付印，不久，又接到主席的便条指示："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第二天，他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下，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他在改过9月11日稿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

总之，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印制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直接参与和细心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随时配合。大家睡眠时间都很少。9月3日的那张便条上，毛主席特意嘱咐："你应注意睡眠。"这虽然是很难做到的事，但仍表明了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是同筹备会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一起进行的。从中共方面正式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共经过了七次讨论，计：由到达北平的全体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两次，纲领起草小组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两次。此外，政协各参加单位还组织各自成员进行了讨论。代表们字斟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酌，反复推敲，畅所欲言，互相商讨，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有的被采纳或基本被采纳，有的为进一步修改提供了参考，有的当场进行了热烈讨论。至于提出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条，是很难统计清楚的。这里只举出几个例子。

关于国名及国名简称问题。本来，在发出新政协号召前后，在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著作中，即多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中华民主共和国”），如1948年1月18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2月15日完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等，都把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后来在8月1日，毛主席复香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等，10月上旬提出、11月25日达成协议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及随之起草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又改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直至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筹备会期间，黄炎培、张志让等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等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决定采用后一种意见。

引起热烈争论的，倒不是国名的确定问题，而是国名的简称问题。最初起草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一条，筹备会召开后，该大纲草案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简称一说仍旧保留着。代表们对要不要保留这个简称及是否把简称写入共同纲领之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一些代表主张，不仅在政府组织法中应注明“简称中华民国”，而且要把这一简称写入共同纲领，因为共同纲领要具有照顾统一战线中各个组织的意义，应该沿用习惯了的称呼。更多的代表认为，不应简称“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简称，而是代表旧中国统治的一切，反动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标榜“中华民国”，而人民对它已发生反感，人民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不能与之混同，如果要用简称，就简称“中国”。还有的代表主张，既不应简称“中华民国”，也不必在纲领条文中注明简称“中国”，因“中国”是习惯用法，不是简称。最后，所有政协文件均没有写简称。

关于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一部分代表认为，既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应该在纲领中把这一目标写出来，使全国人民了解未来社会的远景以及共同奋斗的最终目标。另一些代表则认为，在今天的政协中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还为时过早，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而且，新民主主义本身就预示着社会主义方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后一种意见，少奇、恩来同志都在大会上对这一问题作了说明。这里基本的原因是：第一，共同纲领是属于国家政权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现阶段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如在共同纲领中过早地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就很容易混淆现阶段的实际步骤与将来的理想。第二，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是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要把共产党的第二步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写进国家的基本文件中，也必须经过一个解释、宣传和实践的过程，只有全国人民通过实践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为它而奋斗。所以暂时不写上社会主义目标，并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第三，纲领的经济部分已实际保证了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其实，还在 1947 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期间，毛主席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就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哩！何必提社会主义！”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过程中，中共中央坚持了毛主席这一看法。

关于“爱国民主分子”问题。有的代表提出：序言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一句中的“爱国民主分子”应删去，因为这里讲的是阶级，爱国民主分子也属于四个阶级之内。少奇同志在参加小组讨论中对此作了解释：有些爱国民主分子不属于四个阶级，例如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中之开明分子，单独提出“爱国民主分子”，是给他们开门，让他们进来。

关于“人身自由”问题。纲领初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其中未提“人身自由”。许多代表对此提出意见，认为人身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如无人身自由，其他自由都将谈不到，因此必须在各种自由权之中加入人身自由一项。这一意见在下一个印稿中即被采纳。

关于联苏问题。有的产业界的代表出于同外国做生意的考虑，认为关于外交政策的条文不必突出联合苏联的内容。这一意见未得到响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个国民党民主派的政协代表就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他们的意见是：“本党十三年改组时提出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指的苏联，今天应明确地说出来。”“联苏的口号非公开提出不可”。纲领草案保留了“首先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条文。

除这几点以外，代表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还有许多。如：在第二章“政权机构”开头一条应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属于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国人民”①;政协组织成分中的“知识界”应改为“知识分子”;“反对贪污、浪费”的提法太轻,应改为肃清(或严惩、根绝)贪污、严禁浪费;调剂五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应加上金融政策、技术政策两个方面,等等。这些意见基本被后来的修改稿所采纳。另有一些建议,如文字改革、对日和约等,均属不是现在所能做到和不必即行准备去做的事项,故没有列入条文。

经各方反复讨论和毛主席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于1949年9月17日为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9月22日,恩来同志就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向大会作报告。大会组成包括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在内的六个分组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由出席政协的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中派人组成。中共方面为周恩来。45个单位中,只有民盟派出两人:章伯钧、罗隆基,其他均为一人。28日,政协各单位及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至本日,整理委员会又收到代表意见21件,经讨论,除对9月20日印稿中的不正规字体加以规整和增添一处标点外,全体一致通过保持原文送交大会主席团。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

①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一、二稿均列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条文,后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9月5日印稿,没有列入这样的内容,故代表们提出意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总计六十条，七千余字。这个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给新中国订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它规定了人民 享有的广泛的民主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纲领的制定和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已被集中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级、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意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一致接受，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蓝图。

历史证明，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文件之一。由于它切合实际而又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所以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工作，都起了规范和指导作用。它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血，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所以得到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的一致拥护。

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第三部分

# 胡乔木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一

# 毛泽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 （1951年6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1日，到现在是三十年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得到伟大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英勇斗争，经历长时期的艰难曲折，终于推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辟了顺利道路的历史。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同志把1919年当作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并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这部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着重地发挥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在

---

* 此篇节录自《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初发表于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世界第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学说，并且着重地指出了中国的1919年的革命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事实。在这里，应当特别回忆的，就是列宁本人，早在1900年，特别是在1912年和1913年，就已经注意中国问题，并写了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论文；而在1918年到1920年间，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最紧张的年代里，列宁和斯大林又都对东方的民族问题作了多次最深刻的指示，正是这些指示，构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出发点。在1920年7月召集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专门报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列宁的这些经典的文件，规定了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轨道，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

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五十多个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曾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毛泽东同志是湖南的党的组织的代表。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在1920年又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于同年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任党的湖南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工作，使湖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最发展的省份之一。

在1923年6月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第三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党内的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企图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这个革命，使这个革命在胜利以后，首先就有利于无产阶级，并以无产阶级为中坚力量来掌握政权，用这个政权来保障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认为第一次革命应该让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只能得着一些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所以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后，再来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次革命。所以他们的主张被称为“二次革命论”。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共产党不应当与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所以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大会批评了右倾的和“左”倾的错误意见，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但是第三次大会对于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却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坚持了正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确意见，反对了错误意见。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表现了自己的伟大的革命天才。毛泽东同志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认识了工人阶级能否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却是党的历次大会包括第三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在1924年底就着手研究湖南的农村状况和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并且在1925年和1926年主持广东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努力于训练领导农民斗争的干部。在1926年的3月，毛泽东同志在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他对于中国农民和中国其他各阶级的观察公式化了。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里指出：分辨真正的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资产阶级，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五类主要社会力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且得到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既反对了陈独秀的只看见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而看不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张国焘的只看见工人而看不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为了支持在北伐战争中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斗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927年1月，毛泽东同志考察了湖南农民推翻地主统治的热烈斗争，写了党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同志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农民指责农民的论点，强调地指出：只要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政策，那么，“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的重要价值是：(一)充分地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二)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三)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并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四)着重地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因为这样，这个著作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件。但是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受到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支持，却被党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集团所拒绝和压制，因而没有能够挽救当时的革命。

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紧急关头在汉口召集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毛泽东同志虽然参加了，但完全被陈独秀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并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表决权。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但是缺乏积极的办法。第五次大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虽然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却在实际上坚持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样，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接着，在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杀了大批的革命分子。7月15日,汉口的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就是这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遭到了失败。

党在1927年8月7日的会议上,为了挽救革命,曾号召农民进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之后就到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一带地区领导湖南江西的农民、工人和北伐军各一部举行了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成立了一支工农革命军,与敌人作战。此外,在1927年秋冬到1928年春,党还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湖南南部、广州市、广东东部、海南岛以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起义。其中湖南南部的起义,是朱德、陈毅等同志领导的;他们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后保留的一部分转入湖南南部,在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后不久,又率领部队和起义中组织的农军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其他地方起义中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也多少留下了一部分。凡是对于这一部分武装部队实行了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逐步发展了起来。从此,就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部队,就是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即现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的来源。

1928年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第六次大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民主革命,总的任务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并且规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项纲领。大会提出了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大会指出: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地要来到的,但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因此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这些都是第六次大会的功绩。第六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大会的缺点是对于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少正确的估计；而对于党的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需要将党的工作的重点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这个关键问题，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党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左”倾分子手中。第六次大会的这些缺点，曾经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

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席党的第六次大会。在第六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第六次大会所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随后就由毛泽东同志在实际上和理论上解决了。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10月率领新成立的一支工农革命军退到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井冈山区域，在那里成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政府，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并且着手领导农民分配土地。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朱德同志所领导的部队和彭德怀同志所领导的部队先后与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合以后，逐步扩大了起来。在这个期间，党所领导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斗争，也有了发展，陆续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1929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发，并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冬天开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们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成了新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和全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希望。

红军战争的发展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什么是可能的呢？为什么是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呢？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10月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930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年1月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论文中，给了理论上的答复。在第一篇论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主要条件是五个：第一，中国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所实行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反动统治的缝隙，给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机；第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还遗留在中国的广大区域的人民中；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第四，有支持红色政权的红军；第五，有领导红色政权的组织坚强、政策正确的共产党。在第二篇论文里，毛泽东同志详细地估计了中国红军战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同志认定：必须放手发展红军战争、发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找出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敌人击败，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惟一正确的发展规律，即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且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中国革命在后来二十年间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不但制定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发展的总路线，而且在各项具体政策方面，例如在土地革命的政策方面，在对待中间阶级的政策方面，在战胜优势敌人的军事战略战术和部队工作方面，在农村环境和军事环境下的党的建设工作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创造。鉴于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最革命的力量，中农是坚决拥护革命的重要力量，富农的经济在资产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仍然需要保存，中小工商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需要保护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规定了和坚决地实行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鉴于战争和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又鉴于当时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和敌之脱离群众我之联系群众，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规定了红军必须是党、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和其他一切地方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规定了红军必须在部队中建立强大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群众纪律，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当时的主要战争形式，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和歼灭敌人；而这些基本原则，和其他军事原则，就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由于这一切，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中国革命困难时期的工作，已经奠定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急的任务和普遍的要求。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起来。在 1927 年退出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要求蒋介石政府改变政策。甚至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间，也开始发生了政治上的分化。1932 年 1 月，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反日运动的影响下，向进攻上海的日本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933 年 11 月，这个军队的领导者及其他一些国民党人又在福建成立反蒋联共的人民政府。冯玉祥在 1933 年 5 月也与共产党人合作在察哈尔的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或积极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愿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虽然如此，党的领导在1931年至1934年间却因为陷入了新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致不但没有能够在红军胜利、人民抗日反蒋的有利形势下将革命推向前进，反而使革命受到了新的挫折。

虽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及其以后种种事变的教训，在党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党的领导机关仍然设在反革命中心的上海，党的领导仍然没有以红军战争为中心，仍然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抱着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不了解红军战争的意义和规律、幻想着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举行城市起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占据着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1930年6月至9月间，党中央以李立三同志为首，曾经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这个错误计划曾经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的严重损失，但是在红军中，却由于毛泽东同志坚持着正确的方针，没有发生大的影响。1930年9月，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受到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纠正。但在1931年1月，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外衣，从“左”面来攻击六届三中全会。他们认为李立三同志的主要错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并且责备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他们终于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别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又在国民党区秘密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形式和积蓄革命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虽然在严重环境下作过许多英勇的斗争，最后却差不多全部受到了破坏，而由“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在1933年也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等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这样，由红军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高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复兴，就被破坏了。

在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刚刚出卖了上海抗日战争的蒋介石，又以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组织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全面围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红军在这次反围攻的战争中又得到了巨大的胜利。但在1933年10月，蒋介石又以一百万兵力，举行对红军的第五次围攻，并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红军。在这次战役中，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围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受了“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各地红军，除刘志丹等同志所领导的陕北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由于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而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

1935年10月，即在长征开始的一年以后，中央红军终于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经历了二万五千华里的征途，越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到达陕西北部，与陕北红军部队会合。任弼时、贺龙两同志所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同志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也在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在陕甘地区会合。在红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由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曾经进行分裂和背叛党的活动，拒绝与中央红军一同由川西北北上，强迫部队向西康方面退缩，并非法地组织了另一个中央。由于毛泽东同志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韧努力，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很快地就完全失败了，但是红军却因此受到了另一次很大的损失。在国民党第五次围攻以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由于党内的错误的领导，受到了许多的挫折，经过长征，到陕北会合之后，总共已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极可宝贵的精华。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希望。它使全中国全世界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相信了为着战胜当时在中国得寸进尺的日本帝国主义，非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不可，非停止反共的内战不可。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由鄂豫皖北上的一支红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军，紧接在会合以后，就共同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大大地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的声势。随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的进攻，由北京学生在12月9日举行的抗日救国大示威而开始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发展起来了，广大的人民在运动中一致地提出了党所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革命从新走向高潮。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对日本进攻中国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决定党的政策，纠正在党内浓厚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这个工作，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在8月1日发表了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有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可能参加抗日斗争而其他部分可能由动摇而中立，指出了国民党营垒可能破裂和其中英美买办集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而被迫参加抗日，指出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以后，总结党的任务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同志痛驳了党内“左”倾分子提出来的反对统一战线的一切论据。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且规定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于不赞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资本家和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业是保护的，它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工人农民为主体，但又代表着反帝反封建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统一战线与1924年到1927年的统一战线的区别，是在有无坚强的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参加。毛泽东同志在比较两个时期的不同时说："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预见了中国政治的后来的发展，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中共中央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迅速地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并迅速地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实现。红军在1936年2月东征进入山西，在取得许多胜利以后，在5月间，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并与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等首先实现了停战。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刘少奇同志正确指导下，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蒋介石仍然坚持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继续向红军进攻。1936年12月12日要求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使他停止亡国的反共内战。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因此蒋介石被释放了，国内和平乃得实现。为了便于保持国内和平，并为了争取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决定暂时停止执行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由于国内和平实现，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实行新的进攻时，中国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在内对于日本的进攻就实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行了抵抗，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努力，促成了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这个事实，极大地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1937年5月，党中央召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党在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并为抗日战争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在革命脱离了危险而走向新的高涨的年份，为了总结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同志曾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在1936年冬，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总结了1927年至1936年的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之一。实际上这部书不但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而且因为它深刻地分析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规律，深刻地分析了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根源，战争规律和战争规律的认识过程，它又是一部重要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在1937年夏，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他的著名的哲学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同志在这两篇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而又通俗地解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这两篇著作在中国思想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有极重要的价值。它们是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思想、正确地行动和正确地学习的最好的教科书。它们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争论的哲学性质，根据无可辩驳的唯物论原理，揭露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在认识方法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和推动革命的新高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地依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靠毛泽东同志的努力，党深刻地认识了军事工作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创造了革命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各种政权工作。在这个时期，党认识了自己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同时也认识了各种“左”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并在与各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是主要的危害相反，在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左”倾；“左”倾的错误曾使党和红军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因而延迟了革命的新的高涨。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了各种艰难曲折锻炼出来并取得了丰富经验的党和军队，却构成了后来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由于上述一切，可以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对于中国革命的今天的胜利，是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准备和干部准备。

从 1927 年到 1937 年，党度过了极端严重的反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方面，敌人企图完全消灭我们党，我们党和敌人进行了极端艰苦、复杂和英勇的斗争；另一方面，党在克服了右倾的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又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几次侵袭，以致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和他的异乎寻常的忍耐性与遵守纪律的精神，党终于充分圆满地克服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脱离了危险的地位。这样，党在十年的反动时期，虽有内外敌人的侵袭和打击，却在全国范围内用革命精神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保存了党的革命旗帜，并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和一部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党的大批的优秀干部和数万党员，积蓄了大量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关于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用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全国规模的抗日爱国战争和新的国共合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估计了抗日战争中的复杂的政治情势。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争论，无产阶级与参加抗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线，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路线；实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要全国人民抗战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的路线，战争必然失败；只有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或“全面抗战”的路线，战争才能胜利。1937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集的会议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反对蒋介石反动的两面政策的指针。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决定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洛川会议决定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之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党内也有了严重的反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的弱小和国民党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轻视共产党领导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革命方针，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因而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们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他们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并且拒绝中央的正确的指示。他们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在1938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党的工作中，和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造成了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部队的失败。很明显，右倾分子的意见是适合于蒋介石的利益而危害无产阶级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的复活。毛泽东同志和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使这种错误思想在没有发生更大危害的时候就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克服。

为了彻底澄清党内外关于抗日战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一书。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情况，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最后必然胜利，但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并且必须采取人民战争的方针才能取胜。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全会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决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

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初期虽然抵抗过日军，但是因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而迅速溃败，到了1938年10月，就不能不退出广州和武汉。蒋介石从此把军队的主力集中在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避免和日军作战。而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却相继武装了广大的人民，发展了强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到了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五十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在三年作战中收复了县城一百五十座。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从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一线直到广东和海南岛，都有了共产党员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

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就陷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不能再向前进了，因为他们的后方暴露在强大游击队的攻击之下，他们不得不回头来攻击在他们后方的游击队。日本侵略者决定把主要的压力放在敌后战场，对正面停止战略性的进攻，而实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在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动趋势作斗争。蒋介石的投降危险,在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与英法间战争爆发时,达到了顶点。英美在这时更希望赶快牺牲中国来求得和日本妥协,使日本不和希特勒一起来反对英美,而为了使中国投降,就不能不加紧反对坚持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侵占五个县城,在山西西部进攻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在山西东南部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受着日本和国民党夹击的八路军,坚决地击退了国民党的进攻。

严重的斗争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面。很明显,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国,谁能够赢得抗日的胜利,谁就能够赢得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既然证明了自己是抗日战争的真正的领导者,就必须同时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的全部见解,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而给予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这个任务,由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担负起来了。《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出发,说明了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极大地帮助了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思想的统一,极大地帮助了全国人民解放区的政策的统一,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

……由于这些努力,一切困难都克服了,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巩固，并且从1943年起又逐步地扩大了。

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或迅速变化的时期是难以大规模进行的。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方法，领导全党的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和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别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这两种倾向表现的形式——党八股。毛泽东同志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在这个学习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学习运动，扫除了1931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大会听了并且一致地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第七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一致，根本上是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来中国革命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的胜利发展所形成的。1942年全党的整风运动，在第七次大会之前在党的干部中展开的关于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加强党内的团结，都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七次大会一致地通过了党的总纲，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第七次大会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为着迎接全国的胜利，大会特别要求全党及时地注意加强在城市中首先是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大会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在战争中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共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有九十一万人民解放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军）和二百二十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并且从1944年以来已经转入局部的反攻。从1937年9月至1945年3月，人民解放军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日伪军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日伪军二十八万余名，迫使日伪军投诚和反正十万余名。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或控制之下。依靠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有保证的。但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存在，大会同时要求全国人民严重警惕新的全国性内战的危险和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人民解放军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反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使中国抗日战争立即进入最后阶段。苏联的军队迅速歼灭了日寇的关东军，解放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配合苏联的进军，积极消灭日伪军，解放了日伪军所占领的大量的中小城市。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和蒋介石却命令在中国的日军和伪军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并且继续抵抗包围着日军的人民解放军，以待远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前往受降。美国的军队和空军、海军，这时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运往日伪军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由于美军、日本侵略军、伪军的共同合作，蒋介石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从新取得了在全国的“优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经验，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经验，又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一部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相联合而共同反对侵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这种复杂的形势，并且正确地利用了从 1924 年到 1936 年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因而采取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及时地纠正了党内的偏向，打退了国内的反动派，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依靠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可以打败的。这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都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真理。抗日战争又证明：英美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是始终抱着敌视态度的，只有苏联，才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忠实援助者。苏联的援助，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同样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真理。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就在 1945 年 8 月 25 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毛泽东同志在 8 月 28 日亲自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最后在 10 月 10 日公布了谈判的结果，其中包括许多关于保障国内和平办法的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准备忠实地实行自己所同意的协议的，并且已经着手付之实施了，但是在蒋介石方面，却只把这些协议看作是掩护发动战争的手腕。蒋介石以为在协议成立后，共产党的警戒必然松懈，乘机袭击，必然获得很大的胜利。所以在协议公布后，蒋介石立即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警惕，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被粉碎了。

蒋介石及其美国主人发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蒋介石的躲避抗日的军队还在西南和西北的远后方，而一直在抗日最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却在华北华东和东北，这种情况，对于蒋介石及其美国主人进行全面的内战是不利的。在当时，蒋介石还需要迅速地去接收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还需要把数百万军队运到发动内战的前线上来，而这些事蒋介石单靠自己是办不到的。为了帮助蒋介石办好这些事，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受日本投降，阻止解放军去接受投降，并将日军的全部武器交给蒋介石，又用空军和海军运输了蒋介石上百万的军队到解放区的周围。为了争取办好这一切的时间，蒋介石就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在1946年1月10日宣布了停战令，召集了包括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美国政府，这时也在表面上主张停战，派了马歇尔代替赫尔利来继续“调处”中国的内战，以便利用“调处”的名义帮助蒋介石加速战争的准备。

蒋介石在宣布“停战”以后，随即大举进攻在日本投降前后进入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东北解放区的长春吉林一线以南至安东、以西至承德的广大地区。然后，从1946年7月起，蒋介石就彻底撕毁了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指挥他的全部军队，发动了对于人民解放区的全面的进攻，并在进攻中连续占领了解放区的许多城市和广大乡村。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期间对于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广大而有效的教育，使全国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从对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而觉悟到为要实现和平、民主、独立，为要得到生存，就不能不打倒蒋介石，就不能不驱逐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方面在政治上充分地孤立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另一方面领导了人民解放军以严重的努力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这是因为,敌人军事力量的优势,以及美国的援助,都只能起暂时的作用;而战争的正义性或反正义性,人民群众的向背,这才能起经常的作用;而在这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坚定的努力,优势是确定地属于人民解放军的。

为着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方面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为了歼灭敌人,就必须每一战役都有准备,都有把握,都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去包围敌人,全部歼灭敌人,避免无准备无把握的作战。在这个方针之下,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战争初期退出了许多城市和地方,却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平均约每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旅(师)。人民解放军用缴获的国民党军的装备武装了自己,又把俘虏来的士兵加以改造,补充了自己。这样,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国民党军却愈战愈弱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在遭受了八个月的巨大兵力损失以后,即在 1947 年 3 月以后,就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所谓"重点进攻",以山东和陕北两翼为其进攻的"重点"。但是人民解放军又以严重的作战,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同时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区陆续转入了反攻。因此,到了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便能够在晋冀鲁豫战场首先转入了进攻,进兵黄河以南直至长江北岸。接着,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其他战场上也发起了巨大的攻势作战,根本改变了各战场的形势。因此,蒋介石的进攻,只经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被完全打破了。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曾经被战争初期所得的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切和平建议,结果使自己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走上了死路。在 1946 年 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占领了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城市张家口。第二天，蒋介石就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下令召开分裂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11月15日，这个伪“国民大会”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之下开幕了，通过了伪“宪法”。但是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的预言，蒋介石的这个步骤只是“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在人民中间没有得到任何支持。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撤返延安，随即派军队进攻，占领延安。从此，消灭了任何和平解决的希望。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把同情和希望都集中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三条道路”的宣传，也随之而破产。国民党的革命派、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和广大的社会人士，都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合作，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和反动政府。全国学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举行了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的示威运动，在1947年5月，又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示威运动。各地工人农民，也进行了许多斗争反对国民党。这些都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全孤立，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扩大和巩固了。中国人民在全国的胜利，无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为了满足农民长久以来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天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改革使解放区农民充分地发动起来了，解放区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了，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援助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为着贯彻土地改革，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加强农村的民主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的整党运动，以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阶级觉悟，克服农村党内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为了准备新的胜利，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在陕北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也就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对于党在战争转入进攻的时候所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经济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说明。鉴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经发生破坏工商业的偏向，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着重地从新解释了党在经济方面的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严格地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工作人员对中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政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由没收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巨大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将在人民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严重的决定意义和伟大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的存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并不可怕的。由于这次会议以及在这个期间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党为了领导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在主观上的准备也成熟了。

战争在1948年和1949年的进展极为迅速。在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经充分学会了攻城战术，连续攻克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的辽沈战役胜利后，整个东北获得了解放。这一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二千人，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接着，在南线，由11月7日至1949年1月10日在徐州附近进行的淮海战役，又消灭了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使国民党反动派丧失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使南京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的面前。差不多在同一期间，在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又在北线举行了解放天津、北京的战役，攻克了张家口和天津，使北京得到了和平解放，并使国民党军损失了五十二万一千人。这样，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就在基本上完成了解放。

1949年3月，党召集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了党对取得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从1927年以来，党的基本工作是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以便最后取得城市；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应当移到城市，由城市来领导乡村。这次会议又指出：党在城市中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并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这次会议曾经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个讨论，后来构成了“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的基础。

这时，在国民党反动派方面，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授意，蒋介石假装下野，由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出来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拒绝这个和平的要求，而且经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以后，起草好了一个和平协定的草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却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因而揭穿了自己的假面具。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1949年4月21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解放全中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人民解放军在4月23日解放南京，接着在1949年内先后解放了太原、杭州、汉口、西安、上海、兰州、广州、贵阳、桂林、重庆、成都等各大城市和广大地区，并用和平办法解决了湖南、绥远、新疆、西康、云南等地。1950年4月和5月，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在南方和西南各省，在1950年剿灭了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百六十万土匪。1950年11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成立了关于和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样，除台湾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美国侵略者盘踞外，全国都解放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由中国各民族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各人民团体代表、各区域代表、各部队代表和特别邀请的民主人士共六百六十二人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选举产生出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决定了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光荣地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奋斗，特别是中国人民2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全国的情况，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发表的时期已经完全不同。需要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的条件下说明这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在这个国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呢？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1949年7月1日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了完满的答复。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解释这个公式的意义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要学习苏联的榜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现在就必须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在的历史时期中仍然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这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和东南欧国家的人民民主的区别，这个区别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毛泽东同志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节制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一个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其他的剥削阶级已经打倒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在《共同纲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里面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共同纲领》的总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纲领》有系统地规定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时期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的基本政策。《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特别作了详细的解说。《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在《共同纲领》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而这种领导,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国际友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 1949 年 10 月 2 日就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共和国、瑞典王国、丹麦王国、缅甸联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瑞士联邦、芬兰共和国、巴基斯坦等国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立了外交关系。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荷兰等国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方面，并且努力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1950年2月14日，在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直接参加之下，中苏两国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维辛斯基外长在莫斯科签订了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两国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大大地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地帮助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三十年，乃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通过许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建立独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来担任领导，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以前，中国曾经有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企图领导中国革命，并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他们都在敌人的不同方法的进攻下面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比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所遇到的任何敌人的进攻更要凶恶严重得多，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达到胜利，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为模范而建立起来的新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作风，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由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党才能有效地和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偏向，找到并且确立战胜强大敌人和建设新国家的正确道路。由于与人民群众有紧密的联系，党才能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创造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依靠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来战胜曾经显然占优势的敌人。由于自我批评，党才能在历次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求得进步，并经常保持和改善与群众的联系。具有这种作风的党，乃是领导中国革命直至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党的正确的领导，首先决定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要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达到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可能的。

在1939年10月，在回顾和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道：

“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生动的叙述,充分地说明了革命理论的严重意义。错误的理论,可以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归于失败,而正确的理论,却在最困难的关头挽救党,使革命逐步地走向高潮。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成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但是为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仅仅依靠现成的一般原则的指示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列宁在1919年11月在东方各族人民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族人民的共产主义者发出号召说:“在这里,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全世界共产党员面前是没有提出过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你们在适应于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条件时,须要善于把这个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地解决了列宁所提出的这个历史任务,并因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前进了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作为革命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项基本经验。这两项经验的创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和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分不开的。当党在正确地解决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特别是对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实行联合或斗争的问题时,党和革命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错误地对待这些问题时,党和革命就遭受挫折。

很明显,对于这样严重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独立的思考,而不能依靠于简单地抄袭某一外国的公式。例如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用抄袭的方法要求党把"中间营垒"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种"中间营垒"可以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又例如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用抄袭的方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应当"一切经过"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个反动的中央政权之下可以有一个革命政权,这个革命政权既不与反动政权破裂,又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拒绝了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些错误的观点，而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同盟者规定了不同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1927年以后仍然是分为两个不同的集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和被排挤被损害的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前一个集团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虽曾站在抗日方面，但是与中国共产党并未正式缔结统一战线的组织和纲领，而且仍然极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所以共产党人绝不能“一切经过”他们，而必须实行统一战线中的高度的独立自主。后一个集团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力量，与工人阶级有矛盾，但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也都有矛盾，因此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争取的，只要工人阶级有坚决的革命政策和适当的组织步骤，对他们有联合有斗争，他们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依附工人阶级而尽其尚未完结的历史作用，并不成为“最危险的敌人”。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已经推翻了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在这里，正确的显然是毛泽东同志，而不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又是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分不开的。斯大林同志说：“从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1905年我们俄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的情形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被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上极端丰富地发展了。事实上,从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革命的武装组织也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进退,代表着中国革命的进退。在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党的全部主要骨干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其革命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之高,是许多过着和平生活的人们所不易想像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作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些贡献,和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一样,也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结果。例如教条主义者曾经不顾斯大林同志的启示,在1927年以后四五年间坚持以准备城市起义为党的工作的重心。后来,在城市起义的思想造成了党的组织的严重破坏而为事实所粉碎以后,教条主义者又以阵地战的思想强加于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其结果是使红军被迫退出原有的根据地。与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以后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首先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来代替在通常条件下的城市领导农村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创造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方式,来指导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较敌人居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战争。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已经完全胜利,而由游击战发展起来的红军,终于在胜利中生长为胜任阵地战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这里,正确的显然又是毛泽东同志,而不是教条主义者。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同志又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在中国革命中的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援助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在1919年以后,中国革命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就是中国革命从俄国十月社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主义革命受到了决定的影响。中国革命从来不是孤立无援地进行的，而是在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不断启发、鼓励和援助之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没有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始终一贯的伟大援助，特别是没有列宁斯大林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援助，没有苏联红军在西方消灭希特勒，在东北歼灭日寇关东军的援助，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其他多方面的援助，中国革命的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

# 毛主席开始了工作中心的转变*

（1979 年 1 月 6 日）

我们党提出在 1979 年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我们没有提出过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在历史上已经提出过，而且已经开始。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来认为，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将来条件成熟时，转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的根本纲领、根本任务。在几十年中间，我们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根本目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不是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也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也是一个方法，一个手段，目的还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后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理想。还在革命战争中间，在有了根据地以后，我们就开始经济建设。那个时候的经济建设，一方面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方面又是要解决人民生活

---

* 此篇节录自 1979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的报告。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里的迫切问题。可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建设，要受到许多限制，当时我们同敌人进行着生死斗争，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当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这个任务马上就提到我们面前。毛主席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规定，占领了城市就马上要把生产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党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要乱碰乱撞，妨碍、贻误这个中心。以后，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首先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包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内容，而这个内容是放在三大改造的前面。正因为是这样，毛主席才能够在1956年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出总结，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1957年夏天，发生了右派进攻和我们对右派的反击，毛主席后来把它表述成为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把技术革命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在同年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有这一切都是说，党中央早已把着重点的转移、工作中心的转变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且做出了规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公报里面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正是这些工作，奠定了我们现在在新的条件下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1958年到1966年期间，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曲折。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些曲折并没有使得我们离开这一工作中心，只是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有一些失误，有一些差错。从那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1966年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已经达到的水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966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是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虽然周恩来同志、陶铸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跟林彪、“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但是这个方针终究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执行，因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太厉害了。在1970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国民经济在党中央、各级党委、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有过一段上升。可是到了1974年，“四人帮”在所谓批林批孔的口号下又进行了新的破坏，国民经济受到了很大损失。1975年，毛主席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多数同志坚决执行，使得国民经济重新上升。到了1976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超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三

# 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永垂不朽的*

（1979年1月6日）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造者，功绩是非常伟大的，是绝对不允许抹杀，也不能够抹杀的。如果那样，就不忠实于历史了。特别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用他百折不挠的顽强的努力，用他的远见，领导了红军，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了革命根据地。以后，在红军长征中挽救了红军，因而也挽救了党。在这以后，一直使中国革命由非常困难的情况一步一步走到最后胜利。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完成，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勋是永垂不朽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要永远感谢他的努力。当然，他的努力是在党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条件下进行的。毛泽东同志的大量光辉著作，解释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也解释了在中国革命中如何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这些同以前很多光辉著作一样，永远是我

---

* 此篇节录自1979年1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的报告。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前进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许多重大决策，到现在还使我们受益。如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决策，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天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勇敢地作出决定，打开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僵局，我国就不会同它们实现关系正常化，就不会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毛泽东同志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伟大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提到毛泽东同志还有一些缺点、错误时，应该看到他的功绩要伟大得多。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四

#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解释*

（1979 年 9 月 17 日）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解释的变化。在七大时，七大前，有过解释，应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到六十年代开始，重提这个问题，对七大所作的解释作了相当的改变。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进一步改了，改成一个世界性的新的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什么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创造。后来毛主席本人对这个提法提出了异议，不赞成提第三个里程碑的说法。在这个讲话里，还是恢复了七大的提法。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没有超过中国以外的影响。但是，超过中国以外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讲不是很适当。我们这样讲，其他国家的党并不同意。那么怎么办？实际上现在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党以外，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的党没有一个接受我们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过分的提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话说得不适当，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引起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还是用马列

---

* 此篇节录自 1979 年 9 月 17 日于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的会上的发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并不表示毛泽东思想没有超过中国以外的影响、意义。但是，关于这样的影响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如何提，要由中央考虑，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这个讲话中无须去讲。

关于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个讲话稿中讲了。这是非讲不可的。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各种条件，讲到一定的程度，不作任何的夸大，没有讲中国革命对什么国家有什么影响，讲了一个国家要独立自主地创造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这个问题有普遍性，所以在这个稿子中对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着重从这个方面去讲。是否这样讲合适，请大家多提意见。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五

# 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泽东的评价*

（1979 年 9 月 17 日）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毛主席评价从建党到 1927 年这段历史所采用的方法，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毛主席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只有半年，即 1927 年上半年。在这之前不发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这并不是说陈独秀不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不是说 1927 年以前在实际行动上没有非常严重的重大的政治错误。比如在中山舰事件后，对于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这个关键问题，陈独秀就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毛主席认为，它还没有造成一个不可挽救的局势，没有对全党工作造成那样一种后果。当时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队工作都还在继续进行，全党的工作是前进的，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 1927 年上半年不出现陈独秀的路线错误，也不致发生那样的惨败。

毛主席对陈独秀错误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

---

* 此篇节录自 1979 年 9 月 17 日于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的会上的发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用毛主席观察陈独秀错误的方法来观察十七年，至少可以说十七年绝大部分时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现在用了这样一种提法。请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十七年中关于八大的问题，上次稿子中提了一句，这次稿子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确了，说毛主席的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请大家注意斟酌一下。

在十七年里，关于毛主席怎么提法。不但对过去十七年，在整个讲话稿中，对毛主席的提法是采取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原则，从字面上来看，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对毛主席有什么批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无论党内党外，看了都会知道，虽然没有直接的批评，但是暗含着一种批评。这是不可避免的。对这样两方面如何处理得适当，这是讲话稿的一个主要的关键的问题。现在在党内党外，都存在两种很不相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对毛主席有哪些错误应当讲清楚，有的省在讨论中曾经提出很强烈的要求，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是不讲。刚才说小平同志对第一次修改稿提了原则性的意见，就是指这个。他看了稿子后马上就提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发表这样一个讲话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这个问题是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不需要作解释。大家都清楚，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现在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就是在整个讲话中不对毛主席提任何直接的批评。在上次讨论讲话稿的时候，有好几位同志提出，现在稿子的写法是“功劳是毛主席的，错误是大家的”，不赞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样的写法。现在这个稿子的写法是对毛主席没有直接的批评，不过暗含着一种批评。采取了这个写法，并没有混淆历史上的是非，并没有在这里说混淆是非、颠倒是非的话。但是，对不少是非问题没有提出一个很明朗的说法，并不等于就把这个问题搞糊涂了。实际上大家看了这个稿子还是会看到什么事情是做得对的，什么事情是做得不对的。在原则上把是非分清了，仅仅在责任上没有作具体说明。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六

# 《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

（1980年3月15日）

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下。现在的稿子没有涉及。

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许多同志希望中央列出几条来。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它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不能只说坚持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这些只适用于过去。还要讲适用于现在的，特别是讲适用于现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第一个问题，讲错误发生的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

---

* 此篇是1980年3月15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个人的因素。八大虽然通过了关于分析阶级斗争形势的决议，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出现了前后两种不同的估计，一方面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在后面又讲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什么会这样呢？1957 年 2 月间对社会形势是一种估计，到了五六月间又提出另一种估计。反右斗争以后，虽然说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但只是说了一下，很快就不说了。1958 年还不大讲阶级斗争，讲两个剥削阶级和插红旗、拔白旗，主要还是指的知识分子。到 1959 年庐山会议就大讲党内的阶级斗争。到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厉害了。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转成功。

同时，与此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既然政治统帅一切，而阶级斗争又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结果就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实际上建设是不能光靠政治就能搞成功的。又红又专在 1958 年讲了讲，后来就不讲了。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势力在起作用。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同人民的联系减弱了。实现建设的重大任务，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需要，但是没有在党中央的领导思想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否则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那种口号很难提出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要求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拿现在的话来说，人民要求不要折腾。拿老话来说，要求安居乐业。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在党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反的，把国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一些现象夸大了，比方说有些地主还保存着变天账，当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某些地主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农有些活动，等等，把这些个别现象作为估计国内形势的最基本的根据。对有些干部有些贪污，另一些干部对农村生产中遇到的困难采取了一些对策，比方搞点副业，都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不能算是阶级斗争，而是对阶级斗争残余矛盾的夸大。贪污也许还可以算，但是把商业、运输业等一些正当的活动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只能算是无中生有了。

在国际方面也有这种因素。反霸权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范围也扩大化了，表现在“九评”中。这转而又影响了国内的斗争，并且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国内的因素还有一个，即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从制定第一个宪法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开始还明显一些。以后，人大、司法机关等等，慢慢就不起作用了，司法部经过多次批判甚至被取消了。

在党内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这有好些标志。粗一点讲，庐山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林彪上台以后掌握军队，首先在军队范围内搞个人崇拜，提出来一系列口号，搞了一套办法。这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准备的作用。林彪这样搞，加上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又把影响扩大到军队以外了。

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革命成功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但是还来不及把落后的东西统统铲除掉。

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的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诺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解放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到六十年代，文艺上批《李慧娘》、《谢瑶环》，哲学上批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当作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争论，这不成问题。就是当作普通的党内的思想争论也可以。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非这样办不可，而且全党都非这样办不可。《清宫秘史》的批判没有能开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来补课。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

这些解释可能还不周全，但是可以提供一种思路。

第二个问题讲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方说，可以从《实践论》的贡献讲起。一篇《实践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觉地有系统地开创了党的思想传统。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这个事实。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说明它的地位，它的价值怎样。

群众路线，也可以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

三大改造，当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里首先就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国外还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对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革命的劲头。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深入的分析。

自力更生为主。恐怕除了很小的国家以外，哪一个国家都不可离开自力更生为主，否则这个国家就要处于附属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毛泽东首先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现在还需要作为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对今后还有很大的作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一定要争取外援，但不能盲目地依赖外援。

两条腿走路。不一定用这个名词，可以把长期以来的经验整理一下。这是先进的、落后或比较落后的技术同时并存，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这样办。美国今天还有比较落后的工厂，日本、西德都有。我们可以看看是否有别的国家提出来过。

还有两类社会矛盾。

还有反对大民族主义。

还有一个反对大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尽管有些曲折，但全世界都承认我们确实作出了一些非常难得的榜样，是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对非洲国家援助的精神、方法，不但当地人民，而且政府都是称赞的。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思想，没有完全解决，现在要继续解决。这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有国际性，第三世界也没有解决。我们不要讲毛泽东提的哪些适用于国外，这个没有意思，我们不讲，我们只讲我们自己的。

究竟有哪些发展？提出这一些作为参考，要筛选一下。要做到少而精，讲出来要是颠扑不破的。要多研究一下。先把框框想起来。至于题目之下如何表述，以后再考虑。可以把思想放开一些。

以上两个问题，思想上要弄得很清楚，不只是写《决议》，而且向群众做思想工作，也要讲清楚。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七

# 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

（1980年4月12日、1987年6月12日）

## 一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可以研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对于马列主义的一般理论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想法，恐怕很难说当时就有了这种自觉性。那个时候，党的差不多所有的决议都是共产国际搞的。在那个时候，形成一个不是在个别单独的问题上，而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所谓的完整的思想，是很困难的。

怎样去争取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才发生了原则的根本性的争论。究竟是外国人说的算数，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算数？这时候才发生了真正的争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有争论，但不是原则性的。一时这样，

---

* 此篇节录作者的两次谈话：一、1980年4月12日在讨论教育部拟订的《党史教学大纲》第二、三章（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时的谈话。二、1987年6月12日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时那样，没有完整的想法。就是站在正确方面的同志，由于革命正在胜利发展，当时也未能独立考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排斥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和路线，而坚持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路线，这才发生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产生了长征的曲折，于是才有遵义会议的挽救危局。所有这一切，都是两个方面原理的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引出一条历史发展的线索。

毛主席在井冈山、古田时期的著作里面，露出的很多痕迹，都反映出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多少见解。就拿中国社会怎么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前途，就很多都受到“六大”的影响。但是当时的著作也证明毛主席正在寻求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而且找到了这条道路。当时的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差不多都处在这样一个水平，并不只是主席一人。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当时是最紧急的。当时提出政治问题有没有可能？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十年内战阶段，在政治关系方面，毛主席也没有提出一个成熟的意见。瓦窑堡会议的讲话和后来的讲话还是受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就大大不同了。这个问题是重要的问题，很值得深入讨论一下。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开始成熟了，这个事实很清楚。毛主席不到延安就没有机会读马列的书，看毛主席著作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战争时期连看到报纸也很困难，到了延安才能看到许多书，所以那时才能产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在这之前，不仅没有读书的环境，而且要经常打仗，假定在江西苏区有那么一个读书环境，也不可能看那么多的书，因为天天要打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

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达到完整的成熟的，应该是1936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没有作整个的政治上的分析，谈的只是武装割据思想。给林彪写信时，红军已占领了比较广大的地方了，同国民党作战也有了较多的经验了，但那时对全国的政治形势的完整的分析，还说不上。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时间问题上有点突破是可以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也提出过这一问题。不要拘泥于文件上的这句话那句话，那样就无法写历史了，要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情况，是共产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国际方面，是美国的力量取代了英国，英国处于被动地位，起不了多大作用。原来国民党与美国关系没那么密切，后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完全依赖美国。

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他来起了什么作用？什么作用都没有起，没提出什么建议。从陕北到城南庄以后，毛主席准备到苏联去一趟，他身边的人都做了新衣服，主席也做了新衣服。后来因为情况变化没去成。在我们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后，苏联要求中国不要打过长江去。二次大战后苏联非常害怕引起战争，特别怕美国参战。这是很明显的，对苏联的无理干预，只能作这个解释。

资料方面要有些新东西，现在美国、苏联、日本都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会、研究所。如果我们的研究水平比不过他们，是无法向中央交代的。对社会经济、政治资料的研究，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否则，工作不会有什么进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八

# 要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决议》的始终*

（1980年5月16日）

所以，现在写这个《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这方面确实要有跟七大前的那个《决议》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党内国内树立不起信心。像现在这个稿子讲了这个缺点那个错误，大家越看越泄气。你把理论讲清楚了，其他的事情，有的也可以不写。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写出来。我们现在既要提出实际发展的道路，又要提出一个理想。如果只讲实际，没有一个理想、一个远景，就不会吸引全世界的工人、知识分子，团结他们，而是使他们感到没有奔头了。所以《决议》里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平等的理想，人同人的距离扩大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只搞经济，不管政治的民主化，高度的精神文明，是不行的。那样，青年人就会只追求现实的物质利益。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在《决议》里要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到从

---

* 此篇节录自1980年5月16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始至终，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党里还有很多人坚持毛泽东思想，他们重新领导人民，把中国带上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要很鲜明。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要贯穿在整个《决议》的字里行间，始终使人感觉到，这是这个文件的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基础。

我们需要对好些问题认真地想一下。

反对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文化大革命”错了，不等于说不需要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头脑里要有这么些问题，这个《决议》才能写好，才能有的放矢，经过研究，才能够答复这些问题。

按照毛泽东思想，经济应当是怎么样的，政治应当是怎么样的，文化应当是怎么样的，党应当是怎么样的。如果这样来答复一下，这对开好十二大，统一全党的思想，乃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很有意义。当然，全国人民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统一，但要有一个统一的核心。要让全世界追求进步的人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搞错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抛弃它的理想。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走到苏联的道路上去。当然《决议》中不要涉及到国际问题，我们答复不了。但国内问题包括我们的对外政策一定要讲清楚。它是一个《决议》，不能代替十二大报告，但用回顾历史的形式讲这个问题，有一个好处，不需要像作工作报告、政治报告那样把很多问题说得很详尽具体，可以在原则上把问题讲得更透一点。

现在这个稿子总归提供了一个经验，一种探索、尝试，非有这么一个探索不可。

我想是不是这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以后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前进，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很大的胜利。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中间，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生了许多事件，在行文中捎带说说，邓子恢的问题可以不讲，讲多了就复杂了。

然后从1957年到1965年，这一段是不是这样，党一方面还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离开了群众路线的方法，这样就犯了错误，受了损失，但因为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所以错误得到了纠正。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既然大多数干部坚持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又犯错误，要作出一种说明。我们党用很大的毅力医治创伤，并且使各项工作、主要是经济建设，重新走上正轨。但是因为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已在党内在相当领域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在这一段时间虽然纠正了一些错误，又发生了一些新的错误。总的说来，八大已规定了要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另一部分同志又离开了这个思想，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个想法愈来愈发展，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受到非常大的挫折，但党的大部分干部在困难条件下还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有很多人被打倒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被打倒，他们并没有跟着林彪、“四人帮”干那些坏事，还在困难条件下保护党的肌体，保护党的力量，恢复党的力量，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有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形，后来才能够打倒“四人帮”，而这些干部又重新获得了解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可是还是没有完全破坏。所以没有完全破坏，这还是党多年来进行的工作在那里发生作用，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基层都有大批的同志在工作。毛主席的错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开始离开了他自己的科学思想、即以他为主要代表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走得很远，犯了很严重的错误，造成很大的损失，但他也没有完全离开。就是在“文化大革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命”中，他也没有把权力交给林彪，后来也没有把权力交给江青；他还是要解放干部；他还是在领导外交经济等工作，作了不小的贡献。在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下，“四人帮”才容易打倒，否则，最后“四人帮”怎么不能上台呢？如果全部走向了毛泽东思想的反面的话，那么“四人帮”的不能上台就不容易解释了。天安门事件还是要从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来说，是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打倒“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很快出来工作，党的大批干部解放了，党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了。这个《决议》既要把错误说够，又要说清楚犯错误的同时党的健康力量始终是存在的，党内许多同志始终是在继续工作和斗争的，他们在工作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样，党的生命、党的事业才没有中断，一直发展下来了。

《决议》中要在适当的地方把毛泽东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讲一下。这是继往开来的问题。可以讲得简明扼要。在后面讲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讲到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要求，尽量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同时要讲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这些纲领合起来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总归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这个稿子写出后让人看了不仅仅是把历史上那些问题作一个评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党的目前的指导思想作一个描绘，而这个指导思想同党历来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真正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九

# 对一九五七年后几段历史的议论*

（1980 年 5 月 24 日）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从“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中，到末了，他的论点是变化的。1962 年——1965 年——1966 年，一直到 1976 年那篇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六点，这时的观点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走资派，党内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了 1974 年初的理论指示，到 1976 年四号文件，这个观点又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法，毛主席没有个答案，愈来愈不清楚了。搞阶级斗争，总要有个纲领，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也没有什么具体内容。

《哥达纲领批判》有它的负面影响。当然划分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有很大好处，但是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法权。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没有讲，讲了一个物资的极大丰富、大量涌现，前提是人的全面发展，从分工中解放出来，不是反过来讲首先发展生产力。以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死了，说生

---

* 此篇是 1980 年 5 月 24 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剥夺了，但在交换范围里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剥夺。既然有资产阶级法权，就要有资产阶级国家，结果就好像真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从资产阶级权利到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走得很远了。这样就可以引出贝特兰的理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搞过渡，就要拉平，不要着力搞生产。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平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等。可是，毛主席也没有朝这个方向详细地想下去。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列举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条，末了一条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的纲领是斗私批修。搞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灵魂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没有纲领的，要打倒一批人，这批人是走资派，究竟走资派的纲领是什么？反对走资派的纲领又是什么？讲不清楚。说到最后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成功失败，没法子衡量。把这些人打倒了，就搞不下去了。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什么意思？世界观怎么能革命？革命怎么能解决世界观问题？为了解决世界观问题要发动一场革命？把马克思主义所有的书翻了，也找不出这种理论。

在这个地方要讲，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要怎么样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人同人之间的平等？在这方面这个决议要说出一个道理，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否则，会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八大文件中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

贝特兰讲，张春桥文章虽然不完全对，但讲出一个道理。打倒“四人帮”后，没有一篇文章对张的文章作过系统的批判。张春桥好像继承了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说马克思怎么讲的，列宁怎么讲的，然后讲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这样就摆出一个道理来。他讲的是胡说八道，但是问题得答复。所有制，以后还要变化，也不能设想就是循着由生产队到大队到公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社，由集体到全民这样的次序。当然都是要公有化。在公有化过程中，作为公有制补充的个体所有制，还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指导下，在城市农村还存在。农村在什么情况下还有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是什么原因？这种承包制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群众对集体化觉悟的提高，还要怎么样变化。在交换和分配方面，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交换，商品流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这样才能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前进，而不是使它倒退。还有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本来不只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要说，整个生产关系都是人和人的关系。毛主席说的所谓猫鼠关系，是生产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说的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关系。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实现了平等、自由？这里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幻象、神话消除一下。

1974年的理论指示就是反映了一种观点，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观点。但是，从“文化大革命”没有找到答案。硬要蛮干一气。蛮干确实也是有人煽动的。毛主席闭目塞听，没有几个人同他来往。就是江青在那里煽动。批判《海瑞罢官》时，毛还说要保留意见。后来的变化，同他1957年以后思想不断向“左”的方面发展有关系。引火物是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没有这篇文章，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他修改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花了很大的功夫，改了好几道。他还把陈伯达、关锋找去，要给马恩著作写序，结果找去后又不谈了。可见他思想上变化很大。

他是一种矛盾的性格，一碰到有些事，火是非发不可的，如七、八、九三个月搞了文化教育方面的整顿。看到刘冰的信，又下决心批邓。但是也不放心，所以还留那么一点尾巴，实际是走钢丝。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群、谢静宜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象征。他指示解放蒋南翔，而蒋南翔是迟群去打倒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搞成功，但不能讲。

1957年以后十年这一段，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问题就讲准备不足，发生动摇。1958—1959年的错误，并没有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还是要搞经济建设。反右派扩大化对八大路线是一个偏离，对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偏离。但反右派扩大化，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太大影响。影响是对知识分子打击，不信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没有解决。

八大是正确的，但八大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充分的总结。从八大以后，路线没有把稳。1959年庐山会议上山前，毛主席说经济建设靠陈云，我不行了，是说的真话，虽然不是很愿意说，但还是承认搞失败了。当时参加会的好多人没有转过来，虽然其中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但是指导思想是一样的。后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套，虽然他没有讲，是合乎他的本意的。

但是他不是坏心。当时反右派他也搞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运动的方法问题，要搞什么大鸣大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来我整理了一个稿子，他说先放一放，只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他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社会主义革命来得太快，有反对意见是不奇怪的。

把1957年以后的事情用这样一个线索、一个逻辑写下来，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一个科学的历史的解释。错是错了，小错积成大错。

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要讲一点理由？因为过去没有怎么讲过。八大也没有讲。中国不在1953年以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不行的。资本主义如果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控制它们，就要起破坏作用。这方面的事例在“五反”中揭发很多。经过“五反”后，资本主义受到很大打击，它要继续经营下去，不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不行。非走不可，不是强制的，是一种必然，对资本家对我们都是必然。资本家有他的代表人物参加国家的领导，所以这种合作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农民也有这个问题，一方面国家要求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在土改后很满足，慢慢地困难户增加，又有意见了。

以建设为主体可以不讲，毛主席讲了这个话，但是也没有真正把它当成主体。那时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规模有限，各省主要力量还在搞农业，后来搞社会主义改造。

“向自然界作战”，不这样提，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只是作战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很多事不能用这个说法来表述。造成这十年的曲折就是三年困难时期。1958 年大跃进，想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要持久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没有经济的办法是不行的。

大致按时间写下来可以，但写了以后，一方面说十年经济建设走了一个弯路，又要说很快医治了创伤，走上正确的道路。要有些数字，重新上升，上升得很快，还是有一大批干部学会了搞经济建设，是在用心学习、掌握建设的本领。如果他们一直不间断地搞下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会了不起的。拿恢复来说，当时速度之快也是难得的，用这个来看今天，会给人以信心。讲了这些以后，正面反面还要集中讲一下。几个方面的错误虽然有些解决了，但是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反而发展了。对彭德怀的处理过重。后来让彭去三线，毛主席实际上是向他承认错误，但不是采取正常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刘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这个问题，也是种舆论压力。这时毛主席的心里是矛盾的，有时说庐山会议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正确的，有时又感到搞错了，在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中，毛主席加了经济核算、按劳分配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是绝对不能违背的。一个个错误，具体来说，是纠正了。可是，总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没有触动。政治方面，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提法，一步步升级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逐步升级，到“文化大革命”前夜，周总理在人代大会上的报告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词句，已经是阶级斗争为纲了。加上林彪搞所谓活学活用一套，更加煽起个人崇拜的狂热。对林彪的那种搞法，中央没有正式作决定。书记处、中宣部都讨论过，都是不赞成的。少奇同志是不赞成的。林彪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上对毛泽东思想就提得很高了，后来不断加温。这段时期一方面有些错误在纠正，另一方面有些错误不但没有纠正，还在大大鼓吹。因此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来不是偶然的。这确实不只是个人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原因。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对我们党犯错误怎么讲法？党犯错误就是党中央犯错误，严格讲很难这样讲。如果不这样讲，就否认了那一段的合法性了。我们还是要承认是党的错误。错误是错误，但不必说它是非法的。说整个党好，还是说党中央好？当时党中央的具体状况也要讲。

把“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归结为灵魂、世界观的革命，这个革命是搞不下去的。没有提出具体的目标，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1966年毛主席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信，1971年的教育工作会议，等等，工厂办成什么样的工厂，农村办成什么样的农村，这些口号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提出学制要缩短，一方面要求学制缩短，一方面要求减轻学生负担，结果不能不搞得学生的文化程度下降。所以提不出具体目标是必然的，找不到依靠力量也是必然的，因为前提就错了，没有法子搞下去。

八大到“文化大革命”的一段，不必去讲什么路线错误，讲错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就行了。到“文化大革命”,就发展成为路线错误。

国内外都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还有好的方面,一个是说讲平等,找出了具体办法,贝特兰等就是这样认为。国内有人认为还搞了合作医疗等。这些或者不必讲得太零碎,或者在讲干部和群众还在坚持工作中间去讲。干部和群众还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正确的东西。

你们的稿子说,“文化大革命”“永远不能再搞了”,这个说法软弱。要强调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任何条件下不许重犯这个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名称要不要说?这不能叫革命,无论什么意义上都不能算是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意思是指生产力要挣脱生产关系的束缚。“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能这样说,即使类似过去的宗教革命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没有做什么好事,反而做出许多坏事,不但把原来好的风气丢掉了,而且滋长了许多坏风气。外国人讲起教授下农村,以为是好事。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断定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算是革命,虽然是一句话,但否定是斩钉截铁。

毛主席的功过,要讲他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尽管他在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到 1966 年以后,在主要方面他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外交方面,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调整外交政策,主要是功绩,也有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期把省委恢复后,多数还是要办事的,要为人民服务的。一直到最后,毛主席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解放了一批干部,为打倒“四人帮”准备了条件。当时这样做,实际上等于说打倒这批人是打错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讲,“文化大革命”错了,但究竟是不是阶级斗争?能不能说“四人帮”代表反革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阶级？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说，但是要说一下。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利用了一部分合法的形式，造成了一场内乱，这个内乱既不能说是一场革命的阶级斗争，又不能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斗争。这势必要产生一个问题，林彪、江青是不是代表地富反坏右？是不是要搞反革命复辟？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严格说来，还不能说他们就是要搞一个什么东西。他们会把社会主义制度搞得奇奇怪怪，但很难说这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地主阶级。这不太合乎事实。这两个阴谋集团没有这么一个社会基础。如果要形成复辟，也要有一个社会基础，不能用江青要做女皇这种话来作说明，她要独裁是不成问题的，会把社会主义搞得奇形怪状。这样似乎愈说愈离奇了。当然可以说这些人不会搞什么社会主义，但不一定说他们要搞别的什么制度。整个“文化大革命”怎么解释？要导致灾难，毁灭，都可以讲。搞下去可能会引起某一个局部的反革命事件，但也不太容易。有这么大的一个人民解放军，他们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全部权力夺过去？这很难想像。

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过程。从对资产阶级革命来说，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基本上完了，当然还有斗争。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要一直过渡到共产主义，才是革命的完成。发展生产力是革命，实现现代化是革命，镇压反革命、抵御外国侵略也是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的领导，都是革命，这种讲法，从广泛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原来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可以讲得通的。好处是把革命的旗帜抓住了。这里涉及好些问题，要仔细讲起来很复杂。是否可以总起来说，革命没有终结，所以还需要党的领导，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讲一下。我们批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但是我们还要讲革命。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而且要很确定地很明白地讲清楚。

社会差别是不可能拉平的。现在存在这种差别，是不是形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了阶级？资产阶级批评家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不形成阶级的，都有个集团。这个问题不能详细讨论，但要讲清楚。

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算是手段。不能把人民的个人权力当作手段，不能算是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那样是把人本身都当作手段了。人本身就是目的。人有个人的基本权力。同个人权力不同，人民要当家作主，是个集体的权力，这是永远的目的，不能说是手段。人民到共产主义时代都要当家作主。人民的意志本身，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都是目的，如果连自由都没有，还有什么需要？通过民主的方法达到什么目的，这是手段。在说到人民的个人权力、集体权力时，要说到集体经济都要按人民的意志来发展，不能把人民当作阿斗，这同党的领导完全不能对立起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

# 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

（1980年6月9日）

阶级斗争为纲能否概括“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考虑一下。用人为的阶级斗争来搞“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可以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不管是不是人为的，反正叫作十年动乱，在客观上起了什么作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究竟追求什么目标？或者说没有什么目标？或者说个人权力目标？这些都要有一个说法。

毛主席是在追求一种东西，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这种东西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个东西要说得很完整也不容易。但是到1974年的理论指示，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有一套说法的。这个东西也不能用平均主义来描写。这个当然同“四人帮”所追求的不一样。林彪、“四人帮”并不管这些。张春桥是因为毛主席讲了理论问题才写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张的整个言论并不是这些。“九评”的思想虽然不是毛主席设计的，但是对他是有影响的。像四清运动中的一个批示，说是干部要变成官僚主义者

---

* 此篇是1980年6月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阶级，要被工人打倒，是一场阶级斗争等等。还有后来要求知识分子同工农划等号，因为毛主席多年来同工人联系很少，他比较具体、清楚的印象就是农民，所以他说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对干部同工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分配制度方面，废除工资制，取消八级工资制等等，叫什么？叫按需分配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想成熟，没有把要实现的目标具体化，因为太不现实了，比如农村三级所有制要真正变成公社所有，他也不能下这个决心。

你们归纳的这五条是不是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围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答复了？贝特兰的文章有没有看？他的基本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不能提出要达到什么经济指标。还是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人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所以他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只有“文化大革命”是搞社会主义。因为其他的党都在搞经济建设。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命题，究竟如何？资本主义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复辟？走资派同资本主义复辟是互相联系的，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一个党完全腐化了，党员都用各种手段去谋私利，就有这种可能。但是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这种变化是如何进行的？要实现原来那种资本主义会遇到相当大的障碍，是不是可能实行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把社会主义国家征服了。这里要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农村也好城市也好，究竟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这就要找当时领导四清的人做些调查研究。白银厂的问题现在否定了，但是这个材料可以研究一下。当作一个标本，仔细研究一下。农村用什么做标本？当时是什么情况？究竟叫不叫资本主义复辟？其中有一些是干部腐化、侵吞公款，做生意为个人发财，像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干部的蜕化变质。这是否叫走资派？这种概念给人一个印象：有一个资本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主义，有一个派，有一个目标。一些人想利用社会主义来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这是一件事。至于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那又是一件事。干部中间不是一个个的个人，而是形成一个小集团来盗窃国家财产，利用职务的权力来合伙营私，这种情况是有的，是发生了，应当同这种人作斗争。这种人是否就是走资派？要查一查过去的文件，提出走资派的二十三条是怎么说的？文件中还说层层都有，行行都有，这个概念就大大变化了。既然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就必然会有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也必然会到党内来，这样就不得不把走资派这个概念扩大。

有个现成的办法，仔细研究一下中央 1976 年四号文件，1974 年理论指示，1966 年五七指示，可见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通过对这种纲领性文件的分析才能说明毛主席同江青搞的是两码事。在这些文件里表现了急于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所以说斯大林犯了大错误，所以才会把资产阶级的范围不断扩大，把阶级斗争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说地主变天账等等，大家还承认，后来越添越多，就说不清楚了。

批判唯生产力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

不一定写成论文式的，而是论断式的，论断是在精确研究的基础上下的，还是提纲性的，话虽然说得简单，但论证的基础是牢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一

# 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

（1980年7月3日）

讲几个原则问题。

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这个要求在现在这个稿子中没有能够实现。为了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稿子作比较大的修改或改写。这个问题，在党内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过程来看，在中央委员会的范围里，至少绝大多数同志是赞成这个意见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离开这个方向，要向对于这个方向有怀疑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这个决议就是说服那些同志的重要武器。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如果动摇了就达不到写这个文件的目的。

《决议》一方面要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左”倾错误作出判定。另外一方面，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要对它

---

* 此篇是1980年7月3日上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历史决议》时的发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加以历史的分析，说明这不是偶然的，有它历史的原因。把毛主席在晚年逐步形成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这样才能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文化大革命”，不能把它解释成为毛主席为了把别的同志打倒，纯粹是这个目的。毛主席没有这个理由要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中央委员会里绝大多数同志打倒。这样打倒对毛主席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在1966年中央一次会议上说过，你们都犯了错误，我也不好过。如果中央同志、省市委书记都犯了错误，毛主席是怎么领导的呢？实事求是来说，毛主席在八大以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怎么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党内有时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毛主席认为要搞社会主义，从1974年理论指示所说的，表现得比较清楚，他就是要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制工资这几样东西。从1974年、1975年、1976年，一直在讲，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限制。从1958年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起，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到1958年北戴河会议就讲要实行供给制，说进城后搞工资制没有理由。毛主席的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在正式文件中表达，他感到这个想法得不到多数赞成，但是他的这个思想一直保留着并且在发展。他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想法同现在有一些同志说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毛主席把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这件事丢到脑后了，而认为要把阶级斗争搞到党内来，党内有资产阶级，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应当看作只是出于个人关系，只是由于他对少奇、恩来、小平同志不满意引起的。他是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并不是毛主席所独有的，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中，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从来就有的，现在也还有。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些评论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并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从毛主席的言论中了解到毛主席的这种思想与他们的想法相吻合才这样说的。这些思想违反了中国长期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八大，从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讲话，那时他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上面讲的那种社会主义。这样长期形成的前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给予正确解决是非常必要的。

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有这么个想法，这个想法在世界范围有影响，这些想法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更突出了。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法？世界的工人阶级、左翼知识分子以前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后来失望了，又把希望转到中国，现在中国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其中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很拥护，另外一些人因“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对中国也失望了。对苏联也失望，对中国也失望，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对社会主义感到一种失望、迷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决议要恰当地答复这个问题，虽然不能充分地全部地一劳永逸地答复。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要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说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明一些社会主义的理想，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是什么。这样才能用这个奋斗目标团结全党全国人民，教育人民，教育青年。因此，要在决议中说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能只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果仅仅是这一点，有人就会提出，美国、日本的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吗？香港、台湾不也是很高吗？那样，搞资本主义就行了，还要搞社会主义干什么？一定要加上其他一些原则。我们还要革命，革命并没有结束，要给革命的口号一些新的明确的内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二

# 毛主席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

（1980年7月5日）

延安反教条主义对斯大林的一套体系没有批判，对斯大林建设党、领导国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理、方法没有批判。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本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

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得到胜利，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否则，不能解释中国党为什么同共产国际进行了那么长期的坚决的尖锐的斗争。共产国际形成了一套，这已经成了世界历史的事实。毛主席同这种现象、倾向作了顽强的斗争，这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有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发展过程中防止教条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有一百多年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突破，这不是说马克思已经把一百年以后的所有问题全都解决了。第一国际当时的情况复杂，第三国际是造成了一种教条主义倾向。但毛主席的确打

---

* 此篇是1980年7月5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破了共产国际的专制、教条化倾向。共产国际就不作调查。把调查研究当作一个指导原则、一个重要方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没有的。从马恩以后,形成了一种对他们的崇拜。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说过这个意思。直到现在,对一些理论问题,如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等,还当作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争论。毛主席同第三国际的指导方针作了长期的斗争,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今天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怎么结合?就是要研究中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联系群众,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毛主席把这些发展成了一个观点、一个工作方法的系统,还可以加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确实在世界政治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寻找的道路来取得胜利的。这个传统可以永远保持。中国有十亿人口,一定要依靠自己,绝不能依靠苏联,也不能依靠美国,子子孙孙都要继承这个思想,要把这个思想固定下来,用显著的形式,用科学的形式、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确实是很有特色,很为世界人士所称道的。这个问题不能说在世界上都解决了,世界上很少有人做这种宣传,但是苏联今天还在坚持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道路,说只有他们现在搞的这一套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经典的道路,其他什么欧洲共产主义都是离经叛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观点,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的发展,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如果对这个不重视,就会产生一种对我们党的历史、党的传统的虚无主义。我们这样重视,不是为着实用主义的目的,为了一种功利的需要,而是忠实于历史事实。讲这个,也有助于批评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恢复从1927年到1957年时期的毛泽东,这不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事实,而是超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越了那一段时期。它的意义超越了那一段时期，可以成为对我们党、我们人民长期进行教育的武器。这个思想当然还会发展，从这个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出发规定的政策，也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今天规定的一些政策，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解释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因为毛主席也好，中国党也好，实践的范围，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很有限的。那样说是妄自尊大。但在哪些方面，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的作风、传统，这些作风、传统，曾经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党的，被其他党所称赞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把它放到博物馆去。

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以后，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党纲党章作了规定，党还作了种种决议，这些，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要服从，但是，服从并不是照搬。如何发挥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理论本身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是运动，当然，它是有原则的运动，但是，它毕竟是运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用新的原理代替旧的原理，或者对旧的原理作相当大的修改。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要素也是要发展的。

现在对于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还是摆脱不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好像马克思研究中国历史，比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还要精通。好像如果不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清楚，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不能前进。又如关于古代社会，摩尔根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观点非常宝贵，但是，他所描写的古代社会的具体结论都已经过时了。奇怪的是，摩尔根却得到了另一个命运，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引用，他那些具体结论就成了不可移易的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同古代社会的这种具体判断结一种不解之缘呢？

苏联现在大讲现实社会主义，这个现实社会主义同它的扩张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三

# 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

（1980年7月7日）

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从这里就可以产生社会帝国主义。在列宁的好些著作里都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一方面关于要尊重民族特点讲了很多，可是另一方面，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这就是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不是经过集体的讨论来判断，而是由个人的智慧来判断。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是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不承认这种集中制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建议不可能正确，而是说采取这种作决议的形式，就不能不使事情走上了绝路。

第一国际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它集中不起来，但是也有一些倾向。到了共产国际，它有了政权，列宁提出全世界都要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争论中国在什么时候应当建立苏维埃，这种做法是很坏的，中国革命怎么能靠莫斯科来作决定呢？

---

* 此篇是1980年7月7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共产国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列宁的建党思想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在沙皇恐怖统治下提出来的，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是否还要沿袭下来，不作一种原则的改变，而且还扩大到全世界的共产党之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列宁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的。按照他们那种搞法，就要导致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领导民族和被领导民族，两者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关系。现在的阿富汗就是用枪杆子来改造，把各种现代化的武器都拿出来，支持完全是代表少数人的组织。这就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引到绝路，引导到它的反面。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要奉行的社会主义，在国内是民主的，在国际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没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搞不成，共产主义也搞不成。

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有两种形象：一种是长期的中国革命，一直到1957年，在世界上保持着，在第三世界，以至在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革命给世界展现了一个新的光明前景，提供了一个新的前途。另外一种，主要是从六十年代以后或者晚一点，在国际反修斗争激化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一种形象。对这个形象，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观感。我们现在继承第一种形象，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

同共产国际的上述错误原则作斗争，到毛主席晚年，这种精神也走向反面。在国际范围，他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在国内范围，发生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也不奇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执行纪律制裁，解散，以至可以进行肃反，把领导人杀掉，这谈不上是什么共产党的原则。

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民主难道就不是？到那个时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这种观点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工作，以恩来、小平同志为代表，还是有成绩的。他们是代表，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否则，整个党就完了，为什么我们党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快就恢复了？难道真的是经过火化以后再生出一个凤凰来么？要对历史负责，要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对打倒林彪以后各级党委的状况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有些同志，尽管被人家把头按下去了，但是手一放开，头又抬起来了。当时重新建立的各省省委，真正是属于“四人帮”的还是少数。现在的赵紫阳、余秋里、谷牧等同志在当时都出来做了工作。

“文化大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四人帮”的被粉碎，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不能用一种简单的颜色，比如说黑色来描述“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错误非常严重，引起大家愤懑，这是不奇怪的。可是我们要写历史时，不能不冷静地客观地对待。毛主席对待小平同志可以说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究竟没有说要把他开除党籍。不能说毛主席的晚年什么是非之心都没有了，或者完全颠倒过来了。毛主席后来要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能说完全是为了个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把老干部打下去，不许人家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不可理解的事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否则我们就要像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书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把拿破仑第三的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也还是没有把“雾月十八日事变”解释好，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还是作了多方面的分析。我们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否则，很难用历史来教育党和人民。我们不要捏造事实，但是，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党也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活动。党已经建立了这么大的组织，同群众建立了这么广泛的联系，任何一个人想要扭转历史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这么想，如果毛主席不在那时去世，“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不会走到死胡同去。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四

# 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

（1980年7月24日）

毛主席的错误同功绩比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的这些错误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毛主席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贡献是这样伟大，绝不能够动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的错误是违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因此，这些错误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领袖，还有别的领袖，他是最伟大的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历史可以分成几段讲，1927年前一段，1927—1937年一段，1937—1945年一段，1945—1949年一段，1949年—三大改造一段。遵义会议后长时间的活动，培养了整个党的领导骨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党的各条战线干部。这些干部、党员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各个战线上的骨干。他的思想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去了，他的大量教导永

---

* 此篇是1980年7月24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然后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解释，下一个定义，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不这样认为，这要说明白，以区别“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看马恩列的书，不能光看《两论》，经济学更加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毛主席本人不承认这种说法。

然后讲毛泽东思想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明确地讲共产国际在什么时期对别的国家实行一种集中领导，不把各国革命看成是必须由各国人民各国党决定的，而看成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的。他们不但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变成教条，而且把他们的决定、命令变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其结果，只能对各国革命、各国人民带来损失，造成失败。1927 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当时中国党的一切重大事件要由共产国际来指导，以至把共产国际的决定拿给汪精卫看。当时形势瞬息万变，从国外的国际组织来指导一个国家的革命，无论什么天兵天将都不能做到。六大的所有决议都是苏联人写的。其中十大纲领有一条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这一条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懂。这种状况使中国革命陷于一种困难境地。共产国际不可能找到一条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第一是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是 1930 年写的，是实际斗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产物。土改怎么搞，仗怎么打？当时的党中央都靠本本，就是马列的书本和共产国际的文件。拿本本来，是当时的话。但是毛主席当时不是靠共产国际的决议，甚至不是靠党中央的决议（因为党中央离得远），所以提出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能产生正确方案，能验证中央决议对不对。各国革命的道路要由各国党和人民自己去找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条件、背景。革命要依靠各国革命人民在实际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加以运用，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在当时、现在以至将来，永远都是正确的，要坚持的。所以毛泽东思想强调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经验。智慧、办法要从群众中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实际经验，把各国实际经验提高成为理论，不然各国经验不会自然成为理论。这种理论还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无论什么好的办法都要通过试验。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第二是群众路线。这也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为什么提出依靠群众？因为当时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依靠。要么是失败，是投降；要么是从依靠群众找出路。固然马克思主义也讲工人自己解放自己，但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后，很容易丢掉这个观点。中国革命在失败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相信群众能接受革命道理，能找到胜利的出路，能找到达到胜利的智慧和力量。红军一开始就在毛主席指导下建立一种新式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这样就建立起完全新的军队。建立的新的政权也完全是依靠群众。党员、红军、党的干部、政府人员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维护群众的利益，把群众力量团结起来，并使群众相信党、红军是团结的中心。从红军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后，还是用这种思想要求党、政、军干部。在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提出了许多新办法，如三结合、三同等等，以后我们还要这样。只要一个党要革命，就要坚持这种观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革命、建设要胜利，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革命斗争，不能仅仅依靠别人的援助来达到胜利，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道路，是不能达到胜利的。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不能离开自力更生这个基本点。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动摇。绝不能屈服于任何外国的压力。如果那样，就丧失了革命的原则。同时也要反对自己有任何大国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思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经过很长时期发展的。这几个基本原则一直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些根本精神出发，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一系列原理，领导革命胜利。单独写一段。然后又根据中国革命具体特点提出了新的办法，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历史任务。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主席继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发展生产力。如不发展生产力，中国要挨打、打败。要发展生产力，要注意一些基本的比例关系，农轻重、国防民用，不同水平的生产力两条腿走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消费与积累比例，等等。发展建设事业，要依靠什么人，知识分子、专家，学习掌握科学知识。要实行按劳分配，搞经济核算，等价交换。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保护人民的利益。达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引出一些话，是否可以分一些题目选一些话，虽然这是大家熟悉的，现在引出有两个作用，一是说明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我们现在还要继承这些原则，其次，“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是违背了这些原则。违反了它就要失败，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最根本的就是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则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采取什么方法，坚持什么原则，依靠什么力量。所谓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没有另外的意思，并不是要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际斗争中要遵守的依据的原则，它是个科学，因此是要发展的，说它是个体系不是表示再不需要发展，再不能够发展。科学就要发展。一方面讲完整准确地掌握科学体系，只抓片言只字是错误的，但是否认毛泽东思想也是错误的。要求我们继续按照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前进。不能丢掉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基本原则是我们永远不能离开的。这些基本原则可能还要作些补充。既不是搞句句是真理，也不是搞停滞不前。经历了三十年曲折道路，有挫折，就是由于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我们总结这些经验，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使社会主义继续胜利发展的保证。我们党多年来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奋斗的，因此，这也是团结全党的旗帜。

还要照顾到另一部分干部，在党内有相当的影响，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只是嘴上讲毛泽东思想，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要说明我们做的是毛泽东思想所指示的。要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一些新的经济政策，这会在党内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有相当阻力，不能把这部分人撇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五

# 毛主席跟林彪、江青完全不同*

（1980年9月21日）

在说毛主席跟林彪、江青完全不同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功劳：第一，毛主席基本上维持了解放军。解放军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捣乱，也难免犯一些错误，但是，毛主席维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非常大的功劳，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如果不看到这个事实，那是太不公正了。第二，他基本上维持了国务院。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的手基本上没有插到国务院里。国务院是个小岛，不管它工作怎么困难，也犯了多少错误，可是，维持这么个小岛是很不容易的。维持了一个国务院，这对全国人民，对中国这整个十年，关系是很大的。有了国务院，经济工作毕竟还能够进行，还有领导，不管这个领导犯这个错误那个错误，这都是小事。第三，毛主席基本上还勉强维持了党的统一。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虽然毛主席搞出两个司令部，但是，他也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统统开除出去，或者搞死，实在说，他也没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多久，他

---

* 此篇节录自1980年9月21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就把“走资派”改成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反正这些名词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什么死不悔改的,不死不悔改的,还有什么三反分子,还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般的修正主义分子,老实说,那些作用都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这句话,这句话挽救了他,这就是毛主席自己下台阶,不然,毛主席也没法下台。毛主席也并不想把这个党分裂,他讲了很多,说我们的党分裂不了。在这方面,他跟林彪、江青这些人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在外交上还作了两大贡献。所以,我不同意说我们党变质,我不同意说我们党先变质了,以后又变回来了。总归是把这个党搞得非常混乱了。如果说党变质了,国变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变修了,也变色了,那在国务院工作的,在座还有好几位同志,还有军委叶帅,这些人统统都变质了,这个话不能讲,这样讲,我们党的历史就说不下去了。让林彪、江青横行十年之久,这个错误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引起这样一种义愤。但是,在这个十年中间,毕竟中央还有许多人在为党工作,地方也有许多人在为党工作。在地方负责任的第一把手,我没有统计,我不敢说,我冒估一下,林彪、“四人帮”的死党是少数,过半数的,不管犯了什么错误,还是好人。我也没有列表统计,统计也很复杂,因为每年都不同,但是,为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因为,“四人帮”那一批人差不多年年都要反右,年年都要在全党或者是反三右,或者是反两右,或者是反一右,反正他们是不住地要反右。这说明个什么事实呢?就是“四人帮”没有把我们党统治住,他们统治不住。这是个事实。不然,为什么他们老要反呢?他们已经统治了,为什么还老要反?对于地方上负责的许多同志(不能说所有的同志),他们也不相信,也很反对,不过,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到把这些人统统都干掉那种程度。把这些现象合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在那里起作用,刚才说的这些事实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务院,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批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志，也可以说是一大批同志，尽管也要跟着犯好多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还是要把党的事业维持住，把国家的命脉保护住。不然，我们怎么能解释周恩来同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你能说他的工作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吧？也不能解释1975年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说内乱是恰如其分的。它确实就是个内乱，这个内乱是非常复杂的，跟历史上的一些内乱不相同。这是一个问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六

# 决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

（1980年9月21日）

最大的争论问题，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不能说得太远了，眼睛看得见的将来，还是对我们有作用。当然，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恶感，可是，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毛泽东思想是多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鼓吹到它应有的程度以外，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1927年到1957年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有的同志说，就讲马克思主义就行了。应当说，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我们可以看这一段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当然不只他的著作，学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前辈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能不能用马克思的著作来

---

* 此篇节录自1980年9月21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代替，用列宁的著作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著作来代替，用什么共产国际的文件来代替？不可能的。毛主席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是灌溉了我们的党，确实是培育了我们的党，确实把我们党广大的干部带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所以，这些著作是决不能丢掉的，这种财富是决不能丢的。马克思这个人无论怎么好，他没有到过中国，列宁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关于中国说过许多好话。我们党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虽然也有其他许多同志的贡献，但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摆在一起一比，比方说，把少奇同志的著作，恩来同志的著作，跟毛主席的著作摆在一起一比，就可以看出来，在少奇同志的著作中，在恩来同志的著作中，就缺乏很多东西，这是很难相提并论的。将来恩来同志的选集出版以后，大家一看就可以看清楚。我们所要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当然，1957 年以后，毛主席还发表了一些著作，不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就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收集在毛主席著作里面。有的同志说，现在要赶快出毛泽东全集，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的所有作品都照原样编出来，以便于大家来批判（当然，话没有我说得这样难听，说研究吧）。我想，这个工作是要做的，这不是什么着急的事情。我们现在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主席的批判是够严厉的了。以为今天把毛泽东搞得愈臭愈好，这究竟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究竟能够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的确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提法（关于这个名词将来怎么样解释得更妥当些，我们还有时间来研究）。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个“思想”不是个动词。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它记录下来。不是这样，这是个名词。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他既然成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性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大学者，都不会把不能成为学说，也不能把不成为学说因素的东西，放在他的选集里面，也不会把那些成分当作是他的学说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在我看，可以不必进行那么样严重的、长期的争论，这会涣散我们党的团结。当然，毛主席犯了错误，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很大的不幸，但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不犯错误，那当然好了。事实既然是这样，我们只好照现在这样来研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七

#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

（1980 年 9 月 27 日）

有两个问题要注意：

第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词不太合适。1957—1966 年的几次政治斗争不能都叫阶级斗争扩大化，只能说一部分是阶级斗争，另一部分不是阶级斗争而把它当作阶级斗争。如反彭德怀，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批判吴晗等等都是诬陷，一方面说是政治诬陷，另外又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不是忠实于历史。阶级斗争我不否认，帝国主义特务、台湾特务，同这些人的斗争，当然是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但不能滥用，滥用了发生许多问题，阶级斗争何时是了？

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要加“所谓”，这不是什么阶级斗争。1957 年社会上本来存在着许多社会政治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这本来是毛主席 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企图解决的问题，本来是光明的，结果转成黑暗的。

---

* 此篇是 1980 年 9 月 27 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1957年的反右完全可以不发生，如果没有“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完全可以不发生。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存在，大量存在，无论我们处理了或没有处理，处理得对，或处理得不对。本来主要是经济矛盾（说社会矛盾，包括经济），发展到政治矛盾，以经济为主的社会政治矛盾。多年来，一方面，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对大量社会政治矛盾没有处理好。最明显的是干群关系，花的力气很大，收效甚微。这个文件要同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衔接。本来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想办法。不这样做，结果解决不了，这个话在讲十年中的阶级斗争时，要比较着重地讲一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总题目，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复杂的工作，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一点没有做。后来爆发“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功劳、没有积极方面，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些矛盾。毛主席也提出了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哲学译丛》当时成为他最爱读的刊物，所以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讲话中说，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毛主席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不好这么说，但毛主席确实是第一个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提出来，这是他的功绩。可惜以后走上错路，搞阶级斗争了。外国人认为毛主席要解决这些矛盾，总是好的吧，无非方法不对。如果这一条不讲，就发生一个问题，好像我们把社会主义的问题封起来了，加以取消了，虽然后面也讲到要解决生产关系等问题，但没有讲到要解决社会政治矛盾，这是多方面的，范围非常广。如反官僚主义，这是干群关系。就业、物价问题，就是经济矛盾。对这些矛盾解决不好，人民会不满意政府。这是长期存在的，如果处理得不好，波兰事件会出现。对这种矛盾粗枝大叶，生硬处理，也可以发生很严重的后果。虽然可以把根本原因归于极左路线，但也不是简单地用批极左路线能解决的。就学、就业问题，我们工作中一系列的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公正，都可以成为引发事件的导火线。

上面这些意见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后，小平同志说赞成你写这一点，但不要说过头了，好像马上要兑现。有社会主义就有这种问题，始终存在。有些矛盾，到共产主义也会存在。为什么计划生育，在农村发生许多命案？这些例子值得编成材料，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

第二个问题，党的建设。要讲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讲实事求是非常重要，现在还需要，同时还要宣传加强理论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复杂的事，说“经验极其丰富”，太满了。我们面临很多问题，经济、政治、文化，许多建设中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成问题，但不够，还要学别的。不能认为马列主义以外就没有社会科学，不讲马列主义就没有科学性。讲出这一句话来，非常重要，这才是解放思想。这句话是非讲不可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认为李嘉图的著作不是科学。魁奈也是。我们有这么一种不成文法，谁都不能反对的，就是除了马克思以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假科学、伪科学。所以经济学到了马克思以后，就都是庸俗经济学，这样说一百年，科学史能这样写下去吗？如投入产出法，是世界上公认的，这不过是一种技术而已，还算不上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以后就有教条主义。对此马克思本人就讲，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以后，梅林也讲了这个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同党的集权是互为表里的，因为那是绝对科学，所以你就得绝对服从，这样党内对理论问题就很难讨论了。

讲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就好了，让人感觉到，我们所肯定的毛泽东思想也只是它的实质，而不是他的每一句话。像毛主席所说的，是个立场观点方法，似乎也不太好讲。有许多根本的论题、公式，承认不承认？如剩余价值学说是个理论，不太好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说它只是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是个政治术语，说说就说空了。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大体可以这么说，但讨论纯粹科学问题，就不大好说，说实质好一些。

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还要研究中国的现状，世界的现状，各种新问题。要表现出一种精神，马克思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是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人站在一起的，而不是同死守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人站在一起的。要研究理论，并且要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因为马克思说过什么话就回避事实，用一种创造性的态度来研究，实在是非常迫切的。并不是为了宣传，我们要解决许多问题，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非常落后的。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过去党校学《两论》，毛主席说这不好吧，哲学有个系统，这样把大家的思想束缚起来了。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要使党在理论上来一个复兴，要像毛主席那样，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要犯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说明了这一点。

说毛泽东思想萌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恐怕很难这么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改得很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种思想当时在党内就有，不能说是毛主席一人的首创，毛主席把它搞得更系统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同毛主席相比，别人是不能比，毛主席作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一个革命军队，也比列宁、斯大林的贡献多。这有历史的背景不同，我们是个被压迫民族，毛主席依靠群众来建设人民军队，是突出的。所以苏联军队始终没有建立严格的革命纪律。说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思想全面展开，也不好说。是要到抗战时期，抗战前夜还不能说，那时还是在着重考虑作战的问题。到抗战后，我们根据地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面积已经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要考虑多方面的政策了。

一切正确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说不通，很难为全世界的科学界所接受。一个思想的来源，可以有各种形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不行。我们党怎么做工作的思想，和党的正确思想，是两个含义。群众的含义是非常含混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很多伟大作品并不需要从上到下一个一个阶梯下来，才能普及。如一个美的雕塑，许多群众也能欣赏。

在农民汪洋大海般的环境里，建党和领导革命战争，有个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毛主席确有一些农民思想，但确在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用马克思主义领导党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这一点少奇同志讲过。在解放军中农民的觉悟程度比无产阶级的还要高。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这样一个共和国，不能说是一个农民共和国。1948 年反对农业社会主义，还是非常重要的。

小平同志已经讲了，党内民主问题毛主席没有解决。现在的稿子说毛主席解决得非常好，不妥，毛主席在很长时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工作的，但是他没有把它制度化。

决不要美化，决不要有溢美之词。我们的宣传要非常严格，毛主席讲了的没有做，就不要说他做了。提倡了，还可以写，有些事没有提倡没有实行，就不要宣传。应该很朴素，真正实事求是。对那些确实不是他的特点，我们不要去宣传。毛主席对党的建设究竟贡献在什么地方要想清楚，不要浮光掠影地说。

党内斗争，经过这么大的弯路，希望没有林彪、“四人帮”的残余是不可思议的。另外，现在党采取许多新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必要的，可是必然会增加许多消极的因素。因此，党内斗争是必然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八

# 毛泽东思想要讲三个组成部分*

（1981 年 4 月）

毛泽东思想要讲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革命和建设理论，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可以列举《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二是军事理论，包括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可以列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三是方法理论，就是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原则加以概括。要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今后还要发展。

---

* 此篇节录自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记录。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十九

#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1981 年 5 月 19 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我认为决议稿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超过了 1945 年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即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都简单地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绝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决议稿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关于小生产者绝大多数都要变为无产阶级的

---

* 此篇节录自 1981 年 5 月 19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论点不相容，实是各执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论，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权利并非真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罢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这种等级制恩格斯早就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指世界上（也包括当时的俄国）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也不会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当时并无这种问题。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内以及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但是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受到误解，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这是客观的事实，并非故意要拉上马恩列斯来为毛泽东同志开脱。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受封建主义历史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不是只用封建主义影响所能解释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十

# 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

（1981年8月8日）

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这是一个文艺理论的专门问题，我现在只能主要就政治方面说一点个人意见。

六中全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个任务，经过很多同志很长时间的集体努力，已经由六中全会完成了。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认为，这个题目的内容很丰富，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而这项工作我们现在还做得很少很少。我们的工作绝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这些方面的资料收集起来，进行整理。所以，为了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们现在所依据的资料是很不完全的。关

* 此篇节录自1981年8月8日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它的要点是：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决不可以跟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虽然工农兵不能够代替全体人民，但是他们究竟是人民的最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群众的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跟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比较起来，前一个提法更加准确，更加清楚。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保证每个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个人应有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例外），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即令有时我们这样说了，实质上还是等于说为人民而文艺等等。其次，这也是因为，为政治服务可以并且曾经被理解为当前的某一项政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策，某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甚至为某一个政治领导者的“瞎指挥”服务。应该承认，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只要这种政治确是代表人民当时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就如同宣传画和讽刺画是需要的，但是毕竟不能用来包括整个的绘画。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们的文学艺术为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这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任务，是每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家的光荣职责。当然，艺术的门类品种不同（例如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等等以及各自的进一步分类），它们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方法、方面和性质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对它们的要求也不能“一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只要有益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世界观、理想、道德、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气、情操和整个精神境界，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今天的中国，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正在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如果我们的文艺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不去为它服务，反而损害它的利益，那么人民为什么需要这种文艺呢？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要求作家深入到生活里面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

同时，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第一标准的提法①,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

---

① 作者原注:对于一部作品,应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去评价。从总体上来说,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而且这些观点在文艺作品中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同艺术的形象、题材、构思,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相结合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时,除了分析它所包含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以外,还必须分析它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内容,它对生活的认识价值,这样才能全面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势必硬把作品变成某种政治观点的图解物。即使是政治倾向十分强烈的文艺作品,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倾向,除非它不具备一般文艺作品的特征。因此,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毫无疑问,革命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对革命作家是绝对重要和绝对必要的),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因此，在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时候，我希望同志们对于它的正确的核心要坚决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的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党中央决定，在进行批评的时候，一律不要围攻，不要压服，不要无限上纲，就是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对于各个人，各个作品，各个观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搞围攻，一搞运动，就必然离开说理的态度，离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个正确的方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同志即使在晚年，对文艺问题也发表过一些好的思想。比方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不就是六十年代上半期提出来的口号吗？我们现在大家都赞成嘛。戏曲改革，从原则上来说，也是正确的，不然还有什么推陈出新呢？对于美术，对于人体画，他也发表过正确的意见，这个意见现在许多比较保守的同志和群众还不容易接受。1975 年，也还是毛泽东同志批准了电影《创业》和《海霞》的放映，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鲁迅全集的重新出版和鲁迅纪念馆的扩建，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等等，并且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暂时打击了江青一伙独霸文艺阵地的疯狂气焰。总之，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多花一些功夫，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认真地全面地研究一下，不要用简单的不明确的概念作为大前提来作这样那样的推论。那样会使得人们不容易了解你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包含哪些方面，不包含哪些方面。解放军的各位领导同志对于小平同志说的对“三支两军”要说两句话，不要说一句话，非常拥护。我们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需要采取这样的分析态度。只有这样，才合乎唯物主义，合乎辩证法，也才能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科学地结合起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十一

#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何犯“左”的错误*

（1981 年 9 月 14 日）

省委学习班的同志给我提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都很大，我恐怕不容易讲好，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吧。

第一个问题：我党六十年来为什么“左”的错误经常发生，而且占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反“左”的，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却一直犯“左”的错误（这个话稍微说重了，我照题目念），这种现象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决议》在分析毛泽东同志错误时，为什么不提阶级根源？

这确实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不但在《决议》通过以后，以前也常常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领导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不仅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各国的党在历史上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成立共产党就是要革命，要夺取政权，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一切，但是下了这个决心以后，政权怎样才能

---

* 1981 年 9 月 14 日，胡乔木在中共江苏省委举办的学习班上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提出的五个问题作了回答。此篇是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标题是编者加的。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夺到手，这条路怎么走法，这是很难避免走错路的。这条路怎么走，并不像从南京到上海，有一条现成的路，只要坐上火车或轮船，就可以到了。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时，他也是经常犯错误的。共产党比孙中山高明，但也不是高明得不犯错误。对于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各种可能遇到的失败，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个方面也是准备不够的，经常准备不够。这个准备不够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是必然的。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犯这种错误，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得比较乐观，希望各地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哪个地方起来一个革命，就认为这个革命有成功的希望。列宁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两样。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那时列宁和当时俄国的共产党都认为需要西欧各国的革命来支持俄国的革命，因此就经常希望西欧的革命能够胜利，在这方面发表过很多文章，认为西欧的革命一定会起来，一定会成功。西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革命，但是结果跟列宁预想的不一样，这些革命都失败了。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列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认为这些革命要起来。斯大林那时的共产国际也是这样，老是希望这个地方的革命成功，那个地方的革命成功。既然领导革命，当然希望成功，希望是一回事，能不能达到，怎么样使这个希望变成现实，又是一回事。所以在夺取政权时容易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这一点在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面也曾经说到。为什么党内发生这些“左”倾错误，都是希望革命要早些成功。但是，如何使得革命真正成功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在这方面注意得太少，不注意调查研究，不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可以说，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客观世界跟自己的主观世界发生矛盾，主观上的各种想法成为一种臆想。这是因为对革命缺少经验，对社会政治力量实际上的对比没有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学的估计，这种情况是在夺取政权斗争中最容易犯的一种“左”倾错误。

除了这种“左”倾错误以外，还有两种“左”倾错误。一种就是夸大党内的敌情。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左”倾错误，就是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夸大，用我们现在的习惯说法就是无限上纲。对党内斗争，党内的意见分歧作了一种不适当的、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因此就进行了“左”倾的党内斗争。这个不是对敌人，是对自己。在对敌斗争的困难条件下，敌人当然是想方设法要打到我们党内来进行破坏，我们不得不在这方面提高警惕，但是这种警惕性常常变成一种无中生有的猜疑，后来就不仅是猜疑，而且是判断，是断定了。这也是一种“左”倾，这种“左”倾在中国党内，在外国党内，都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损失。刚才说的这种错误，都还是属于主观跟客观的不一致，就是主观的认识不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事物在时间、空间里运动，如果我们走到正确位置的前面去了，这就叫做“左”倾，就脱离群众了，如果落在群众的后面，就是右倾，这是“左”右倾的一种情况，这只能解释一种情况。“左”倾并不都是革命者的认识超前，孤军深入，群众跟不上。有一种“左”倾错误，并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群众越觉悟，就越反对这种做法。比如说，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这就无所谓跑到时间的前面去，跑到群众的前面去。因为好好的房子为什么把它烧掉呢？你不能利用它？烧掉它谁可以得到好处？谁也得不到好处。像这么一种错误，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幼稚的，可是在我们党内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比方说在解放战争期间，老区土改的时候，就犯过这样盲目破坏财物之类的错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这是更大规模地发展了这种错误。这些根本跟群众的觉悟没有关系。所以“左”倾错误不单是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个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觉悟，有些事我们本身就做错了，群众无论怎么觉悟都不会赞成，越觉悟越不赞成，只有群众完全不觉悟才会盲从，才会跟着我们干这种蠢事。所以“左”倾错误有几种情况，几种不同的情况，最后的这种情况就不属于主观的认识同客观的形势是否符合的问题了，这里面包括一种逻辑思维上的错误，或者称作一种假言判断上的错误，你提出来的这种行为的标准本身就错了，所以做出了错误的行为，这同群众的觉悟毫无关系，这是我们自己的认识上的错误。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 AB 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当然，还是毛主席认识了这个错误，许多材料送到他面前，开始他还相信，到后来，材料里涉及到的许多人是他周围的人。他说，别的人我不知道，连我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了？这些人跟我一起工作、生活、斗争这么久，这些人我还不了解吗？他们的历史我也了解，所以他就发觉这个抢救运动是搞错了，因此就要求停止、纠正，并且向所有斗错了的人道歉。他亲自在大会上，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向大家承认错误、道歉。在华北的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连中农的土地都要平分。毛主席作过解释，说中农受了一部分损失，但又得到了一部分利益，利益跟损失相抵，还是得到的利益比较多，因为推翻了地主阶级。但是，这个办法还是错误的，所以后来毛主席就纠正了这个办法，取消了平分的办法，以后新区的土改就不采用，因为这样要扩大打击面。所以，就是在民主革命时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期，也不能说毛主席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不过，这些确实是很短暂的，比方像抢救运动，确实是康生这些人搞起来的，并不是出于毛主席的发动，但是，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后才纠正了这些错误。历史需要分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也不是一直犯“左”的错误，这种说法把问题搞得太简单化了，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确实是犯了不少，因为这时已经夺取了全国的政权，这时的错误影响比在江西、延安、华北都大得多，因为影响到全国了。

革命时期的“左”倾，也不能都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解释。一九四五年的决议里讲了很多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同时也讲了小资产阶级从狂热转为消沉，因此就左右摇摆。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间犯这种“左”倾的错误，1945 年的决议也分两方面说了，一方面是认识上的原因，一方面找社会历史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就找到了小资产阶级。这是讲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到党内来的人，还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产生了这些错误。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也有的不能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来解释。如果没有详细的历史分析，就轻易地运用这么一种分析方法的话，就很可能犯一种实用主义的错误，把它当做一种工具使用，哪个错误要分析，有一个现成的解释的方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我们要研究，小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究竟有没有这一种愿望，如果说有的，那么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当然，小资产阶级也要分很多集团、不同的阶层，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一个阶层，它内里又分了许多小的阶层，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哪一个集团也没有这么一种要求的话，我们就不好随便地贴这个标签。随便贴标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历史唯物主义本来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不是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贴标签那样。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容易犯“左”倾，但也不是说没有右倾，确实犯过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历史的事实。有的时候，右倾的错误也非常严重，这一方面用不着多说了。

我们先从社会主义革命看，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间，也有一种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的急于求成的错误，这种错误也跟民主革命时期犯错误的情形一样，都是希望早一点成功，同样是夸大了一个方面，贬低了另外一个方面，对客观世界作了片面的、歪曲的理解，这样子就会作出一种有偏向的决定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是两方面的“左”倾错误：一个是政治上，也包括文化上，就是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容易误认为又来了什么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的影子笼罩着很多同志的思想。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必须仔细地重新认识，要用一种学习的态度来认识的一个问题。这个学习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自己建立起来一种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社会，但是，不等于自己对它有充分的了解，这很不容易。一男一女结成夫妻，也不容易互相充分认识，也经过一些曲折，最后才能充分了解，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同样，这个新的社会尽管是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不等于我们就能完全地认识它。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以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最理想的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所以才有社会主义运动，所以才成立共产党，都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地前进。假如有困难，那是天灾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困难所造成的，而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像社会主义以前那样的冲突，这是很自然的。说实在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而且有两大类的矛盾，即敌我矛盾跟人民内部的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还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一个已经认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了的事物。可是，已经认识了的事物，不一定就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在另外一个情况下，本来已经认识了的东西，又不认识了，又发生了错误的认识。所以，认识是一个曲线，不是那样很容易达到目的。1957年毛主席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原则，可是不久，就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我们现在用不着详细回顾这段历史了。从这个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这个怪物（或是叫魔影），就很长时间笼罩着我们的党了。1958年好像没有进行什么阶级斗争，实际也进行了，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反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些都是1958年进行的。1958年还发生了反对反冒进，党内发动了有非常长远影响的错误斗争。1957年的斗争对党内也发生了影响，有好些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但是这个影响比较起来还是小的，对党内来说，1958年反对冒进，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这个不仅仅影响到党的经济政策、经济工作，而且影响到党内的生活，影响到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为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反对，而且党内在1958年出现一些人宣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有个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当时就没有人敢反对。这个同志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了。当然，1958年的错误，毛主席确实在1959年上半年做了很大的努力来纠正，这是很认真的。毛主席深深感觉到，他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外行。在召集庐山会议以前，毛主席已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经济工作看起来还是要陈云同志他们来领导。这个话也不是假的，毛主席说过多次。从1949年就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生疏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学习。毛主席也进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了一些学习，比如说《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可惜这种学习没有坚持到底，还往往过于匆忙地下结论。凡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方面，就尽量夸大，而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东西，就尽量否认，或者贬低。1959年纠正经济工作方面的错误以后，在庐山会议的后期又发生了批判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样以后，就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引到党内来，不但引到党内来，而且认为党内的阶级斗争比党外的、比社会上的还重要。这当然有一个发展的历史，我们现在没有可能详细写出这样的编年史来，讲出逐年逐年的发展。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些，一些地主保留了一些变天账啦，或者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时有些地主说了一些什么话啦，其他的事情，实在也很少。因此，阶级斗争到哪儿去找呢？后来就越来越到党内来找了。很出名的一件事不是就发生在江苏吗？“夺印”就发生在扬州，于是就成了全国的一相当标准的公式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夺印”的问题还是限于基层，而且，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也倾向于不赞成把它夸张得很厉害，当时毛主席说，基层组织有百分之二十烂掉了。刘少奇同志说不止，恐怕百分之三十也下不来。少奇同志对当时农村的形势估计得比较黑暗。这也是发生在江苏，他给江渭清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江渭清同志在江苏工作这么久，也不了解江苏的情况。所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党内来，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并不是说只有毛主席是犯错误的，其他的人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少奇同志确实在估计基层组织变质这个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过于极端了，并不是不存在一些社会矛盾、经济矛盾，不是的，而是把这些矛盾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都说成是敌我斗争，就完全弄错了。可是，这种错误由于我们党过去斗争的历史而形成的习惯势力，很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易产生，几乎就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这不是少数人，中央作出这些估计也是根据许多地方的反映，这是客观事实。这些地方的报告到现在还存在中央档案馆，是不能修改，不能否认的。这是互为因果，互相助长的。当然不能要地方同志负主要责任，还是中央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央先提出一个对阶级斗争长期性的很不恰当的、很过分的一种估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那么地方上当然也就抓了，抓了也就“灵”了。这样就出来很多的典型，很多的报告。所以，这段历史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那段历史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这段历史的投影。这个投影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阶级斗争是存在，是有，问题是扩大化了。所谓扩大化，就是一部分是有的，一部分是无中生有，数量上扩大了，性质程度上也扩大了。到《二十三条》的时候（这《二十三条》也是中央跟地方很多同志一起研究制定的），对全国形势的估计为，全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全国普遍地都存在这个危险。底下就说这也不要紧，只要我们认识这个危险，我们就可以跟它作斗争，就可以改变过来。现在大家头脑完全清醒了，这完全不是事实，怎么会社会主义的中国在1965年初存在全国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呢？社会主义改造后，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矛盾，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些矛盾不但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正常的发展，健全的发展，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些事例是用不着详细说了。从《二十三条》就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不断升级，一个支部书记或公社主任不能算了不得的当权派，再往前走就走到党内、军队内、政府内、文化界内各个方面都存在资产阶级代理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由小当权派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当权派了。上升这么快，当然有种种原因。批评《海瑞罢官》的过程，是促进大升级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毛主席早已对中央政治局不满意，提出两个独立王国，现在证明了。上海《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北京都不登了，这还得了，这成什么样子了？可见这不是支部书记烂掉了，不是一个支部烂掉了的问题了，政治局都烂掉了。因为这样，就要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到党内，即党内的阶级斗争。现在回顾起来，从1957年到1966年，究竟有没有哪一个案件能成立，是一个问题。当时举出来的一个例子是甘肃白银厂，现在已经完全平反了，报纸上发表消息了，说是完全反错了。原来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白银厂这件事，引起毛主席作出这个判断，说白银厂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在什么地方？就在冶金部，就是王鹤寿，因此就把王鹤寿同志的冶金部部长职务撤掉了，下放到鞍钢。把过去的阶级斗争，盲目地引用到新的时期，不但是引用到新的时期的社会上，而且引用到新的时期的党内来。

这种情况所以发生，除掉是由于一种习惯势力以外，也由于革命胜利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计。1945年估计革命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胜利，但是到1949年，革命就胜利了，超过原来的估计。并不是说1949年不应该胜利，而是确实胜利了，一些人觉得过去对困难估计太多了，对自己主观力量估计不足，这样就对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威力估计过高，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所谓“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当然，这话不能当做一个讽刺，共产党是要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外一种人间奇迹是创造不出来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那种人间奇迹永远也创造不出来。革命的胜利来得这样迅速，这样就发展了一种骄傲情绪，关于个人的宣传也就越来越高，发展到像1958年在中央就不太容易平等地跟毛主席讨论问题。所以每个领导同志都要接受这个教训，这个危险哪！并不是说一定要做了中央的才会有这个危险，哪一个在相当范围里面掌握一定权力的同志都有这个危险。过高估计自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作用，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信，这样就会走向反面。

在经济上的“左”倾，也同革命时期急于求成的心理一样，希望革命能够很快地实现。也希望建设能够很快成功。谁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这个希望完全是正确的，可是要达到这个希望，要实现这个希望，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这样落后的、人口众多的、情况复杂的国家，要很快地赶上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当时不是提出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在钢铁等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吗？当然，英国现在是一种走下坡路的情况，但是中国同英国仍然很难进行简单的比较，有一些方面中国的条件比英国有利，有很多方面英国仍然在中国前面，科学、技术、文化这些方面，中国还是远远不如英国，所以要超过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很不容易。希望尽快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自己尽快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苏联是世界上第二个大国，它不是也不断提出口号、指标，老也实现不了吗？苏联早已提出超出美国，到现在也没有超过。所以也不能说这方面的错误就是中国犯，别的国家也同样会犯，也犯过，或者还在犯。经济上的这种“左”倾，当然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缺少经验，但是同骄傲自满的情绪，过分夸大主观的作用，并且不能够容忍更谈不上接受正确的意见有关。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谨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简直把他当做所谓党内的右派，这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讲的了，也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这样讲。

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用阶级根源来说明？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人们（包括各阶级）曾经长期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荒谬行为，现在知道这是错误的了，但这个错误有什么阶级根源呢？没有，这就是认识的错误。它的确不是哪一个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讲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好多小资产阶级的根源，我预先就讲了，这个问题要进一步分析，不能认为1945年作了决议，这个问题就完全解释完满了。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发生的错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路就走错了，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问题本身就提错了。因为人犯错误，并不都是因为有个什么阶级根源，不但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会犯错误，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人犯错误也不能都说是由于阶级根源，如科学家搞试验经常要犯错误，你说这是什么阶级根源？这是胡扯。学生做习题做错了，也不能说是阶级根源，就是老师犯错误，也不能说是都有阶级根源。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用哪个阶级的根源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究竟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谁能够答复这个问题？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究竟存在哪些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当然还存在一些阶级，现在也存在一些阶级，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种行为，这个十年的历史，符合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你说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大家不承认，这不成问题了。你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哪一点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讲不通。好多资本家被扫地出门，搞得家破人亡，这怎么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呢？说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究竟什么阶级是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小资产阶级，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原来存在着，还有它的残余势力，我们还可以讲。我们不是讲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现在还存在吗？是不错。可是，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说农民吧，“文化大革命”符合农民的利益吗？是农民要求取消自由市场、自留地？这些办法，符合哪一省农民的利益？这是讲不通的。那么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符合知识分子利益吗？“文化大革命”恰巧是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了，不但打倒，有许多人都打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出来一个阶级根源，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避免给毛主席安上哪一个阶级的帽子，我们要对历史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责任。假如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并且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我们这个决议的灾难。结果认为我们的党里面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还有什么阶级，因此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社会上一个人犯错误，以至一个党犯错误，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我们也无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下去，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用阶级斗争去解释的问题，硬要用阶级斗争去解释，那么，在我们党内就要没完没了地进行阶级斗争。

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研究来研究去，还是现在《决议》的说法比较妥当。我们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都认识不足，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比较短的时期，可以比较快，虽然不像1958年想像的那么快，但也不是很远，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落后，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党内民主生活的不健全，我们对历史上的教训忽视了。人是很难牢记历史的教训的，比方1945年的《决议》里面批评“左”倾错误时讲：“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的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的和最简单的情况。”“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这不是说得很清楚，说得非常明白吗？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教训，自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写下来的，在七大党的中央全会前夕通过的，而且是授权七大以后的中央再作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才公布的，我们大家都参加讨论的。说得这样清楚的话："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不就是后来所说的斗争哲学吗？毛主席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对英国的蒙哥马利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斗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根本没有逻辑，用三段论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1945 年的《决议》说："在组织方面，……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对敌人做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的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训，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这些历史经验大家都忘记了，我们现在确实应该把这个历史教训好好记住，永远记住，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记住，使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永远记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十二

# 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

（1983 年 5 月 14 日）

**胡乔木**（以下简称胡）：这次你在中国走的地方比较多，谈话比较多，你所想要了解的问题都了解得差不多了吧？

**白修德**（以下简称白）：我在中国了解了很多情况，现在想了解的是你的一些想法，这是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

**胡**：我个人对一些问题的想法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党的一些重要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我曾在其中一些问题上参加过意见，这些意见已经成为集体的意见。当然，我很愿意谈谈你认为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我愿意按照我的了解来满足你的希望。

**白**：我知道胡乔木很谦虚，在美国文化界，你被认为是在政治局中在改革方面发挥主要影响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中国目前领导体制改革、文化改革、技术改革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物。请你谈谈这场改革的性质，以及作为学者、历史学家，你本人在改革中发挥的

---

* 此篇是 1983 年 5 月 14 日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的部分内容。标题是编者加的。白修德（西奥多·怀特）（Theodore H. White）：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1939 年从中国开始记者生涯，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对中国人民友好。他的作品在世界上有较大的影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作用和对这次改革的影响。

**胡**:可能美国一些学者从一些不准确的来源把我的作用夸大了。我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我不是起主要领导作用的人,我愿意按照事实,很客观地来作一些说明。这不是谦虚。自三中全会以来,确实有一些重要文件是在我的主持下与许多同志共同起草的,但起草的这些决议反映了党中央主要同志的共同意见,而且得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全体赞同,当然也作了许多修改。但比文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我可以坦率地、如实地解释这种情况,即我为什么在有些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些意见供党中央采纳。这同我是从延安时期以来一直在中央工作的少数人员中的一个有关,这同我与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个人在工作上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了解党中央的历史,了解它过去所作决定得到的正反两面的结果。

**白**:你与毛泽东在工作上是什么关系?

**胡**:我从 1941 年开始就是他的秘书。在延安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当时政治局的秘书。1956 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这个书记处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一直到不幸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始终同时是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所以,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在现存的领导同志中,我是比较熟悉者之一。因为在书记处工作,所以既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信任。邓小平同志对我非常了解,他认为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继续做他的助手,就像我曾经做毛主席的助手一样。当然,我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没有在地方、军队、政府机关担任过工作,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在政府机关中做过一段比较不重要的工作。因此,我的知识也是有限的。

**白**:我必须要在这谦虚问题上称赞你。因为我看过各种官方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的文件，这些文件往往冗长，使人难以看完。但我要说，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我们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文件的思路很清楚，事实阐述得很明白。这是我对这个文件称赞的意见。应该坦率地说，毛泽东的著作我都没有完全看完。

**胡**：关于六中全会文件产生的背景，我得要说明。首先，它的许多基本的观点是由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首先提出的，这些观点始终保持在文件里，一直指导着这个文件起草的全过程。其次，这个文件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在起草过程中，曾在几千人内进行讨论，经过至少三次很重大的修改。我认为，这个文件写得成功与否不是单纯的写作问题，像这样的文件主要是如实地反映历史，并从历史中得到正确的结论。在讨论过程中，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比如说，有些同志比较倾向于更多地原谅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另外有些同志则比较倾向更多地夸大他的错误，以至于认为错误这样严重，因而不愿再保留“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名词，或者不愿公平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贡献。当然，还有更加难以处理的分歧意见是怎样解释“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同志个人所犯的错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什么是造成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这确实是很困难的题目，对刚才谈的后面的问题，文件采取的态度是，认为历史不是单纯的个人、特别是个人感情、个人品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离开科学的态度，历史就会变成一种难以理解的事物，我们就会重复赫鲁晓夫在解释斯大林错误时所犯的错误。总的说起来，无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都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碰到许多客观上以至主观上的困难。白修德先生既然曾多次到过中国，并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也曾对中国有很多直接了解，那末，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不难理解建设社会主义会比推翻蒋介石、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还要困难。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把共产党大批领导干部都逼到农村去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可是,由此也给这些领导干部带来一些限制,使得许多领导干部对经济工作的很多方面不了解,对文化工作的许多方面不了解,对国际情况也有许多不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当然,这种不了解必然造成一些不幸的后果,而这种不幸的后果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方面发展比较顺利,而到后来逐步走上了曲折的道路。在这种曲折的道路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内部争论。毫无疑问,即使不是全体,至少是大多数党员和人民群众,都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最聪明的领袖。其他一些领导人也都有各自的长处。比如说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他们都曾比较长期或短期地在外国,在欧洲生活过,学习过,劳动过。此外,自从国民党反共以后,有许多同志曾在国民党地区长期或短期工作过,使得他们得到一些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志所得不到的知识和经验,这点也很重要 。刚才所说的这些因素,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概不显得那么重要,可到了建设时期,就显出了差别,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毛泽东同志曾去过苏联,但这段时间不但短,而且是不愉快的。他在领导革命战争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确实无与伦比的功勋。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农民战争历史,但过去一切农民战争都失败了,即使有的成功了,最后也变质了。惟有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到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广泛的胜利。当然,在国民党反动时期领导农民革命战争不只毛泽东同志一个人,但毫无夸大地说,是他创造了完全新型的军队,跟中国历史上所有军队,甚至跟外国哪怕是装备非常现代化的军队完全不同。他也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创造了在中国这种困难条件下，以弱小的、装备落后的军队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这是其他领导同志所不能跟他相比的。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享有了全党最高的威望，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全军的领袖。这一切是自然的，是历史必然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特别表现在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善于团结各方面的领导同志，使中国革命很快走向奇迹般的胜利。可是，在胜利以后，这种情况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由于他们的经验、知识不同，他们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开始发生一些分歧。当然，这些分歧是慢慢形成的，也就是说，它逐渐由小变大，由一些局部性质问题发展到根本性质的问题。

**白**：什么样的局部问题？

**胡**：比如说，由于革命战争在后期得到顺利的发展，使他产生一种想像，比较希望中国用同样的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同其他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尽管有些比较明显，有些是比较潜在、不明显的。比如，在建国初期，他能很正确地对待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取得成功以后，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与他曾联合，而且联合得很成功的资产阶级都逐步由不重视到强烈的不信任。到六十年代，他对这些资产阶级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扩大到对在农村里比较会经营的、比较富裕的阶层。在同一过程中，他对于在工厂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发生了怀疑。应该说，这种分歧的发展过程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营垒。毛泽东同志有些意见在党内也得到很多同志支持。而中国建设过程跟中国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又互相纠缠在一起，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和苏联逐步走上互相完全对立的地步。在毛泽东同志以及很多同志心目中，苏联不仅仅是中国的威胁力量和敌人，而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且，苏联已经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成了修正主义。后来对这种修正主义的态度同对国内的许多人，许多政策的态度也互相混淆在一起。因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心目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外面有修正主义，它敌视中国；内部也存在修正主义，它是敌视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他就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一种非常广泛而又深刻的不安全感。对于外部、内部的力量都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以至后来发展到一种危机感。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中国和苏联之间争论的起因和苏联一些非常错误的做法。这些情况非常复杂。因为有这样一些条件，党中央在对国内形势认识方面，可以说至少在表面上是一致的，都承认或至少不得不承认国内外都存在修正主义的严重威胁。可是，党中央接受毛泽东同志对国内外形势看法的同时，大多数同志还是认为中国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不然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而且不要把经济建设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可以用类似战争的手段或革命的手段就可以把经济建设推向前进。所以，在党内，这个时候就潜伏着两种实质上不能相容的矛盾状态。毛泽东同志也可能不自觉地改变了以前一个时期他所赞成所主张的观点了。比如，他有一句名言：中国一穷二白，因为一穷二白，所以中国需要建设，需要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穷，就要革命，就要改变，就要建设。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发展最新、最现代化的科学、教育事业。他在一段时间里是强调这一观点的。可是，随着他对国内以及国际上许多事件的观察，其中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观察，他认为，苏联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发展了，可是发展以后，并没有革命，而且，按照当时的观点，它走向了反革命。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由穷变富就要变成反革命。同样，知识越多越不等于他会坚持革命，相反，可以产生这种现象，即知识越多越反动。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白**: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

**胡**:知识越多越反动究竟出于哪个人的口我现在也不能确证。我可以说他有这种思想。在接近"文化大革命"几年中,他逐渐形成了这种思想。他确实说过:书读得越多越蠢。他反复强调缩短学校学习时间,要把课程砍掉一半。最重要的是在六十年代,逐步形成一个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说,虽然实现了社会主义,但还是要不断革命。要推翻一切他认为是离开革命道路,走上资产阶级道路的力量。他开始认为,在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在党外还是在党内,同苏联一样,到处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不能孤立地看,孤立地看就变成了非常神秘,非常不可理解的一种说法。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得到党内相当多的人的赞成。他们收集了很多例子来证明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尽管收集这些例子的人后来也被打倒了。我很难详细描述毛泽东同志各种观点的来由。总之,他既然有这样的观点,而又享有党内最高的威望,使他逐步形成要再来一次革命的思想。开始,他并没有在党内,在政治局讨论过。他对政治局已经不完全信任了,依靠的是他所信任的少数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最著名的是后来的"四人帮"。他对党的各级领导也逐步有一些不信任了。可是,他对自己创立的人民解放军是信任的,而对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不信任。他选择的林彪是一个完全的投机分子,是野心家。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就好像物理学上的惯性一样。毛泽东同志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革命战争得到胜利以后,还想要继续过去所进行斗争的方法。这样就同认为中国现在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是要改善人民生活的头脑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同志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而跟着惯性往下走的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人,有很多干部都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由于这个惯性,火车在拐弯处不拐弯,继续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进,那就要出轨了。这就是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解释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冲突、感情这类问题去解释。虽然不能说这里面完全没有这些因素,但基本上不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由于长期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新的条件下应该改变时有一股力量,它没有适应改变的需要,它坚持要继续过去运动的方向和方法。这样就造成了这场悲剧。

**白**:我一直在考虑你上午的谈话。你谈到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力量,这使我回想到在延安枣园时的情况。那时,毛主席住在山上,周恩来、朱德住得离他很近。山下住的是彭德怀、刘少奇。毛主席怎么能容忍刘少奇、彭德怀被迫害致死还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胡**:首先要说明这三位同志的相互关系。在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跟刘少奇共事的时间比较短。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是很亲密的。相反,毛主席和彭德怀是长期共事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但在这之中也产生了一些摩擦。他们的个性有些不同。彭德怀在华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这是他跟许多同志发生一些不愉快关系的因素。当然,其他同志也都有个人的缺点。你刚才说的三位同志,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但刘少奇、彭德怀都不像周恩来那样善于同别人包括毛泽东很好地相处。如我上午所说,这里最重要的不是个性上的差异,而是对某些问题的观点有重要的不同。拿彭德怀来说,他在 1959 年曾写了一封署名的信给毛泽东,批评 1958 年所实行的办法。这封信在今天看起来,还是相当委婉。但如果他采取其他方式的话,可能不至于导致后来那种不幸的结局。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很不容易接受哪怕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含蓄的批评，他觉得这是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他整个思想路线的挑战。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许多同志正在纠正1958年的错误，在平心静气时，他对这些错误是能够承认，能够改正的。而且，当时召集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为着纠正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还没有肃清的过火的"左"的错误。在这个时候，如果彭德怀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可惜历史没有这样发展。也许当时可能采取的这种纠正不那么完全彻底，但会给后来继续纠正过去的错误开辟一条顺利的道路。这就如同一个人有了伤口，伤口正在愈合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接触它。应该让它自己愈合，那么伤口是可以自己愈合的。但如果接触得不好，特别是接触时带有刺激性，就会引起受伤人的暴怒。这样，就会引起他们两位同志之间过去关系中的一些不愉快方面的回想，认为这是乘机报复。这好像是偶然事件，使得中国历史进程走到相反方向了。这里应该说明，这不单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个人之间的关系。彭德怀同志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与人相处比较粗鲁，对他不满意的人是不少的。另方面，大多数党的干部不愿意在这样困难的时候造成内部分歧，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损害毛主席的威信，造成一大批人对毛主席的攻击。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毛泽东同志曾邀请彭德怀到他家做客，对他说，我们的争论可能你是对的，正确的可能是在你这方面，这可以让历史来判断。同时，毛泽东同志任命彭德怀同志担任一项重要的工作。

**白**：那时他在四川？

**胡**：不错，担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应该公正地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毛泽东下命令调他回来，要跟他进行斗争，处罚他，甚至追究他的历史的。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主意。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白**:但毛是否知道彭德怀在医院病得要死呢?

**胡**: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非常离奇的局面。这是后人以及外人很难理解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所说,把一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以后,就很难收回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要人物表面上非常尊重、绝对服从毛泽东,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很多事情是他们干了,然后报告毛泽东或不报告。毛泽东对这些事情不是完全能够控制的。彭德怀究竟藏到什么地方,受到什么虐待,党中央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周恩来也不知道。只有林彪、江青等少数几人知道。这是绝对秘密的。甚至后来彭德怀病重到医院时,都是极端的秘密。他的名字被改了,没有人能够接近他。医院的院长也不敢泄露这个病人是谁。刘少奇、贺龙、陶铸还有很多人也受到同样的秘密摧残。这好像是难以理解的,其实是不难。因为毛泽东这样很有威力的人同任何有威力的人一样,不可能知道一切,决定一切。原来党的忠实的队伍完全被打垮了,掌权的人中有一些阴谋家。如同对付毛泽东一样,这些人完全有办法对付他们所要对付的人。毛泽东在他后期不像在早期那样,对任何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亲自处理。他只能依靠一些他所相信的人。而这些人只选择一些愿意让毛泽东知道的事情报告给他。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包括一些重要的情况。在那时,党是由一批非常残酷的极端分子把持着。有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有位老同志曾是铁道部副部长,他的妻子利用偶然的机会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在监狱里怎样受到各种各样的虐待,吃不饱饭,并且也没有任何权利。这封信居然落到毛泽东手里了,他写了很严厉的批评: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这是法西斯,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这样的人一定要严办。一定要给所有被关起来的人人道的待遇。这是我们党,是毛泽东亲自创造的传统。为什么破坏了?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刑讯、逼供的办法为什么又恢复了？可是，这样的问题不能够得出答案，说不出是谁干的。这是当时的一股势力，一股潮流。这是“四人帮”造成的。“四人帮”应该对此负责。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主要人物说一下。因在美国有人为这两个人物写书，把他们说得很好。这就是林彪和江青。事实上，林彪在解放以前仗打得不算最多。毛泽东所以起用林彪，是因为林反对彭德怀。在这点上，毛泽东跟林彪有共同的地方。从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林彪早在1962年就写道：不能说真话。他担任国防部长以后，实际上任何事都没有做，就是养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做什么工作。而最积极干的事就是打倒几位元帅，如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贺龙是死得最惨的。除此以外，林彪究竟做了什么呢？就是准备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并要培养他的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尽管在十大上，林彪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把它写在党章上。这是很荒谬的。在这时，毛主席也感觉到林彪不是同他真正情投意合的人。毛泽东发现林彪要培养他的儿子做第三任接班人。毛泽东再三提出不要再设国家主席。这本来不是原则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如果当时要设国家主席，林彪必然会当选。这样一来，林彪的野心就更加难以控制。为了节省时间，请原谅细节我就不再叙述了。林彪这种野心暴露以后，毛泽东仍然在党内，在许多同志中宣传：林彪虽有这样的错误，可是我们还要维护他的地位。一直到林彪采取实际行动杀害毛泽东。这种事外人很难设想，但这确是事实。林彪一伙派飞机去轰炸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毛泽东巧妙地、突然地改变了行车时间，飞行员又装病不去，轰炸火车的计划没能成功。这样避免了生命危险。林彪印发了有关攻击毛泽东的宣传品，同时布置了他能指挥的陆海空三军，阴谋在广东组织第二个中央政府，以便于同海外建立联系，事情不成功时还可以继续他的活动。这样的计划也失败了。当然，党不得不对林彪加以戒备，可并没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对他作什么处分。林彪在感到非常恐慌的情况下，非常匆忙地带着妻子、儿子乘飞机出走。他是想要飞到苏联去的。因汽油和飞机各种准备都不够，路线不熟悉，事前也未联络，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落了。苏联派人去看了飞机和尸体。证实是林彪，他们非常后悔事先没有联系。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美国出了一本书，说毛泽东要害死林彪，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公布有关档案，当然并没有这样的必要。

**白**：在这段时期你本人是否下放，受到虐待或软禁，是否安全地渡过了这个阶段？

**胡**：我多次受过“批斗”。我认为，在可能的范围内，我是能够直言的。所以，毛泽东对我虽有许多不满意，但他知道我是正直的人。经过一系列“批斗”以后，他下命令说只要将我软禁起来，而不作任何其他处理。这样我才能活到现在，不至于受到江青这些人的进一步迫害。1973 年、1974 年，毛泽东再三催问他们为什么不“解放”胡乔木，他有什么罪？他认为我没有什么问题，应该使用我。他们把我说成是叛徒，都失败了，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不得不恢复了我的自由。

江青跟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毛泽东跟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非常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的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但为什么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泽东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白**：1944 年在延安我见过江青一次。那是在毛主席的窑洞里，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留我吃饭。江青进来招待我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们吃饭。什么话也没说。她的举止使人感到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妻子,而且是尽责任的妻子。那时她还是很漂亮的,但现在使我感到她确实是很可怕的。

**胡**:因我跟毛泽东是比较熟悉,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假如要写个人的传记,这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很大的不幸。但毛泽东使用江青和林彪是有责任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参观。她认为小靳庄是她的一个代表作。她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也是多么残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十三

# 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

（1987 年 11 月 5 日）

三年多不见了。对你第七次访华拟写新长征的努力表示钦佩。相信会与第六次访华写成长征取得同样的成功。

你的提问很有意思。邓小平的双重贡献是十三大的重大主题之一，你写的长征也结束于 1974 至 1975 年的邓小平的一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形成和发展的道路上，1974 至 1975 年邓小平和毛泽东和“四人帮”三者之间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当然，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李先念等早就不同意毛泽东的许多看法。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在 1957 年下半年把反右斗争扩大化，这就意味着党在 1956 年八大规定的中心任务（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发展阶级斗争，那已不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被否定了。由于以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主要任务仍然是阶级

---

* 此篇是 1987 年 11 月 5 日会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谈话。标题是编者拟的。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Harrion. E. Salisbury）：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曾任国际合众社记者、编辑，《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等职。1972 年后曾 5 次访华，著有《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这样，他就走上了空想的道路。继续坚持用主要力量发展经济、坚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党的其他领导者和广大干部，就不得不采取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来与毛泽东争论，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现在不可能作详细的回顾，那占时间将太多，只需指出，这种斗争虽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条件下也没有中止。只是到1974至1975年邓小平重新居于领导地位以后，这场斗争才出现在舞台的正前方，为党内外的公众所周知。这也就是你所提问的当时政治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至于其他内容，即邓小平和毛泽东在约一年时间内共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邓小平重新进入领导岗位的过程是：1973年3月重任副总理；1973年12月任军委总参谋长、政治局委员；1974年4月率代表团参加联大；1974年10月至1975年1月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是否重用邓小平，在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这是很自然的。“四人帮”这一名词也就是在这场斗争中（1974年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警告江、张、姚、王不要搞四人小宗派）提出来的。随后不久，1974年10月，因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决定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就使邓小平代替周恩来成为“四人帮”夺取权力的主要障碍。“四人帮”竭尽全力来阻挠邓小平的任职，但失败了，结果是毛泽东对他们更为憎恶。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这表明他认识到对经济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此时，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个观点被写入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他同时还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与“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邓小平得以在政治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线(同时也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重要工作并系统地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先决条件。尽管抓革命、促生产的说法和1966年12月《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在工交企业中全面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由此造成的组织混乱、干部损失,使工交企业陷入严重困难,但一般说来,经济工作在邓小平任职以前,也还在挣扎着前进。周恩来1972至1974年主持工作期间,已经针对“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要求整顿企业管理状况。邓小平主持工作,继续和发展了周恩来所开始的对工交企业的整顿。1975年2至9月,先后召开了解决全国铁路运输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南方十二个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提出如下重要原则性的口号:“治乱安邦,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党全国都要为(二十五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这个口号就是现在要实现的第三个奋斗目标。“三项指示为纲,1.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2. 安定团结;3.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样,邓小平的主张就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你会注意到,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这由周恩来在1972年初开道,毛泽东也表示赞同。

邓小平进一步突出整顿的问题,使政治战线的斗争逐步深入和扩大。到九月,斗争已扩大到全国各方面。除军队在一月已提出整顿外,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文艺要调整,也就是整顿)、科技都要整顿。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班子。“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在这些口号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组织措施:

1. 在军队中强调军队要统一,要整顿,清除林彪影响,不准闹派性,整风、缩编。这使军队重新掌握在老革命派的手中,成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的首要保证和首要力量。

2. 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寸步不让。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使被摧残的党的战斗力得以恢复。

3. 解放大批被关押、虐待的老干部三百多人,决定被关押者绝大多数要“释放、分配、补资、平反”,最后撤销专案组。强调要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的作用,对青年干部强调“台阶”论(这在当时的意义所指是很明显的),要落实对老劳模、老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

4. 强调规章制度,工业要抓利润。

5. 强调教育以教学为中心,提高教师地位。否则危机可能出在教育方面。

6. 强调科学技术,指出是生产力,否则要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这些措施收到了实效。军队大权夺回,党的阵地大为加强,国民经济自 1975 年 3 月后逐月好转,五、六月创月产最高水平,财政上半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军工生产在七、八月召集会议以后也全面好转。

这个成就是邓小平及其他同志们在毛泽东与“四人帮”矛盾上升的情况下取得的,虽然十分难得而且说来令人惊讶,但也是基础不稳定的。关键是在:毛泽东虽然要求安定和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仍然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因而邓小平的政策发展到一定时期,两者的矛盾又必然上升。邓小平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对教育科学的整顿方针首先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0月，由于争论涉及某个毛泽东所信赖的人，这一矛盾表面化了，成为批邓反右的导火线。

因此，围绕究竟是要发展生产力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当时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不难看出，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矛盾为什么同样不能解决。毛泽东最后还是把权力交给了华国锋这个“凡是”派，而不是“四人帮”。毛泽东这时是空想的革命家，他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四人帮”和林彪一样，是假革命即反革命的阴谋家，他们只想把一切搞乱，乱得越彻底越利于他们夺权。这样，三者的矛盾都难以调和，但邓小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破坏和阴谋。毛泽东认识到“四人帮”有阴谋诡计，但没有认识出他们的反革命本质。毛泽东认识林彪的反革命本质也为时过晚。同样，毛泽东最后虽承认“文化大革命”遭到多数的反对，但未能认识到它本身就是绝大的错误。

上面所说的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本身就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不承认既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或它的初级阶段的事实，不承认既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就不能继续成为主要矛盾，而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不成为新的中心任务的事实，这些都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空想，都显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认识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历史观点上都是如此。这也违反了毛泽东曾经作了最重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这是从实质上看。就当时的现象来说，毛泽东在授予邓小平权力的同时，多次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学习无产阶级专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政理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直到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除所有制不同以外，一切和资本主义一样：还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不但小生产者，连工人、党员、干部都会变成“资产阶级”，因而“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四人帮”在这方面大肆渲染，甚至把毛泽东的一些话莫名其妙地歪曲引用，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同时提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且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全面学习，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加以割裂。这是针对林彪、“四人帮”而言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大量空想主义的提法保持沉默。

说到文化方面，这跟经济工作中的情况大致相同。毛泽东在1975年确曾在知识分子问题和文艺文化问题方面多次表示要放宽。这些表示当然为邓小平所拥护，同时也当然是对“四人帮”的重大打击。但到“批邓反右”以后，一切又倒转了。如你所知，这个倒转在1976年第四季度至1978年第四季度，就又被颠倒过来。

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就始终只是一个空想家。对此现在不作详细讨论。你已看到，毛泽东的宝贵遗产一直受到继承和发扬，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二十四

#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成果*

（1991 年 6 月 25 日）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历史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成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确地宣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必然随着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世界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成功的运用，也必然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也必然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自的发展。中国是个大国，是个东方大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是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可能不是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重大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把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

---

* 此篇发表于 1991 年 6 月 25 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探索，而为了把两者成功地相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正是两者相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一贯要求中国同志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要从客观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努力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并且长期教育全党，使全党接受了他的这一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并一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现在，我们就中国共产党在哪些重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哪些发展简要地观察一下。

（一）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思想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党逐渐认识到，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首先领导农民在农村中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游击战争，进而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是不可设想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要争取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西欧的农民（他们的情况跟中国的农民很不同）却缺乏革命的要求，而当时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又还没有发展到东方。列宁提出了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注重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的党并没有领导农民斗争的足够的经验，十月革命的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由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宣布和实现的，而不是由农民通过自己的革命斗争实现的。真正解决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任务，不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能不历史地落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共产党人身上。在1927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既不能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又不能通过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种形势要求党非把主要的力量转向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不可。中国的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但是中国农民的惟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惟一出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毛泽东。他在领导秋收起义未能达到党所预定的夺取城市的目的之后，毅然决然地把失败了的队伍领上了湖南江西边界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在理论上论证了在全国的反革命形势下为什么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以后，他又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领导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并且在理论上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将可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实现。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后，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终于胜利地发展成为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党究竟是依靠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当然我们决不能忽视城市各阶层人民（以工人和青年学生为先锋）在开辟革命战争的“第二战场”中的作用，但是革命的主力，无疑是接受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亦即贫农和它的同盟军中农。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地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组织训练的问题。党把如此众多的出身小生产者的农民在斗争中教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和坚定的党的干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迫切要求土地和其他生活权利、贫苦而缺少文化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竟可以激发出如此伟大的革命潜力，可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以组织成如此有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可以经受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所施加的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围攻和迫害，可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也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

（二）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创造性思想。农民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同有一支由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分不开的。当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时，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理的人，因为历史上很多统治者或统治地位的追逐者都懂得它，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都懂得它，欧洲有工人武装起义传统的党也曾经懂得它，而且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曾领导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他只是在当时不与国民党争军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第一个说出了这个真理。蒋介石的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拿起了枪杆子，同反革命作斗争。中国成立了工农红军。红军的名字是从俄国学来的，但是中国红军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与俄国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由上而下成立起来的情况很不相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国人民军队独立形成的一系列至今在世界上少有的特点。毛泽东把红军的性质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他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否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红军既是这样的组织，就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就必须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争取敌军的原则，就必须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就必须遵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最严格的群众纪律，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时处处为群众服务，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进行各种革命斗争。党在创建武装力量和领导武装斗争中，实行并坚持了诸如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机关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忠实工具，从而科学地规定和处理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关系。这样，红军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武装力量。红军后来改名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又改名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环境尤其在建国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建军的根本原则却没有也不容许有任何变化。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始终是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是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部队长期驻守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边防地带，帮助驻地（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海岛）的建设，发展和维护广大高寒地区的交通运输，他们默默地克服着常人所难以想像和忍受的危险、痛苦和困难，包括必要时击退侵略者的挑衅和入侵，不屈不挠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奉献着一切。人民解放军经常担负着繁重的训练、建设和生产的任务，经常出现在一切发生巨大的自然灾害或人民迫切要求紧急援救的地方，而且经常地在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起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解放军中大量涌现雷锋式直至苏宁式的既尽忠职守又忘我地为群众为战友服务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是偶然的。由于具有同人民群众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我军在军事上就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套战略战术使我军在十年内战时期和八年抗战时期得以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而在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得以迅速地最终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多万军队，比预计的时间更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任务。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这种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内容，随着战争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十年内战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加以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作出规定；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当然，将来可能发生的强加于我国的战争，由于战争条件和军事技术的不同，一定会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产生更多的新的变化。我军在现阶段所紧张进行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是瞄准着风云变幻的未来世界的。但是如同我军是人民军队这个根本特征不会变一样，我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个根本特征也不会变。人民军队这个关于武装力量的新概念，它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新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战争所形成的战略战术的新特点，不但在革命史、军事史和军事学上有其伟大的意义，而且在国家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三）在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创造了独特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策略原则。革命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发展的特定的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统一战线，这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见。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写着：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等等。但是历史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功经验确实是不多。在中国共产党怎样与国民党建立或保持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就往往（不是全部）是不中肯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指导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当然，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主义的领导仍然要负主要责任），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也曾造成一个时期的混乱，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抵制，才避免了这种混乱的发展。抗日战争的八年是国共两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党既合作而又尖锐冲突的八年。这次国共合作不同于西欧国家共产党与社会党所曾形成过的合作(当然国民党也不同于社会党),一则这种合作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协定,没有一定的规章可循;二则这种合作是两个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和政权的政党之间的合作,而且一方居于中央政府的地位,还采取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另一方既不被承认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又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地方政府的范围。后者的力量远弱于前者,而在政治上远强于前者,它必须在斗争中求生存,而又确能在斗争中求发展。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中求发展,这首先是因为国共两者的团结是为了共同抗日,在它们两者之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在日本占领区(敌后)共产党大有发展的余地;其次还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国共两者之外还有一个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是共产党所必须争取和可以争取的同盟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了和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斗争求团结",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其他人民力量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最终由对国民党的劣势变为对国民党实质上的优势。诚然,这样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党站在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立场,站在坚持人民利益的立场,但是如果不是坚持实行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方针,得到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原则的具体运用,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这里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要在统一战线中实行以斗争求团结,不要说做起来很困难,就是想起来也会使不深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感到大惑不解。中国共产党不但由此证明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远胜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家,而且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世界政治斗争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自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然不限于对待国民党，也包括对待一切其他同盟者。毛泽东曾多次着重指出，共产党员在社会上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与党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可以总结的宝贵经验很多，可惜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加以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统一战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的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已经日益制度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在这种多党合作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一定不能动摇，这已经是实践所证明的了。

（四）创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从最初成立时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到现在的五千零三十二万党员，成为中国的领导党和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当然有丰富的成就。我们在本文前面所说的领导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领导人民战争、领导革命统一战线，这些都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之一。这是中国党的长期革命斗争必须坚决依靠群众支持和集中群众智慧的表现。毛泽东关于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可能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和“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思想。而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则出自他的首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有过许多的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经这样解释毛泽东所倡导的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由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除了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特殊的利益的观点，上升到只有革命的阶级、革命的群众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升到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才是惟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了。

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直是党对待劳动群众、革命群众的指针，是使党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党在居于执政地位以后，特别是党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出现了某些松弛的现象。一部分群众对党内的某些腐败现象的不满，为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的诱因之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实极为重视。为了坚决改变这种状况，在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中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力争今明两年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最关心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从今年起,每年年终总结工作,都要结合检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考评干部,以利于不断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

(五)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正确区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党的建设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党内斗争的讨论很多,却很少提出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并且要求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作的决定统一全党的行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党内的思想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难以避免地常常发生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尤其难以避免。为了保持党的纪律、团结和战斗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就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其中有不少是错误的,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的效果都是很不好的。1942 年,毛泽东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了教育团结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了错误的绝大部分同志,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从而达到了团结全党的目的。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空前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而七大的圆满成功又为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的基础。随后,党又扩大了应用这个方针的范围,在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又把这个方针应用到对民主党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和工商界方面来，并在1957年2月根据这个方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加以系统的说明。尽管从1957年夏季反右派扩大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期间，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是它毕竟已经在全党形成了长时期的历史传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的影响。正是根据这个方针，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成功地处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所遗留的异常繁重复杂的问题。接着，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空前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十年来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对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处理，党同样是按照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方针进行的，因而迅速恢复了国内局势的稳定。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原理，还有另一方面的重大意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基本完成了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随后不久，毛泽东又针对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针，指出中国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将要长期存在的国际背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严重注意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矛盾的新形态。毛泽东的这个英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明的预见，已经为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国内国际政治生活所证实。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

(六)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列宁在1920年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的设想。① 但是由于缺乏实际经验，不可能形成成熟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创造了新经验，毛泽东据以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贡献。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对于受十月革命影响、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大而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积极性比较薄弱的国家，革命人民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这时已经拥有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在抗日战争的发展中证明他们的军事主张和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和有效的，而且已经拥有多方面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政治威信，足以对未来中国的前途拥有有决定影响的发言权。诚然，《新民主主义论》书中所引据的斯大林所说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任何民族问题，任何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作出的)，后来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所证明；毛泽东后来也对这个观点作了公开的修正(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710页注[17])。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新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9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民主主义论》的预见。

（七）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必然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1953年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的实践证明，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后一个任务是比预期的时间更早地完成了。这里不讨论在完成这个任务中有些什么简单化或其他可以避免的失误，而只讨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和平改造的这一历史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设想；列宁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则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有代表人物参加政府机构；在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广（尽管中间又经常发生冲突甚至严重冲突）；他们表示拥护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它的分配政策，即他们只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左右作为股息红利，而其余则分别归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和职工福利奖金；最后，他们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他们同意只接受一定时期内按核定的私股股额每年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这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样，中国就得以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有史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今后人类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许还会比中国共产党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国的这个经验无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的智慧和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绝不因为后来变得极端刻板化的、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体制按广大农民的要求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而失去意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经营形式，它在土地公有，大型农田基本设施和大型农机具公有，乡镇企业基本公有，乡、村两级经济组织对个体农户的生产和经营进行协助、服务和调节（所谓“双层经营”）等方面，都继承和巩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成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后　记

在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又一次引起我们编写组同志对乔木同志的深切怀念。两三年前他亲自指导并参与这本书编写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他的身体因癌细胞扩散已经很衰弱了，但还是异常紧迫地主持这项工作。他从1991年10月起以每周一次的高效率就这本书的写作连续作了十多次谈话。有的谈话竟是在医院的病室里进行的。他竭力搜索记忆，整理思路，在谈话中广泛地涉及四十年代毛主席一些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具体资料，涉及他本人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涉及对这本书的总体设计和各个专题的写作要求，等等。他亲自翻阅和选择历史档案，并为文稿中得以使用一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欣喜。他还随时对写出的文稿从观点、材料到文字提出种种中肯的修改意见，要求我们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在1992年4月审阅三篇修改稿的时候，他满意地表示，如果其他文稿都能写成这个样子，那就算可以了。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这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貌出版，能够对四十年代毛主席的重要思想和活动有比较系统深入的反映，那主要是乔木同志倾注了他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一生中最后的全部心血的结果。但是，这项工作显然是动手得太晚了。乔木同志终于没有能继续指导编写工作直到它的完成。尽管我们力求按照乔木同志认可的三篇文稿的标准整理修改其他文稿，这本书还是不可能达到他所期望的那样高的水平。至于原定编写回忆五十年代毛主席活动书稿的计划，更是无法实现。这是令人十分痛惜和遗憾的。乔木同志的七十自寿诗中有句云："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现在，"弦急琴摧"已经将近两年了，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实现他的一部分遗愿，能告慰他的生前友好和敬重他的同志们。

这部著作得以出版，还要感谢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鼎力支持。

先后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以下一些同志。

从1990年初起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有：东生、邱敦红、徐永军等。

1990年9月至1991年9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理论组参加编写工作的有：石仲泉、田松年、张宁、顾龙生、高路、陈晋等。

从1991年9月开始，成立了由龚育之、郑惠、石仲泉负责的编写组。

参加"谈话录"整理工作的有：郑惠、石仲泉、鲁振祥、章百家、邱敦红、徐永军、施肇域等，由郑惠负责整理完成。

参加"初拟稿"撰写工作的有：石仲泉、东生、鲁振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章百家、邱敦红、徐永军、施肇域等，由石仲泉、郑惠负责统改。

上述两部分文稿，龚育之全部负责看过，作了修改。

张高富负责编务工作。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等同志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写组**

1994 年 7 月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 增订本后记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自1994年9月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虽然因为作者过早地离开人世，这部著作未及完篇，但是，由于它相当系统深入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四十年代的主要思想和活动，由于作者渊博深邃的识见、知人论世的睿智，以及整理者融入的丰富档案史料，仍然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得到读者喜爱，受到学界重视，是此书应得的回报。

胡乔木自1941年初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由"学徒"至助手而终至于获得"党内第一枝笔"的赞誉，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了解和认识，感受和理解，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从1951年"七一"前夕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到1991年"七一"前夕发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阐述、宣传毛泽东思想，编辑、整理毛泽东著作，是胡乔木毕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为突出的贡献。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感到，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加以扩充，把胡乔木在其他场合论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篇章增收进去，使之成为一部全面反映胡乔木谈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专题著作，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是对毛泽东的极有意义的缅怀和纪念，也为读者和学界提供一部学习与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值得信赖的读物。

胡乔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1951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代表作。在这篇影响深远的力作中，胡乔木按照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奋斗历史的四个阶段，论述了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扼要地介绍了毛泽东主要代表作的历史背景、思想理论价值及其伟大作用，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此文论述毛泽东各个时期代表作的部分都选入了本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六中全会前后，主要是在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工作的过程中，以及在六中全会后宣传和解释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就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围绕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三十多次讲话、谈话，回答了当时国内外提出的疑问、进行的争论，澄清了种种误解及片面认识，批驳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诬蔑、攻击，有力地论证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胡乔木第二次相当集中地论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们从中选出21篇，收入本书。其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和《毛泽东思想要讲三个组成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在这些篇章中，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毛泽东提出了工作中心的转变，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永垂不朽的，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决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他主张，《历史决议》要回答“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坚持什么”的问题，对此，胡乔木作了充分的阐述，在《历史决议》中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胡乔木又指出，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结合建国以来的历史，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特别是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犯“左”的错误的原因。同时，胡乔木又明确指出，在1957年以后十年这一段，毛主席还是关注经济建设的，党一方面沿着毛泽东思想轨道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则。胡乔木着重分析了毛泽东犯“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期的全局性错误的原因。同时又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跟林彪、江青完全不同，要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地分开。

胡乔木第三次较为集中和系统地评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1991年开始的回忆毛泽东的写作。他本想从自己了解的情况入笔，写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写成一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惜没有来得及完成。在此之前，胡乔木有两次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同美国记者的谈话，内容广泛，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见解独到，还包含若干外人所无从得知的胡乔木与毛泽东个人交往方面的史实。我们也收入本书。而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交相辉映的又一篇力作。按本书主题规范，我们选录了其中论述毛泽东时代的部分。

以上所说，就是这个增订本增加的《胡乔木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经增订后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分为两大部分：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正文一仍原样。二、《胡乔木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共收文24篇。按时间先后编排。

《胡乔木传》编写组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